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

生民无疆 著

Question about Western Civilization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 / 生民无疆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5

ISBN 978-7-80234-769-4

Ⅰ.包… Ⅱ.生… Ⅲ.文化史—西方国家—通俗读物 Ⅳ.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1291号

书　　名：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
著作责任者：生民无疆
出 版 发 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80234-769-4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960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310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联 系 电 话：（010）68990646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编辑手记

这注定是一本引发争议的书!

当我们在“天涯社区”寻找选题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稿,当时它还仅是一篇帖子,名字叫“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帖子地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81217.shtml)。我们立刻被帖子的内容所吸引,当然,最让我们关注的还是后面的跟帖(**有3万条之多**),因为里边充满了激烈的争论。网友各占立场,纷纷向敌方开火,火药味甚浓。我们是编辑,不想让自己的立场影响对书稿的判断。经过认真的阅读和分析,我们断定,这是一部蛮有出版价值的书稿。

作者“生民无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西方文明、反思中国文化的崭新视角,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明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而我们中国文化也许有着自己独有的价值。作者的态度并不偏激,他尽量用客观的材料说话,正如他自己在帖中所言:“本书所用资料,凡涉及西方世界的内容,全部取材于西方专家的学术著作;凡涉及中国历史的部分,亦尽量取材于西方学者的著作!”我们做了核查工作,的确,材料都是经

得住考验的。虽然材料是严肃的、权威的，但作者的语言却是生动的、活泼的，这一点从本书的各节标题中就能看出来，如“拷贝来的希腊‘学说’”、“莫把评书当历史”、“罗马议会的悲喜剧”、“可怜又可嫌的东罗马”、“披裹羊毛学经商”、“暴富暴穷的黑帮老大”……作者这样做的苦心，无非想让读者轻轻松松地学到真正的历史，当然，这也正是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

值得欣喜的是，**本书受到了国内著名畅销书作家成君忆先生的青睐**，他以极大的热情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我们除了要向成先生表示感谢外，更要认真出版好此书，以不负作者和方先生的厚爱。

说中国一直比西方落后，想来很多国人不会认同，毕竟，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不可抹杀的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忘记过去，并不能使我们更好地奔向未来；相反，梳理好过去，倒有助于我们迎头赶上。严格来说，作者也有偏激些的情绪性表达，他称呼那些一味吹捧西方文明的人为“哈洋族”。一时，我们不好决定是否应让作者修改；后来，我们认可了作者的这点“血性”。但为着能引发公平公正的讨论，甚至争论，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朋友对本书“拍砖”，如果您说作者是“哈中族”，我想，我们也不会反对。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自然，看待事物的立场和角度也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您细心阅读本书。我们相信，只要您细心地阅读了本书，一定会有所收获，至少，您会对自己以往的观点有所思考，哪怕您变得更加坚持了。

推荐序
Preface

中国人的围城困境

相传，法国有谚语曰："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因为憧憬想进来，城里的人因为厌倦想出去。"1947年，钱钟书先生因之而写作小说《围城》，以机智与幽默的文字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很多人开始发现，"围城"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态。

事实上，小到我们各自的人生，大到我们共有的家园，都有可能成为一座进退失据的"围城"。因为这种"围城"似的心态，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快乐生活。在许多不幸福的男人眼里，老婆总是别人的好，反之亦然。家乡的美总是要别人来发现，在这种美被发现之前，许多人早已怀着对远方的向往，远走高飞。几乎每一座城市的社会文化，都会遭到来自市民们的极端恶评，例如上海女人总是瞧不起上海男人，说他们"女里女气"；武汉男人总在指责武汉女人，说她们"恶燥"，却无视她们敢作敢当的壮烈之美。而在"哈洋一族"的学者们眼里，外国的月亮总是比中国的圆。

1840年的中国似乎也是一座"围城"。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向以"天朝大国"自诩的中国人开始丧失文化上的自信。到了1872年，根据容闳的倡议，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

共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实指望这些孩子能师夷长技，学成后归来报效国家。孰知幼童们登上大洋彼岸，立时便遭遇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并深以拖在脑后的长辫子为耻辱。从小学到中学，幼童们使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的人生观因此变得西化，并开始对“四书”、“五经”产生强烈的反感和质疑。与此同时，西式教育也在登陆中国，并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私塾和书院。当此时也，一方面是朝廷的专制和腐败，一方面是西式教育的民主思潮，便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自兹以来，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士在时代的洪流中崭露头角，也有许多崇洋媚外的“哈洋族”在中间推波助澜。

革命斗士的爱国之志自是令人敬佩，但“哈洋族”的上下其手却无疑会挫伤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些“哈洋族”总是习惯于鼓吹西方的文明，而对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则是极尽质疑、讽刺、挖苦之能事。某些“哈洋族”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几乎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他们习惯于用一种叫做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不做研究，或者在做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主观的定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大堆等待批判的材料，但事实上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相。时至今日，在中国学生的教科书里，依然充斥着大量的“哈洋族”课文，并因此培养出了“哈二代”、“哈三代”、“哈四代”，岂不令人叹息！

直到有一天看到网友“生民无疆”的文章，顿时便有了所见略同之感。我所谓“哈洋族”，“生民无疆”先生则谓之“洋奴”，在激扬文字之间，尽兴挥洒他的爱国之情。尤其是当他遭到“哈洋族”的围攻时，他的反击显得那么从容而又漂亮。

例如，他这样讽刺那些“哈洋族”：“天下竟有这样的人，一旦别人称赞他妈漂亮，他就骂人，而且高呼他妈从来就丑陋无比——尽管他妈很漂亮，年轻时是天下第一的大美人。”

例如，他又调侃说："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美化一下自家的祖宗，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那就不好理解了。"

例如，他又说："因为今天落后，就骂自己的祖宗的人，首先是缺德欠教养，第二是缺骨头欠揍。"

和"生民无疆"一样，我也爱我的"妈妈"，她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妈妈"。她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却因为时乖命蹇陷入了一时的窘境。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所有不尊重母亲的人子都堪称不肖。由是而观中国，不肖子孙可谓多矣！

"生民无疆"又说到自号黎明老人的吴虞。吴虞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后来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章，猛烈抨击儒家学说和他所谓的"封建礼教"，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和"启蒙思想家"。为了与家族划清界限，他辱骂自己的父亲是"老贼"，亲手痛揍自己的父亲，与父母分割家产。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不肖的儿子，也是一个顽劣的父亲，宁可花钱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肯花钱让自己的儿女上学。"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的家族文化，被他老人家立时摧毁得面目全非。

而今，"生民无疆"将他的文章整理成书，名之曰《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却少了许多风发的意气，多了一些现实的理性。他又邀请我为之作"推荐序"，我感慨良久，思绪万千，不知从何"序"起。在这个寒气侵骨的冬夜，我的思绪从一座"围城"游离到另一座"围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的"围城"，许多人的"围城"，我们这个国家的"围城"……于是，遥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陷在围城困境之中，或痛哭，或沉思，或疾呼，或革命，在左右冲突之中寻求着出路。生民如此多难，心中怎不悲悯！

人性本善，没有人愿意做不肖的子孙；世间万象，皆是事出有因。我们需要思考的问

题是：到哪里才能找到围城困境的解决之道呢？“生民无疆”说：“我坚信《国际歌》中的一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我则以为，救世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他不在外面，不在某个外国人或者某个权威学者那里，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感谢“生民无疆”，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用心良苦的历史读本，让我们能够得以破除对西洋文明的迷信。或许就在那一破之间，真理之光忽然照耀我们眼前的迷雾，让我们在恍然大悟中找到那种原来如此的释然和解脱。

畅销书作家　成君忆

2011年12月12日于旅途

目录
Contents

引言 / 1

第1章 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 / 7

村庄联合体 / 9

愚昧、野蛮、封闭 / 10

希腊经济发达吗? / 13

繁荣的“东方” / 15

希腊化还是波斯化? / 17

希腊拿什么搞科研 / 20

希腊科研无目的? / 22

拷贝来的希腊“学说” / 23

值得玩味的“巧合” / 25

智慧来自东方 / 26

莫把评书当历史 / 29

依依惜别原始社会 / 32

苏格拉底为什么“反民主” / 36

第2章 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 / 39

罗马议会的悲喜剧 / 40

“八旗子弟”的天堂 / 43

武夫的黄金时代 / 45
罗马的“海军” / 46
赤字外贸的工商业 / 47
“自治”的“城市” / 50
罗马城：古今第一的“休闲城市” / 52
罗马的教育：“军事训练” / 54
罗马的科技：“成就很少” / 57
可怜又可嫌的东罗马 / 58
人性澌灭的时代 / 61
血腥刺鼻的罗马法 / 63

第3章 中世纪：文盲武夫的时代 / 67
日耳曼人走出丛林 / 68
大师白描中世纪 / 70
田园牧歌时代 / 73
文盲时代 / 75
无国都时代 / 78
细胞裂变时代 / 80
神权时代 / 83
无货币时代 / 86

十字军东征与全盘“阿化” / 88
披裹羊毛学经商 / 90
西方的经济强国 / 94

第4章 海洋文明——血腥扑鼻的伪概念 / 97
西欧：阿拉伯海盗的乐园 / 99
肩扛十字学海盗 / 102
寻找“软柿子” / 105
阿拉伯人：欧洲海盗的师傅 / 108
暴富暴穷的黑帮老大 / 111
英国：民间海盗转向国家海盗 / 115
法国：醒得晚动作快的海盗 / 119
真实的海洋文明 / 122
中国的海洋文明 / 128
“海洋文明”与“怀柔来远” / 133
“海洋文明”带给中国什么 / 138

第5章 商业文明——端着刀枪做生意 / 143
儒家重农也重商 / 144
宋朝：“成熟的资本主义” / 146

不比不知道 / 149
哥伦布交换 / 151
“哈洋族”缺少饿肚子 / 153
欧洲人的新农庄 / 158
暴发前夕的英法工商业 / 162
仗剑经商，强买强卖 / 163
法国：变革与工商业 / 170
中英自由贸易 / 173
数字游戏与“商业文明”的启示 / 177

第6章 科技文明与“李约瑟难题” / 181
希腊文化无需“复兴” / 182
天上掉下个牛顿 / 183
“文艺复兴”与阿拉伯学派 / 184
拜师学艺 / 186
再说牛顿 / 189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文艺 / 190
宗教改革的价值 / 193
战争与掠夺：技术进步的催化剂 / 195
启蒙运动：让欧洲穿越时空 / 198

天问时代 / 201
莫名其妙的“李约瑟难题” / 204
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 205
启示：高科技不如烧火棍 / 211

第7章 神主与民主 / 215
契约是怎样炼成的 / 216
契约社会 / 219
家族制度与族权 / 222
欧洲人的“奴性” / 227
欧洲的女权 / 231
英国革命：贵族圈子的游戏 / 235
18世纪：伏尔泰的世纪 / 238
血腥之下无民主 / 240
跌跌撞撞向民主 / 242
中国的“专制”史 / 247
儒学功罪千秋评 / 254

第8章 结语：对外开放的条件 / 261

引言 Foreword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三代五代的祖宗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8世纪，不少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在完成对中国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说：“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

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或空运、或飞鸽传书地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又为何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如此好用的“数码”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

有趣的是，丹皮尔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既然亚历山大之后是“希腊化”时代，那么，东方文化又如何能“影响”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怎会如此弱不禁风，“影响”一下便从欧洲销声匿迹？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是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

不知道丹皮尔是否联想到：阿拉伯帝国正是建立在原“希腊化”国家的地盘上，

这里的“东方文化”既然能让欧洲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为何对阿拉伯人没有坏影响?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

不知这“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他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所以，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种心态，安田朴有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其实，并非所有的西方专家都那么褊狭固执。古罗马，在许多西方专家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饥荒、无视科学等等，也无一漏网；中世纪是西方专家公认的“黑暗时期”：文盲遍地、杀伐不断、关卡林立、动辄饥荒、城乡贫困、臭气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不过，当西方人为自己的祖宗树碑立传时，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祖宗，美化一下自家的血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那就不好理解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有些人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他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他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有“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之称的吴虞教授，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他们的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在他们的笔下，中华5000年历史，就是辫子、八股文、小脚、太监、贞节牌坊、姨太太等等，而这些都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

辫子，本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民主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审美自由、个性张扬的世界，有人喜光头，有人爱平头，有人乐于长发飘飘。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派军队强行剪百姓的辫子，这个政府没准会遭到全世界封杀；而将辫子当作保守、愚昧的人，无疑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八股文，仅是科举考试中规定的一种文体，如同当今高考时，规定作文只允许做一定字数的议论文，不许用高等数学解答某些数学题。如果一定要说与当今议论文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在写作格式上有严格要求，如同律诗，讲究音韵，有平仄、对仗等要求，不如现代诗天马行空。八股文不好写，而写律诗所受限制更多，但很少有人敢骂律诗有什么罪过，因为热衷并擅长写诗填词的唐宋士人，始终头脑清醒、思维活跃。只有脑袋出了问题的人，才坚信八股文造就了“头脑僵化”。

小脚，无疑是应当禁止的丑恶的东西，但它源于古人不健康的审美观。倘若将之作为妇女被压迫的证据，则是有失公允的。平心静气地看，这更多的是古代妇女求美的自觉自愿的自残行为，与当今妇女们热衷的“隆胸”、“拉皮”、挂耳环、文身等毁身以求美行为差不多。当初禁止裹脚时，曾有不少家长甚至孩子们依然偷偷缠足。

太监，确属反人道的产物，应予铲除。稍懂一点历史都会知道，古埃及、古罗

马、西亚都曾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并非中国的特产。就在不久前，欧洲还存在由被阉割的男歌手组成的“花腔男高音”艺术群体。

贞节牌坊，确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精神绳索，应予革除。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高度重视妇女贞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至于姨太太，更不是中国男人的专利了。

这些精英在大骂祖宗的同时，竭力美化西方人的祖宗。他们宣称古罗马只有民主与法治，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匈奴捣乱，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强大的未来。有专家一再叹息：丝绸之路没能直接连通罗马，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还有专家一再赞叹：文盲遍地的中世纪欧洲，也是一曲动听的牧歌，高度“理性”、“科学”，惨无人道地屠杀掠夺美洲大陆，被打扮成“自由贸易”的文明女神。更不可理喻的是，对于列强侵略中国，包括英国政府武装贩卖鸦片，包括火烧圆明园，包括强索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包括掠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日本侵华，某些人只是一个劲儿地罗列清廷和先辈的不是，而忘却了用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概念做任何分析。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某些专家自己，也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解释这个世界，并在不知不觉中诞生了一套完整的中西方文明“理论体系”：

西方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是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西方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是充满科学的地方。

西方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

西方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开放基因；中国自古专制封闭，只有专制保守文化。

在构筑这套“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这些专家、学者们，无时无刻不展示出“做不了正宗洋人，做个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态。他们把自己关在精神租界里，在国人面前，以为自己是洋人；在洋人面前，他们立刻认识到自己是卑微的中国人。有人称他们为“香蕉人”，我以为，他们更多地属于“哈洋族”或者“租界人”，“香蕉人”则是那种彻底的不要祖国的人。

我不是学者，我不排外，也无心去挖西方人的祖坟，更承认西方强盛与发达的现实。但是，我更欣赏抬头挺胸地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的汉唐胸襟。

人类是在不断地互动中成长起来的。当今的中国，非常需要学习西方的很多东西。但是，学习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奴才做小妾。自轻自贱、猥琐下流心态的人，即便泡在学习的酒缸里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长为大写的人的；奴性十足、无钙无骨的民族，即便学会了人类全部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命运的。因此，不管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好好传承汉唐的阳刚之气，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婢膝地模仿。

历史证明，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闭关锁国”，是可恶的、可怕的。历史也在证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美国立国之初，各方面都十分落后，非常需要学习欧洲。当此之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告诫国民：“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当我们所喜爱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和憎恶的对象。”德国学者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在某些以西方自古月亮圆的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中华民族将逐渐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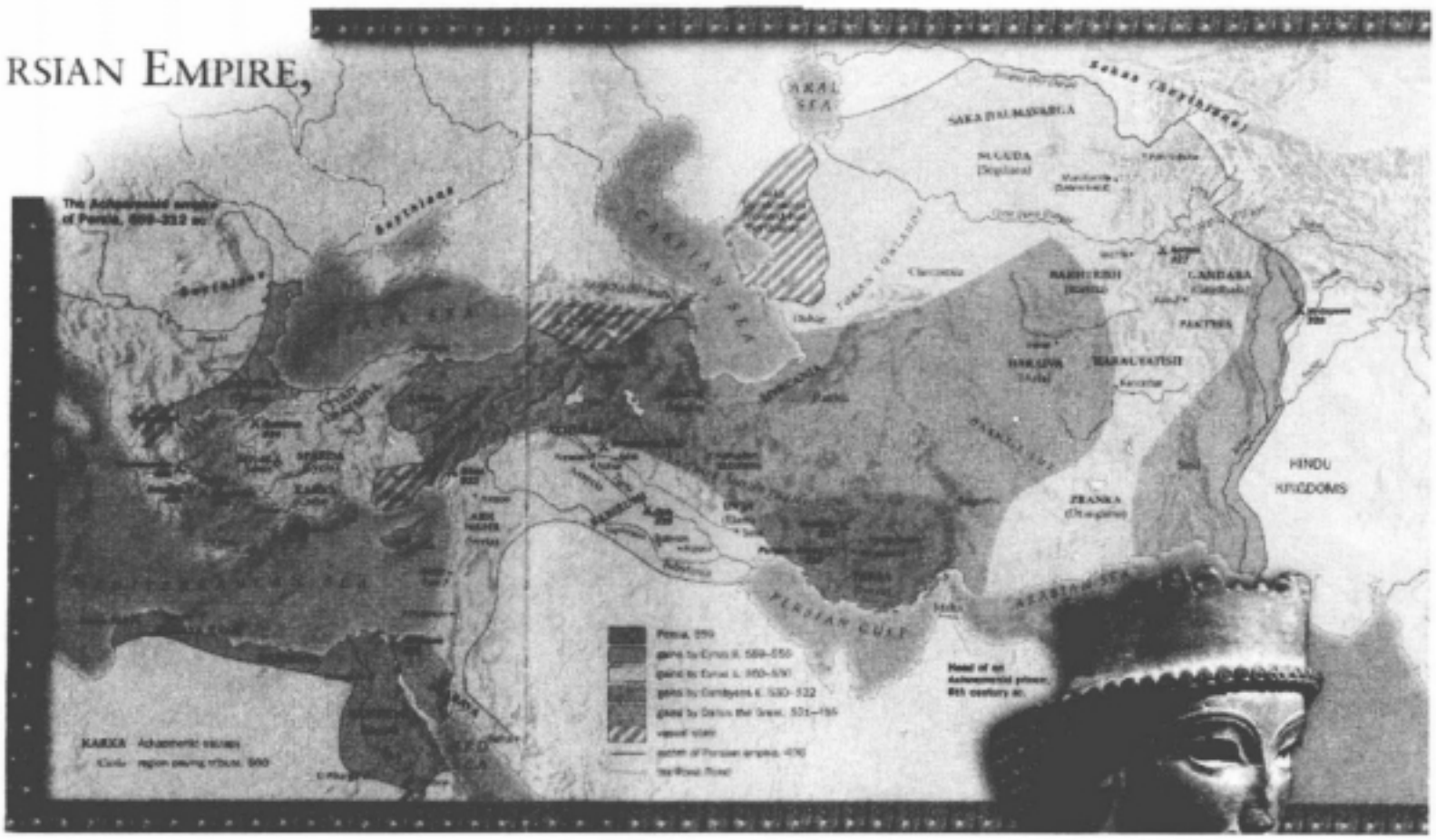
有鉴于此，我主要借用西方专家的著作说西方的事，专说“哈洋族”不说的事。如果以为我旨在揭西方之短，那是莫大的误会。其实，我的主题很简单：洋人、华人都是人，我们的祖宗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能好好尊重自己的“人权”——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挺起胸膛，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中华就一定能自立于这个世界。

第1章

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主要是指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所“创造”的文明。此后，从亚历山大东征到托勒密王国灭亡（公元前30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据说是希腊文明传遍世界、改造印度的时期，故称之为“希腊化”时期。“哈洋族”所说的古希腊文明，下限一般是到“希腊化”时期。从时间上看，这大致相当于我国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

关于希腊文明的上限，有越来越久远的架势。根据神话、《圣经》、《荷马史诗》和考古发掘，此前的两三个世纪，称为荷马（史诗）时期，又称“英雄时期”。



古波斯帝国全盛时地图

目前，希腊文明史已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发生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根据神话和《荷马史诗》，主要通过“现代化”推理，“哈洋族”声称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是地中海上的霸主。不过，尽管克里特岛今天属于希腊，但在公元前2000年，临近克里特岛的地中海沿岸，只有埃及和西亚拥有肥沃的土地、稠密的人口和高度的国家级文明，而且《荷马史诗》中英雄的长相、民风民俗等等，与欧洲人无关。抛开这些不谈，克里特岛是仅8000平方公里、几无耕地的小岛，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这里可供养的人口最多不过数千人。**论证这里诞生过“高度文明”、强大的“米诺斯王国”，无异于论证今天的月球是人间乐土。**

村庄联合体

狭义的“希腊人”，主要是指生活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讲希腊语的人。他们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广义的“希腊人”，则包括侨居于地中海沿岸，乃至黑海沿岸和岛屿上的希腊人。“希腊人”没有国家概念，更谈不上国家意识。

这些“城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出于自然的演化”，“由若干村坊组合”而成的“城市”，人口一般万儿八千。他们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说事。

斯巴达，是四个或五个村庄、两大家族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有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根据“国际惯例”，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相对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斯巴达人“以军事立国”，整个城邦就是一个兵营，男孩长到6、7岁，便被城邦收养到军营接受训练，每天给极少的食物，鼓励他们偷盗提高生存能力。“如果偷盗被抓，他们会受到惩罚，不是因为偷盗，而是因为失手”。**斯巴达人文化水平低下，公民基本上是文盲。**

雅典是4个部落（后改组为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专家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万～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

选出10名司令官，每个部落推举1人。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雅典人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古希腊名人多与它有关联，有关古希腊的文字依据基本来源于雅典。

愚昧、野蛮、封闭

来到古希腊，你会看到，人们光着脚板满街跑，斯巴达人更是光着屁股到处晃悠。文明一点的雅典人，也就是将一块布裹在或披在身上。部落内部，大事小事商量着办，共同祭祖，共同对敌，夺得战利品人人有份。虽有贫富之分，但总体来看，一幅原始共产主义风貌。

说它原始，最典型的，反映在婚姻问题上。

“哈洋族”以雅典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象征，殊不知，这源于雅典禁止它的成员与外界通婚。在小小的雅典，男男女女只能内部消化，要想确保阴阳平衡，唯有强制推行一个萝卜一个坑，认可亲兄弟姐妹结婚。

希腊人的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雅典的女人，青春期过后，14岁左右必须嫁人，一般是嫁给30岁左右的男人。同父异母的男女结合、堂兄弟娶堂姐妹、亲侄女嫁给亲叔伯，统统被社会广泛认可。**而在斯巴达，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样可以结婚生子。**因为畸形儿太多了，斯巴达有了一个规矩：消灭畸形儿合情、合理、合法。

代表“希腊化”成就的国家托勒密王室，将这一传统保持的最为彻底：

托勒密一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二世，先是嫁给她在马其顿的同父异母兄弟“雷电”托勒密，双方翻脸后，跑到埃及，嫁给她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托勒密二世，当上了埃及王后。后来这对国王王后被尊为“姐弟神”，她死后，还被托勒密王国奉为女神。

托勒密三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三世，嫁给了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四世，成为埃及王后。

托勒密五世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二世，先与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六世结婚，接着又嫁给她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八世，再接着，托勒密八世又娶了她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三世，她仍然是她弟弟的王后。

……

这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婚俗，托勒密王室一直坚持到王国灭亡。克莱奥帕特拉七世——中国人熟知的“埃及艳后”，就由她的父王许配给她的亲弟弟托勒密十三世。

正宗的“希腊王国”——马其顿王国，自然也是这种婚姻制度。马其顿王德莫特里乌斯二世娶他的亲妹妹为妻；“父贵者”密特里达泰斯六世，先杀兄后弑母，再迎娶他的亲姐姐。

如此繁衍出来的希腊人，智商能够高到哪里去，只能去问动物学家；这样的统治者，能否“化”百姓，只能去问政治学家、社会学家。

希腊化国家亲兄弟姐妹结婚，正是在认真建设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里：“法律准许兄弟姐妹同居，如果抽签决定而且特尔斐的神示也表示同意的话”，男人“可以同任何女人相处，除了女儿和母亲，女儿的女儿以及母亲的母亲。至于女人，同样可以和任何男人相处，只除了儿子、父亲，或父亲的父亲和儿子的儿子”，但必须是得到“治理者的准许”和祭司的祷告后，才能干这事儿，否则就是“苟合”，是“不合法的、亵渎神明的”，生下的孩子当然是“私生子”，“是愚昧和淫乱的产物”。柏拉图还要求：只有优秀的男人、女人才够格结婚，并且必须在限定的时间交配、生子，孩子出生后便被国家收养，不得让父母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让孩子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但，不知希腊化国家是否严格落实。

如此野蛮的“婚姻法”，是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吗？至少中国不是这样。西周之《礼》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民风民俗，拥塞中国古代文献。

别看在当今雅典名气很大，它的公民文化素质却低得一塌糊涂。在雅典，工匠是奴隶，画师是奴隶，医生是奴隶，连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奴隶！所有需要文化的工作，离开了奴隶玩不转。《探寻古希腊文明》一书说：雅典的“学校的出现始于公元前6世纪末。男童6、7岁开始上学，学费相当低，因为教师工资低。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奴隶所从事的，自然是最下贱、高贵者所不为的工作。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建立了真正的国家，政府也没有举办任何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纯属个人行为。

也许，有不少希腊人想读书，但买不起纸和笔。当时的中国人用便宜的竹简，希腊人没想到这一点，昂贵的皮纸被发明与否不得而知，而埃及的纸草纸贵得吓死人。据《探寻古希腊文明》说：“一卷草纸的成本似乎相当于一两天的工资（盖为一名劳工的6天工资）”，一个作业本得花掉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难怪“草纸遗存主要在埃及，其他地方少有发现”，甚至拥有埃及的波斯帝国也只是“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泥版文书”。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哪个诸侯不办学校，公子王孙不通六艺，不被其他国家笑话死才怪。早在西周，政府办学就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是说，全国范围内，每闾（25户）设立一所启蒙学校（塾），每党（500户）设立初等学校（庠），每州（12500户）设立中等学校（序），诸侯和都城设立高等学校（国学）。“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年二十入大学”。上学时间和课程也十分明确，《礼记·内则》说：“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博学不教，内而不出。”《周礼·司徒·保氏》说：“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在春秋战国的外交场合、贵族聚会，“歌诗必类（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哪里走得出门！“百家争鸣”岂能从天而降！

中国关心教育，希腊热衷于宗教。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古希腊到处是宗教祭祀场所，像样一点的建筑，无不是“神庙”。雅典的部落，是按照中国的“家族祠堂”来设置的；不同于中国的，是雅典每个部落都有世袭的专职祭司，并属于当然的“政府”官员。雅典最基层组织是德莫，其负责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抓好宗教事务。举行任何重要活动之前，诸如发动战争、召开公民大会，事先必须举行净化仪式，屠杀动物甚至以活人献祭，沐浴、香薰一番，坚决禁止分娩者以及接触过分娩者和死尸的、吃过某种食物的、近期有过性行为的人员进入。

雅典宗教势力到底有多大？古希腊的“三贤”，苏格拉底因为“引进新神”、“腐化青年”，被以最民主的方式判处死刑；柏拉图不得不长期流浪异乡，因此长了许多学问；亚里士多德因为被控“亵渎神灵”，吓得连夜逃离雅典。显然，“三贤”的“理性”学说，在古希腊是没有市场的，与古希腊的发展没有多大关联。以“三贤”及其学说作为古希腊“繁荣”的象征，的确有点勉为其难。

希腊十分封闭保守，拒绝与外族通婚，禁止外来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雅典规定，只有父亲、外公都是雅典公民的人，即血统纯正的人，才算雅典公民。今天的美国，热烈欢迎智力投资者、钞票投资者，如果美国人认为你够分量，便可以加入美国国籍。雅典不是这样，只要不是雅典公民，即便你再有钱、再有名，也不能在雅典买房子买地。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一辈子也只能以游客身份，租房子侨居于雅典。**今天有人说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撞穿坟墓来喊冤。**

希腊经济发达吗?

号称游历西亚、埃及的希罗多德承认：“希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要想证明古希腊经济繁荣，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溜一眼地图就能发现，希腊是一块山地，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农村地区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这里适宜于种植的也就是橄榄和葡萄，主食小麦产量严重不足。因为生活艰难，大批人谋生于异国他乡。据说，“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他们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400多处殖民地”。

自然条件差、物产不丰富也没啥，还可以发展工商业嘛。发展工商业首先得有通用货币，A.T.奥姆斯特德在《波斯帝国史》中指出：“希腊人向吕底亚人学会了制造钱币的技术。他们必定还学到了重量单位的名称。”然而，当波斯普及金币、银币之后，“希腊城邦基齐库斯、米蒂利尼和福西亚，继续按照吕底亚的老传统用天然金银合金铸造钱币”。

古希腊色诺芬的《斯巴达的政治体制》说：“众所周知，在大多数城邦里，每个人都竭力从事赚钱谋生的行当，比较常见的有农夫、水手和商人，而其他人则靠各种手艺来维持生计。但在斯巴达，吕库古禁止生而自由的有这些谋生手艺。作为自由民，他强令他们只能专注于那些作为公民自由基础的活动。”显然，斯巴达人和罗马帝国公民一样，除了打仗啥也不干；而在其他城邦，最多的是农夫，其次是水手和商人，手艺人则是不常见的——“工业”是不怎么繁荣的。

在希腊经商做生意，必须做好累死或者横死的准备。《探寻古希腊文明》指出：“希腊的地形及糟糕的路况并不利于出行及陆路运输。陆路旅行常靠步行或骑马，驮畜经常要负重。马匹是为稀罕物，是地位的象征，只有富人才能承担其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马匹都不能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走，因无掌铁，有无马镫及马鞍也不清楚。马匹除了用于马军或战车体育赛事，很少用于运输。”“古希腊多数道路系依地形而建，形同小路或小径。”“古代资料偶或提到‘货车路’，可能是指所有带车辙的路。但是，这样的路很少。大多数路是为行人、役畜设计的，轮车一般不能通行。”更恐怖是：“多数内陆地区，尤其是高地，强盗与土匪大批出没，而且他们的活动得到一些城邦的默许，所以超出城邦边界的陆路旅行常常要冒风险。”

最为奇特的是，希腊人似乎是为打仗才降生的，希腊半岛始终炮火连天弹痕遍地。阅读古希腊“历史”，整个就是一部战争史：城邦内战、城邦之间的战争、部

分城邦联合起来的对外战争。只要有一天没有外族威胁，希腊人就会兴高采烈地搞内耗。谁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列出一张年表，看看希腊半岛有几天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剪不断理还乱的城邦争霸战，致使城邦之间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罗斯托夫采夫说：“希腊本土的经济生活一直下降的首要原因，在于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时那些经常发生的、几乎不断的、席卷了许多城市的战争。虽然也曾多方努力来缩减这些战争的破坏作用，并使战争受到邦际的某些约束，但这些战争还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使参战者——无论胜方或负方——全都遭受损害。蹂躏地方的土地，销毁敌方的谷物、葡萄园和橄榄林，焚烧敌方的农舍，掠卖虏获的人畜，用被侵伐的地区的物资来给养军队，这些行动越来越普遍。”无尽的战乱令希腊人贫苦交加，每餐能吃饱饭便心满意足，“他们甚至没有用于流通的贵金属货币，只是把铁棒作为货币来使用。正因为如此，英语中的‘Spartan’成为‘简捷、节约和克己’等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内耗，也是希腊人的至爱。希腊各城邦内部，持续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就在进行对外战争的时候，希腊本土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城市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阶级战争”，不少人天天高呼“重新分配土地”口号，闹着要革命，搞得亚里士多德紧张不已。高层的阴谋、暗杀、相互屠杀、争权夺利更是此起彼伏，苏格拉底的弟子、伯利克里的亲戚阿尔西比亚德，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许性子比较急躁吧，干脆跑到敌国斯巴达搬兵，杀回雅典夺权。因果报应也应验在这个希腊人身上，最终处死他的就是斯巴达人。

在这种环境下，别说做生意，即便躲到深山老实种地也不可能。这时期的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八成是呆在安静的天国开展学术研究的。

如此，希腊内地的生意是做不成的了。驾着船专做沿海地区的生意，行不？那也是行不通的！

“哈洋族”说，希腊的海洋贸易十分发达。无论有无传说和记录，都可以肯定，作为“内海”性质的地中海，很早很早以前，地中海周边的先民，腓尼基人、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等等，就在海上讨生活。根据记录，我们知道，西亚的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十分活跃，是他们教会了希腊人航海。根据希腊人“神话”类的文字，根据“希波战争”和雅典拥有“舰队”，以及散布于地中海岸上的希腊人定居点，希腊人也许曾为海上骄子。但是，在古希腊，“在《荷马史诗》中，海盗行为被视为自

然行为，而在古风时代，战争与海盗行为间的区分并不明显。海盗不仅袭击运输船只，有时还袭击岸上的城邑并且行如打劫者一般。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绑架人质以获取赎金。不同时期的希腊城邦均积极保护海运，建立强大的水军以镇压海盗，但从未彻底根除……而随着提洛岛奴隶市场的繁荣，希腊化时代的海盗成风”。显然，在希腊做海洋贸易，和陆地贸易一样，必须提着脑袋来干，弄不好船长和水手一起被掳去当奴隶贩卖。

地中海沿岸，凡是经济发达的富饶之地，都是波斯帝国的地盘。而波斯帝国，恰恰是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城邦的敌国，这个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西地中海，则是虎狼之国迦太基、古罗马的地盘，希腊人去那里岂不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因此，即便海上平静，雅典等城邦的外贸能有何作为？

无怪乎亚里士多德说：“专门搞一批水手在那里是没有用处的，农夫就足够做这些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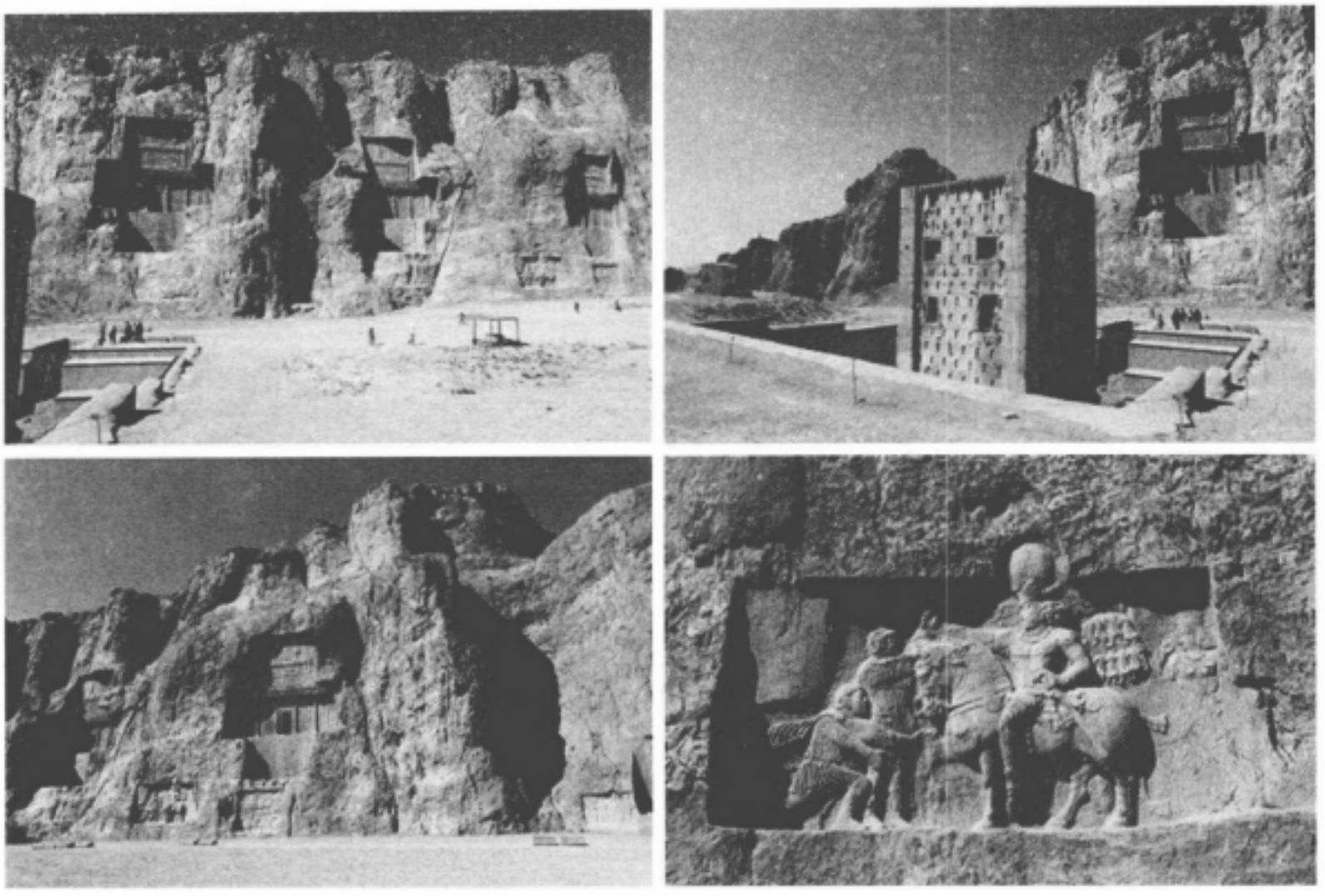
古希腊的对外贸易肯定是存在的，毕竟，希腊土地贫瘠，需要进口粮食。有专家试图以考古发掘出一些希腊陶罐，证明古希腊工商业十分发达，甚至说陶罐出土地也“希腊化”了。在世界各地，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沿岸，到各大海域的古代沉船中，都发现大量的景德镇瓷器，这似乎也不能证明中国或者中国江西省的工商业高度繁荣，更不能作为瓷器出土地被“中国化”的依据。

工商业生存发展的起码条件，一是大量剩余的可交换的产品，二是广大的消费人群，三是良好的内陆交通与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这三者，古希腊都不具备。中国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方千里”的大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齐国首都临淄居民七万户人家；韩国的阳翟“户四万一千六百五十，口十万九千”，商人们只要肯下功夫，不出本国市场，即可富及陶朱猗顿。希腊最大的城邦雅典也不过十万人口，靠拉动内需来发展工商业，只能演绎出“吃狗屎”的GDP故事。

繁荣的“东方”

希腊人所谓的“东方”，也就是波斯帝国的地盘。波斯帝国的国土面积，比后来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得多。

波斯文化和教育发达，以知识精英治国，“帝国的管理召唤着一个新的受过教育的官僚阶级的出现……波斯各城市聚集着大量的管理人员、收税人和档案管理者……帝国生存依靠着这些有文化的专业人员，一些高级官员于是开始与武士和氏族首领分



波赛波利斯遗址

享权力和影响”。今天的考古学家甚至挖掘出了巴比伦时代的学校遗址。“波斯人在训练有素的帝国官员们管理之下形成的法律和正义的概念，也把生活在庞大波斯社会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波斯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是金庸笔下明教的源头。

波斯在治国上很有一套，奥姆斯特德指出：“在古代众多的君主中，我们很少发现有哪一位统治者能够如此透彻地理解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依靠坚固的经济基础。”帝王们在知识渊博的精英们的辅佐下，颁布法律，制订税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筑驿道，开凿运河，兴修水利，改革军事，定立国教，建立三权分立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其丰硕成果，足以让中世纪欧洲的大小领主们脸红不已。

波斯首都波赛波利斯虽然被亚历山大一把火烧毁，但留到今天、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全部是石砌建筑的残垣断壁，奥姆斯特德感叹：“其成果之壮观，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期望。当着上百码壮丽的浮雕，其中大部分像它们当初被雕刻成的样子，完整无损地从埋藏了22个世纪之久的地方被发掘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惊奇地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在这里，不难窥见希腊、罗马建筑与雕塑的祖师爷模样。波斯

四通八达的公路，尤其是希罗多德大为赞赏、石头铺就、设有111个驿站、全长2575公里的“波斯王道”，就是罗马公路的样板。波斯“建设地下水渠坎纳特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人口增长。冶铁技术传遍帝国各个地区，到阿黑门尼德王朝末期，铁制农具在波斯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当然，造房子、修公路、建坎纳特、冶铁之类的技术，当波斯帝国健在时候，顺利地传遍帝国各个角落和周边地区；当帝国消亡时，自然是连技术带人留给了“希腊化”国家乃至后来的罗马帝国。

波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自不必说。波斯的工商业同样是没说的。《新全球史》认为：“有几种原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波斯帝国维持了政治的相对稳定，帝国内普遍的繁荣，标准化货币的使用，良好的商业道路。这些商业道路中包括很久之前就存在的道路，新建的干道如波斯王道，以及穿过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海上航线。在波斯帝国的大城市里，市场定期营业，而在巴比伦这样的大城市里，聚集着大量的银行和店铺，他们进行商业风险投资。”奥姆斯特德说：“对于这个时期巴比伦堆积如山的泥版文书走马观花的考察，得出的印象是商业活动比较正常……帝国境内贸易突然开始兴隆。例如，马尔都克纳西拔借钱给两个到处奔走的人做买卖。不论他们在城里在乡下赚到了银子，一半的利润归他所有……神庙地产日常收入的买卖，甚至是一天的一小部分，都使我们想起在股票交易过程中，为了保证世俗股份公司的安全而采取的同样方法。”

波斯的“人权”状况远远优于希腊城邦。奥姆斯特德在波斯王家档案馆中发现了许多账单，“大多数账单是发给各种工人队伍工头报酬的记录……就我们看到的报酬而言，这些工人所得到的报酬，如果说不比巴比伦同样的工人更好的话，也算是还好的”。和希腊人靠奴隶劳动不同，《新全球史》说：“波斯社会的支柱是自由人，他们没有氏族首领和高级官员的特权。在城市里，自由人包括工匠、手工业者、商人和低层次的社会服务人员……在农村，自由人包括有地和无地的农民，无地的农民作为雇工和佃农耕种国家、神庙组织或者其他个人的土地。农村的自由居民有权结婚和迁移，他们能在城市里或者军队里寻找更好的机会。”

希腊化还是波斯化?

马其顿，是波斯帝国的属地。在“希波战争”中，马其顿就是波斯大军的马前卒。在波斯的支持下，马其顿人扫平了希腊半岛。看到波斯帝国内部混乱不堪，公元前334年，马其顿首领亚历山大起了反心，从希腊半岛抓丁拉夫后率军东征，仅用

了4年时间便征服了衰老的波斯，兵锋直达印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他手下的将领之间便开始了争霸战，一直厮杀到公元前275年，终于出现了安提柯（马其顿）、塞琉古、托勒密三国鼎立局面。据此，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专家说，亚历山大的这一下子，使原波斯地盘，乃至印度，凡是亚历山大的士兵脚踏过一秒钟的地方，通通“希腊化”了。

如此结论，总让人觉得怪怪的。

奥姆斯特德指出，早在正式东征之前，亚历山大便在自己的地盘上“采用波斯的管理方式”，“波斯行省的权力分给了三个不同的官员，每个人直接向国王负责的制度被保留下来了。它的创新之处就是由一个希腊人来负责行省的财政”。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在埃及，他记住了自己是神之子，因此他是神王。他越来越受到东方信仰的影响，不久，他采纳了波斯的盛大场面和仪式。最后，他梦想把波斯和希腊两个民族和文化融合成一体，东方征服了这位凶猛的征服者”。于是，亚历山大立即推行两大“改革”，与蛮荒的过去划清界限。

第一招，是与中国的北魏孝文帝一样，亚历山大带头匍匐于波斯文明面前，娶波斯贵族女子为妻，穿戴波斯君主服饰，推行波斯宫廷礼仪，征召甚至强迫波斯人才为其幕僚和各级官员，鼓励甚至强制官兵与波斯女子通婚，甚至为他们举行集体婚礼。

第二招，便是与中国康熙帝拜祭明朝皇帝的祖陵一样，轰轰烈烈地“拜谒了位于帕萨尔戈蒂的居鲁士坟墓”，以行动感染波斯王国的臣民们。

这些举动，正如《新全球史》所说：“亚历山大在波斯和埃及把自己描绘成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他尊重他们的前辈，保留他们的荣誉，也保留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管理机构，甚至让许多总督和其他官员继续保留原来的职位。”

亚历山大所强力推广的，不过是“献祭和体育比赛，包括火炬接力赛跑”而已。

亚历山大的遗产——安提柯、塞琉古、托勒密这三个国家，便是正宗的“希腊化王国”。

安提柯王国的地盘是马其顿和希腊半岛，也就无所谓“希腊化”了。安提柯是这三个王国中最糟糕的国家，始终保持希腊文明的特色传统——持续不断的内耗，基本在战争中过日子，无建设可言。故姑且不论。

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04年～公元前64年）几乎拥有整个西亚——波斯王国的核心地区，它“在保留了帝国的公路和邮政系统的同时，也保留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管理和税收系统”。塞琉古一世娶了个波斯女子，其继承者坚持与波斯贵族本都、卡帕

多西亚家族联姻，依靠有文化的波斯人治国。俄罗斯学者瑞布里克《世界古代文明史》指出：“在军队、政府和法庭中，伊朗人比马其顿人或希腊人要多……这个国家混合着各种因素，一方面是阿提卡钱币和马其顿的军事殖民地，另一方面沿用波斯人的阿拉美亚语作为官方语言，与希腊语并用。在巴比伦，楔形文字（如王表、法令或天文学资料）继续使用。和其他希腊化国家相比，塞琉古王朝最为东方化。”如果一定要说“希腊化”的影响，就是王国很快便陷入分裂与内战之中，和希腊半岛一样，没有一天的安宁之日。王国东部大部分地方也独立出去，恢复了波斯人的统治。

托勒密王朝占有埃及之后，在坚持亚历山大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更是干脆将埃及人的塞拉比斯崇拜定为国教。由于王室直系血亲繁殖的婚姻制度，王室子孙智商有限，以至国家的摄政者如尤莱乌斯、勒奈乌斯，都是外族人。到了“埃及艳后”这一代，他们和满清王室成员一样，就剩下一口地道的埃及话了。

相对而言，《新全球史》说：“希腊化帝国中，最富庶的可能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埃及的上层统治者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他们不干涉埃及社会的发展，相反，他们对埃及已有的富有成效的农业、手工业和税收体制都非常满意。他们维护灌溉工程，监控农作物的种植和税收，同时王室还垄断着绝大多数赚钱的行业，如丝织业、制盐业和养蜂业等。”维克多·V.瑞布里克说：“国王垄断了收税、采矿和出口等特权。”

八成是因为托勒密王室持续的直系血亲结婚，罗斯托夫采夫说：“早期几代有能力的国王故去之后，嗣位的都是些不肖子孙，他们既不努力，又无能力。埃及的国际威信一落千丈。”在托勒密王国，凡是能捞到较多好处的事情，只有国王能干，罗斯托夫采夫称之为“对生产和交换二者采取国有制”。但是，国王只管赚钱，不管建设。“希腊人虽然流入埃及，却并没有如理所当然的那样使这个地方产生都会化的后果。除了上埃及的托勒买斯以外，托勒密王朝没有为希腊人建立过任何城市……就是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勒买斯，也还不算是正规的希腊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只算是希腊籍国王的一个希腊式驻跸之所，即使说它一开始即具有一种正规城市的组织，但也很快就被取消了，它的自治组织被裁削的程度，已经使它与埃及的其他行政区域中心毫无差异，只不过它在城市建设方面更加美丽壮观罢了。托勒买斯所享有的自治权稍微多一点，但这个城市始终没有在埃及生活中起过任何重要作用。”难怪“希腊化君主国的这种摧残性的经济制度在大多数土著中产生了有增无减的不满情绪”，在伏尔泰眼中最为温顺的埃及人，也要一次又一次地起来造反了。

尽管亚历山大的军队到印度西部边境地区溜达了一圈就退了回去，西方专家就声称，希腊文明传到了印度，影响了印度。但是，西方专家们都不得不十分沮丧地承认：即便是在“希腊化国家”，希腊文化的影响也仅局限于高层，是脆弱的、“薄薄的一层”，对广大土著居民几乎没有影响。

希腊拿什么搞科研

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重视教育、资金充裕，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雅典抵制新科学，”奥姆斯特德指出，“东方的新科学在雅典受欢迎的程度，比不久之后这座城市向爱奥尼亚美女塔尔盖尼亚及其妓女姐妹表示的欢迎大为逊色……阿拉克萨哥拉因为教授天文学、不敬神和亲波斯而被传讯，不得不亡命海外。”

丹皮尔教授说，希腊的“普通人民信神之心极其虔诚，阿拉克萨哥拉就因为是无神论者被赶出雅典，同样的罪名也是苏格拉底的罪状之一，虽然他反对阿拉克萨哥拉的见解，事实上是领导了一次宗教复兴”。苏格拉底悲叹：“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并且爱你们；但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雅典人啊！不要打断我，听我说……现在，雅典人啊！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要为我自己来进行辩护，而是为了你们……”古希腊三贤，甚至伯利克里的老师安纳克萨哥拉斯，他们统统容不下。在宗教至上的希腊，不知“理性”思想是如何辉煌起来的？据说亚里士多德精通生理学、医学，而希腊人禁止搞人体解剖实验，不知希腊的生理学是如何兴起、传播、发展的？

《探寻古希腊文明》说：斯巴达人蔑视教育，而雅典的“有钱人家通常会继续他们孩子的教育直到18岁，他们有专门的教师教授医学、法律、修辞课程，或由智者教授的流行课程”，“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男童一般由一名被称为paidagogos的奴隶陪同上学”。有思想有水平的老师要么被杀要么逃亡，留下一群奴隶教书育人，不知雅典的教育质量是如何保证的？

在谈到古希腊罗马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那么，古希腊的科研经费从何而来？

哲学和文学需要一帮闲人躲在家里一边读书一边冥思苦想，或者一帮闲人一边喝茶一边侃天激出火花；天文学有赖于一批敬业的科研人员长期不断地进行天文观测与演算推理；医学、生理学有赖于大量的解剖与药物实验；植物学需要长期不懈地进行

观察、种植与研究；物理学需要大量的持续的实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大量的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下，才能有所成就。比如天文学，伏尔泰提到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计算出来的32次日蚀”，其中任何一次都源于巨大的投入。要想在哲学、文学、天文学、数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等诸多学科有所突破，总得有1000名专门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研究吧？

姑且不考虑这1000名人才来自何方，我们只讨论谁出钱养活他们，并支持他们进行科研活动。养这么些人，在庞大的罗马帝国，那是没有问题的，随便从国库里推出一车银子就行，罗马帝国愿意不愿意，则另当别论。摊到古希腊，那就是天文数字了！斯巴达是绝对指望不上的，它是一个懒得读书、穷兵黩武的城邦，斯巴达人始终过着勉强吃饱肚子的日子，绝不会花闲钱、养闲人、干闲事。雅典人口至多不过15万，让这个土地贫瘠、战事连绵的地方每150名雅典人就必须养活1名科研人员（不考虑雅典的“公务员”也是有工资的）。如此沉重的负担，雅典人愿意干吗？

雅典人不干就对了。据《资治通鉴》，至富至强的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全国总人口4543万人，其中官员17686人，吏员（即无品级的衙役之类）57416人，即600人养活1人。须知，唐朝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古希腊。

财政学常识告诉我们，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是政府的事情。比如哲学、数学、天文学，属于不赚钱的纯科学，除了有钱又有闲的高级知识分子，谁都不会感兴趣。除非国家投资，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参与，否则科研工作就无法进行。直到今天，无论是亿万富翁云集的美国，还是发展中的中国，诸如“1+2=3”、银河系有多少颗星星，只有国家花钱来干。某些富豪积善行德搞赞助，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没有相当规模且财力不雄厚的国家，不会去玩哲学、数学、天文学之类的纯科学。当今欧洲的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冰岛，乃至卢森堡，经济和政治条件都不错，似乎没有谁在纯科学上下大工夫。

有人会问：干吗一定要将这1000人交给某一个城邦来养活？

答案很简单：只有古希腊每个大点儿的城邦都养1000名科研人员，才有可能百花齐放！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就是建立在各国皆有科研机构、公卿贵族多、公卿贵族的门客多的基础上。

今天，在欧美日发达国家，每个国家科研人员数以万计，但依然难保每年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

希腊科研无目的?

苏格拉底宣称：“我们是为发财而奔走的奴隶。”尽管众多的古希腊名人“奔走”，然而，“整个希腊时代，极少有技术发明会影响到经济产出，省力装置亦罕见使用”。

《探寻古希腊文明》说：“尽管希腊人在建筑及手工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但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并非希腊人所为……人们似乎并不重视实物上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应用亦十分缓慢。”

丹皮尔教授也说：“在实用技术领域中，我们从传说中知道几个朦胧的人物……”

在工业方面无建树；在交通上没有修建一条“公路”；在军事上没有创造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农业上，甚至连确保稳产高产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没有任何作为。唯一能反映希腊时期工程技术水平的是神庙、神像，不过，在古波斯留下的波赛波利斯宫殿建筑、改善交通的官道、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坎纳特等无数遗存面前，似乎不足为凭。还有可以用来显示希腊“工商业”文明的陶罐，但研究证明，留在上面的工匠姓名大多不是希腊人。

对照鲜明的是，同时期的中国诞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考工记》，诞生了能工巧匠的组织墨家，还有著名的鲁班！作为《周礼》的一部分，7000余字的《考工记》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的规范性文件，用现代科学语言讲，叫做“国家标准”。按照所谓“国际惯例”，进入东周之后，则应该称之为“国际标准”。该书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分别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专业知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春秋战国各大强国的支持下，我国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政治学、史学、音乐学等等，都十分发达，科技成果之丰富，可谓举不胜举。技术进步，是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按照主流的说法，在欧洲，“希腊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1000多年来，希腊文明始终没有为社会贡献像样的“技术”。

雅典有一个著名的柏拉图学园，据说，一直办到529年，经历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东罗马时代。而且，在东罗马帝国，贵族们说的是希腊话，读的是希腊书，后来连皇帝也是希腊人。可是，这个千年帝国究竟给人类创造了什么呢？这

一点，我们还是放在后面来说吧。

罗斯托夫采夫说：整个古罗马时期，“有一件事情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与希腊本土无缘”。

那么，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寡民小国，却开展号称“撬动地球”的研究，到底目的何在？

拷贝来的希腊“学说”

要想证明希腊的学说是自家的，很难。波斯，太发达了。巴比伦和埃及两大文明古国，都属于波斯帝国版图。

单说数学、天文学，远比“古典希腊”早的新老巴比伦就十分了得，他们把几何、代数都玩得不错，而且将几何与代数结合起来玩。他们弄出了10进位制、60进位制；把圆周360等分；用上了乘法表、倒数表、平方表、立方表等数表，会求平方根、立方根；会解三次方程和含多个未知量的线性方程组；会用“毕达哥拉斯定理”计算某种几何题；懂得相似三角形之对应边成比例；会计算平面图形面积和简单立体体积；推算出一年是365天6时15分41秒（比近代的计算只多了26分55秒），七天为一周，一天分十二时；绘出了黄道十二宫图……古埃及的数学也不赖：诸如等腰三角形、长方形、梯形、圆的面积，他们都会计算，他们把圆周率算到3.16。据说，如今还保存有埃及人计算求截头角锥体和半球体体积的手稿。

要想证明“希腊人”的著作比上述内容高明多少，似乎很难。如果数学水平都不行，却大谈科学技术与创造发明，那是昏话。至于托勒密在专心天文观测与研究、撰写天文学论文的同时，还拥有令人恐怖的地理知识，那得请神仙来解释了。

西方学者告诉我们：希腊的一切“学说”，全部属于复制品。

丹皮尔教授说：“荷马写作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他给阿卡亚人的肤色安上了白皙或褐黄一类的形容词；地中海人死后都实行土葬；但是荷马笔下的英雄却用火葬；他们使用铁器，而较早的希腊人民却使用青铜器……”不少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的真实性或者原创性产生怀疑，因为其中许多东西，明显来源于西亚地区。

专门“探寻古希腊文明”的英国专家介绍了古希腊“科学技术”的来历。

数学：“据信，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而泰勒斯将几何学从埃及传入希腊。”

天文学：“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已经在航海及日历等领域利用天文周期，而古希腊人亦借助于天文学用于同一目的……随着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天文学知识的传

播，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事天文学研究。”

医学：“荷马的《伊里亚特》中描绘有对伤者的治疗，这与关于古希腊早期外科手术工具的证据一起，表明古典时代之前的外科学引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医疗实践。”

物理学：“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斯的探究，开启了物理学之门。”这就是著名的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生长于米利都的泰勒斯也被称为希腊的“科学和哲学之祖”。

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叙述得更详细。

数学：“巴比伦的数学和工艺要素显然是从非闪族的萨马利亚人得来的。萨马利亚人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统治那个国家1000年之久。在巴比伦人的碑石中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他们采用了12进位制，是分数易于计算，同时还采用了我们的手指得到启示的10进位制。为了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他们对60这个数目特别重视。这种双重计算法的平行应用成为重量和度量——圆周及其角度的划分，英寸、英尺及平方英尺，达伦和蒲式耳——的基础……但是，实际知识是和巫术观念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也一块由巴比伦向西传布。”埃及“最早的算术和几何学历史文献证据是一份纸草纸，这份纸草纸残片在大英博物馆内……纸草纸上记有关于分数和普通算术四则的一些说明，乘法是用屡次相加的方法得到的。上面还记载有测量的规则。”

天文学：“时间的有系统的测量在巴比伦也开始得很早……有些巴比伦尼亚星象家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巴比伦的天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这可以说是科学的天文学的起源。功劳应该属于巴比伦尼亚及它的三个学校：乌鲁克学校、希拔学校及巴比伦的波希帕学校……公元前540年左右，即迦勒底人征服巴比伦尼亚之后，占星术在巴比伦达到鼎盛时期。200年以后，又传到希腊，再由希腊传到当时已知的世界。”

医学：“如果埃及在天文学方面落后于巴比伦，没有像迦勒底亚的那样有名的占星家的话，他们在医学方面的地位却恰恰相反。我们已发现有好几种重要的埃及纸草书卷，并且翻译了出来，上面载有医药论文……外科毕竟是有了一个开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雕塑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埃及外科医生施行手术的证据。当时有僧侣学校训练出来的医生，有治疗骨折的接骨郎中，有治疗埃及经常流行的眼病的眼科医生……配置药物和香料的技术达到高度完美的状态，许多埃及药品当时都闻名全世界。

埃及医学后来传到希腊，或许是经过克里特岛传去的，接着又由希腊和亚历山大里亚传到西欧。”

《波斯帝国史》也告诉我们：“正当雅典宣布研究天文学违法的时候，东方仍然在使其科学成果更加精确。”德谟克利特通过游学埃及和巴比伦，知识大增。“如果我们知道名为《几何图形》、《算术》、《几何学》、《论无理数的量值和立方体》和《圆周、球体的相切和切线》这些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贡献区分开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第一个对希腊人公布如下定理的，即圆锥形的体积是等底等高圆柱体体积的1/3……他的天文学论文，只能用巴比伦泥版文书的术语来解释……同时代的巴比伦天文学家，没有人不知道这里所讲的知识……这些知识被德谟克利特传给了欧克特蒙、默冬和欧多科索斯。从他们那里，这些只是又传给了那些有作品被保存下来的作者——阿拉托斯、格米努斯、西塞罗、维特鲁威、普林尼和其他许多后来人。因此，在这些后来的作家中，我们发现了与那波里曼尼及其弟子的教科书一致的资料。”

丹皮尔教授说：“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部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这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

值得玩味的“巧合”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小亚细亚；公元前525年，冈比西二世征服埃及；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将印度的旁遮普变为一个省。就此，波斯帝国融印度、埃及、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于一体，教育、科技、经济、交通均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直到公元前330年灭亡。

巧合一：几乎波斯帝国诞生的同时，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开始了希腊的“古典时期”。

巧合二：古希腊知名人物，除了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小亚细亚的阿布德拉的学者普罗泰哥拉的学生）等个别人物之外，要么和伯利克里（约生于公元前495年，小亚细亚的科拉佐美纳埃的安纳克萨哥拉斯的弟子）、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等人一样，是留学波斯的“海归”，要么是波斯帝国国民。

如果引入现代观念，以出生地确定国籍的话，属于波斯帝国国民的有：

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小亚细亚的萨摩斯人，据说曾远赴印度求学；

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生于约公元前540年），小亚细亚的以弗所人；

《几何原本》首创者希波克拉底（生于约公元前470年），小亚细亚的基奥斯人；

神医希波克拉底（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小亚细亚的科斯人；

大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生于约公元前460年），阿布德拉人；

大天文学家卡里普斯（和亚里士多德同时期，生卒年不详），小亚细亚的库基库斯人，提出一年为365又1/4天说。

植物学家塞奥弗拉斯图斯（约生于公元前370年），是小亚细亚的埃莱苏斯人；

哲学家纳乌西法奈尼斯（约生于公元前360年），是小亚细亚的特奥斯人，伊壁鸠鲁的老师；

大哲学家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1年），萨摩斯人；

天文学家奥托里库斯（公元前4世纪人），小亚细亚的皮塔内人；

《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公元前300年人），籍贯不详，长期生活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据说是《机械原理手册》的作者费隆（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人），拜占庭人；

天文学家卡里普斯（生于公元前287年），小亚细亚的库及库斯人；

大科学家阿基米得（生于公元前287年），意大利的叙拉古人，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求学；

……

巧合三：在《探寻古希腊文明》中列举的90名知名哲学、科学家中，波斯帝国灭亡后出生的，仅18人。

匪夷所思：波斯兴，希腊学术兴；波斯亡，希腊学术衰。这就更是“巧合”了。

智慧来自东方

雅典之类的“城邦”，能够独创出多大个文明，绝对是天方夜谭。

众所周知，封闭状态下，任何一种文明是很难持续发展进步的。其他野生动物消失后，狼群必定会退化；一种文明一旦定型，就会产生惰性，只有与另一种文明交流

碰撞，才会激发出新的活力。早在几千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就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到欧洲人抵达时，这里甚至还有退步。中国春秋战国的辉煌，正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东方齐鲁文化交融促进的结果。中国唐朝文化的博大，也源于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就诞生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强大的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边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达。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至于波塞冬这个名字，他们是从利比亚人那里知道的”。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所谓“古希腊神话”，著名的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的神灵。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文字是希腊人模仿西亚腓尼基字母的结果，这大约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而腓尼基文字，又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和日文来源于汉字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英国、法国、德国文字，源头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腊最显赫的遗存是建筑。雅典人自称从埃及人那里学来测量技术，而留名至今的两位希腊城市建筑规划大师，都是亚洲籍人士。希波达姆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米都利，据亚里士多德说，雅典的皮拉埃乌斯就是他设计的。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城的设计建造者德伊诺克拉泰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罗德斯。

至于雕塑、美术，据西方专家研究，希腊原本没有石雕，在神庙里也只有木雕神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起，小亚细亚的萨摩斯、纳克索斯等岛屿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人体大小的雕像。前7世纪晚期，传入希腊本土。流传至今的希腊时期的绘画精美的陶器，据西方专家研究发现，在已知的40位艺术家名字中，“多数并非雅典人名”。

《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岛或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说到希腊哲学，追根溯源，自然是著名的“米利都学派”；而米利都，却是位于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的一个地方，也是波斯大军最早征服的“希腊城邦”之一。说到科学技术，自然让人联想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尽管毕达哥拉斯成名于意大利，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波斯帝国籍人士。古希腊的著名人物，要想找出一个非亚洲籍人士，或者没有留学亚洲、埃及，又不是二者的学生的人士，比登天还难。

古希腊人承认：“光明来自东方”。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

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说：“当希腊各城邦发展起来，越出先前的界线的时候，希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需要就迫使希腊人民同更古老的文明发生接触。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到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考察。这种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当时希腊人大概还保持着过去的米诺文化的传统并且同巴比伦和埃及的学术保持着接触，因而对演绎几何学和自然界的系统研究提出一些见解。”

“哈洋族”说，西亚、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不少地方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里的人所创造的，仍属于希腊文明的成果。

“殖民地”有其专门的内涵。一半臣服于波斯，另一半不断遭到波斯侵略，始终内战不断、一盘散沙的希腊半岛，是否有能力跑到海外建立“殖民地”？这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退一步说，假设“殖民地”理论能够成立，那么，遍布于欧美大地的“唐人街”，岂不成了中华的“殖民地”？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等等，岂不成了欧美“中国化”的代表人物？

发达地区战争多，建设也频繁；偏远地区战争少，建设也不多。在北京，很难找到清朝城墙；而在敦煌，能够看到千年前的壁画——这绝不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品。尽管古埃及人、西亚人是地地道道的老师，希腊人是学生，但是，两三千年来，西亚、埃及太发达、太繁荣、太多战乱、太多语言文字和文明的更替，以致老师的作品或被“希腊化”或被销毁，而来自穷乡僻壤的学生的作业却保存下来，使得学生为后世所传颂。

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我们记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不排除山寨货的水平高于正品的可能性。基督教在欧洲独霸天下，经常让人忽视耶路撒冷；禅宗在中国大放异彩，总是让我们忘却尼泊尔。我无意否定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希腊文明。今天的人们读一读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言论，一定会大有收获。但是，那种为尊者讳、言必称希腊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说说奥运会。奥运会本是希腊四大宗教节庆之一：奥林匹亚赛会、内美亚赛会纪

念宙斯，皮提亚赛会纪念阿波罗，地峡赛会纪念波塞冬。这类似于我国诸如赛龙舟、舞狮、赛马、摔跤等的民俗活动，一个乡村主办、多个乡村参与。若干年前，在中国大地类似活动多如牛毛。因此，没有必要神化。当然，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其内涵有了质的变化，须另当别论了。

由希腊女巫点燃的那把火，被我们称为奥运圣火，宝贝得不得了。试想，在言必称希腊的今天，如果我国举办一个体育赛事，由武当道士或者少林和尚点一把火，在全国传递一下，不知某些评论家会发表什么高论？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古希腊的缺点时说：“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什么。”的确，评价古人时，应该永远持这样一种光明的心态，即便是对遭遇鸦片战争的清朝。

莫把评书当历史

希腊的军事十分原始。希腊没有正规军，始终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全民皆兵”。巅峰时期，斯巴达紧急动员时拥有6个师，每个师576人，即全部兵力3456人；雅典集合全部17～59岁男子，约有3万人，一半出征，另一半老弱看家护院。武器装备由士兵根据家庭经济条件自行配备。希腊的主战力量是所谓的重装步兵，即身披铠甲，一手握着沉重的金属盾牌，一手握着刀剑的士兵；辅助部队是所谓的轻装步兵，即手握藤盾的士兵。由于马匹昂贵，马上功夫来自于长期训练，所以，希罗多德说，希腊“没有骑兵和射手”，也无战车部队。到了后期，斯巴达才拼凑起60人的马队，也只能作为辅助部队。希腊人打仗也好，通讯也罢，一切全靠两条腿，这就是“马拉松”长跑运动的来历。

雅典水兵也是采取摊派的形式，要求每个三一区提供一艘战船和士兵，选出一位舰长。不可理喻的是，雅典规定，舰长必须承担这艘船的运行维护及其船员吃喝拉撒的全部费用。舰长们挖空心思节省开支，海军战斗力每况愈下。后来，雅典不得不废除这一制度。此时的海战，和陆战没啥区别，不过是士兵之间的打斗，由陆地转到了船上。

“哈洋族”说，斯巴达和雅典一联手，打败了波斯百万大军，使波斯就此由盛而衰，有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为证。

“哈洋族”还说，《希波战争史》的价值，可以PK司马迁的《史记》。

希罗多德善于编故事，据说他曾游遍天下。希罗多德说，在埃及，亲眼看到“他

们上市场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则拉到下面来。埃及的妇人用肩担东西，但男子则用头顶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他也曾亲眼看到“他们（指印度的男人）的精子也和其他人的精子不一样，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和皮肤一样的黑。埃西欧皮亚人的精子也和他们一样，是黑色的”。《希波战争史》是希腊版的《镜花缘》，的确引人入胜！

和中国的《杨家将》之类接近，希罗多德善于讲神话。《希波战争史》中，每战必有鬼神托梦，必要时，神灵索性亲临战场杀敌：“当异邦（波斯）军逼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时，他们受到了自天而下的霹雳的打击，帕尔那索山的两个山峰给打了下来，它们带着巨大的轰响向着他们压了下来，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压死了。而且，从雅典娜神殿也发出了胜利的喊叫和呼声。”

在希罗多德笔下，斯巴达和雅典的勇士们，无不胜过《三国演义》之张飞、关羽、赵云，让罗贯中也自愧不如。

在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中，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波斯骑兵、弓箭兵、步兵，只有两条腿的雅典“重装步兵”毫不畏惧：“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奔来的时候，他们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是在发疯而自寻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奔来的雅典人人数不但这样少，而且有没有骑兵和射手。”就这样，“雅典人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并且乘胜追击波斯人，他们在追击的道路上歼灭波斯人一直把波斯人追到海边”，“在马拉松的这一战役中，异邦军当中阵亡的有6400人左右，雅典人方面则是192人”。雅典人的武功是如此之好，步兵攻击骑、步、射，战绩1：33。

最精彩的故事，还是正宗的“希波战争”。希罗多德说：为了搞定雅典、斯巴达，波斯动员了528.322万大军。除了庞大的后勤部队，仅一线作战部队“总数就是264.161万人”，其中：

从亚洲带来的陆军：“步兵人数是170万人，骑兵人数是8万人。在这之外，我要加上阿拉伯的骆驼兵和利比亚的战车兵，估计他们有2万人。”

从亚洲带来的海军：“这样的船一共集合了3000只，这样，上面的人员就得是24万了。”波斯海军的主力是腓尼基人及其“行驶得最好的船只”，而在航海和海战上，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师父。

奥姆斯特德说：“希腊世界中拥有更多人口，在财富、文化上更先进的那部分地区，早已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战争爆发前夕，大半个希腊半岛也投靠波斯，希罗

多德说：“献出了土和水的是：贴萨尼亚人、多罗匹亚人、埃尼耶涅斯人、佩莱比亚人、罗克里斯人、马格涅西亚人、玛里斯人、普提奥梯斯的阿凯亚人、底比斯人以及除铁斯佩亚人和普拉塔伊阿人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贝奥提亚人。”当然，还有早就投到波斯门下的马其顿等城邦，而且“色雷斯和色雷斯附近海上诸岛的希腊人提供了120只船”。这些希腊城邦纷纷派兵助战表忠心，“全部人数是30万”。

挑战波斯的希腊阵营是：

陆军：“在那里等候波斯人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斯巴达的重武装兵300名；铁该亚人和曼提涅亚人1000名，双方各占一半；从阿尔卡地区的欧尔科美诺斯来的120人，从阿尔卡地亚的其余地区来1000人；除去这些阿尔卡地亚人外，从科林斯来400人，从普列欧斯来200人，从迈锡尼来80人。以上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从贝奥提亚来的则是铁斯佩亚人700名，底比斯人400名。在这些人之外，又召来了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的全军和1000名波奇斯人。”合计4000来人。据说，后来希腊人还立碑为证：“4000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300万敌军奋战。”

海军：“被指定在水师里服务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雅典人提供了127只船，普拉塔伊阿人和雅典人同样地乘上了这些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海上事务的经验，而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和热诚。科林斯人提供了40只船，美加拉人提供了20只船……集合在阿尔铁米希昂的船只一共是271艘，那些50桡船还不计算在内。”到萨拉米司海战时，全部战船凑足了380只。

一场陆战下来，波斯胜利，占领雅典，但21000人战死；希腊除斯巴达300壮士大多牺牲外，其他人全身而退。战绩：1：70。

萨拉米司海战更神奇：希腊海军几乎歼灭了波斯海军。

波斯人没招了，只好留下30万大军驻守，其余人马回家。但是因为一路病死饿死，“带回来的军队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了”，也就是说，至少死亡400万人。

接下来，希腊组织了11万民兵步军对付30万波斯驻军。在普拉塔伊阿，“给希腊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尽情杀戮的机会，30万人的一支大军，除去和阿尔塔巴佐斯一起逃跑的4万人之外，只不过有3000人活下来罢了。在这一方面，则斯巴达出身的拉凯戴孟人在战斗中死亡的一共是91个人，该铁亚人是16个人，雅典人是52个人。”战绩：1：1616。

在《水浒传》、《说岳全传》中，宋军曾直捣黄龙，让辽、金称臣纳贡，而且将何人在何地，用何谋略、武功、武器，消灭敌军多少，都讲述得详详细细。丰富的中

国史料告诉我们，那是评书，是瞎忽悠。希罗多德不懂军事，在战场细节描述方面，太有所欠缺了。

波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据西方专家研究，波斯大军进攻希腊本土，是在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79年，这正是波斯旭日东升的时期。一支刚刚扫清埃及、平定巴比伦，打出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军队，要说打不过一盘散沙的半个希腊，那一定是天方夜谭。如果波斯大军果真到过雅典，而最终没有征服希腊半岛，只有一种可能：主动放弃。希腊半岛3/4以上是山地，土地贫瘠，食之无味，且民风强悍，统治这种地方得不偿失。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曾从朝鲜半岛撤军，明朝也曾主动放弃交趾，这两次行动，恰好也是发生朝代上升时期，难道是中国军队打不过吗？

这些，得靠我们用正常思维——用中国人疑古的思维去判断了。毕竟，波斯帝国留下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希波战争”的记载。

依依惜别原始社会

“哈洋族”说，雅典是一个民主国家，实施了完美的民主政治。

“哈洋族”认定雅典是一个国家，但是雅典人从没说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且连政治、政治家的概念也没有，更别提民主国家的所谓“政党”。几个村庄组成的联合体，雅典更像一个部落联盟。雅典是国家还是部落，并不重要。

雅典是4个伊奥尼亚的部落组成的一个联合体。由于世世代代内部通婚，这4个部落成了一个血缘关系紧密的大家族，凝聚力超强。雅典是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它的4部落、10部落，都是按照“祠堂”建立起来的，都有专职的世袭的祭师。雅典的宏伟建筑，全是宗教祭祀场所，无一例外地拥有专职祭师，所有这些祭师，均为当然的高级“公务员”。部落治下的三一区、德莫的领导，是否享受薪水不得而知，但均为该地盘的宗教领袖。遇上什么事情，这些人便召集公民们开会，会前通过宗教仪式以统一思想，祭师们自然说啥就是啥了。

雅典的所谓政治，实际上是宗教领导下的家族内部事务。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最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碗水端平。雅典的大事，是召开公民大会决定的，尽管没有扩音器和高音喇叭，由4个部落轮流主持，10天一次的6000人、万人公民大会照开不误；4个部落改组为10个部落之后，每个部落产生一名带兵的将军，于是雅典有了10名司令官。雅典的官员，包括500人议事会成员、公民大会主席、陪审法庭成员、

具体的执法者，全是抽签产生。在各部落平均分配指标、部落内部抽签产生的“人大代表”，轮流主持政务；具体工作，诸如城管局长、公安局长之类，也是抽签决定，谁抽上谁干。雅典的“国家元首”，也是抽选出来的，每个人只能干一天，真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大民主。

雅典确实很民主，但是，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行为，引起了古往今来的西方专家的警觉。

抛开雅典曾经出现的独裁者和贵族政治时期不谈，雅典的政治，说到底，就是人人平等，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表决权，人人有均等机会行使执法权。不管是阿猫阿狗，有才无才，只要抽签抽上了，就可以沐猴而冠，行使执法权。柏拉图很不赞成这种做法：“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由文盲为科学家的科学事业主持公道，由流氓为慈善家的慈善行为作出判决，果然，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了活命也得逃离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暴民政治”或者“群氓统治”。

德才兼备者掌握立法权、执法权，才是光明的、科学的、可靠的民主政治。在神权统治下搞民主，不是科学的民主，而是原始的、愚昧野蛮的民主。

有人说斯巴达独裁专制，雅典比斯巴达更民主、更先进，我看未必。

斯巴达，说起来有两个世袭“王”，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个部落的首领。部落首领世袭，是原始部落的普遍现象，并不奇怪。这两个“王”，没有自己的王宫，没有自己专门的办事机构，一天三餐与臣民们同吃大锅饭；战利品，特别是最宝贵的土地，也是与广大臣民平分。作为“王”，唯一的特权，就是给臣民当裁判员，战争时期则当指挥员。这么大公无私的独裁国王，到哪儿找去？有这样的独裁国王，是百姓的福气。更何况，斯巴达还有5名监察官、30人的长老议事会（含二王）、公民议事会，真有什么大事，两名国王也是与大家商量着办。如果一定要说斯巴达是君主政治、独裁政体，也太不讲理了。

当然，斯巴达也有让人很不爽的地方。《新全球史》（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下同）说：斯巴达的“女孩在18到20岁时结婚，但他们不能同丈夫生活在一起，只是偶尔才有夫妻生活。男子在30岁左右时，离开军营与他的妻子和孩子组建家庭”。中国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搞的男女隔离，或许就源于此。这种苦行僧的做法，很是不得人心。

撇开斯巴达不谈，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很先进吗？依我看，每个民族都曾是雅典。

刚从原始社会爬出的日耳曼人，在入主西欧后很长一段时间，各村庄依然执行自己的“会议制度”或者“议会制度”，“这种大会由定居于各个地区的一切自由人组成；所有这些人不仅有权参加而且必须参加会议”，“人们在会议中讨论一切问题、一切参加会议的人所共同关心的事”，“在大会上，它们不仅执行法律，不仅商议共同的事物……”

有日耳曼法律规定，“每个百家村应按照古代习惯在伯爵（或其使节）和百家村村长面前召开大会”，“任何一个自由人如果忘了参加会议，不到伯爵或他的代表或百家村村长面前来，则罚款十五个索利图斯。任何人，不论是公爵或伯爵的封臣还是其他人，都不应忘记参加会议，以便穷人能提出他们的诉讼案件”。

与雅典一样，啥事都共同商议、共同执法，大多数时间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与大多数人无关，那么，大多数人岂不成了“打酱油的”？这样的民主，只有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消受得起。穷人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雅典公民只要到会就可以领到一笔“会议津贴”，但农忙季节怎么办？十天一次的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是多数人缺席，这个说“我家的麦子要收割了”，那个说“我家的地要浇水了”，待在家自个儿忙乎着。好在“城邦国家很小，公民相互都很熟悉”，缺席一下，也没有谁会怪罪。

日耳曼人开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事不知怎么让皇帝知道了，虔诚者路易立即做出重要批示：“关于代理主教和百家村村长，他们多半出于贪财而主要不是为了执法，常常召开议会，从而扰民太甚。”“关于自由人应出席的地方议会，必须遵守我们神父的法令，即一年只应召开三次大会，除被告或起诉人或被传来作证的人而外，不得强迫任何人出席。关于应由百家村村长召开的其他议会，除辩护人、法官和作证的人以外，不得召集任何人出席。”此后，日耳曼人的议会先是变成贵族会议，最后成了国王自家的会议。

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的远祖也是如此。尧、舜、禹都没将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他们的王位的更迭，是通过选举制加禅让制实现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他们登上宝座之后，依然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特殊化的味道：“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　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　，胫不生

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井田制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组织的资料显示，雅典、斯巴达，与中国区域宗族性的乡党组织十分类似。

在组织形态上，《周礼·大司徒》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乡党组织里，不仅土地按人口平分，还设有公田以备救济，设有学校教孩子读书习武，设有公堂开会议事娱乐。人们熟悉的《诗经·豳风·七月》告诉我们，广大中国“村民”不仅同劳动同祭祖，而且一同在家族公堂聚会议事，一派和谐气象。

雅典的部落、三一区、德莫同时是一个相对应的军事组织，中国的乡党组织也是如此。《周礼·小司徒》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族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平时，农忙劳动，农闲军训；战时，每家抽一人入伍，就可立即投入战斗。

在中国古代乡村，关键的主意，是由有钱有闲的乡绅们来拿，雅典也是如此。在雅典，唯独最具实权的、最关键的岗位“十将军”，是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来的（其他职务一般是抽签产生）；唯有这个职务，可连选连任；唯有这一职务，老百姓打死也不会干的，因为唯有这个职位是没有工资白干的。穷人不干，只能委屈有钱人了。有钱又有闲的伯利克里，在首席将军这个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多年。

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地之上有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古希腊的部落各自为政，所以雅典、斯巴达像一个国家。直到汉朝，宗族首领“三老”依然被列入地方政府的议事机构。

起初，蒙古帝国也很民主。大家推举铁木真当上成吉思汗后，蒙古帝国被公认为成吉思汗家族共有的财产。成吉思汗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大汗的位置，都是通过库里台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为了民主，大汗位置常常悬空几年，年把两年没有大汗再正常不过。诸长子西征时，正是因为长子们急着回去参加库里台大会，西欧诸国才躲过一劫。直到忽必烈以武力夺取龙椅，大家才不再谈民主了。按照某些“哈洋族”的理论，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帝国应该位居“贵族民主制度”的行列了。

在人类远古时期，在原始部落里，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部落首领和军事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当今世界的众多未开化地区，仍是如此。

苏格拉底为什么“反民主”

苏格拉底、柏拉图并不喜欢民主。苏格拉底把人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做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将当时希腊各城邦的政制分为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在柏拉图看来，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寡头政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在民主国家里比在寡头国家里更为强暴”·，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谋杀的。僭主政制是民主政制发展的结果，而“僭主是杀父之徒，是老人的凶恶的照料者”。相反，斯巴达的一套，还是“受到广泛赞扬的”。据此，柏拉图设计了一个“理想国”：国民分为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劳动者等四个等级；各等级的人必须遵从神的意志，安守本分，否则给予严厉处罚，对屡教不改者处以死刑；至于统治者，最好由德才兼备的哲学家来担任。

培育出专制君主亚历山大的亚里士多德，还写出了《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忠实传承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学说，坚信龙生龙凤生凤，“优种传递优种，世泽之家的后裔常常见到有良好的品德”。希腊城邦现行政制当然都是不好的，而民主是绝对搞不得的，因为“倘使穷人占据最高治权，就会凭其多数来瓜分富户的财产——这是否有违正义（非法）？……这种多数显然是在破坏城邦”。到底应该将国家交给谁来治理呢？“谁对这种团体所贡献的（美善的行为）最多，（按照正义即公平的精神）他既比和他同等为自由人血统（身份）或门第更为尊贵的人们，或比饶于财富的人们，具有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较大的一份。”国家必须由一位“道德哲人”来统治。

至于遍及希腊各个角落的奴隶，自然入不了这三大贤人的法眼。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奴隶属于等外品；亚里士多德则干脆将奴隶与野兽等同，“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他们研究的政治学和理想国，自然是与奴隶无关的。

三大贤人不主张民主，而强烈支持、高声呼吁、极度赞美君主专制的古希腊学者更多。

当亚历山大用君主独裁制，将“希腊文明”推广到亚洲、非洲后，罗斯托夫采夫说：“君主政体随之成为希腊世界的主要政府形式，君王统治者备受推崇。哲学家成为希腊化时代各宫廷的座上宾，而且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纷纷以王权为题，论述君主政体的合理性。”

J.H.伯恩斯主编的《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说：“希腊世界有着君主统治的思

想传统，可回溯到荷马那里。”“在希腊化国王的统治下，希腊思想融合了外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传统，产生了一种相当长寿的综合体。皇家意识形态在一个又一个歌功颂德的演说中，在一系列君王论的著作中得到了预演，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以及后来的日子里，这种皇家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没有发生过变化。”

经广大希腊学者的努力，君权被推向极致。“狄奥托根尼说：（国王）‘他不对任何人负责，他就是他自己，自己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法律’，国王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是，国王必须令人敬畏和有威严；而宫廷礼仪的目的就是要为他树立起神圣的氛围。但他不仅仅是在长相和行动上模仿上帝，他还必须起到上帝的中介者之作用，因为他的王国要继续生存下去得靠神的恩典。因此，国王既是将军和法官，又是祭祀，对其臣民的宗教福祉负责，因臣民的犯罪而向神作交代。”

古希腊的贤人们纷纷支持君主专制制度，似乎是对雅典政治的悖论，实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

综观人类历史，由原始民主制向君主独裁制，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必由之路。波斯如此，罗马如此，日耳曼人如此，印度和中国又何尝不如此！不用讲述任何理论，“希腊化国家”的实践，证实了古希腊此时正处于由原始民主制向君主独裁制转型期。雅典一再出现独裁者，正是原始民主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交锋与较量。当亚历山大的军功使希腊社会国家化之后，希腊人终于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

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从原始民主向专制国家转变的时期。所不同的是，雅典有记载，因为它晚至2000多年前才出现，而且被当今的头号富豪欧美人视为祖师爷。

古希腊的贤人们纷纷支持君主专制制度，只能说，他们通过观察周边国家，结合希腊实际，在深入思考之后，得出了希腊的出路在于君主专制的正确结论。



第2章 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



公元前6世纪末，从多瑙河沿岸迁到亚平宁半岛上的几个小部落，建立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510年，过渡到共和时代。经过几个世纪的军事扩张，建立起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帝国。公元前后，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1461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主流”史学界一般以西罗马灭亡作为罗马帝国消亡的时间点，因此，古罗马大致对应于中国的战国至东晋时期。

罗马议会的悲喜剧

几个小部落联合而成的罗马“共和国”，长期是靠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来进行村民自治的。随着地盘越来越大，鉴于有些人不自觉遵守风俗习惯，世风日下了，大伙儿便找来几块铜牌，刻上“约法三章”，立此存照，这就是所谓的“十二铜表法”。此后几百年，共和国便据此实施“法制”。

罗马有一个权力很大的元老院。元老，就是代表各大家族利益的有钱又有闲之人；元老院，是罗马共和国的董事会。共和国的大事，都是由董事会商议、拍板之后，由选举出来的总经理——执政官负责实施。广大公民是罗马共和国的股东，组织有一个所谓的百人队会议，也就是能服兵役的壮年男子的会议，类似于希腊的公民大会，也即共和国的股东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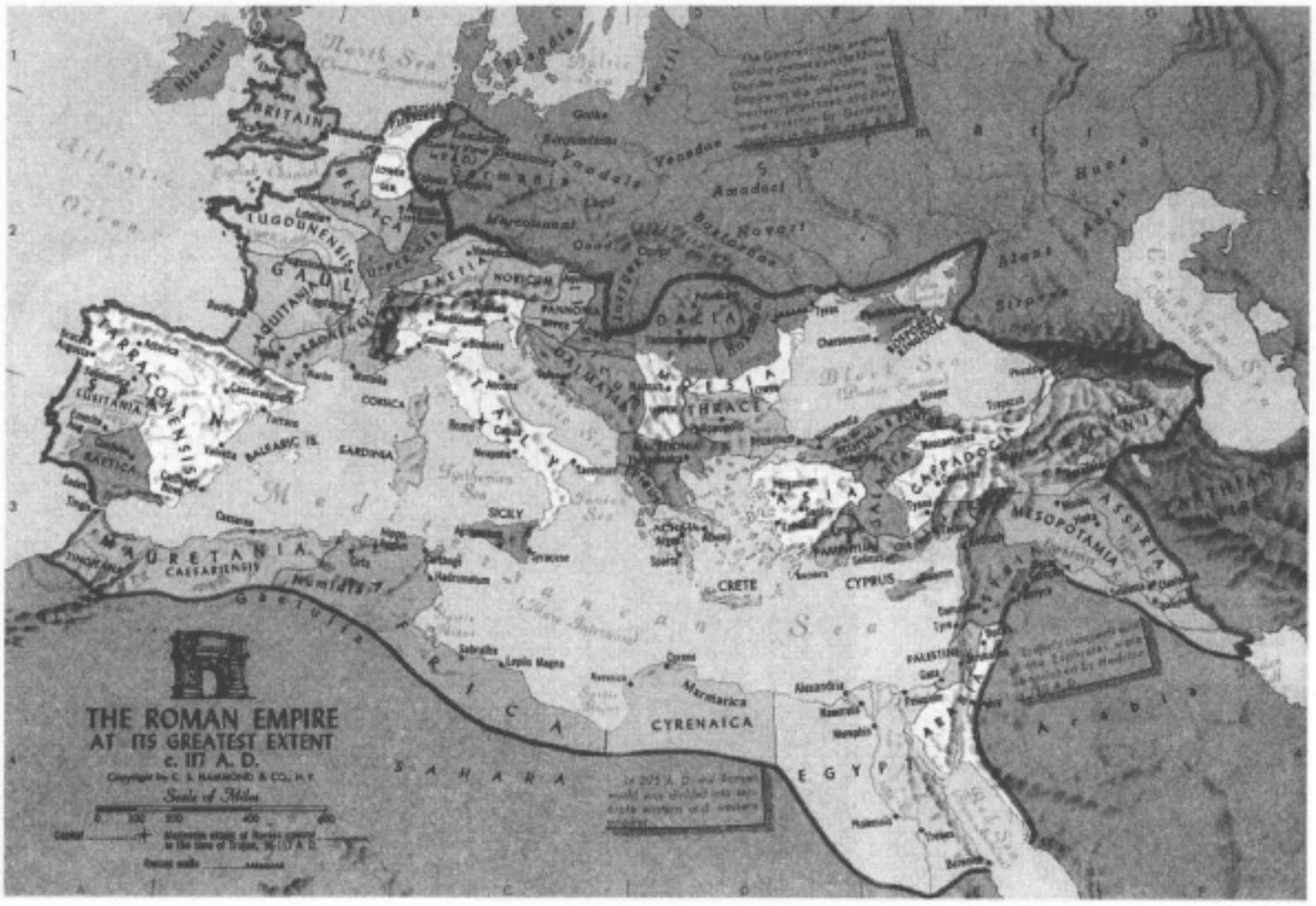
平心而论，在董事会领导下的罗马共和国，发展得是很不错的，可以说又好又快。元老们创造的最具特色的法律，是“罗马‘八旗子弟’权益保护法”。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介绍道：“意大利人的产业全都免税，对意大利人，地方司法官也无权随便加以处置，他们的完全依照首都的形式建立的市自治机关被授权，

在最高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下，行使司法权力。”当然，还包括管吃、管住、管玩等内容。这个法律是很具凝聚力的。元老们指挥将军们率领公民东征西讨，从“在方圆四五里之内劫掠埃克斯人、沃斯克人、安提亚人”开始，通过发动无数次战争，罗马发展成为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董事们并不总是懂事。由于不能与时俱进，犯下了两大错误，元老们惹来了杀身之祸。

一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干些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事儿。在对外战争中，征服地区的“那些貌似出于感激或慷慨暂时被容许握住权杖的王公，一旦完成了分派给他们的任务，把那些被征服民族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他们立即便会被从王座上踢开”。这些混账行为，招致各地不断的强烈报复，仅仅“在亚洲被控制后的约40年中，在米特拉达特的残酷命令下，一天之内就有80万罗马人被杀”。

在对外战争基本结束后，为罗马人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的意大利人，一再“和平请愿”要求加入“罗马公民”行列。**在元老们的心中，只有自己那几个部落的人，才是上等人。**他们坚持将意大利人当作小跟班，拒绝给予“国民待遇”。意大利人



古罗马帝国全盛时地图

受不了了，联合起来自建国家挑战罗马，亚平宁半岛烽烟四起，战火烧了长达两年之久。鲜血教训了元老们，意大利居民得以全部农转非，升格为“罗马公民”。

二是不知进退，不能准确把握将领们的需求。爱德华·吉本说，虽然“选择谁作为罗马的敌人的权力一般操在立法机构手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事关重大的问题，先需由元老院讨论决定，最后由人民批准”，但是，随着罗马持续的对外战争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元老院培养、任命的军事首长们，不再满意这群大腹便便的龙钟老迈们的指手画脚了，他们想自己说了算，要当CEO。“在胜利的掩护下，特别是在他们不再受到元老院的代理人的控制的时候，他们实际行使着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当庞培在东方用兵的时候，他随意奖赏他的士兵和同盟者，废除某些国家的君主，重新划定一些国家的疆界，建立殖民地，并任意分配米特拉达特的财富。”

终于，“罗马宪法的一道道防线一道一道全被独裁者的野心所攻破；所有的樊篱也全都毁在三执政的无情的铁腕之下”。自此，“立法院”丧失立法权，最终，“议员”们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了。

公元前88年，苏拉率领罗马军队杀入罗马城；公元前82年，苏拉再次率军杀入罗马城，被元老院任命为无限期独裁官。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说：“他发明了放逐制度，并且给那些不属于他的一派的人们的脑袋定出了价钱。”恺撒更牛，孟德斯鸠说：“有一天元老院把某些荣誉授给他，他却连站都不屑站起来……他把元老院竟然蔑视到他自己做出元老院决定的程度；他想到哪些元老，他就用哪些元老的名字来签署这种决定……恺撒曾傲慢地说过共和国根本不算什么玩意儿，而他的言语就是法律。”通过数以十万计的罗马人死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罗马完成了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过渡，CEO们很快完成了股权变更，共和国变成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议会始终是存在的。不过，皇帝们或呆在尼科米底亚，或定居拉文纳，或住在君士坦丁堡，或者呆在其他什么地方，总之，不与元老院在一块。“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时，君主只是和大臣们商量商量，而不必听取全国性议会的意见。直到帝国的最后一段时间，元老院这个名称仍然能引起人们的敬畏，它的虚荣的成员仍然以拥有元老这一光荣称号而沾沾自喜；但是，这个多少年来一直作为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工具的会议，却被人们恭而敬之地逐渐全部遗忘了。与皇帝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一切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已成为卡匹托里亚山丘上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

瓦勒良和伽利埃努斯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值得一说。正当这两位老大领兵在外作

战的时候，一大群野蛮人越过多瑙河，很快烧杀掠抢到罗马城下。呆在罗马城的元老们万般无奈之下，一边调集留守的军队，一边就地征兵，出门迎战。野蛮人看到罗马军队如此众多，便放弃攻城，带着大批珍宝回家了。在元老们弹冠相庆之际，得到这一捷报的伽利埃努斯大为震惊——元老院竟有如此力量，这太可怕了！他立即下令：禁止元老踏入军营半步。从此，元老院变成彻底的养老院了。

“八旗子弟”的天堂

与大清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有一帮“八旗子弟”——罗马公民。爱德华·吉本说：“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的地区的一切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罗马的公民。”正是他们的祖宗流血流汗，一刀一枪地打出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作为功臣的后裔，他们才得以受到历任罗马皇帝的殷切关怀，踏踏实实地享受坐天下的滋味。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国按时给他们发放酒、肉、粮食、衣物，乃至零花钱，保证一家人达到小康。他们一辈子只有当兵打仗一个义务。打胜了立功了，还有土地和金银珠宝等奖赏。混得好的，日子自然安逸得不得了。对混得不好的，帝国的恩泽也无微不至，不仅管吃饭穿衣，而且一再扩建澡堂、竞技场等休闲设施，免费提供洗澡、看戏等各种服务。罗马城和其他的罗马公民聚集处，澡堂、剧场等娱乐业十分发达。这帮“洋八旗子弟”觉得做饭太麻烦，帝国立即接受这一合理化建议，将定期发放粮油，改为每天发放一次面包、熏猪肉之类的熟食，管保一家人够吃。爱德华·吉本愤愤地说，吃饱喝足后，“他们整天在大街上或者竞技场上四处闲逛，听听有什么新闻，彼此胡乱争吵；他们把妻子儿女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用拿来豪赌中输个一干二净；夜晚，他们跑到阴暗的小酒馆或妓院去，在下流无耻的肉欲中消磨时光”。

统治阶级给自己和后人确定高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奇怪。中国的周朝建立后，也实施了乡遂制度，将国民分成“国人”、“野人”两个等级。国人，主要是参与打天下的那部分人。和罗马公民一样，参军打仗是国人的事情，国人对政治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左右国君的废立。周朝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给国人，国人们不仅要自己种地，而且必须负担军赋和力役。野人也获得国家按人口平分的土地，同样要出钱，还要参加指定的义务劳动。当然，上缴税负的比例是有差别的。正因为广大国人是自食其力者，所以，从西周到东周，没有“八旗子弟”阶层，而且人才辈出。

清朝建立后，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子弟们待遇优厚。但是，比起罗马公民，满清八

旗子弟的福利待遇差远了。旗兵的祖宗也就获得30亩田产，后世当兵者每月一二两银子，没当上旗兵的“余丁”一无所有，这算哪门子特殊化！满清八旗子弟被批判被嘲笑，真是冤得慌。

不久，“洋八旗子弟”们大多花光家产，成为混吃混喝的流浪汉，不仅上不了战场，而且大批人因为高层争权夺利成为冤死鬼。到了后来，帝国不得不通过赐予“罗马公民”身份，征集“蛮族”男子上战场。蛮族汉子自然不会那么无用，他们大多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有机会就想当皇帝，于是政变更加频繁，终于，龙椅上坐着的变成了蛮族人。

罗马公民无用，根子在于他们的主子混蛋。罗马皇帝多靠阴谋与屠杀起家，一旦坐上龙椅，便无恶不作。康茂德终日不干正事，热衷于和狮子老虎打假，搞女人，杀不听话的人，这也就罢了。最离谱的是，他专门找来300个英俊的小伙子，300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强迫小伙子们分别诱奸一个姑娘，若不成功，就会严惩。主子如此，奴才们会好到哪里去！伏尔泰在《风俗论》说，罗马帝国“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证代替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代替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

比大清八旗子弟更甚，罗马公民沦为彻底废物。打天下时，罗马军团的战斗力也许还行，坐天下后纯属垃圾。百万罗马公民聚居的罗马城，在被哥特人阿拉里克的乌合之众围困后，“洋八旗子弟”们第一反应是，“一个下贱的野蛮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贵族和人民一开始不免感到惊诧和愤怒；然而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敛起来，而他们缺乏男子气概的愤怒也没有转化为对武装敌人的反击”，却是大肆搜寻、残杀所谓的“通敌分子”。罗马城的卫队长建议以巫术退敌，打算“借助咒语和牺牲的神秘力量从云中呼唤雷电，并让这天火指向野蛮人的营地，将它烧毁”。待到数以千计的罗马人饿死街头，他们不得不派使节求和，阿拉里克“在对方立即支付5000磅金子、3万磅银子、4000件丝绸袍子、3000件质地上乘的红衣和3000磅胡椒后，就立即解除了包围”。接着，根据阿拉里克提出的要求，在元老院“一致拥护”下，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个傀儡偏偏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阿拉里克索性纵兵在罗马城随意屠杀、强奸、洗劫了六天之后，满载财宝而去。伏尔泰感叹道：“当时罗马帝国已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这个哥特人不屑于当罗马的国王。”

武夫的黄金时代

罗马帝国，是典型的武夫当道的时代。帝国的皇帝，基本是军人出身，相信只有在军人们心情舒畅的条件下，自己才坐得稳天下。塞维鲁告诫自己的儿子："保证能得到部队的欢心，对其他的臣民全可视如粪土。"罗马军队是肆无忌惮的悍兵，稍有不满，便杀进皇宫割皇帝的脑袋。259年，波斯杜穆斯被他的部下推举，割据高卢为皇帝；268年，他又被这些人杀死，因为他禁止官兵抢劫美因茨这座城市。每个新皇帝登基时，即便挖地三尺，也要弄一大笔钱向禁卫军买平安。

古今中外，龙椅的诱惑都是巨大的。按照中国的习惯，罗马帝国可以分为N个朝代。为了争夺这把椅子，你刚唱罢我登场。有脑袋进水花钱买椅子的；有认干爹继承椅子的；有领兵杀进皇宫直奔椅子的；有前线将领阵前黄袍加身的；有老子杀儿子的；有兄弟相残的；有天上掉馅饼，稀里糊涂当上皇帝的；有被士兵们"拥戴"被迫登基的。无数人为此掉了脑袋，许多刚坐上龙椅便被人割了脑袋。

说个有趣的故事。192年，禁卫军杀死暴君康茂德，推举龙钟老迈佩提那克斯即位。迂腐的佩提那克斯想搞改革，但才坐了86天龙椅，便被他的卫士们割掉了脑袋。禁卫军官兵们突发奇想，宣称向富人们拍卖龙椅，谁出钱多，就将龙椅送给谁。有钱又想过皇帝瘾的人从来不缺，几个人跑去和禁卫军谈判。**经过角逐，元老尤利安努斯以许诺给每个士兵6250德拉克马的钞票，名列第一，立即被拥上皇帝宝座。**不过，这傻老头在龙椅上没坐几天，就被另外一支军队拥戴的人赶下台，脑袋也搬了家。

孟德斯鸠说："当帝国后来在瓦列里安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伽利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可怕的混乱到达极点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三十个不同的争夺王位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相互残杀而死的，他们每个人的统治都十分短暂，而且他们都是被称为暴君的。"中国历史上争夺皇位的大戏，罗马帝国无一例外地全部上演过；不过，军队拍卖龙椅，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

军人横行如斯，动嘴皮子的议员自然不如草芥，数以百计的元老动辄被处死。无论谁当皇帝，元老们都赶紧迎上去点头哈腰，但仍然逃不脱被屠杀的命运。过不了多久，元老院就换成全新的面孔。公元前43年，渥大维和安东尼、雷比达联合夺取政权后，大肆追杀政敌，一次性杀死300名元老。屋大维一上任又逼迫200名元老自动请退。哈德良刚即位便处死四大功臣元老。罗斯托夫采夫说："皇帝们与元老院议员阶级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芮罗统治时期告一结束，其结果是最富有的和最悠久的元老院议员家族几乎被杀尽斩绝，残留下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家族，而且是那些势力最小

的家族。”好在元老们家产都在“一万镑”，他们便倾尽家产，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连后代也懒得要或不敢要，许多高贵家族就此灭绝。帝国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元老院被皇帝遗忘，扔在罗马自个儿民主议政去了。

罗马军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即便是罗马蒸蒸日上地对外扩张那一会儿，也仅仅是在遇上“希腊化”国家的军队时，还算是一支“劲旅”；一旦与其他国家军队交手，必然是窝囊废一个。公元前53年，著名的克拉苏率10万大军杀向安息，结果逃回者不足1万，他自己的小命也留在了那里。公元前36年，著名的安敦尼攻打安息，亦遭惨败。公元260年，皇帝瓦勒良帅数万大军远征波斯，一战而败，全军被围，瓦勒良主动上门当俘虏，受尽羞辱死去后，他的皮囊被塞进草料做成人形，保存在波斯博物馆中。公元363年，皇帝尤利安率军征讨波斯身受重伤死去，中级军官约维安竟然被陷入绝境、六神无主罗马军队推选为皇帝，波斯提出的割让5个省的条件，约维安立即照单全收，签字画押、交出地盘后，波斯人让开通道，罗马军团落荒而逃。

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野蛮人，罗马军人也打不过。皇帝德基乌斯亲率帝国精锐征讨蛮族哥特人，结果他和他儿子的脑袋一块儿被哥特人砍下。罗马帝国索性在北部筑上了长城。用兵40年，罗马也没能搞定蛮荒的弹丸之地不列颠岛，也筑上长城了事。

罗马的“海军”

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类似于中国的洞庭湖、鄱阳湖，或者渤海。罗马起家的时候，罗马人对海洋是一无所知的。孟德斯鸠说：“罗马人根本不懂得航海术；迦太基的一支舰船在他们的海岸上搁浅了，于是他们便模仿着这只船修造了一支新船：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水手受到了训练，他们的舰队被修造和装备起来，并且被放到海里去，这支舰队遇到了迦太基的海军后，便把它击败了。”尽管如此，在罗马统治者眼中，海洋是微不足道的，陆军才是正经的军队，才是高贵的象征。精锐士卒被充任禁卫军，稍次的编入选军，最次的编入辅军。海军士兵，都是免奴——摘掉奴隶帽子的下等人，当然海军司令由罗马武士来担任。不用怀疑，罗马一定有一支舰队常年游弋于地中海，即便是出于治安需要。

因此，罗马海军很不咋的。在罗马帝国颇为兴旺的瓦勒良和伽利埃努斯时代，一群又一群的北方蛮子，驾驶着比独木舟稍微强一点的玩意儿，从黑海北岸出发，顺着海岸线向南，一路肆意抢掠，无不满载而归。尽管“明智的斯特拉波明确告诉我们，本都和小西徐亚的野蛮人所使用的海盗船最多只能容纳25或30人，那我们便可以有理

由肯定，在那次强大远征中船上所载的战士最多也不过15000人而已”。当这支海盗队伍推进到雅典时，罗马皇帝所能做的，不过是派“机械师”来帮助加固雅典城墙。自始至终，罗马海军没露面。待到海盗们侵袭到意大利一带了，罗马皇帝深感事态严重，与大臣们商议的结果是：“招安”——委任蛮子中的老大为执政官（大约副总理级别吧）。这一招果然灵验，通过以夷制夷，勉强搞定了这批西方倭寇。

罗马公民不重视海军，也许有一个客观原因——怕水。罗马是个“农民国家”，古罗马有句经典的话：“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这样称颂的人，认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最强壮的人、最不畏缩的士兵，就是来自农民间的。”因此，罗马公民们都是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土地上，罗马皇帝带头，当上了头号大地主。贵族们起而效尤，想方设法多捞土地，以致许多贵族所占地盘太大，仿若国中之国，进而尾大不掉。

孟德斯鸠说：帝国分裂后，“西方的帝国处境特别惨：他根本没有海军；海军都在东方的帝国、在埃及、在塞浦路斯、在腓尼基、在伊奥尼亚、在希腊这些地方。只有这些地方当时是从事商业的”。东罗马的海军是不是就了不得呢？当然不是。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

顺带说说岛国不列颠。伏尔泰说：“恺撒进入英国时，发现这个岛比日耳曼更加野蛮。居民赖以遮体的只是几张兽皮，一个村子的女人不分彼此地属于当地全体男人所有。他们的住所是一些芦苇盖的窝棚，他们的装饰就是男男女女文身刺画，涂以草汁，跟今天美洲野人一样。”

赤字外贸的工商业

罗马帝国的“龙兴之地”亚平宁半岛的社会经济水平很低；帝国版图内，最发达、繁荣、富庶的是西亚和埃及一带。爱德华·吉本说：“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的民族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加图《农业志》、瓦罗《论农业》和科路美拉《论农业》，不过是照抄照搬东方人的著作罢了。

由于粮食主产区属于皇帝所有，因此，帝国各城市长官首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任务，就是确保居民粮食供应。罗斯托夫采夫说：“罗马帝国并没有谷物过剩的现象。在所有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东方，行政组织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就是负责居民必需的粮食供应的部门。然而，在帝国的都市生活中，饥荒还是极常见的现象。”“帝国所有的城市差不多全都经常遇到缺粮和粮价高涨的灾季，就是那些最肥沃的地区的城市也在所难免，而意大利和外省山区里的城市则尤为甚焉。真正闹饥荒的年成确属屡见不鲜。”

“中央政府不负责解决调整市场的问题。相反的，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反而设置了许多严重的障碍。对于皇帝及其所属官吏们说来，国家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说，有关紧要的，是如何保证其权力。因此，他们为本身利益垄断了大量的谷物，用以供应罗马城和他的军队；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状者，才可以从埃及运出粮食。皇帝的大庄田遍于帝国各地，所产谷物为量甚巨，也都用于此目的。这些皇庄上所产的谷物，很少出现在公开的市场上。”罗斯托夫采夫说：“无怪乎当一个城市能够保持谷价低廉的时候，就要把这件功绩刻在该城官长提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旁边。”

商业并没有因此断绝。罗斯托夫采夫说：“帝国各地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财之道就在于进行省际的贸易，而这种商业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多的谷物、肉类、油和葡萄酒，从这儿运到那儿究竟是为了谁呢？毋庸多言，只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费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粮，而大多数商人——他们往往又是船主和堆栈主人——都在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所谓的商业，主要是担任政府物资的转运站、军用物资的补给站。

这些商人都是谁呢？答案是“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也就是阿拉伯人。罗马公民是不玩工商业的。“人们称为平民的罗马人民甚至不憎恨那些最坏的皇帝。自从他们失去大权并且不再从事征战，他们就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恶的民族。他们认为只有奴隶才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他们所领到的配给的粮食，又使他们忽视土地的耕种：他们所习惯的是各种比赛和观览。”孟德斯鸠告诉我们，“罗马的公民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奴隶们才干的行业；他们是绝不做这些营生的。如果有几个例外的话，那不过是一些被释放的奴隶继续干他们先前的行业而已。”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承认，罗马帝国的商人主要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总之，不是西欧人。

“另一项致富之源是工业”。需求量稍大的服装、毛制品、亚麻制品、羊皮纸、

上等皮革、玻璃、珠宝等等，完全为“东方人”所垄断。高卢，是欧洲地区最发达的“工业区”，主要经营者也是叙利亚人。

汤普逊说：“叙利亚在罗马出现于东方之前，已有一个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业历史。叙利亚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尔和西顿两城。他们的繁荣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来。”

罗斯托夫采夫说：“当和平局面来临和东方开始复兴以后，那些意大利人依然落后，而无法同精明的东方人竞争，东方人一直没有把东方贸易的门户要地，即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腓尼基沿海诸港放弃给西方侨民。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时，叙利亚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从这里派出他们的经纪人到提洛斯岛去，后又派到普特约利去……”

关卡林立，沉重赋税，商人举步维艰。“在罗马帝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没有的，因为有着许多关税势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转口税’的内地通行税，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课以入市税……税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税势力圈和另一个关税势力圈各不相同，从2%到12%不等，后一项税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随着帝国贫困的增长和赋税负担的加重，转口税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4世纪，那不折不扣的12%税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税率了。”

世袭制度也摧残着罗马的工商业。汤普逊说：“使一切手工业变为世袭的一种臭名昭著的法律，规定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再也不能想象有比其更有效地压制创造力和摧残天才的办法了……在5世纪，由于工资的低微、工作时间的久长、赋税的苛重，或在职业上没有兴趣，有成千类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奴隶进入到手工作坊。

至于国际贸易，罗马帝国的表现只有两个字：赤字。在红海，对东方的海外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帝国收取25%的高额关税，由于没有可供出口的东西，“据普林尼记载，约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每年从罗马帝国支出去，以平衡东方贸易差额”。罗斯托夫采夫说：“大批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源源输出国外，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内产品，来抵消输入的东西；结果，它的贸易差额经常是入超的。在东亚文明国家里，帝国的粮食和制造品，却是找不到销路的。”“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完全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者至少主要依靠，白银。”帝国在西班牙就有多达四万人开采银矿，“到了第三世纪中期以后，金银矿的出产已不足以弥补这项亏空了”。

对付贸易赤字，罗马皇帝敲破脑袋，只想出一招：禁止进口奢侈品，比如丝绸。

“自治”的“城市”

毫无疑问，古罗马是欧洲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爱德华·吉本说，罗马“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两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

罗斯托夫采夫说：“普遍的繁荣促使城市繁荣发展，从而把帝国变成了一个由最繁华的城市组成的机体，其中尤以希腊、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城市为著。”

罗马的城市都是袖珍型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些城市，占地面积从20英亩到500英亩，大小不等。”20英亩，即11个足球场的面积，难怪爱德华·吉本说：“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1200座城市……”

“城市”，通常是相对于贵族们的“领地”而言，与我们的城市概念有所区别。罗马帝国设有若干个行省，“城市”隶属于行省，是和中国的县差不多的基层行政区。罗斯托夫采夫说：“每一个城市都规定辖领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市辖区’。这个市辖区或者是古代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领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罗马人而制定分配给新城市或旧城市的土地，这样的城市也许是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许是土著的市镇。”“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

省长把自己的地盘划成N个行政区，在每个行政区内找出一个村庄或者集镇作为市府，然后把这里的有钱人——胞族抓过来开会，告诉他们：从现在起，这里的日常事务你们说了算，但是必须保证每年足额上缴钱粮赋税和另行摊派的任务。遇上灾年收不到钱怎么办？你们都是有钱人嘛，当然由你们自掏腰包补足。你们这么有钱还要工资奖金干什么！不愿意干？那是找死。如此这般，“自治市”就炼成了。

法国著名政治家、学者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具体论述了帝国后花园高卢的情况。他说：“这个时期，在高卢存在着四类人、四种不同的社会等级：① 元老院议员；② 胞族；③ 名为庶民的真正的人民；④ 奴隶……元老院议员是从一切阶级里

产生的，甚至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在内；皇帝随时可以收回他给予的特权。然而因为这些特权是实在的，而且还是世袭的，至少那些在其父亲升为元老院议员后诞生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就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有了一种或至少有了政治贵族这一非常明显的外表。市民的第二个等级是胞族或缙绅，即富裕业主，这不是罗马元老院的成员，而是市议会或者他们城邦的议员……胞族阶级包括城市的居民，他们或者就出生在那里，或者从外地而来，他们拥有25个jugerum（古罗马的地积单位，相当于25公亩——笔者注）以上的地产，而且不以任何名义被列入豁免胞族义务的特权者中……胞族无论是自愿或被迫，就这样被固定在胞族组织中，他们的任务和负担如下：① 管理自治市的事务、自己的支出和收入，或者在胞族组织中加以审议，或者交给市议会行政管理官员处理。在这种双重的情况下，胞族不仅负责个人的经营，而且也负责城市的需要；当收入不足时，这些需要由他们自己负责供给。② 征收公共的捐税，在征收不足时，也要由他们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③ 没有省长的准许，任何胞族成员不得出售使之成为胞族成员的财产。④ 如胞族成员的继承者是胞族以外的人，或者胞族的寡妇或女儿出嫁给非胞族成员时，必须放弃其财产的1/4给胞族组织。⑤ 没有孩子的胞族成员只能按遗嘱拥有其1/4的财产，其余3/4根据规定归胞族组织。⑥ 他们没有获得省长的准许，不得离开自治市，即使有限期的离开也不行。⑦ 当他们未经许可而脱离了胞族，且在一段时间后不能把他们弄回来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以充胞族之用。⑧ 被称为aurum coronaium（金花冠）的在某些庄严节日捐献给亲王的税款，应完全由胞族成员负担。”

基佐评述道：“由胞族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事实上只不过是专制政治不用花钱的代理人，他们为专制政治的利益而剥削他们的同胞，直到他们有机会摆脱这沉重的义务为止。”“他们的选举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皇家在行省的代表可以把它取消掉；这倒是一种照顾，从皇家代表那里得到这种照顾，是他们最大的希望。”“最后，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能实施它。他们没有被授予任何有效的裁判权；要不被取消，他们对此则完全无能为力。”

对于“自治市”、“胞族”的意义，基佐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方面，政府卸脱了供应对它本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公共事业的责任，把它推给了这个市民阶级；另一方面，它利用他们来征收规定给它的捐税，并使他们负责收回全部捐税。它使胞族破产以豢养它的官员和军队；它给予它的官员和军队以一切特权的利益，使他们为它服务，阻止胞族自救。”

汤普逊说：“城市衰落的象征，早在图拉真时代（98～117年）已有所显露，因为我们看到那位皇帝给小普林尼的一封信里，提及那些不愿意担任‘什长’的人……到了第四世纪，城市状况达到了这样的严重地步，以致政府强迫有钱人担任官职，并有系统地以消耗私人财富来平衡城市的预算。”到罗马帝国中晚期，已是城将不城，基本农村化了。

罗马城：古今第一的“休闲城市”

古往今来，世界大多数城市，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下而自然成长起来的。罗马城却不同，仅仅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享乐而生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畸形的怪胎。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罗马城面积5000英亩，鼎盛时期常住人口约百万人。爱德华·吉本说：“罗马城的行政管理是罗马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必须使罗马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使它配称世界的京都；必须使罗马城不断增多的居民在生活基本方面得



古罗马建筑遗址

到保障，如水源供应、排水、卫生设备、防火防洪、铺平街道、修筑台伯河上的桥梁、一支有高度效率的警察部队，等等——这些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所有较重要的城市都曾具备过——除此种种而外，为了赡养罗马城居民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还得付出巨大开支。住在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罗马公民很少关心政治权利……任何一位皇帝，哪怕就是恺撒或者奥古斯都，也不敢触犯罗马无产者这种神圣的权利。他们最多只敢减少和固定领公粮者的名额，以及定出一种适当的分配制度。他们也规定了罗马城居民一年能在戏院、竞技场和圆剧场里看几天好戏，但他们一直没有侵犯过这种制度本身。他们并不是害怕罗马的贱民，他们手下的禁卫军足以平定任何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他们情愿让罗马城居民保持愉快的情绪。在罗马公民中有着这么一大群享受国家津贴的人，其人数在20万左右，都是古代罗马部落的成员。因此，皇帝们每当出现于凯旋、献牲、主持竞技赛马或角斗等群众集会中时，一定受到热烈欢迎。但久而久之，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欢迎，为此，他们举办额外的赛会，填补钱谷的犒赏，设筵席招待成千上万的宾客，布施各种各样的物品。”

那鳞次栉比的院落，是贵族们的乐园。“一篇在提奥多西乌斯写成的精确描绘该城情况的文章，共列出了1780所曾作为富有的有地位的公民住处的房屋。看一看这些豪华的宅院，其中有许多都几乎使我们再无意责怪诗人的夸张描述了——罗马城中布满了数目众多的宫殿，而每一座宫殿都能自成一座城市：因为凡真有实用价值或享乐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其中无不应有尽有；包括市场、喷泉、浴池、柱廊、绿树成荫的园林，以及人造的鸟房。”

贵族有钱，整天醉生梦死，“在罗马，商业活动一直都遭人鄙视”。钱花光之后，“那些伟大人物不惜采用一些最下流的计谋。在他们要向人借钱的时候，他们会像喜剧中的奴隶那样不惜低三下四、卑躬屈节；但在让他们还账的时候，他们又会像赫尔枯勒斯的子孙们一样，软硬兼施地求饶。如果要账的逼要不休，他们便会找到一个能信得过的狗腿子，让他控告这位不客气的债主曾经投毒杀人或使用过妖术，把他送进监牢，而且他若不肯签署一份放弃全部债务的声明，则休想从监狱里走出来”。

各地源源不断运来的粮食，那是皇帝用来免费发放给罗马公民的；巨大的面包房，是用来为罗马公民制作免费面包的；世界最大、最多、最豪华的澡堂、剧院、竞技场，是为了免费让罗马公民得到最佳休闲，不惹是生非。

罗马城除了是首都，不是经济中心，不是商业中心，只是“洋八旗子弟”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是古今中外排行第一的“休闲城市”。

我们不妨引用罗斯托夫采夫的一段话：“城市的繁华是由城市居民中相当少的人创造出来的，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立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群众则或者收入极其菲薄，或者生活贫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夸大城市的繁华富丽：他们的外貌是迷眩人的。”

罗马的教育：“军事训练”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科学是否发达，首看其社会风尚和教育制度。今天，当我们看到欧美国家的大街上、车站、空港，到处都是捧着书读的人，欧美科技发达就不足为奇了。

读书的动力，源于社会压力和个人精神需求。中国与西方不同，除了皇室成员，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主要靠自己的学识从竞争环境中博取，所以，想读书、爱读书、勤思考的人占绝大多数。**古罗马，是一个军事贵族主导、公民享受生活的社会，人们对于读书提不起任何兴趣。**

当汉朝皇帝设置博士和学校倡导读书、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在中国首都的太学攻读的时候，在罗马皇帝持续稳定地亲切关怀下，罗马城里，“使这些游手好闲的群众真正感到激动和欢乐的，仍然是频繁举行的公众竞技活动和各种节目……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天刚破晓时候就赶去占地方，还有很多人就在近处的柱廊上度过焦急的不眠的夜晚。观众的人数有时多达40万，他们不顾日晒雨淋，从早到晚全都全神贯注地观看着”，“罗马的宏伟宽大的剧院里常常有3000名女舞蹈演员和3000名歌手组成的各种合唱队在各个高手的领导下一同献艺”。

当汉朝皇帝设置天文台（灵台），当中国的张衡正在观察浑天仪、地动仪运行状况时，罗马贵族们却“完全相信肠卜师们通过观看牺牲的内脏做出的关于他们未来将如何伟大和显贵的预言；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没有根据占星学的规定，认真弄清水星的位置和月亮的状态之前，便绝不肯洗浴、进食或在公众面前露面”。

“富不过三代”的中国古训，在西方也是管用的。古代中国是个科举取士国度，但是，锦衣玉食中的薛蟠、贾琏之流，纵情于声色犬马，将读书视作洪水猛兽。在读书与做官无关的罗马帝国，不愁吃、不愁穿的罗马公民更是懒得读书了。吉本说：“求知活动很少能引起贵族们的兴趣，他们讨厌学习带来的疲劳，也看不见学习带来的好处；他们唯一有兴趣阅读的书籍是尤维那尔的讽刺作品和关于马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冗长、荒诞的历史。他们的先辈留给他们的图书馆，就像黑夜的坟墓一样整天

不见阳光。而剧院用的贵重乐器、笛、巨型竖琴和水力风琴，他们却让人造来自用；声乐和器乐合奏的乐曲声不停地在罗马宫殿里回荡。在那些宫殿之中，声色更重于知识，而对身体的爱护则更重于思想的提高。”

罗马帝国不同于部落林立的古希腊，它是一个国家，有专门的政府机关考虑政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财力雄厚，所以，他们出钱办学校抓教育，表现出来的比古希腊高明得多。帝国给学校老师们的待遇还很不错，君士坦提努斯就规定：“医生们、学术教授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们可豁免一切公职和费用；不列入民兵服役名册，也无需接待宾客或缴纳任何费用。”

罗马以军事立国，后来的帝国皇帝和官员多是军阀出身。军阀是不希望下属太有脑袋的，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除了忠心，就是看上阵杀敌的本领。罗马公民如不具备当杀人机器的条件，啥好处也捞不到。因此，罗马广泛推行军事化教育，学校主要对学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目的是培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杀人机器。罗斯托夫采夫说：“谁也不要求专门订出一种教育标准。用教育来作为区别一般上层阶级的一种标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对于京都和意大利诸城市的贵族子弟和自由民出身的青年所要求的唯一的教育训练，是某种程度的军事体育训练。因为从一个阶级提升到另一个阶级里去，实际上要取决于皇帝，所以，效忠皇帝，也就被视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不同于一个粗人之处，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他受过竞技所和角斗演习所的课程训练。例如，在埃及，凡是在竞技所受过教育的人形成居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他们能享受某些权利和特权。因此皇帝克劳迪亚斯认为亚历山大里亚自由民中的青年，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才能获得亚历山大里亚公民资格这一重要特权。”

在罗马，并非没人读书。帝国东部地区，如西亚、埃及、希腊，读书之风得到传承，并且渗透到了罗马城。这些读书人，有的设帐授徒，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到处发表高论。读书人知识多，主意便多，喜欢品头论足，怪话连篇，慢慢地，罗马出现了一个“犬儒学派”。犬儒们的胡言乱语，影响到“八旗子弟”的脑袋和嘴巴，有动摇罗马帝国根基的危险，结果犬儒们统统被放逐到极远极荒之地。有点文化又有唱反调的毛病的贵族，多被割掉脑袋而不得善终。

帝国对学校的监管达到疯狂的地步。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道“敕令”：

瓦伦提尼安、瓦莱里乌斯和格拉蒂安给罗马行政长官奥利布里乌斯的敕令

① 一切来罗马求学的人，到达时必须立即向人口调查局长呈交批准他们此行的省

长签发的阐明他们的住处、年龄、身份和职业的公函。

② 他们同时还必须声明他们特别想研究的是什么学科。

③ 他们必须随时把他们的住址报告人口调查局，以便那个部门的官员注意他们是否始终进行他们自己指定作为其追求目的的那个学科的学习。

④ 上述官员有责任注意学生们在听课时是否按照合适的方式行事，避开一切可以得到坏名声的机会，不参加任何我们视为简直是罪恶的私人团体。他们不可以过于频繁地去看戏，也不得沉湎于国都的享受和宴乐。任何学生如果忘记了他作为攻读文科的学生应有的高贵品行，就将公开地受到鞭笞，并被不光彩地逐出城市，送回原地。那些勤奋学习者可以留在罗马，直到他们年满20岁为止，如果那时他们忘掉了没有自动回家，则行政长官应使他们离去，不论他们愿意与否。

这些规则应严格遵行，您阁下应立即命令人口调查部门的主要官员每月提出一份关于所说的学生的报告，阐明学生人数、姓名、何时来到罗马，他们的一般鉴定，其中谁的居留罗马期限已经届满、必须送回非洲或其他行省……这种报告应每年呈送我们一份，以便了解学生们的各种优点和学得的知识，以便判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工作究竟可取和合乎需要到什么程度。

对孩子们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基佐评价道：“在各学校内部完全没有自由；全部教授都是随时可以被免职的。皇帝不但有充分的权力可以把他们从一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可以在任何合适的时候，随时撤销对他们的任命。”

罗马皇帝的智商，也是这种教育的产物。罗斯托夫采夫说，在这样一种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4世纪时的皇帝（特别是迪约克勒戚安）是在横暴强迫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现象，从来没有遇到过其他任何方法。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有限的，他们只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拯救罗马帝国是为了把它变成一个容纳几千万人的大监狱，这样做是否值得”？

皇帝只是不让读书人胡思乱想，基督教会则是将世俗知识连根拔起。丹皮尔教授说：“到帝国接受基督教时，这个组织便依靠正在衰退但仍然占有优势的罗马传统力量，成为不可抵御的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在390年间被德奥菲罗斯主教加以毁灭，一般说来，愚昧变成大家恭维的德性。当基督教成为人民的宗教后，这种态度变得更加残酷。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所产生的这一结果：415年，西帕西娅被杀害。她是天文学家塞翁的女儿，也是亚历山大里亚最后一位数学家，可是竟

被基督教徒异常残忍地加以杀害，而这个暴行据说是西里耳教长所主谋的。”

广大的基督徒更简单，不让孩子去读书，攻击老师和学生。基佐说：“在许多高卢城市里，人民自己也是反对他们的，因为人民至少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因此都不喜欢完全异教传统和异教志趣的学校。教授们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学生们所处的地位也几乎一样，他们都是一大批宗教裁判所的、令人恼火的治安法规的对象，在这些法规之下，他们是毫无保障的。”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倒塌，世俗学校终于被教堂所取代。

罗马的科技：“成就很少”

丹皮尔教授是一位欧洲中心论科技史专家，在谈到罗马的科技时，他是很谦虚的：“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只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里亚的第奥放达斯是希腊最伟大的代数学著作家以外，没有一个第一流的人物。在罗马帝国头300年间，罗马法的伟大成就登峰造极，罗马政权还没有衰微，但科学就显然已经和哲学思想的其他部门一起差不多停滞不前了。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写些对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

罗马的粗鄙武夫也有优点，就是讲究实用。“罗马人在理论科学方面成就很少，但在实践方面却值得注意。罗马的卫生和公共保健事业都安排得很好。清洁饮水用巨大的导水管引到市区内，市内设有公共医疗系统和医院，军队中设立有医官。”建设于罗马扩张时期的罗马城，确实建设得很“现代化”，其建筑质量和艺术水准都是上档次的。

没有科学研究的导引，工程技术的进步必不会持久。没有牛顿等人的贡献，就没有后来的工业革命。罗马正是如此，若干年后，连复制一个罗马城的能力都没有了。

君士坦丁登基后，他不喜欢罗马城，想要建一个“新罗马”。吉本描述道：“由于技术水平日益下降，现有的建筑师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他庞大的设计要求。于是，他指示帝国最遥远地区的各省总督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并利用可以获得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有一定天赋的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并从事建筑业的工作。新城的建筑工作是君士坦丁依靠他的统治势力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进行的；但装饰用的作品却全都出自伯里柯利和亚历山大时代

最著名的大师之手。”

房子建好了，石匠们做不出像样的雕塑和其他装饰品，“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洲的许多城市的最有价值的珍宝全都被洗劫一空”。将各地好东西全部搬过来，君士坦丁堡是这样炼成的。

贵族子弟打架去了，百姓的孩子信教去了，罗马成为文化沙漠了。罗斯托夫采夫分析道：“从文化精神方面来看，主要的现象是古代文明、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文明衰落了。东方文明是比较巩固的：它们掺杂了一些希腊城市文明而继续维持者，甚至在波斯和大食帝国还曾一度出现灿烂的复兴现象，更不用说印度和中国了。这一演变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希腊文明在其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领域如精密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创造力完全穷竭了。这种衰落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即已肇端……这个现象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民众中间发展了一种新的心理倾向。这是社会下层的心理倾向，完全以宗教为依皈，它不仅忽视、而且还仇视社会上层的文化成就。这种新的心理倾向逐渐支配了上层社会，或至少支配了其中大多数人。各种神秘宗教（有东方的，也有希腊的）在上层阶级中广泛传布就反映了这一点。基督教的胜利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最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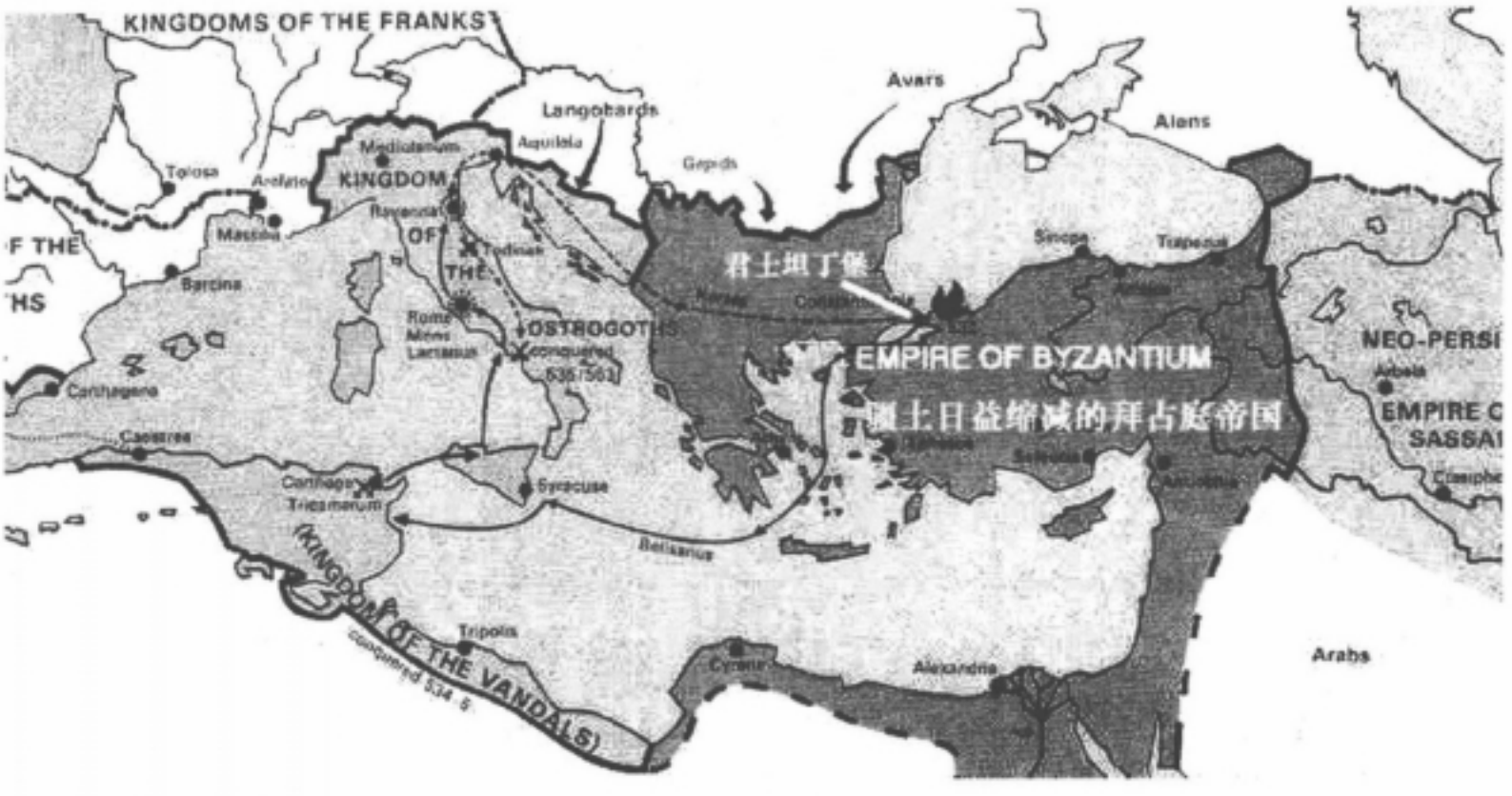
谈及罗马的科技，丹皮尔教授很不客气地说：“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北方民族推翻罗马，与其说是野蛮人摧毁了文明，倒不如说是把已经倾颓的废墟打扫干净，让将来的新的大厦好建筑起来。”不过，“建筑”新的大厦，欧洲整整花了1000年，才开始有点模样。

可怜又可嫌的东罗马

5世纪中叶，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崛起，四面出击，驱赶得北欧的日耳曼人鸡飞狗跳。匈奴人原来呆在蒙古高原，被汉朝打得满地找牙后，大部归顺汉朝融入主流，小部一路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占据当今东欧一带，继续向西向南扩张。在匈奴大军多次践踏、大面积掳掠之后，随着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拥推进，476年，稀里糊涂中，蛮族们将西罗马帝国搅得灰飞烟灭，西欧就此进入了所谓的“中世纪”。

西罗马帝国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仍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吉本说：“它从阿尔卡狄乌斯的统治，直至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在一种早熟的、永远处于不断腐败的状态中，存在了1058年。”

其实，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东罗马、西罗马是罗马帝国下属的两大行政区。在



东罗马帝国地图

罗马帝国的传统上，向来习惯于将全国分为几块来治理，一国有两三个“皇帝”也是很正常的。戴克里先为了应对复杂局面，就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共治者”，随后又任命两名儿皇帝，分别治理帝国的东西部。当然，戴克里先才是真正的老板。**事实上，罗马帝国从未真正分裂为两个帝国，两个皇帝也没有认为东西部是两个国家。**因此，日耳曼人消灭西罗马，和金国占领宋朝的北方差不多。因此，《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说：“以前沿用希腊国王为正式称号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从812年后，开始使用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

东罗马帝国完整地继承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国家政权的主宰；皇帝豢养的“八旗子弟”是帝国的公民。东罗马人读的书，一半是基督教经典，另一半则是古希腊圣贤的著作；帝国官方语言则是拉丁语、希腊语并行。当然，东罗马同样继承了罗马帝国热衷于“篡党夺权”的优良传统，几经折腾，7世纪后，东罗马皇帝也是血统纯正的希腊人。希腊人也热衷于篡党夺权，《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说：“从610年的赫拉克利乌斯到1453年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共经历了九个王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巴西勒一世。他是皇宫的马夫，于867年阴谋暗杀成为皇帝，建立了拜占庭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按照吉本的说法，叫做“荷马和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的光辉，照亮了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西欧人称之为“希腊帝国”。

遗憾的是，东罗马始终没有闪耀出任何光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上，无不一塌糊涂。

一部东罗马历史，除查士丁尼统治时（527～565年在位）有过短暂的辉煌外，余下的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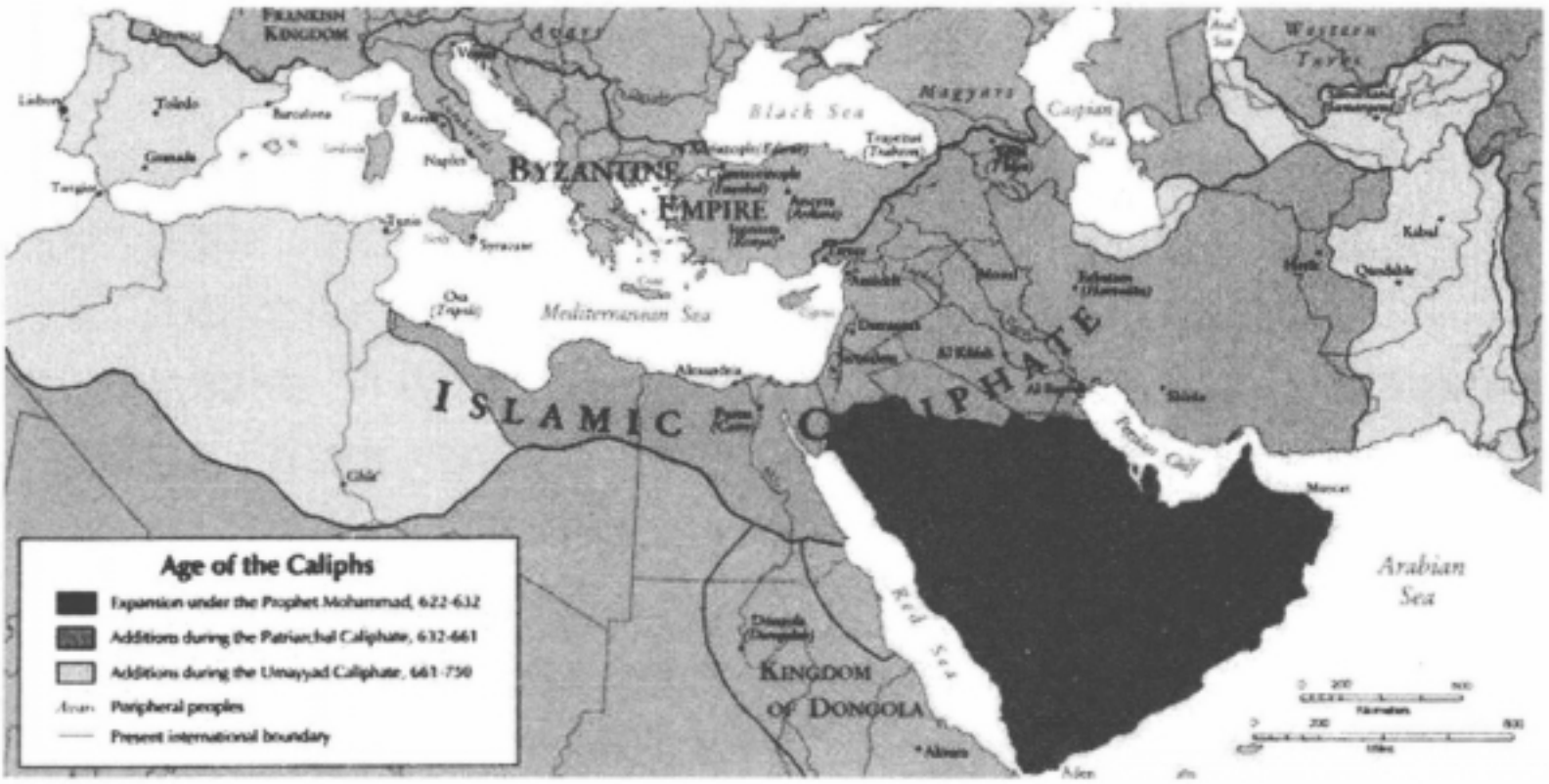
5世纪，为了少受匈奴人攻击，一次给匈奴首领阿提拉送去14000镑黄金，同时割让了大片领土，以后每年缴纳贡金2100镑。

6世纪，在北方的蛮族们的侵略、蚕食下，帝国在欧洲地区仅剩下沿海的一些据点。

7世纪之后，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没完没了的欺负之中，在亚、非的领土丧失殆尽，沦落为龟缩于小亚、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袖珍帝国。

搞笑的是，帝国原本指望西欧十字军能够教训一下穆斯林，以出口恶气，岂料信耶稣的十字军比穆斯林野蛮千倍，他们将拜占庭洗劫得水洗一般干净，“连死去皇帝的陵墓也难逃劫数：在使徒大教堂，所有皇帝的墓都被掘开”。带不走的东西，他们统统点上一把大火；能够长庄稼的土地，他们一律瓜分。东罗马的海军为什么没有挡住、消灭这群海盗呢？说起来就更搞笑了：很早以前，东罗马的“大公爵或海军上将，几乎是公开地将帆船、桅杆和船上其他装备全给可耻地拍卖了”。

就这样苦熬到1461年，仅剩一隅之地的东罗马被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成了穆斯林国家的都城，基督教堂变作清真寺。当然，东罗马帝国几乎所有的地盘，被穆斯



阿拉伯帝国地图

林接管了。

“只要一考察东罗马帝国的经济政策，”汤普逊说，“它对政治经济的愚昧无知的状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至于政治与法律，除了篡位与屠杀，还野蛮得令人发指。剜眼珠子、砍胳膊剁腿等等酷刑，是他们惩罚政治对手和反叛者的基本刑罚。伏尔泰说，剜去罪犯的双眼，是希腊人的“风俗习惯”，而且希腊人还有一整套剜眼的作业程序。1014年，东罗马打了一次胜仗，俘虏14000名保加利亚战士，希腊人毫不犹豫地将俘虏们的眼珠子挖出，只给其中的几十人留下一只眼睛，让他们领着这一万多瞎子回家。

孟德斯鸠颇为不屑地说：“希腊帝国的历史不外是一连串叛乱、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

意味深长的是，在文化传承上，这个窝囊的东罗马帝国，是最有资格的代表西方文化的——由正宗的希腊人推行正宗嫡传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西部君主国败落之后，皇权的威严便全部体现在君士坦丁堡的亲王们身上，在他们中查士丁尼是第一个，在60年的分离之后，重新获得古罗马的统治权，并通过征服得到的权利，使用了罗马人的皇帝的庄严的头衔。”但是，它实在是窝囊得过头了，西方历史学家们热衷于希腊，而忌讳希腊帝国；爱说罗马而慎言东罗马；宁愿大谈黑暗的中世纪西欧，不愿提到同时期的东罗马。总之，让人有一种东罗马与欧洲文明无关的感觉。

《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说：“拜占庭文明是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兼收并蓄的综合体，其政治理论源于前面两种文化，并呈现出适应基督教文化的特性。”静下心来一想，西欧所谓的“文艺复兴”，其目标，不正是要建立这么一个“综合体”么？

人性澌灭的时代

长期以来，罗马人是靠打仗掠夺过日子的。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夺取土地，掠夺地面上的所有财物，将百姓统统掳做奴隶。罗马大军所到之处，百姓要么被杀，要么掳做奴隶。一次杀死数万人、掳数万人为奴，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其血腥与残忍，无以言表。当在西亚遇上强劲对手，且支撑扩张的资源枯竭后，罗马人主要靠榨取亚平宁半岛之外的产出实现骄奢淫逸。亚洲和埃及，是帝国的钱包和粮仓，而庞大的罗马城仅仅是一个挥霍场所，“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

场和高雅生活”。

欧洲有买卖奴隶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古希腊一直传到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方才作罢。罗马到底有多少奴隶？有人估计在6000万左右，是否准确无法断定。吉本说：“有人发现曾有过如此悲惨的情况：在罗马的一间大厅里共生活着400个奴隶。这400个奴隶原属于非洲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寡妇，她把他们赠给了她的儿子，而自己还保留着更大一部分财产。”尽管罗马人以奴隶劳动果实为生，但在罗马时代，一次又一次颁布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奴隶的法律。公元57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案，若奴隶主在家被杀，不仅这家所有奴隶要被处死，而且连已被释放尚未离开这家的获释奴隶也要被处死。

说罗马人是一群野生动物，绝不为过。定期在大“剧院”里观赏奴隶角斗、人兽搏斗，是罗马公民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之一。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在《罗马帝王传》中说：恺撒就爱看剑斗士们“殊死的格斗”，他还亲自主办了“人兽格斗表演5天”。一个奴隶与另一个奴隶持剑生死相搏，当其中一人被对手杀死时，数以万计的男男女女会激动地跳起来高呼“给力”，和同时期中国人看斗鸡、斗蛐蛐一样兴高采烈，与当今人们看球赛的感觉相同。

如此熏陶下，罗马公民看罗马士兵们打内战，也像看猴把戏一般乐开了怀。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历史》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民众站在一旁观看双方的战斗人员，就仿佛他们在赛马场观看比赛似的。他们时而向一方、时而向另一方呼号喝彩，以示鼓励。如果一方后退了，而士兵们藏到店铺里去或是到某个私人住宅里去逃避，旁观的人便要求把这些人拖出来杀死；这样他们可以取得较大部分的战利品，因为军队完全醉心于对敌人的屠杀，而战利品便落到乱民手里去了。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可怕而又可憎恶的景象。这里在进行战斗和负伤流血，那里的浴场和酒馆却还在开门营业；这边是鲜血和大堆的尸首，那边却是妓女与他们同样堕落的人。”

视生命如儿戏的传统，到中世纪，便发展为骑士之间的拼死决斗。中世纪的贵族们认为，看别人打打杀杀远不如亲自上阵刺激。一番拼杀下来，死伤的一方只会被嘲笑学艺不精，胜利者则会大呼过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肉，准备下一场决斗。中世纪以来，欧洲共有多少绅士死于决斗？只有天知道。

决斗，到了今天，发展为击剑、拳击运动；古罗马的人与狮子老虎等野兽打架，则变成斗牛了，毕竟野生动物既凶猛，又是受保护的对象。

血腥刺鼻的罗马法

据说，帝国时代是创造与运用“罗马法”的黄金时代。

以“愚昧、残酷的提比略，狂暴的卡利古拉，软弱无能的克劳迪乌斯，荒淫残暴的尼禄，禽兽一般的维特利乌和胆小如鼠、不齿于人类的图密善”为开端，独裁的君主孜孜不倦地创造着“法律”，而傲慢无礼的军队则始终无视法律。“卡利古拉和图密善都是在皇宫之内，被他们自己的家臣刺杀的：前者的死在罗马引起的骚乱只限于罗马城的四门之内。而尼禄的败亡却使整个帝国都被卷了进去。在短短的18个月中有四位帝王倒在短剑之下。”

打打杀杀中，强势皇帝诞生了。“是戴克里先的傲气，或者正是出于政策考虑，使得这位机智的皇帝把波斯宫廷中的盛大气派引进到罗马来了。”

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的气派分毫不差了：“由于不断增加一些新的仪式和礼节，要想当面一睹圣颜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皇宫的钱财有一些一开始被称作内宫官署的机构严格看守着。寝宫则交托给一些十分警惕的阉人看守。他们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大可说是皇权日益专制绝对不容怀疑的标记。一个臣民如终于能面见圣颜，不论他的地位如何，都必须俯伏在地，按东方的规矩，对他的主人或主子的圣体膜拜。”中世纪贵族见到主子不顶礼膜拜，是蛮子们不懂得高贵的“罗马宫廷礼仪”。

自屋大维以来，皇帝们无不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苏埃托尼乌斯说，伟大的“恺撒在玩女人方面是过分的放荡不羁的。他诱引过许多知名的妇女……他毁掉一座城市，常常是为了掠夺，而不是为了惩罚”。中国有一个爱逞英雄的项羽，康茂德则热衷于用刀剑刺死奴隶格斗士，或者和狮子老虎打架；中国明朝有个木匠皇帝，埃拉伽巴卢斯则热衷于穿着女装纺纱织布；中国有个搞“花石纲”的宋徽宗，君士坦丁则热衷于搜罗天下珍宝装扮他的“君士坦丁堡”；张献忠一天不杀人就难受，卡拉卡拉也爱看他的士兵满街追杀百姓；隋炀帝习惯在扬州办公，罗马皇帝很少有长期呆在罗马的，有的恐怕一辈子都没去过罗马。不过，阅读中国历史，绝对难以找到这样的感觉——孟德斯鸠说：“在翻阅皇帝们的历史时，人们感到难以卒读的是：竟有无数的人被处死，就是为了要没收这些人的财产。”

当然，在确保皇位稳固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帝国的皇帝们是十分用心的。

首先，是确保军官们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终日沉湎酒色，或一味施行暴政的早期那几位罗马皇帝，几乎从不在部队或在各地方省区露面。他们也绝不容许他们手下的将领自行其是，表现出极大的勇敢去取得他们自己由于疏懒，无心取得的战

功。一个臣民享有善于用兵的名声被视为是一种侵犯皇家政权的无礼行为。”在“武大郎开店”精神的指引下，罗马军队更加窝囊废了，皇帝们也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接着，他们将国家分成几块，分别交给信得过的几个跟班管理。几个保镖出身的“禁卫军卫队长则逐渐从最低贱的地位步步高升，直至真正掌握着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了。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卫队长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被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总理大臣一样，一手握着玉玺，一手握着帝国的大旗……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业等一切对帝国的繁荣有利的生产活动都受禁卫军卫队长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饬令时按自己的意图对其进行解释，加以实施，有时甚至作某些修改。他们监督着各省总督的活动，免去玩忽职守者的职务，对犯有罪行者予以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人和重要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案件，如需上诉，都可以被送到卫队长的公案前进行审判。他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改易。皇帝本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对这种判决或对他如此信赖、赋予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不满。”

再接着，建立庞大的特务机关。**“罗马法”空前绝后的创新，就是发明了“尊严法”：只要皇帝认为谁冒犯了他的尊严，就得死。**伽利埃努斯下令：“让那些说过一句反对我，反对我，瓦勒良的儿子，许多王子的父亲和兄弟的话或抱有反对我思想的人全都死掉。”孟德斯鸠说：“在罗马有一种尊严法，这种法律是针对着想危害罗马人民的人们的。提贝留司利用了这个法律，不过他不是用这个法律来对付原来规定的对象，而是用来对付他所憎恶的或不信任的一切人。受这个法律所管束的不单单是行动，而且包含言语、表情，甚至思想，两个朋友之间相互倾诉的由衷之言是被视为思想的。在宴会上面于是不再有自由，亲戚之间也不再有信任，奴隶中间也不再有忠诚……从共和国时候起，元老院这样一个机构就从来不审理私人的事务……提贝留司则要它审判一切他认为对他所犯下的大逆罪，这一机构因而犯下了难以容忍的罪行。元老们争先恐后地作奴颜婢膝状地表示忠诚。在谢亚努司的庇护下，最先贵的元老就干着告密人的勾当。”

为了贯彻落实“尊严法”，罗马发明了秘密警察。罗马交通十分发达，为调动军队而修建的官道，深入到了帝国每个角落，每隔五、六英里则设有一个驿站，每个驿站备有40匹马。这些驿站变成了皇帝派驻全国的情报站。“在一种软弱无力的有害的统治的影响之下，使他们的人数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到了10000人，他们全然不顾当时虽然无力却也三令五申告诫他们的法令，竟把那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了掠夺性

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着联系的密探在常常能得到好处的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某种正在进行的叛乱计划，从轻微的甚至暗藏的不满到打算进行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

相比罗马的秘密警察，明朝东厂西厂锦衣卫简直就是小儿科了。吉本说：“在意大利以及整个帝国，到处是蛆虫一般的密探和告密人。”“没有任何证据，不经过任何审讯，不容有任何辩解的机会，马格努斯便同另外4000个据说是他的同谋者一同被处死了。”

罗马法制的杀手锏，是罗马皇帝的雷霆之怒。骇人听闻的“塞萨洛尼卡大屠杀”便是一例。塞萨洛尼卡博特里克“手下的奴隶中有一个漂亮的男孩引起了马戏团中一位车术表演者的欲望。这个凶残无理的情人被博特里克下令关进了监狱……因为军队的主要兵力被抽调去支援意大利战争，又加之常有士兵逃走，剩下的兵力已不足以保护住不幸的将军不受狂怒的人群的袭击，致使博特里克和他的几位主要官员惨遭杀害。有人还拖着他们那遍体鳞伤的尸体在街头示众……火爆脾气的提奥多西不能等待司法部门按部就班的审讯，他匆匆决定他的副职将军的鲜血必须用行凶手的鲜血来偿还……于是，一座罗马城市的复仇计划就这样盲目地由一群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人执行了，而且这一敌对行动的计划还是和一个阴暗、险恶和非法的阴谋一同进行的。塞萨洛尼卡的市民们得到一份以皇帝的名义发给他们的请帖，假意邀请他们前去观看马戏。由于他们对这类娱乐永远也看不够，又加上观众是如此众多，一切恐惧或怀疑念头竟全被打消了。在观众全部来到以后，事先埋伏于竞技场周围的士兵们就在一声号令中行动起来，不是进行比赛，而是开始大屠杀。这场不分外地人与本地人，不分年龄、性别，不分有罪、无罪的血腥的大屠杀持续了3个小时，被杀人数，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七千人。更有些作家肯定，至少有15000人成为奉献给博特里克的英灵的牺牲品。一位外国来的商人可能不曾想到自己会被杀，因而提出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财产来换取他的二子之一的性命，正在他对两个儿子都同样舍不得，不知该选定哪一个、牺牲哪一个犹豫不决的时候，士兵们帮他做出决定：用匕首同时刺进了这两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孩子的胸膛”。

说起来颇有些滑稽：制造塞萨洛尼卡大屠杀的皇帝，正是西方法学家的祖师爷之一，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的“主编”。

对于为当今法学界奉为金科玉律、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的《民法大全》，《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一书评价道：“优士丁尼通过法典编撰，把所有法律，不管来自法

学家还是皇帝，减少至他自己所颁布的法令。所有的部分（甚至包括《法学总论》）从此就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一般说来，优士丁尼的编撰者所用的材料几乎不包含对法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思辨……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就像《圣经》一样，乃是一个巨大的材料库，可以从中引出各种不同的原则和格言。尽管皇帝保证不自相矛盾，但《民法大全》还是包含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法，至少对那些不熟悉这些说法的原始语境的读者来说，就是如此。但这些说法看起来都具有同样的权威性，而且都受到了像《圣经》一样一致的尊重。主张全然相反政治观点的说法，在《民法大全》中也能找到支撑。”一旦对簿公堂，就要看法官喜欢谁了。

查理曼帝国的形成

第3章

中世纪：文盲武夫的时代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年代概念。根据目前主流的说法，起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截止时间有的以“文艺复兴”为准，有的以“地理大发现”为准，总之，是在15世纪中晚期。在区域上，基本局限于西欧地区，很少涉及东边的“希腊帝国”——东罗马帝国，与欧洲人重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传统颇不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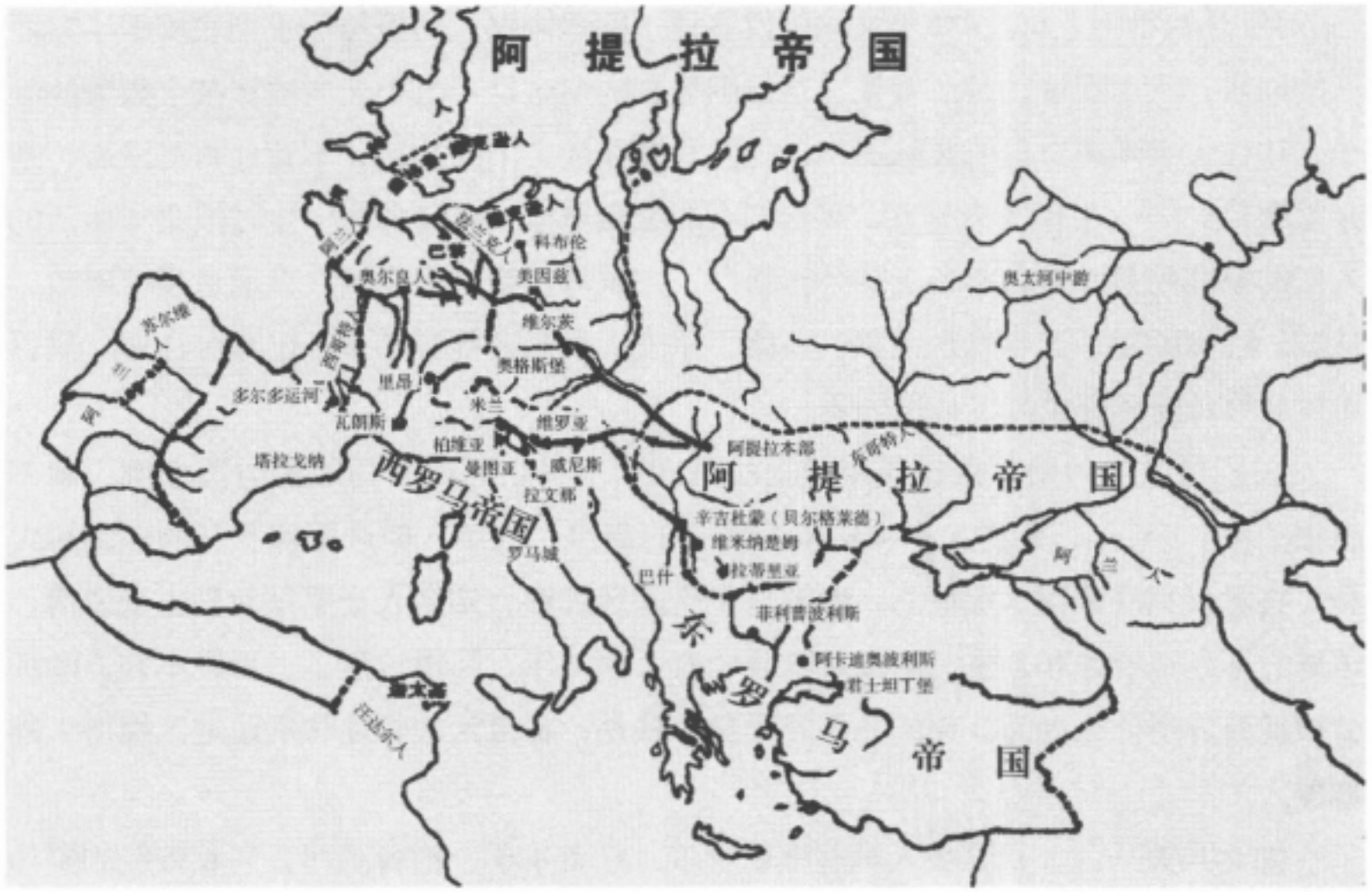
日耳曼人走出丛林

中世纪西欧的主宰者是日耳曼人。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人主要居住于北欧地区，刚从树上下来，处于原始蒙昧的状态。汤普逊教授说：“古代日耳曼人逐渐从畜牧阶段过渡到一个较多定居性质的阶段，因而发展了一种简陋的农业，也许是从一个早期的零星耕种成长为经常的生产。这种转变似乎是在恺撒（公元前50年）和斯特累波（公元1年）时期与塔西佗（公元100年）时期之间发生的。”大约在我国西汉末到东汉中期，日耳曼人开始建立村庄，过上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罗马帝国曾经试图征服这一地区，但命不值钱的日耳曼人，反让罗马人筑起篱笆以自保。

伏尔泰说，这一时期，“在日耳曼，所有这些蛮族人家庭的唯一居处就是一些窝棚；那里面，一边是父亲、母亲、姊妹、兄弟、小孩，赤身卧于干草上，另一边是他们的家畜……同一个塔西佗在称颂日耳曼人时，又承认所有的人都知道日耳曼人宁愿靠抢劫为生，而不愿耕耘土地，他们在抢夺邻人之后，回到家中吃饱酣睡”。

日耳曼人刚刚搭好窝棚，匈奴人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关于匈奴闯入欧洲，欧洲教会人士编写的历史最有趣：魔鬼化作一只鹿，吸引匈奴人追赶；匈奴人尾随魔鬼渡过了亚速海。



阿提拉帝国地图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在中国汉朝大军的猛烈打击下，“从公元前35年前起，我们就不再见到西匈奴的踪迹。持异议的郅支单于带着外蒙古的一些匈奴部落，来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草原后，就是在此时被一支中国远征军打败和杀死的。他带到这一地区来的匈奴部落的后裔们，在此停留几个世纪。但是他们周围没有文化较高的邻邦把他们的活动和冒险记录下来，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公元4世纪，他们进入欧洲，与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时，我们才又听人说起他们”。

汤普逊说：“公元375年时，匈奴人冲过‘乌拉尔大门’出现于欧洲地区；他们猛扑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马尼亚的哥特人；当时，他们的进攻，使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都充满了惊慌情绪。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时代人描写他们的生动记载。”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说：匈奴首领“阿提拉的势力从多瑙河一直扩张到莱茵河，他摧毁了人们在这些河流沿岸所修筑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并且使两个帝国向他上贡”。

匈奴人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收编“白匈奴”，带着他们东征西讨。441年，匈奴王阿提拉出动强大的马队，攻击毗邻的东罗马帝国。在饱尝匈奴人的威力之后，东罗

马423年开始年年上贡，448年又和匈奴签订了割地协议。阿提拉几乎彻底榨干了东罗马的油水。伏尔泰说，为了筹集上贡给阿提拉的财宝，“每个元老被课某个数额的款子，往往大大地超过他的实际财产；但凡是列在他名下的数目，不管他有与没有，是必须缴付的……在有些情况下，高贵妇女的家藏珠宝，或者那些一生过惯豪华生活的人们的家庭用具，就在市场上陈列出售”。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通过横征暴敛，从423年到447年，连年奉送巨款，买得了平安。后来，他实在拿不出真金白银，只得可怜兮兮地给阿提拉打了一张欠条。

东罗马以邻为壑，用钞票将阿提拉推向西罗马，而西罗马确实穷困潦倒，拿不出银子来。451年，阿提拉率军进攻西罗马的高卢。次年，他进军西罗马的心脏意大利，将意大利蹂躏得一塌糊涂，西罗马皇帝闻风逃窜。知名人士罗马教皇出来说情，承诺立即奉送钞票和公主，阿提拉收兵回府。第二年，阿提拉死了，否则不知道欧洲会被他整成个什么局面。他的几个儿子自相残杀，将自家的领地和周边地区搅得天翻地覆。

如此兵荒马乱，日耳曼人唯有拖家带口、赶着牛羊、抱着鸡鸭，向着曾经的罗马帝国的地盘，举村迁徙、逃亡。一些梁山好汉似的冒险家，为了生计，拉帮结伙，一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大师白描中世纪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逃亡迁徙大军，竟然折腾出了欧洲的中世纪。据西方专家估计，先后闯入西罗马并定居的蛮族总数不过数十万。其中，西哥特人约15万，东哥特人20万，勃艮第人8万，高卢法兰克人3万。就这么一群流浪汉，通过砍砍杀杀，却在数千万人口的西罗马大地上，当国王做贵族，迫使无数人为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野蛮人不断地逃亡、迁徙，最终定居，这一过程是辛酸的、残忍的、丑陋的、漫长的。

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蛮族的洪流也就决破堤岸，滚滚而来，一批来了后，又来一批，前后相继，不下五百年之久。他们造成的灾祸非笔墨所能形容：多少人民被消灭，多少胜迹被摧毁，田园荒芜，城镇夷为平地；工艺、美术、科学，都被损坏、糟蹋、遗忘；到处是恐惧、愚昧、强暴。来的全是野人，等于休隆人与伊罗夸人突然之间驻扎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社会上。当时的情形有如

宫殿的帐帷桌椅之间放进一群野牛，一群过后又是一群，前面一群留下的残破的东西，再由第二群的铁蹄破坏干净。一批野兽在混乱中喘息未定，就得起来同狂号怒吼、兽性勃勃的第二批野兽搏斗。”

基佐说：“那些创立王国的最强大的部队，例如克罗维率领的这一支队伍，仅有五千至六千人。整个勃艮第民族不超过六万人。它迅速蹂躏了一块面积不大的地方；劫掠了某一地区；进攻了某一城市，有时携带战利品而撤退，有时在某处定居下来，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分散过甚……房屋被烧了，田地被搞得荒芜了，农作物被拿走了，人被杀了或是被带去做了俘虏。所有的这一切祸害都过去了，几天之后，海浪停止澎湃，涟漪也平静下来，个人的苦难也被忘却，社会至少表面上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这就是4世纪时高卢所发生的实际情况。”

慢慢地，流民变成了骑士，老大当上了王公，团伙之间为了地盘大打出手。

伏尔泰描绘道：“从阿尔卑斯山至莱茵河各省，不知道应当听谁的命令。城市每天改换暴君，乡村被各派的人轮番洗劫……极目欧洲，一片混乱，最强者在最弱者倒台的废墟上崛起，然后又被别人摔下来。整个这部分历史，只是几个蛮族将领同一些主教争夺对愚昧农奴的统治。”

丹纳说：“到10世纪，最后一群蛮子找到了栖身之处，胡乱安顿了下来，但人民的生活未见好转。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截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11世纪时，70年中有40年饥荒。一个叫做拉乌·葛拉贝的修士说，他已经吃惯人肉。一个屠夫因为把人肉挂在架上，被活活烧死。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等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人性澌灭，甚至养成像新西兰一样吃人的风俗，像加莱陶尼人和巴波斯人一样野蛮愚蠢，卑劣下贱，无以复加。”

基佐说：“在这个时代，到处都有战争，也到处都必然有战争的遗迹、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手段。不但建筑了坚强的城堡，而且一切东西都被变成防御工事、巢穴和防御性的住处……修道院、教堂也为自己设防：它们周围都设有塔楼、防御土墙和护城河；它们都被专注地防卫着，并能支撑住长期的围困。自治市的自由民也像贵族们一样行动，城市和乡镇都设防了。战争经常威胁着它们，以致其中许多城镇里都派有一个儿童，在教堂的钟楼里作为哨兵，躲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 望远处发生了什么事，并在敌人逼近时发出警报。此外，敌人往往就在城墙之内，就在临街，就在中间的房屋内；战争可能而且事实上的确就在此处与彼处之间、这座门与那座门之间爆

发，而防御工事像战争一样，到处都是。14世纪时，每条街有它的街垒，每座房屋有它的塔楼、枪眼、炮台。”

地盘终于确定了，大家开始称孤道寡做贵族了。当然，不是拥有高贵的身份，就能洗净野蛮的本性，赢得学识和气质。

丹纳说：“到1550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黏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至于法国，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16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1522年，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意大利情况稍好一点。丹纳说：“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歌德人、法兰克人、赫硫来人、东歌德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所征服。”

丹纳总结道：“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像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

直到500年前，即中国明朝时期，欧洲绅士依旧是地道的蛮子。伏尔泰证实：15、16世纪，“法国各地高等法院有时还下令举行决斗。查理六世统治期间，勒格里和卡鲁日的决斗就是证明。后来许多决斗都具有相当合法的形式。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的陋习按某些被视为必不可少的程式进行。在准备决斗之前，必须先忏悔、领圣体。优秀骑士贝亚尔决斗前总要作弥撒。决斗者选定一位教父，由教父给他们同样的武器，特别注意他们是否施行魔法，因为没有比骑士更相信魔法的了。这些骑士中有时有人离开本国去别国寻求决斗，原因无他，无非为了出风头而已。波旁家族的约翰公爵声明，他将率领16名骑士前往英国参加拼死决斗，免得终日无所事事，并以此证明他值得他为之效力的绝代美人的青睐……有100多名骑士在这种竞赛中丧生。但是，这种竞赛却因此更加流行”。

伏尔泰白描中世纪：“当我们从罗马帝国的历史转向把罗马帝国在西部弄得四分五裂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时，我们犹如一个旅行者走出一座美丽的城市，进入荆棘丛生

的不毛之地。从伊利里亚的穷乡僻壤直至阿特拉斯山，优美的拉丁语被20种蛮族土语所取代。治理东半球一半土地的那些明智的法律荡然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风俗习惯。各行省的竞技场、圆形剧场换成了茅屋。从卡皮托利山脚到托罗斯山的美丽而坚实的大道上，到处是一洼洼死水。人的精神也起了同样的变化。图尔的格雷戈里、圣高尔修道院的僧侣弗莱德盖尔成为我们的波里比阿和我们的提特斯·李维。人们失去了理性，沉迷于最卑怯、最荒唐的迷信行为。这些迷信行为愈演愈烈，以至于僧侣成为领主与王公。他们蓄养奴隶，这些奴隶甚至不敢有任何怨言。**整个欧洲直至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这种腐化堕落状态中，只是经历了可怕的动乱，才得到解脱。**”

田园牧歌时代

如果认为是日耳曼人将欧洲引入黑暗，那可太冤枉好人了。接近中世纪时，罗马帝国早已满目疮痍，一头钻入黑洞之中。汤普逊说：“在第五世纪的开端，整个西欧是由有势力的地主贵族控制着。他们占有着有时是毗连的，但多半是广泛分散的庞大的世袭领地。这些领地由两类劳动者，即部分是奴隶，部分是农奴来耕种。由于这些转变，人口的移动，在总数上是很大的。商业和工业的萎缩，使城市人口减少。农业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生产形式。财富是由土地来代表的，很少有其他东西来代表。随着城市的衰落，乡村中兴起了很多由住在大领主的大庄园上的农奴和奴隶所构成的新社会。所有的大领地渐渐变成为一个私人业主手中的地方政府单位，因而把合法的政权抹去了。”

西罗马帝国晚期，“农业成为主要的，甚至是独一的生产形式”，即便没有“野蛮人”闯入，欧洲照样会黑暗得见不到阳光。

野蛮人的老大夺取西罗马的天下，所接管的只有一片片田产，土地成为其酬谢功臣的唯一手段。汤普逊说：“法兰克国王既然占有了帝国国库领地，就成了一个大地主。的确，除了教会以外，是最大的地主。这些领地，不仅是进款的一个来源，而且是作为酬谢他臣属的手段。国王赐给土地，在初期，看来简直是赠与性质，但到后来，我们才完全认识到，王室土地建立在一个王室行政制度之上，具有巨大价值，因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封建式的庇护制度。”

一时间，西欧爵士满天飞，每个爵位配有相应的一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受封者美滋滋地在领地上建军队、设法庭、种庄稼、收赋税，自得其乐。

安顿好手下，国王便在留给自己的领地上，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日子来。汤普逊

介绍道：“‘庄园’和王室领地遍布于全高卢和莱茵河区，总称为‘国库领’。其中有的是位于旧罗马城市内的地产，像在巴黎、奥尔良、理姆、德里弗斯、麦茨那样，但是其中大多数是大农庄，而国王所喜欢的是位于像克利奇、奇尔、乔济、埃皮内、马伦海一类大森林附近的庄园，因为法兰克国王热衷于打猎。耕地、草地、牧场、森林、鱼池、采石场、矿场可能都包括在一块领地之内。庄园内的住宅区都有一座高卢——罗马建筑式的庄园大厦，一般是用木材建造在领地中最适合的地基上，两侧并附有寄宿国王官吏的小房屋，以及马房、仓库、储藏室和仆役间。当时，国王是没有固定首都的。随便什么地方，国王临时驻扎在那里，就是政府所在地，因为他的官吏、随从、服役者、卫兵和家奴的整个队伍，是跟他一起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去的。的确，那在一个几乎是完全农业经济的时代是必要的。当时，商业和贸易稀少，道路又破败，而现款税又是很少。正像俗语所说，国王‘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地方赋税主要以实物来缴纳，例如，缴纳1/15的粮食、1/10的牲畜等等。所以，王室庄园成了国王收入的最重要的源泉。”

虽然“食品是充足的，但它的种类是有限的，在十字军从利凡得带入香料和调味品以前所流行的烹饪法，也是简单的。可食的蔬菜有菠菜、芜菁、红萝卜，只有苹果和生梨是丰产的。肉类是大宗食品，而大吃是一个普遍现象。肉的烹饪是把肉放在木炭上或在一根铁钎上烤，或放在炉灶上的锅内煮。家具又少又简陋：有放在支架上的木板桌子、木板长凳或靠背椅子（更正确说是凳子），在墙壁四周还有几只用于存放衣服和被褥的箱子。在十字军带入地毯和挂帷之前，地板和墙壁是光秃秃和冷冰冰的。在冬季，将灯心草或柳条或麦秸铺在地板上，直到其由于猎物的污物和进食时所投下的骨头而变得臭气熏人时，才将其移去。羊毛制成的服装较为普通，夏季和冬季一样。的确，这些城堡的内部是如此透风，如此寒冷，即使在夏季，也必须穿厚衣服。衬衣在13世纪被采用，也是因为在十字军时期输入了丝绸和棉织品，但这种衣料是昂贵的。睡衣尚无所闻，甚至最高级领主和贵妇们也是赤身睡在床上的。床是高高放在地板之上，挂着帐子，以防通风。在这一方面，国王和王后的享受，不见得优于他们最富臣民所享受的。当圣路易从‘圣地’返国所搭乘的船只起火焚烧时，法国王后一丝不挂地出现在甲板上。然而，优雅的作风还是维持的。妻子一般先到床上就寝，而后她的丈夫再解衣。早晨，丈夫则先穿起衣服。而礼节就是靠着床上的帐子来保持的”。

这就是西欧国王的“奢侈”生活：吃撒一把盐后煮熟的东西，一年四季穿麻布或

者羊毛织品，住四面透风的木屋（当然比较宽大），娱乐活动便是打猎、打架、打老婆，或者聊天。

与此同时，中国处于唐宋时期。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任何一个殷实人家，也比西欧国王过得更舒适、更有品位。不信，你去找唐宋话本对照一下。

爵士们的生活自然不会强过国王。至于最广大的农奴们，汤普逊说："村民的生活，是一种艰苦而又单调的生活，不像近代农民有着机械来减轻那样。那些农民所处的苦难而又残酷的境遇，使他们的感觉变得如此迟钝而又麻木，以致今天我们会大吃一惊。甚至近代生活中最主要的礼貌是被漠视的。在气候很热的时候，男人一丝不挂地在田间和妇女并肩工作。哈文特的腓力告诉我们说：在夏天，他'看到大多农民在市场日子里，在街道上和在村庄广场上走来走去，不披上什么衣服，甚至裤子也不穿，为得要凉快。他们这样赤身裸体地进行他们的工作。当有些僧侣震惊于这种境况而愤怒地加以申斥的时候，他们则粗暴地回答，这关你什么事？农民的茅舍，全部用木材和枝条建造，屋顶盖着茅草而没有烟囱，所以茅舍人不能在室内烘烤面包。在夏天，烹饪工作大多是在户外露天进行的；而在冬季，则在茅舍内泥地上进行。当开门的时候，浓烟会从门口或屋顶上洞孔冲出，因而户内的可怜人会睁不开眼睛。中世纪的农民，在一间泥地的茅屋内，并没有人工照明。用柴把作为火炬是有危险的，因为屋顶茅草可能着火；至于蜡烛，亦无力置备。而且，天暗之后，农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不能再工作。他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书；即使有书的话，他也不知道怎样读。所以日没之后，他和妻子、儿女就去睡觉了。但卧床是怎样的呢？仅仅是屋角里的一堆草秸，有着恶虫且常常是潮湿的。他是不能脱衣服睡觉的。"

文盲时代

罗马帝国晚期，西欧便向文盲时代大步迈进。基佐说："5世纪中的一切事物都证明世俗社会的学校的衰败。当代优秀的作家，例如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和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对此都深为痛惜，在他们著作的每一页中几乎都说到，青年们已不再学习，教授们无学生可教，科学已凋萎并正在消失。"硕果仅存的世俗学校，遭到全社会抵制。"在许多高卢城市里，人民自己也是反对他们的。因为人民至少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都不喜欢完全异教血统和异教志趣的学校。因此教授们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而且往往被虐待。实际上，除了残余的上等阶级和帝国当局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到6世纪，“世俗学校变为教士学校，已完全实现。现在让我们看看学校里讲授的是什么课程。我们往往会在它们那里看到过去在世俗学校里讲授的那些学科的名称，如修辞学、伦理学、语法学、几何学、星占学等，但这些学科内容除了与神学有关的以外，其余的显然都已不再讲授了。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变成了《圣经》的注释、历史注释、哲学注释、寓言注释、道德注释。学校只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牧师，一切学习，不论其本质如何，都被导向这个结果。有时候甚至走得更远：学校反对世俗科学本身，不管这些科学被作何种用途。6世纪末，维也纳主教圣迪齐厄尔在他的大教堂学校里讲授语法学。伟大的（教皇）圣格列高里为此尖锐地责备他，写信给他说：‘一张专门用来赞美上帝用的嘴，竟为赞美朱庇特而开，这是不适当的。’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对上帝的赞美或对朱庇特的赞美与语法学有什么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把世俗的研究贬低了，虽然它是由教士进行的。”

神学是社会进步的敌人，糟糕的是，在这个文盲遍地的年代，贵族们大多拒绝读书，多数国君也是地道的文盲。**由于国务必须由读书人来处理，不少国家的大臣不得不由教士担任。**乔治·杜比的《法国史》告诉我们，正当中国盛唐大量创作诗歌的时候，西欧的“查理·马特和矮子丕平时期，实际上是野蛮和文化贫瘠的时代，普通大众一般都是文盲”，加洛林家族富贵无比，垄断墨洛温王朝宫相职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百余年，“矮子丕平和卡罗曼并非文盲，他们曾在圣德尼修道院接受过某种教育，但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文化水平估计过高。丕平由于忙于他的政治和军事要务，并没有想到文化问题”。这个丕平，正是后来的加洛林帝国的皇帝。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代出贵族，就是说，富贵人家到第三代便全身透出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高贵气息。遗憾的是，几百年过去了，在中国宋朝中晚期，西欧的贵族子弟们依然不读书。乔治·杜比曾感叹道：11世纪，“在这个依然十分野蛮、十分困苦的国家，教会人士是当时唯一通文墨的，我们所有的文献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正是通过他们的眼睛，我们才看到当时可以感知到的一切，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对军人和恶行两个词之间的亲缘关系的思索”。

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一书记载：“奥托大帝30岁时才学习读书；康拉德二世（1027～103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笔者注）的御用教士坦承，康拉德‘不能读懂书信’。如常见的情形，这俩人在非常年轻时就投身于冒险、艰难的生活，因而除了实际经验或口头演说传统，没有时间从事文化学习以便为其统治生涯做准备。较低级的贵族更是如此。我们不要因为少数王室或贵族大家族相对高雅的教

养而产生误解，也不要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骑士阶级坚持发展教育的传统所蒙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育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熙德和希梅内斯的知识面大约不会太宽，但至少知道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这一时期大权在握的中小封建主中，至少绝大多数人是不折不扣的文盲……世俗社会对教育的忽视，可以说明教士何以既是伟大人物思想的诠释者，又是政治传统的保持者。诸侯们不得不依靠教会人员为其服务，以致其余的侍从者无力效劳。大约在8世纪中叶，墨洛温王朝诸王的最后一批世俗咨询官已不复存在。1298年4月，美男子腓力把印玺交给骑士皮埃尔·弗洛特。这两个日期相隔5个世纪之多，在这5个多世纪里，法国诸王的重要的臣职位毫无例外地都是由教会人员担任。总的来说，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欧洲大陆尚且如此，英伦三岛更是尚未走出石器时代。1066年1月，英王信教者爱德华逝世，立马有人登上王位。这年9月，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带上军队在英格兰南部登陆，武力夺取英国王位。让诺曼底骑士们大感惊奇的是：英军，这些临时召集起来的“农民军”，不少人手里攥着的武器竟然是石斧！

如果以为整个欧洲都是一团漆黑的，那就错了。西班牙，自8世纪初以来，直到12世纪，就一直保持着繁荣昌盛的景象。

那时的西班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王国。711年，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通过多年征战，占领伊比里亚半岛。750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被推翻后，唯一活下来的王室成员阿卜杜·拉曼潜入这里，建立科尔多瓦埃米尔国。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西大食。他们兴修水利工程，将大米、蔗糖等农作物引进来，改良了西班牙的农业。他们带来了玻璃、纸张、皮革的制造方法，以及刀剑甲胄制造的新技术；他们探采金银等各种矿产；他们发展丝织和毛纺手工业，仅科尔多瓦便有纺织工13000多人。这里是欧洲最为繁荣富庶、科技发达、文化昌明的福地。**西班牙不仅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同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有着某种往来。**穆斯林君主们以开阔的胸怀，吸纳各种文化，能够善待各种文明和宗教。“在10世纪，科尔多瓦拥有的公路照明道路总长度超过16公里，并拥有免费的伊斯兰教学校、巨大的清真寺和藏有40万册的宏大图书馆。”著名的科尔多瓦大学里，有来自欧、亚、非各国的青年到此求学深造。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印度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的科技文化等等，就是通过这里传到西欧人的。基督徒“光复”西班牙之后，西班牙成为欧洲的“阿拉伯著作的翻译中心”。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一直与穆斯林西班牙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许多意大利人到此留学深造，在这里，他们了解了世界，学到

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意大利人翻译阿拉伯人的著作，创办学校培养科技人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意大利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中眼界最开阔、思想最活跃的地区。作为西欧最早创办世俗学校、最早翻译阿拉伯作品的地区，经过多年积淀，意大利终于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继承了这笔丰厚遗产的西班牙、葡萄牙，也成为欧洲最早走向海洋的“崛起大国”。

无国都时代

文盲当政，没有货币也就罢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数百年时间里，西欧的皇帝、国王们竟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即：有国君，无首都，无政府。

蛮族们经过若干年此起彼伏的砍杀，克洛维最终成为公认的老大，西欧进入了被称为墨洛温王朝的时代。乔治·杜比说：“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要求，也可能是由于他的祖先在乡间迁移的传统而产生的喜新厌旧的偏好，国王在一块领地生活一阵后，又转移到另一块领地。尽管克洛维在巴黎设立了王座（用格雷戈里·德·图尔的话来说），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偏爱森林地带的乡间住所，如舍来、克利希、诺让、吕埃依、维尔贝里等地。他们将城市用作避难所或自己的墓地……事实上，我们不该忘记，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和他们的墨洛温王朝的前辈一样，是一些到处游荡的君主。直到807年，查理曼除了偶尔还在另一些宫殿落脚之外，才永久性地定居亚琛。”

这两个王朝，是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基本统一了西欧大陆，对西欧大部分地区实行一元化领导。查理曼还被罗马教廷授予皇冠，被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的正宗继承人。

居无定所的皇帝们的“大部分乡村宫殿位于法国的北部或东北部，即帝国的中央核心区，特别集中在阿迪尼、基耶尔奇、维尔贝里、贡比涅、蒂翁维尔等地。如果把这些宫殿想象成城堡一样的建筑就错了，因为它们一般没有建防御工事。相反的，这些宫殿其实是乡村大地产，上面有一些房屋和建筑，供君王和他的随从食宿和栖身，或者根据这样的目的来进行布置……描写这座宫殿的文本由一位巡视的王家专员在9世纪初写成，他这样写道：‘吾等于阿纳普觅见王宫一座，建以优质的石块，分三房，主屋周边围以回廊，长廊配有十一间小房。地下有食品储藏屋和两个门厅。院内有木头房屋十七座，配以相同数目之主屋和其余保留完好之附属建筑：马厩、厨房、面包房、两座粮仓、三间货仓。院子围以坚固的栅栏、石门，门下有走廊。院内有小院，亦以篱笆围之，篱笆以各种树木整齐排列种植而成。’”

可别以为皇帝是带着朝廷微服私访，或者巡回视察，因为法兰克的皇帝们没有朝廷或者中央政府机关，他的随员，全是他的家臣。“抽象意义上的宫廷人士即为国王的辅臣，他们随国王在王国境内到处迁徙。除开国王的家庭成员，他们主要由宫廷内部各项服务的负责人组成，事实上，他们最初是国王的仆人。其中有监管宫廷膳食、尤其是国王膳食的‘塞内沙尔’，或称膳食官，字面上的意义就是老仆人，而其拉丁语头衔的意思为‘国王餐桌的职员’；有司酒官；有国王寝室护卫官，因为国王的金钱放置在寝室中；最后还有负责马厩和交通运输的管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因为当时的朝廷是不断移动的。这些宫廷官吏的职能明显地并不局限于国王的私人事务，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其他事务上展示自己，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除了这些官职，最初的加洛林王朝中央行政系统并没有针对不同领域的事务而设有专门机构。但有两类事务除外，因为这两类事务的处理需要有良好文化素质的人员——教士来担任……这两类事务机关就是王家教堂和掌玺署，而两者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

皇帝如何管理、控制全国呢？他派出自己代表，即所谓的伯爵，分别治理全国各地。伯爵们是所辖地上的绝对权威，管钱、管事、管人、管枪。所有自由民中的男丁都是当然的军人，皇帝一声号令，男丁们必须自备武器、干粮从征。皇帝自然可以随时撤换伯爵，也不时派人巡回检查他们的工作，而皇帝直接控制他们的手段，就是召开一年一度的全体大会，同时检阅伯爵们带来的军队。

天下太平时，军政一统的伯爵们当然会很听话。一旦局势动荡，有机可乘，他们便会另立山头，割据称王。虔诚者路易的几个儿子争夺天下，打得稀里哗啦。

伯爵们自立为王后，也是东游西逛、逐水草而居。以法国为例，乔治·杜比说：“在12世纪后半叶之前，巴黎的地位并不突出。到那时为止，国王仍旧是居无定所。他反复在宫殿和领地的各城堡之间巡游，这有物质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食物供应——例如他可以行使自己的食宿权而让修道院负担——但尤其重要的是，在一个实行直接和口头管理的时代，国王本人必须亲自现身于其产业的各个角落，军事和司法事务均需要他这样做。”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说：“国家档案馆的建立同样应归功于他（菲利浦·奥古斯都）。在他以前，国王们不管走到哪里，总要带着他们的档案（国家的法令文件、证书、名衔等），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做法。1194年，在旺多姆附近遭到诺曼人的一次袭击，菲利浦丧失了他惯常随身带着的一些重要的证书、抵押品。从此以后，他放弃了这种做法，建立了一个存放一切政府文件的仓库。”直到特别喜爱巴黎的路易六世登基，他和他手下的教士、贵族们纷纷在这里大兴土木，巴黎才不

知不觉地变成了法国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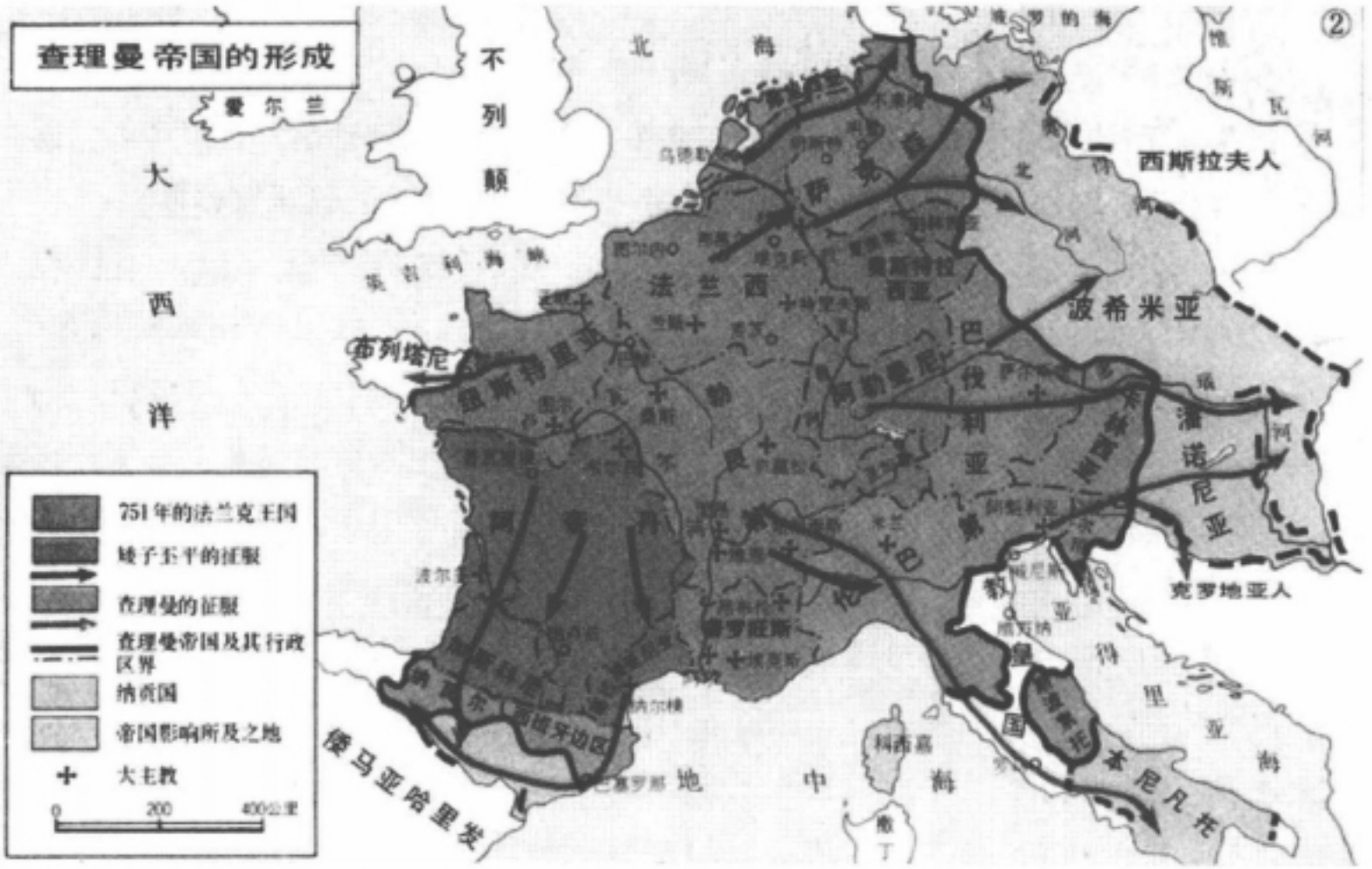
细胞裂变时代

人们往往奇怪，欧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有的国家只有巴掌大小？“哈洋族”说，这是欧洲人的什么“分权”、“联邦”、“自治”的结果，真是天大的谎言。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国家众多、战乱频频的时代，那就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读过《封神演义》的都知道，周朝建立之后，大封亲朋功臣，以拱卫王室。后来的天子也分封自家兄弟和儿子，如此往复，据说西周时期国家有数百之多。到春秋时，见诸《春秋》、《左传》者也有140多个。天下纷争数百年之后，痛定思痛的秦始皇拒绝分封制，中国一步跨进江山一统的新时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外帝王一致的观念。如何治理好“王土”，就要靠经验的积累、理论的建树、观念的更新、执政的艺术了。

克洛维掌控西欧后，乔治·杜比说：“国王头脑里丝毫没有罗马时期那样的国家概念，总是将他的王国看做是应该在他儿子间瓜分的财产。”夺取墨洛温王朝的江



查理曼帝国地图

山之后，“丕平遵循法兰克古老的规矩，即王国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已经将王国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但分割的方式有点怪异，他将每一地区都分成两部分，分属两位儿子统治。阿基坦就是如此，面向大西洋的西边一半交给查理统治，卡洛曼则获得了其余的部分”。没办法，丕平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只好共同继承王位。一个天空不可能有两个太阳，不久，哥俩的矛盾就很突出了：阿基坦人爆发起义，“卡洛曼拒绝支持查理去镇压起义”。幸好，卡洛曼很快就死了，查理立即将两个侄儿的继承权剥夺，弟媳远走他乡，查理成为王国的唯一主宰。他既很不幸，也很幸运：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810年和811年，在相隔很短的时间里，查理曼两位年纪稍长的儿子相继去世，虔诚者路易因此单独获得了整个帝国的继承权，查理曼亲自为他带上皇冠”，帝国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

虔诚者路易是一个有想法、无才华、少恒心的改革家。他很想当一个好皇帝，收拾了他老爸的宠臣和大批情妇，决心取缔祸害无穷的分封制，并确定长子罗退尔为储君。可他还有两个儿子，而且他的后妻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眼看封地无望、在外带兵的两个儿子起来反对，他的后妻天天在枕边念叨要封地，他动摇了，便决定收回封长子为储君的文件。这样一来，罗退尔也不干了，起兵谋反。路易便左右摇摆，最终，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联合起来打老爸，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840年，虔诚者路易在痛苦煎熬中死去。其中一个儿子过早逝去，843年，另外三个儿子在战争与谈判中，将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雏形。

国王们往往儿子多，既然是分封，那就得一代代裂变下去。与此同时，后世子孙间的骨肉亲情也被无尽贪婪所取代。“罗泰尔一世很快撒手人寰（855年），他的王国由他的三个儿子瓜分，而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合法的继承人（均未成年——笔者注）。这就意味着这些年轻国王们的叔叔们可以静观这三个新的王国的演变，并伺机将它们占为己有。实际上，他们最终未花费太大的力气就如愿以偿了。虔诚者路易的子孙们之间的这种持久对立，及至885年左右，是影响整个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

面对不断的战争，查理曼的后人们为了调动手下的积极性，不断拿出自己的领地来奖励伯爵们。当他们打得精疲力竭时，自家的领地也快要被送完，欧洲变成伯爵们的天下了。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伯爵们成为实力强大的诸侯，而国王变为弱不可及的周天子。

接下来，该伯爵们的领地裂变了。而且，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伯爵们都不讲



12世纪左右欧洲地图

规矩，那么他们的手下也可以乱来。

9世纪末，法兰西分裂为29个国家：加斯科涅公国、贝阿恩子爵国、图卢兹伯国、萨蒂玛尼亚侯国、巴塞罗那伯国、卡尔卡松伯国、纳博纳子爵国、鲁西永伯国、乌尔热尔伯国、普瓦捷伯国、奥弗涅伯国、阿基坦公国、昂古莱姆伯国、佩里戈尔伯国、利摩日子爵国、波旁勋爵国、里昂人伯爵国、博若莱勋爵国、勃艮第公国、沙隆伯国、法兰西公国、韦克森伯国、维尔曼伯国、瓦卢瓦伯国　蓬蒂安伯国、布洛涅伯国、安茹伯国、曼恩伯国、布列塔尼伯国。

到了10世纪末，这里裂变为多达55个小国，以至于势力范围不过三五个村庄的城堡主人也要闹独立。可以想象，如今在法国高速公路开车奔驰一小时，在当时，会穿过多少个国家。基佐说，号称法国国王的“胖子路易真正能够称之为自己的领土的领土，除了界限的不正确以外，只包括我们现在的五个省，即：塞纳、塞纳－瓦兹、

塞纳-马恩、瓦兹和卢瓦雷省。在这块小小的领土里，为了行使某些权力，法国国王得不断地用武力对付始终想和几乎总是能够不服从他的德·肖蒙、德·克莱蒙伯爵、德·蒙莱里、德·蒙福尔-拉莫里、德·蒙莫朗西、德·库西、杜·皮舍爵爷和其他一群人。”

法国比较幸运。路易七世娶了加洛林家族的公主，后人们便有了天生“龙种”的高贵血统和耀眼光环，挺让诸侯们崇拜。最关键的是，后世国王们事业心和能力大都比较强，通过联姻、战争、阴谋等种种手段，阻遏了英国势力，逐渐削平了内部的山头，“1217年时，菲利浦·奥古斯都拥有67个管辖区或采邑领地，其中32个已由他并入法国王室领地，这些管辖区一共给他带来43000利弗”。至此，法国王权得到了诸侯们尊重。当路易八世在兰斯加冕后进入巴黎时，“在一切广场和大街上，大家争相沉湎于各种各样的公众娱乐；有钱人不把穷人逐出他们的节庆大厅；所有的人都分散到各处同吃同喝”，“国王前进时要经过的道路，都令人惬意地撒满了鲜花；他终于快乐地走进了他的王宫，并坐在他的王座上，他的大臣围绕着他”。到14世纪初，国王基本搞定了种种势力，晋身为公认的老大。但是，法国依然支离破碎，国王继续给儿子封地，国内公爵、侯爵领地林立，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公爵、侯爵起兵找国王的麻烦。直到强人路易十四一阵“拳打脚踢”后，法国才像一个完整的国家。

最悲惨的是德国。17世纪时，德国仍是“神圣罗马帝国”，由大大小小的300多个“邦”、51个“自由市”、1500个“骑士领”构成。这里终日战争连绵、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一场为了宗教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就消灭了1/3的人口。直到19世纪中后期，俾斯麦靠枪炮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神权时代

在这纷争与黑暗的时代，竟然孕育出一个庞然大物——罗马教廷。在西罗马时期，罗马主教还是很不得志的，完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终日小心谨慎地伺候着。在墨洛温、加洛林王朝，罗马教廷依然是帝王们的跟班，以讨主人欢心，争取优惠政策。当罗马政权瓦解、蛮族兵士横行、百姓无依无靠的时候，基佐说：“主教们是城镇里的天然首脑，他们管理每个城市的人民，他们在蛮族面前代表人民，他们在城里是人民的行政长官，在外面又是人民的保护人。因此教士都是深深扎根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就是说扎根于罗马社会的一切残余物之中。但不久，他们又把根伸到其他方面。主教们都变成了蛮族君王的顾问，他们向后者建议，对被征服人民应如何行事，为了

成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又应采取什么方针。他们远比刚从日耳曼来的蛮族经验丰富，政治上也远为聪明。他们酷爱权利，他们已习惯于靠权力来办事来获利。”他们为墨洛温王朝的开国之君克洛维举行加冕仪式，并且为克洛维创造“神鸟带来神油”的超级神话。他们既帮国君们稳定民心，又神话国君，国君没有理由不给他们好脸色。

罗马教廷最成功的赌博，莫过于出卖前主人墨洛温王朝。教廷在最困难的时刻，费尽心思帮助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丕平篡位，抛弃尊严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戴上皇冠。伏尔泰笑道：“斯蒂芬教皇并不限于为丕平举行加冕仪式，他还规定法国人永远不得拥立另一家族的人为王，否则给予绝罚。这位主教在他自己被赶出祖国而在异乡求告的时候，却敢于发号施令，因为他拥有权威，足以保障丕平的权力。而丕平为了牢牢地享有不该他享有的东西，也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了教皇。”

投桃报李，丕平率军驱逐教皇的敌人，将所得地盘转送给教廷，并授予教廷在西欧的精神领袖地位和罗马公爵头衔。世俗君主们深知，只要教廷愿意神化自己，自己就应该神化教廷，因为神化教廷就是在神化自己。斯蒂芬亲吻了丕平的脚，丕平之子查理亲吻了斯蒂芬的脚，于是，双方都是神了。查理不知道，他与父亲接力捧出来的神，后来做了害死自己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的帮凶，整垮了他们辛苦创建的帝国。

如此这般，罗马教廷顺利地消灭了各地的原始宗教，造就了天主教一统西欧的神话。**当骑士授甲礼仪也基督教化时，罗马教廷就成了西欧真正的精神领袖，西欧的三个等级形成了。**用教士的话说，“有人祈祷，有人战斗，还需有人劳作。此三者为一整体，不可分离”。专司祈祷的教士是与神沟通、受神管理的，当然是最高等级；维持世俗社会秩序的战斗者，自然是第二等级；剩下的人便是第三等级。这并非教士一家之言，而是文盲欧洲的共识。

国王赏赐土地、大小贵族捐赠土地给教会，成了家常便饭。“在中世纪的各种机构中，再也没有比寺院享受着更大的公众崇拜。所以，寺院在建立时，通常是获得大量的基金的赠与。干得斯亥莫女修道院，即萨克森族所偏爱的团体，在956年开创时，获得了一万一千处庄园的捐赠……”汤普逊说，“秃头查理曾赐给阿维那寺院一千一百五十座庄园，来维持四十个尼姑和二十个牧师的生活。”

人一阔，脸就变。对于在自家庄园上耕种的农奴，主教们毫不犹豫地摆出了领主的架势来。汤普逊指出：“在解放奴隶和释放农奴方面，教会是社会中最保守的分子。几乎所有大批解放农奴的事件，都是由世俗领主而不是由宗教领主所做的。找不到例子可说明寺院曾释放过大批农奴。”不仅如此，马克·布洛赫说，为了显示和维

护教士团队的高贵血统，“在各个地方，某些大宗教团体过去一直拒绝奴隶出身的圣职申请者，它们也只是在这方面表现出贵族精神，然而，现在它们决定接纳他们，条件为他们是贵族等级的后代。”就是说，西欧的普通百姓没有出家当和尚的资格。对于下贱的第三等级，教会已没有丝毫怜悯之心。1375年，意大利一带闹饥荒，而教皇国里粮食丰裕，周边各地纷纷求援，格里高利六世却声称自己的粮食也很紧张。饿急眼了的佛罗伦萨人索性拿起武器发动“小麦战争”，闯进教皇国强夺了大批粮食。

为了敛财，教廷几乎是不择手段。被任命为主教、修道院长，要给教皇的使徒交钱；被任命大主教，要交任命费——因教区肥瘦不同而缴费标准不同；正式就职时要缴纳任职费；任职的第一年，要缴纳“初熟之果”——担任主教的第一年的全部收入；接受教皇的训令要缴纳手续费；教皇直接保护下的教区要缴纳免役费；各教区都要缴纳收入的10%，即什一税；各教区都要缴纳巡游费，作为教皇巡视的经费；还有什么教产税、定期赠礼、空额费等等。教廷还开矿山，办商品交易市场，请“威尼斯商人”为他们理财。后来，教廷干脆公开出卖教职，出售“赎罪券”——只要买了这玩意儿，杀人放火也可以上天堂。

教廷实现了华丽转身，脱胎换骨，不再是国王的小跟班。“教廷固然首先是个精神组织，但它也是由一个国际社会组成的国际性国家，它的最高执政者是教士，也是君主。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也是政治统治者，因为他们享有类似世俗王公们形式的那些统治权。此外，教廷也拥有巨大的财富，表现为捐赠的土地、市场特权、铸币权以及由主教团或修道院的居民经商的商店。教廷向修道院、领地和教士们征收的岁收如此之大，使它成为全欧洲最大最富的收税者、最大的财政机构和最富有的银行家。”就此，教廷成为西欧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马克·布洛赫说：“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个合法等级……在财富、权力和指挥能力上，这些教会大领主相当于最大的军事贵族。”

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在文盲世界，精神领袖的号召力是无穷的。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对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以及基督教堂，都十分宽容。“耶路撒冷教长狄奥西多，在869年写给君士坦丁堡的同僚易格拉提阿的信里，赞扬了萨拉森人的宽大政策，因为他们准许基督徒建造教堂并依照他们的法律过活。”欧洲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圣”，也畅通无阻。随着在蛮荒欧洲的成功，教廷的征服欲不断膨胀，他们宣称圣城正在被穆斯林蹂躏，中东的基督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呼吁西欧的贵族和农奴团结起来，打到中东去，解放基督徒，杀光抢光穆斯林。“最野蛮又最贫

困的”西欧贵族和农奴，也自以为生活在天堂，纷纷义愤填膺地摩拳擦掌。许多人贱卖全部家产换取路费，拖家带口地参加“圣战”去了。“这些农民军队没有一队曾经到达耶路撒冷那里。这队伍由于贫困、疾病和殴斗，在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已死伤很多。这些可怜队伍的残余分子，又由于饥饿和土耳其人的进攻，大部分死在小亚细亚。”随后，变卖领地拉起武装的骑士也踏上了征途。这就是发生在1095年前后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使欧洲饿死、冻死、病死、战死者达300万之众，教会在这场战争中大发横财。在基督徒举家“东征”急需路费时，教会以超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地家产；十字军抢夺的穆斯林财宝，络绎不绝地运进了罗马教廷的仓库；骑士国更成了教皇的私产。十字军还攻占西班牙、葡萄牙，将那里的穆斯林屠杀殆尽。

为了拓展和保护自己在西欧的生存空间，教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以“绝罚”的精神武器对付天主教徒，一边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它与神圣罗马帝国交过手，与强国法国打过仗，更不用说欺负弱者了。至于处死异端、阻碍科技进步之类的事情，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教廷玩过头了。终于，信奉天主教的君主们，开始推行宗教国家化。“教皇虽然在另半个基督教世界被视为教父，但他的一些儿女有时也理直气壮对其进行反抗……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这种手段使法国的风尚产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修道士们全都开始树立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他们首先是国王的臣民，然后才是教皇的奴仆。”

无货币时代

国王、贵族、神职人员呆在自家庄园自给自足，自然少有商品制造者、消费者。马克·布洛赫说：“贸易不仅限于有限的几条路线，而且规模也极小。更为不利的是，贸易似乎一直明显地呈现为逆差，无论如何，对东方的贸易就是如此。西欧用来交换这些奢侈品的东西，几乎只有奴隶。”

中世纪的贵族十之八九是文盲，武夫们始终保持着武夫本色，呆在乡村小木屋里，每天吃饱喝足之后，就是练习筋骨，根本没有工商业概念。马克·布洛赫说：“一切事物都往往促使贵族生活在乡村。采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乡村庄园组成，庄园主的住宅一般矗立在房屋群中间或附近。这些建筑物的样式，一般都非常简单。在很长时间中，其最普通的样式是木制塔楼，至少在地中海区域以外是这样。尽管村落领主对其租佃者拥有的司法审判权是构成其权力的基本来源之一，但他通常很少亲自

行使这一权力，而是通过管家代为管理，这些管家本身也是农民出身。贵族所热衷的娱乐活动，首先是狩猎，此外是马上比武。”“贵族的天职使其不能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他们以全副身心承担其特殊的职责，即武士的事业。”

事实上，即使他们有经商的头脑和热情，也没法做生意。

遍布欧洲大地的数百个大小领主，无不称孤道寡，自设朝廷，自封官员，自定税制，自铸货币，自建军队，成为事实的独立王国。从罗马帝国的官道和大小河流，到山野小径，关卡林立，每过一步，必须留下买路钱，商人寸步难行。“一个领主常常迫使一个流动商人走着这条路而不准他走那一条路，为得要使他缴付通行税；或者当商人本可摆渡的时候，也强制他通过一条桥。在德意志，这叫做‘强制走路’。甚至查理曼也必须立法来反对这种行动。当地领主还要求取得任何从载货车上落下来的包裹之权利；如果一部载货车翻到了，他可要求那货车上的全部货物；但道路一般是很坏的，所以，大部分商品是用骡子来驮运的。”

没有消费者，没有一条通畅的商路，拉动内需的凯恩斯主义又没有诞生，自然便没有了工商业，更无城市化了。

汤普逊教授说：“到9世纪，原为高卢最富饶省的布罗温斯变为一个最贫苦的省了。在那里，叙利亚人的居留地已不复可见，科比的僧侣们曾长久享用从弗斯港口所得的大量通行税的收入，到716年，钱袋里则空无所有了。马赛降为杂草丛生的港口，终于湮没无闻约有200多年之久。除了贸易没落以外，还有下列其他各种证据，说明法兰克境内经济状况的显著变动：墨洛温朝的人头税已经取消，城市已在萎缩状态，商品已不流通而具有地方性质。农业活动几乎已压倒商业活动占上风，一种消费经济已代替以前（至少部分地）交换经济，关税已退化到地方的、专横的通行税，造币厂和市场已合并在一起……”

欧洲商业落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水平低下。马克·布洛赫指出，欧洲中世纪农业十分落后，在耕作方式、肥料使用、农业工具等方面甚为原始，直到18世纪末期，“在旧日法国，如果收获能达到播种的3～6倍，人们就很满意了。”因此，乔治·杜比说：“8世纪和9世纪，农民劳动创造的资本仍很微薄，不足以让贵族用于生产性投资，他们热衷于奢华生活的追求：资金最终以首饰的形式积累起来，存入教堂、国王和大贵族的保险箱里，历经几个世纪而未去触动，由此杜绝了所有投资的可能和经济增长的可能。”

货币成了没啥用的玩意儿，人们只好挖个坑，将货币储藏起来。汤普逊教授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年，对应我国北宋中期——笔者注）空前地需要现款，这一点终于打破了这个时代的‘自然经济’状态。当然，对于一个要到东方去的十字军士兵来说，完全不可能把足够的物品随身携带，以便在路上维持自己的生活。结果使那窖藏了好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货币，由住持、主教、贵族，甚至农民，拿出来重见天日。”

十字军东征与全盘“阿化”

十字军东征，让西欧从持续了几百年的蛮荒中爬了出来。

长期以来，欧洲各地不断有基督徒朝圣者，不远万里到耶路撒冷顶礼膜拜。就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不久，“1033年时，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阶级和各等级的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那是从来没曾有过的事情：有些贵族，大批贫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许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们的故乡”。拜完基督后，反而不愿回基督教世界，为啥？这里太富太繁荣，故乡太穷太落后。

十字军东征能持续两个世纪，并非教皇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十字军的主力是骑士。此时，骑士已成为西欧的一大公害。这些无所事事、不学无术的缺德武夫，终日无恶不作，危害乡里。“法国的每个省都是刀光剑影的比武场，一伙伙的骑士明火执仗，其暴行骇人听闻。”“在当时的编年史和宪章文书中，随处可见的是抢劫、屠杀、伤残、强奸、绵延日久的残酷仇恨——这些仇恨导致家族分裂，甚至使得同一封君麾下的附庸队伍分崩离析。”教会、国王不断呼吁“休战”，但是毫无成效。

与此同时，有的贵族家庭衰落，骑士子弟已陷入困顿之中。富裕人家，由于推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子弟前景渺茫。十字军东征，“给了那些穷困的家族幼子们以成功和迅速致富的希望。大批冒险的青年响应大胆的诺曼底人的号召”。

这是典型的祸水东移，一举两得。乔治·杜比说：“十字军是件卓越的善事，因为它将长时间地动员骑士阶层的过剩能量：这是一场群众运动，在30年的时间内（1097～1127年），法国有一半的骑士前往西班牙或海外同穆斯林进行为时或长或短的战斗。”

十字军中也有许多宗教极端分子，比如被称为“圣路易”的法王，置国家大事不顾，终日琢磨着打击异教徒，收回圣地，但是又没有什么军事才能，率领手下进攻埃

及，结果战败被俘。忠心耿耿的大臣们砸锅卖铁将他赎回，但他回国后仍不思悔改，再次率军渡海讨伐异教徒，最后客死他乡。

此时的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炮火连天。这些来自野蛮世界的欧洲武士们一度占领“圣城”，在这里建立了王国、伯国什么的，首次试验了后来侮辱我国近百年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制度。随着成吉思汗大军开进西亚，穆斯林世界不断整合。不久，用300万欧洲基督徒生命换来的袖珍王国，变成了一个传说。

十字军东征，对于欧洲整体来说，所谓“商业”利益绝对是负数，“在交换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下列原料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出口：谷物、奴隶、羊毛、皮革和毛皮。所以在贸易上的差额，经常用金银的出口来抵消”。

西欧最大的收获在于，东征归来的骑士像变了个人似的。乔治·杜比说：“十字架旗帜指引下的征途和同十分发达的伊斯兰文明的接触，反而使得残酷的骑士心态大为缓和了。除了忠诚勇敢的品质外，骑士还必须具有基督教的美德，而这些美德是受一种强烈的人道关怀感召的……骑士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饮食变得精致了：餐桌上出现了水果和香料。服装也不那么简陋了……最后，领主身边一些有学养的文书为他们撰写文件，处理复杂事物，他们的出现有利于消除封建早期贵族当中特别流行的对文化的鄙视。”

汤普逊认为，在与阿拉伯人交流中，“东方的灿烂文明，在基督徒看来，是如此新鲜，如此不同于他们在西欧城堡里所过的狭窄而又单调的生活，所以，不久他们向它屈服了”，促使欧洲社会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变。汤普逊逐项举例道：

日常生活：“进口货物，原来是奢侈品，而现在变为必需品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新织品，像棉布和丝绸一类，新食品，像砂糖、香料、胡椒、生姜、东方的蜜饯水果一类，至少改变了欧洲上层阶级的卫生和饮食，也有助于居民物质享受的提高。浴池的使用（一个东方的习俗），虽然远未普遍化，但至少对于富裕阶层已更加寻常化了。”自此，贵族们开始学着洗澡泡澡、喝糖水、用香料、穿着棉衣和丝绸、品尝美味佳肴了。

城市建设：“十字军虽没有建造西欧的城市，但它们刺激了城市的生活，使城市扩大并富裕起来。”自此，见过世面的贵族不再留恋乡下城堡，开始迁居城市，按照阿拉伯人的样子搞城市建设了。

商业手段：“十字军的一个重要创造，是关于营业方式的发展……在近代商业活动中，我们所看到的制度，像领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银行、股份公司以

及后来的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军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自此，欧洲所谓的“商业先驱”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开始知道银行业也能赚钱了。

个人修养：“封建式的而又好战的西欧之粗鲁方式让位给东方文雅态度了。战士典型的好斗的男爵转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有优良的（虽非典雅温柔的）风度的绅士。”自此，欧洲的贵族们知道，仅仅有爵位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点绅士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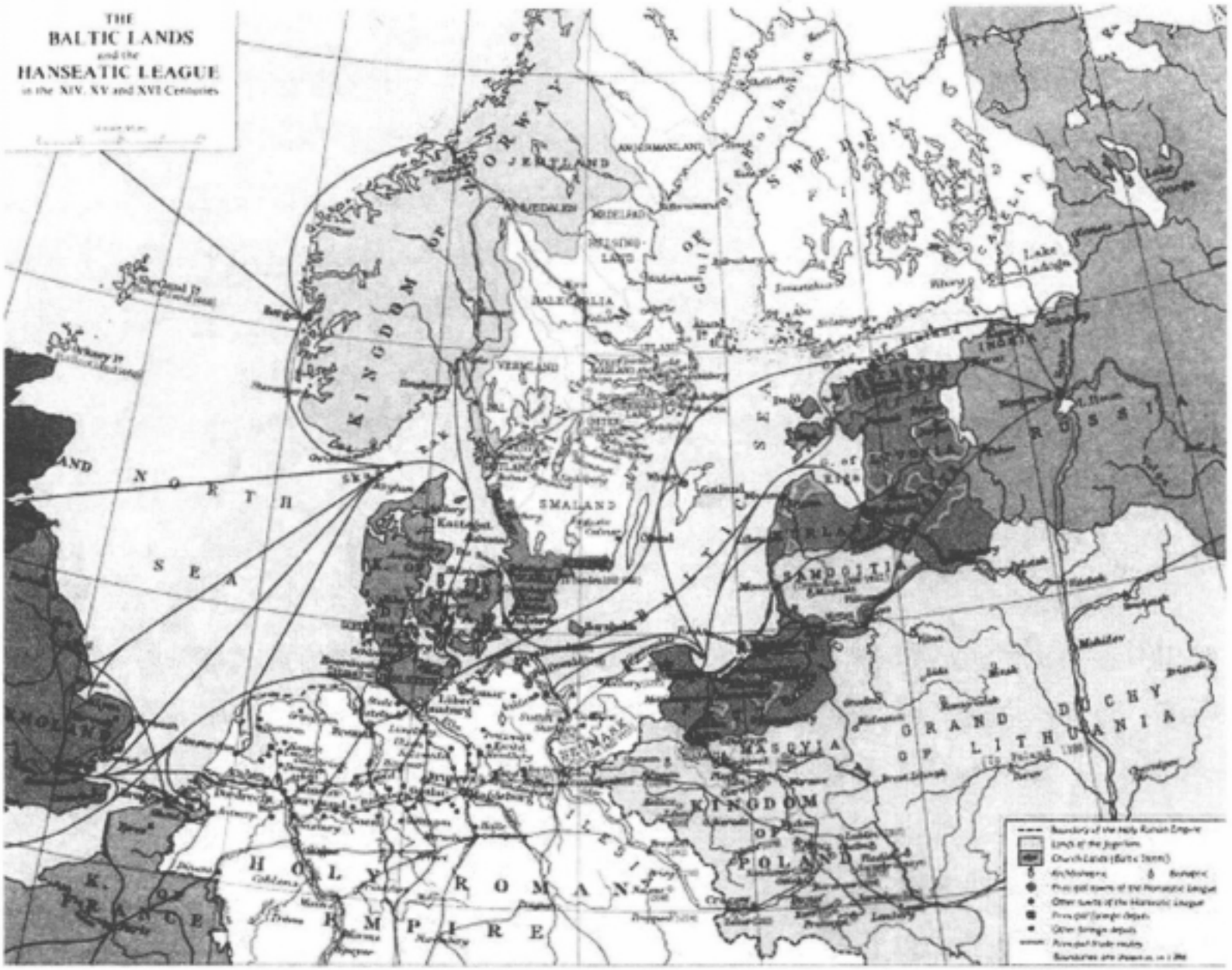
犹如秦朝人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今天，西方人的变化触及灵魂深处。“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十字军在东征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而活跃起来。对东方的兴趣以及东方商品引起旅行家的东游，像马可波罗那样。科学研究也获得了一大刺激。西欧人对于奇异植物和走兽，发生高度趣味，因而他们设立了植物园和动物园。十字军导入了一个航海和发现的时期，那终于导致新世界的发现。**总之，十字军增加了欧洲人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兴趣，刺激了他们的思想。**如果没有十字军，文艺复兴不会蓬勃发展，不能如其所表现的那样。”

披裹羊毛学经商

过上更舒适生活的欲望，是刺激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产生这一动力的前提，是人们知道还有某种未曾发现的好日子。

欧洲的另一半东罗马贵族，日子就过得很滋润。首都拜占庭拥有近百万人口，工商业繁荣，浴室、酒店、剧院等“第三产业”更是发达。皇宫不仅气派豪华，而且有2万多人服侍皇家成员起居。贵族们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住在仆役成群、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别墅里，完全是生活在温柔之乡。

比起靠奴隶劳动的东罗马，广大的穆斯林地区，那就是天堂了。曾经的阿拉伯帝国地域广大，使得各地农作物得以广泛引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交流普及。《新全球史》说，“数以百计的农业手册”的“其中几本被大量传抄，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流传……粮食产量的提高使从印度到西班牙的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城市发展迅速……所有的城市都有繁荣的市场支持着数千名手艺人、工匠和商人，大部分的城市还是重要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瓷器、玻璃制品、皮革、铁器和钢材的生产中心。在阿拔斯时期，造纸业作为一种新的行业出现在伊斯兰的城市里……航海技术的创新也刺激了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上稳定增长的海上贸易……银行业也刺激了



汉萨同盟地图

伊斯兰帝国的商业经济……他们建立了多级支行以兑付从总行签发的支票（sakk，英语单词check，即支票，就来源于此）”。

十字军进入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时，看到鳞次栉比的楼堂馆所，眼花缭乱的商品，可口可心的服务，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好一阵目瞪口呆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生活。而跨入阿拉伯人的领土以后，更是领略到了文明世界、现代生活的美妙。前线回来的贵族们，不仅带回了大把的珠宝、大量的新鲜玩意儿，而且带回了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需求是工商业之根。找回西欧市场，这是欧洲最大、最关键的收获。获取利凡得（指地中海东部地区——笔者注）的一切，成了西欧的时尚。贵族们有新的需求了，不再把依靠自家农庄，裹上羊毛吃饱肚子当做最大的幸福。他们开始制定贵族礼仪，培育贵族气质，穿着内衣内裤，用调味品做饭，用瓷器吃饭，建筑新的城堡，有

的索性搬进城市居住。

要想满足如此多的新需求，缺少钱，怎么办？贵族们开始使出十八般武艺，有的设关建卡强抢恶要，有的在城堡周围建设市场收税，有的直接铸造货币，有的创办手工作坊生产洋玩意儿，还有的派军队去偷去抢，有的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

有买的，就会有卖的。等了几百年，“威尼斯商人”大展宏图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有的将西欧的奴隶卖到东罗马或者阿拉伯世界，换回丝绸、棉织品、瓷器、香料等奢侈品；有的索性在本地办工厂，专门生产“商品”。西欧的“国家”多，货币更是千奇百怪，好在“威尼斯商人”见识过阿拉伯人的银行，他们也创办货币兑换机构，称之为银行，当上了欧洲的金融中心。

手工业回来了，城市也回来了。

汤普逊谈到了这一转变过程：“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12、13世纪的社会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贵族所组成。而教会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当时不是‘货币经济’时代，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到1300年，货币经济已大体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经济，这是因为工商业需要使用货币来经营，而与此同时，农业则长时间依靠以物易物的交换来维持。”

这个时代，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高，而西欧不仅诸侯争霸战争持续不断、政治经济制度落后，处于农奴社会阶段，市场购买力十分有限，社会经济进步的速度比蜗牛还要缓慢。

长期以来，西欧没有可以天天做生意的地方，商人必须在国王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卖指定的东西。“在中世纪时代，市场权利是一项封建权利。市场是采邑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庄园制度，限在属于一个领主的庄园或他的庄园集合体范围之内的。这类地方市场一定是靠得很近的，是为一个小地方服务的……它变为一种每周举行的市场，在那里，每月中的某几天——第二周的星期三，第三周的星期四，等等——还开办特种市场来出售谷物、木材、葡萄酒、马匹、牛羊等等。”汤普逊说，“到了15世纪，在最大的贸易中心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开始取代昔日的定期集市。”欧洲有“市集”和“市场”之分。市集是大封建主主办的面向较大范围的居民的交易活动，一般按季度举办；市场则是小封建主在自家庄园内举办的主要面向自家百姓的交易会，一般每周或者每两周某一固定时间举办一次。汤普逊说：“每个国家和大封邑，各有其市集……在巴黎星期日，即‘大市场日’，圣德尼斯、波未、喀姆

布莱的布商多来出售他们的布匹。他们在交易广场上，有一个特别房间。只有一项规定：所有商人在打钟发出开市信号之前，不得作交易，而当打钟发出收市信号之后，一切买卖必须停止，外国商人必须退出。常设的商业，就是每天做生意，是属于当地商人的特权。在巴黎大市场日，凡是城内设有店铺的商人，必须关闭店铺，而到市场上去做生意，违者处以四十个苏的罚金……在巴黎，市场是属于王室的。在市场市房里，国王出租货摊地位；所以，他希望看到在市场日子里市房内挤满了人。在法王圣路易时代，王室曾要求市场权利作为王家特权的一部分。他曾坚持下列原则：非征得国王同意，任何人不得在法兰西王国境内任何地点上开设市场；市场如此，市集亦然。”

道路破败，关卡林立，让商人望而却步。汤普逊说：“在14和15世纪，欧洲的道路情况，看来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坏，因为封建主对强制筑路的奴役劳动已逐渐丧失了权利，又因为没有别的合法的和经常的办法来维持公路。当时，道路和桥梁，都用唾手可得的最容易的办法马马虎虎地来修补。有人谈到一条桥，他的物料是用木头和石头东拼西凑的，以至不可能说出它原来是用哪一种材料来建造的。路上的凹槽，是用柴把来填平的；泥浆用扫帚来扫除……普遍存在的地方政权，使商人无限度地负担各色各样的地方捐税。每个封建主，上自公爵和伯爵下至子爵和小城主，即使国王本人也不例外，对经过其领地的一切商人小贩，处以罚金，课以重税。”

欧洲的货币，更是五花八门，劣币横行。马克·布洛赫说：“12世纪以前，穆斯林世界与拜占庭世界一起，仍对欧洲拥有名副其实的经济霸权：在我们居住的欧洲这一部分地区，仍在流通的金币出自希腊或阿拉伯的造币厂，或者至少——也像不止一种银币那样——是仿造希腊或阿拉伯货币铸造的……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几乎每次发行的货币，其重量和成色都有变化……在货币领域两个基本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变化是铸造比第纳里重得多的更大银币，这一变化在13世纪初才发生，而且那时只发生在意大利；另一个变化是恢复铸造本土风格的金币，这一变化在13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巴掌大的法国，竟然有80多个领主铸造劣币，法王圣路易“在他当政时期，货币的变更几乎每年都出现。而在他颁发的56个关于货币的法令中，有35个是以降低铸币的成色为主题的”。汤普逊说：“16世纪，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货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1390年法案）。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

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年。”

西方的经济强国

这一时期，最先进最发达的是法国。谈到法国，不能不说著名的香槟市集。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市集。香槟市集，是由6个市集组合而成，经过法国国王特许，每个市集可连续营业6周多时间，6个市集轮流开放，这一带便形成了几乎天天有市集的热闹场面。这里，长期聚集着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各国商人，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波兰。和巴黎市集一样，香槟市集严格规定了每天开业停业时间，而且限定了每天销售的商品种类。基本上每10天一轮换，比如，这10天是布匹市集，下一个10天是皮革市集。汤普逊说：“在13世纪末，法国是欧洲最繁荣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1306年，腓力四世由于迫切需要金钱，颁布了一部有关犹太商人的总的法令。宣布法国的所有犹太商人从属于王权，他们构成王室财产的一部分。犹太人被迫在圣约翰节（6月24日）之前，将动产兑换成现金交国王使用，而所有的不动产马上被没收。1311年，同样的厄运降临到‘伦巴第人’头上。伦巴第人丧失了财产、金钱，和犹太人一样被赶走。尽管腓力四世推行高压政策，工商业还是得到迅速发展。当时法国的人口在2000万～2200万人之间，而当时法国的版图却比现在要小得多。人口密度大概与现在不相上下，大城市寥寥无几。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多数城市不超过1万人。”

此时的英国，纯属化外之邦。汤普逊告诉我们：“与英国这一时期的财富加以对比，法国几乎比英国富3倍。1378年（明朝初年——笔者注），伦敦人口为46000人。”中世纪的英国，在当时欧洲人的眼中就是出妓女的地方，“在伦巴第、在法国或在高卢，很少城市没有一个属于英格兰族的娼妓”。

城市经济最发达的是德国。汤普逊说：“在13、14、15世纪，德意志是欧洲‘最杰出的’市民国度。它既不像法国，也不像意大利，而是自由城市的国家。市场一般每周开放一次，农民在市场上出卖鸡蛋、奶油、水果等产品。买主不得先于商人离开城市，本地市民只能购置自己必须的消费品。此外，零售商人只有待消费者买足了所需品之后，才能登市选购。城市人口虽比今天少，但交易范围比今天更大，市内设

有粮食、牛、马、干草、蛇麻子等专业市场。德国城市给外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俄国首都的大主教伊西多在1430年去参加佛罗伦萨会议时路经德国，见到像纽伦堡、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竟感到惊讶万分。同一时期一位意大利人艾利厄斯·西尔维厄·皮科洛米尼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证据，慕尼黑和纽伦堡同样使他流连忘返。最后，他这样作结道：‘德国城市的美丽和舒适是欧洲任何国家难与伦比的。’这时纽伦堡的居民或许还不及15000人，后来1449年户口调查时，它的人口总计为25000人。虽然犹太人处于王室特权统治下，但从来没有摆脱帝国的租税。15世纪末，从对犹太人适当的宽容到不能容忍的转变，根本原因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嫉妒，正如反教权主义也是出于经济上的偏见一样。”德国的各个“大城市”大致是这样的：“15世纪末，科隆无疑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估计拥有52000人。黑格尔和比西尔已经估算出：纽伦堡1431年有22797人，而后来于1499年的统计是20211人；奥格斯堡、汉堡不超过18000人；法兰克福不超过14000人；1460～1461年，贝律克有20436人，1487～1488年，有22172人；罗斯托克1378年有10785人，1410年有13935人；但泽1416年人口为8549人；德累斯顿1489年有4817人；巴塞尔1454年有7650人。”在同时期的亚洲和中国，这就是乡村小镇。

在十字军运动中大发横财、获利最多、与中东接触最为紧密、见世面最广的是意大利。意大利工商业最为发达。汤普逊说，“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使其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优势。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他们具备了各自的特点。威尼斯、热那亚与利凡特进行贸易；佛罗伦萨处于内陆所以首先发展工业，其次是商业，最后发展银行业。佛罗伦萨所有的自由民必须掌握21种手艺中的一种，这些手艺如下：① 审判官和公证人；② 卡里马拉或叫呢绒商；③ 银行商；④ 羊毛商；⑤ 丝绸商；⑥ 医生和药商；⑦ 皮货商；⑧ 制鞋工人；⑨ 铁匠；⑩ 屠夫；⑪ 麻布商和服装商；⑫ 石匠和石雕工；⑬ 葡萄酒商；⑭ 小客店主；⑮ 油商和制绳匠；⑯ 袜商；⑰ 兵器、盔甲商；⑱ 锁匠；⑲ 鞍工；⑳ 木匠；㉑ 面包师傅。14世纪和15世纪前半期是佛罗伦萨羊毛工业和贸易的繁荣时期，由于巨额资本的需求，许多小企业合并为大公司，从而使14世纪初的300个小商行发展为1338年的200个大企业。1343年（元朝末年——笔者注），维拉尼估算政府收入为604850金弗洛林，除去僧侣和修女，佛罗伦萨总人口估计为90000人，再加上流动人口，平均为1500人。毛纺工人雇佣了3000多人。”

伏尔泰说，13、14世纪，“在法国、德国、英国的城市里，几乎所有房屋均以茅

草覆盖。甚至意大利的一些不那么富庶的城市，如‘稻草盖的亚历山大城’、‘稻草盖的尼斯’等等，也是如此……巴黎的街道几乎都没有铺砌路面，遍地泥泞，坐着牲口拖拉的大车便是一种奢侈，美男子菲利普还禁止市民享受”。两三个世纪后，“工业还没有把巴黎街道上用木头和石灰建造的小屋改变为宏伟的宫殿。伦敦城的建筑更差，那里的生活更苦。最大的领主骑马下乡，让妻子坐在马屁股上，公主们出游也都是这样。若在雨季，就披上涂蜡的粗布披肩。国王们过的生活不过如此。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存到17世纪中叶”。

这，就是大航海前的欧洲工商业。

“哈洋族”说，因为工商业如何繁荣、如何发达，甚至生产能力如何过剩，为了寻找新航路、开辟新市场，才推动西欧走向了海洋。这，简直是弥天大谎！

第4章

海洋文明——血腥扑鼻的伪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海洋对于人类的价值是大不一样的。独木舟时代，人类除了在岸边打渔摸虾，就是煮盐。进入帆船时代，特别是指南针成为导航手段之后，海洋变成了免费的马路，人们可以利用它做生意赚钱，当然也可以利用它来进攻别人、掠夺别人。当汽轮成为主动力的时候，海洋就沦为海盗、军人、商人的奴隶了：海盗在这里打劫；军人在这里主张海权；商人借这里赚钱，因为这里是廉价的商业通道。

天下的人都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人们主要从土地里刨食，正如奥地利、瑞士、捷克、波兰等内陆国家只会产生“农耕文明”，而要求中国的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省份产生“海洋文明”，必然是头脑发昏。海边的人们会很自然地在海上讨生活，正如中国广东籍、福建籍的海外侨胞最多，英国想不产生“海洋文明”也不行。人类历史上，与海洋打交道的人永远是少数。滨海国家才会有海盗船队、渔船队、商船队和海军舰队，即便这些国家，吃这碗饭的也永远是少数。绝大多数国民，还是呆在本土，或种地，或从事手工业，或开个杂货店。

海洋的价值，是随着人类科技进步而不断提升的。当人类还呆在树上的时候，海洋是遭人唾弃的。今天，我们知道，海洋不仅是最廉价便利的马路，而且是巨大的聚宝盆，因此，维护海洋权益的口号和实际行动，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难点和武装冲突的爆发点。

海洋成为一种“文明”，应该是围绕海上贸易展开的；而贸易，必须是公平、平等的商品交易活动。否则，便是对“文明”二字的玷污。

西欧：阿拉伯海盗的乐园

西罗马帝国消亡后，正当西欧大地上相互残杀、一片混乱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7世纪。几乎与中国唐朝创立时间相同，伊斯兰教诞生了。穆斯林大军所向披靡，迅即占领大片东罗马领土。汤普逊说："他们在648年占领了塞浦路斯，在653年占领了罗得岛；在654～673年间，多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在667年，对它进行了第一次大围攻；在672～673年，再度对它举行了围困……不久，这些新征服者也冒险出海，而大海遂变为他们进一步征服的通路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各地都不能幸免于他们的侵掠。他们对各岛屿进行侵犯，西西里遂被他们占领……在750年巴格达城建造的时候，默罕默德教已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旧波斯帝国以及除小亚细亚各省以外所有原属拜占庭的亚非两洲领土。她拥有着非常富饶的地区、全世界贸易的中心，并统治着千千万万最勤劳的农民、精巧的手艺者和狡猾的商人。它是所知道的陆上、海上最古老商路的主人翁。"

地中海，成了阿拉伯人的内海。马克·布洛赫说："阿拉伯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水手，他们的海盗船从非洲、西班牙，特别是巴利阿里群岛的巢穴出发，袭击地中海西部的目标。从842年开始，他们上溯罗纳河，远至阿尔附近，沿河两岸大肆抢劫。890年左右，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萨拉森人的小船被风吹到了普罗旺斯海岸（属法国——笔者注），也就是今天的圣特罗波兹城郊。船上的人昼伏夜出，杀害邻近村庄里的居民。他们隐蔽的这一地区多山冈，森林茂密，当时被称为　树林堡，或叫弗莱内，是个易守难攻的隐蔽地。此时，这伙阿拉伯人同坎帕尼亚地区阿根托山上的同胞一样，在高地的茂密荆棘丛中建筑了堡垒，并召集同类人伙。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盗匪巢穴。"

"维护阿尔卑斯山或普罗旺斯乡村的治安，为当时的各世俗政府的能力所不及。基督教徒唯有希腊人是技术熟练的水手，然而希腊人有时也像萨拉森人那样参与海盗活动，从中牟利。931年和942年，拜占庭船队两次出现在离　树林堡不远的海岸，但两次进军均一无所获。951年，东法兰克（加洛林王朝三分后之一，今德国之祖——笔者注）国王奥托大帝自立为伦巴第国王，在962年加冕时就继承了查理大帝的皇冠。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结束萨拉森人的侵掠。他首先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劝服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下令撤走在　树林堡的属民，然后又制定了一个御驾亲征的计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看到，甚至在11世纪，莱林斯的修士仍在为赎回被阿拉伯海盗捕获并运到

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而奔忙。1178年，阿拉伯人对马赛附近进行了一次袭击，捕获了许多俘虏。”

西欧霸主奥托大帝也好，希腊帝国也罢，竟然奈何不了一群穆斯林海盗，只能靠神父教士们祈祷上帝、缴纳赎金。

罗马教皇也顾不得上帝的尊严，主动向穆斯林交纳保护费。伏尔泰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穆斯林于846年用大批船只从西西里出发，由台伯河口进入意大利，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于是便去保卫罗马。他们占领了外围，在掠夺了城外华丽的圣彼得教堂之后，便撤围而去迎战前来援救罗马的、由罗退尔皇帝的一个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法国军队被打败了……”

“教皇约翰八世不仅在罗马受到意大利人的迫害，而且他还在877年刚向占有西西里和加里利亚诺的伊斯兰教徒缴付了25000利弗的银子：这就是秃子查理用来购买帝国的钱，这笔钱很快就从教皇之手转到了萨拉森人手里；而且教皇根据一份正式条约，还不得不每年付给他们同一数目的钱。”

“这些征服者如果团结一致，就可能成为意大利的主人了。”

“哈洋族”爱吹嘘的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海洋共和国”在干吗？汤普逊说：“在10世纪前的中世纪史上，几乎没有提到过利古里亚湾沿岸城市，热那亚、比萨和卢加，而在十字军开始之前，它们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比萨在860年遭受那些地中海上横行的北欧人的劫掠；热那亚及其整个海岸在931年和935年两次惨遭北非穆罕默德教海盗的洗劫。甚至972年，在萨拉森人被逐出布罗温斯之后，沿海城市还是继续遭难。因为科西嘉、萨地尼亚和巴利阿利群岛还在穆罕默德教徒手里。比萨在1004年和1011年又两次被抢劫。”

大不列颠，更是各路海盗的下酒菜。伏尔泰告诉我们：“他们挣脱了罗马人的枷锁，又落入撒克逊人的桎梏……这7个省份在撒克逊人国王爱格伯时期终于统一起来，这时正是诺曼人前来侵扰英吉利和法兰西的时候。据说诺曼人于852年驾驶300艘船溯泰晤士河而上。英国人并不比法兰克人抵御得出色些。他们像法兰克人一样向胜利者纳款……有些时候，整个大地成了一片大屠场，而这样的时期又是屡见不鲜的……不列颠民族尽管自命不凡，却注定要受异族人的统治。自从阿尔弗列德于900年去世以后，英国又陷入混乱和野蛮状态。英国的早期征服者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的统治者丹麦人一直为占有英国而你争我夺，而新的丹麦海盗还经常前来分享掠夺

所得。这些海盗一直是如此可怕，而英国人又始终如此衰弱，以至于在约公元1000年时，英国人不得不向他们付出48000英镑的赎金。为筹集这笔钱，开征了一种捐税，这种捐税后来在英国存在很长时间，就像大部分的其他捐税一样，到不再需要时仍照征不误。这笔丧权辱国的纳款称为‘丹麦金’。人们称之为大王、而其所作所为无非是累累暴行的丹麦国王克努特，把丹麦和英国合并起来置于自己统治之下（1017年）。英国本地人被当作奴隶对待。当时的作者承认，一个英国人遇到一个丹麦人，要停步肃立，直至丹麦人走过。”

当欧洲人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也玩不转的时候，隔壁的穆斯林却在浩瀚的印度洋、太平洋上遛弯、挣钱。《新全球史》说：“从一开始，伊斯兰教社会便从商业经营中获取了大部分财富。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位商人，他高度尊重商人……到阿拔斯王朝时，精密的贸易网络巴把伊斯兰教世界的所有地区都连成一体并使其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半球经济圈中……航海技术的创新也刺激了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上稳定增长的海上贸易。阿拉伯和波斯的海员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指南针来指引他们在深海的航行。从东南亚到印度的海员那里，他们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大三角帆———一种增加船的机动性的三角形帆。从希腊化的地中海地区，他们学会使用星盘，这是一种使他们能够测量纬度的装置。在配备了这些装置之后，阿拉伯和波斯的海员在整个印度洋沿岸冒险，拜访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锡兰、印度、波斯、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的各个港口。”

汤普逊说：“在中世纪时代，所有那时已知道的非洲，即从地中海到赤道止，所有的西部亚洲、印度的一半和大陆的整个海岸，以及印度洋上各岛屿，都在穆罕默德教的权力和文明之下，那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

要航海，得会造船；造海船，得充分地了解海洋。在印度洋上溜达的阿拉伯人，自然不存在这些问题；而对文盲的日耳曼国王和贵族，则难似登天揽月。北欧海盗至多不过是流浪于海岸线罢了，尽管据说他们曾驾驶着独木舟般玩意儿逛到过北美。

在造船和航海上，真正代表欧洲大陆最高水平的，是穆斯林控制下的西班牙。汤普逊承认：“据流传下来的记载所指出，地中海的船只，在大小方面远远地胜过了北欧的船只。据说，西班牙人按照他们邻人的船只模型，曾建造大型船只并曾以他们的大船闻名，直到他们在16世纪丧失了海权为止。”

西欧其他国家建造的船，只配称作小舢板。汤普逊说：“1066年，诺曼底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所乘的船，每只载重30吨，可搭乘50到60人。13世纪早期的英国船，据

说可载重8至15匹马，虽然这些船只在史籍上叫做‘军舰’。”

航海不是开汽车，而是门技术活儿。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利用季风渡海的故事，对于地中海北岸的基督徒来说必是天书。欧洲“出海商人的生活，从10到15世纪，一般是一种很危险的生活，即使不是比陆上旅行更困难的话……对海洋的恐惧心理，在十字军运动开始之后已经减少，可是那安全而习惯航行路线，还是在可以望见友好的海岸范围内。在这整个时期中，所有满载乘客或货物的船舶，都不敢驶人公海上去。热那亚人、比萨人、阿马斐人以及法国蒙特皮列与马赛的海员和加达鲁尼亚人，一般是沿意大利半岛西岸向南航行……在13世纪，那些富有冒险心的船主，采取了从干地亚往叙利亚海岸直接航线。罗盘针直到14世纪，才应用于航海方面，此后水手们能横渡地中海而不迷失方向了。”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从事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必须有数量很大、可供交换的产品。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都是著名的粮仓，阿拉伯地区不仅农业技术远远超过西欧，而且通过与中国、印度之间的交流，引进种植了大批农作物，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衣食无忧不断牵引出新的需求，他们大力发展工商业，将生意做到了已知的世界。

欧洲大陆农业技术十分落后，农作物品种单一，粮食难以自给，不知棉花为何物，人们以麻布或羊毛裹身，手工业更是无从说起。汤普逊说，定居于荒岛的“威尼斯商人”，做起了富有西欧特色的生意，“根据穆拉托里的话，在8世纪中期，威尼斯商人曾在罗马城开设市场购买大量奴隶，为的是要把他们贩运到萨拉森人那边去”，“在日耳曼—斯拉夫边境不断进行战争时期所获的大部分战利品和一半被俘获战俘，都被集中到威尼斯去了。威尼斯贩子在供应穆斯林世界的闺房婢妾和奴隶方面，看来优越于所有竞争者。有人提及伊斯的里亚的波拉城是他们的交易基地。我们还知道，在10世纪，哥尔多华的哈里发有一队匈牙利奴隶的卫兵”。

“哈洋族”说欧洲自古重商，看来是真的：实在没东西出口，那就出口欧洲的人口；然后，“把那里的丝绸、香料及其他‘豪华东方’的奢侈品运回来”。

肩扛十字学海盗

天上有时候真会掉馅饼。人类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偶然写成的。

9世纪以来，特别是10世纪以后，由于长期的内部纷争，阿拉伯世界分裂为内斗

不断的若干个政权，欧洲人的机会来了。

“读者应该注意下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11世纪，热那亚、比萨和阿马斐在西地中海海权日益增长，开始推翻了伊斯兰教在那里曾称雄250年的优势。欧洲从庄园状况和几乎完全农业的生活中觉醒过来的时期，恰恰正是它再向东方开放商路和在地中海恢复海权的时期。”汤普逊说，“1016年，当热那亚和比萨的联合舰队进攻萨地尼亚的时候，它们从历史的黑暗里一跃而进人光明的历史了。”

在乡村城堡呆了许久的西欧，包括教皇在内，完全不了解阿拉伯世界，不知道阿拉伯世界是个温柔之乡，不知道东方世界的普通基督徒的生活质量也远高于西欧的贵族。懵懵懂懂之中，在罗马教皇蛊惑下，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解放中东基督徒为目标，1096至1270年间，组织了多次疯狂、愚昧的十字军东征。

打仗，本来是军队的事情，可是在中世纪，作为海上军事力量的舰队——中国称为水师，在西欧国家始终是空白。“当时，特殊的战舰，一般是没有的，船只被使用于战争或商业方面，须视情况而定。它们往往是两用的，因为一只商船时常需要对付



十字军东征地图

海盗船或其他敌对的船只。在整个中世纪时代，战争是依靠商船进行的，政府认为必要时就征收商船来使用。把商船改为战船所需要的手续，只是充实船上的人员和军火配备而已。”“威尼斯商人”的商船队走上历史舞台。欧洲出动的海上力量，从物资补给，到海上军事较量，完全依赖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商船。

骑士们全是旱鸭子，吃够了“威尼斯商人”的苦头，抢到物资要与他们分享，占领地盘要与他们瓜分，还时时被他们要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时，法国骑士组成的十字军进攻目标是埃及，因为没有船只渡海，便求助于威尼斯。威尼斯开价85000银马克，十字军无奈答应。为确保钱款到手，威尼斯将十字军扔到一个荒岛上，要求先交钱再渡海。十字军想尽办法才凑到2/5现金，不得不同意威尼斯的条件：攻打同是基督徒的商业对头扎达尔城。攻下扎达尔城的收获，鼓舞着他们进攻更肥的拜占庭。东罗马的海洋文明成就了这批海盗：东罗马的海军司令早已将全部舰船换钱揣入自己的腰包，陆军闻风而逃。闯入拜占庭的海盗们索要银子而不得，便三次纵火焚烧城市，大肆奸淫抢掠，挖开罗马皇帝和“圣徒”的陵墓搜寻珠宝。

欧洲各国没有海军，战争又离不开海军，教皇也拿这帮只认钱不认上帝的“威尼斯商人”毫无办法。“威尼斯商人”一边参与圣战，一边与“异教徒”做生意赚钱。1215年，正当教会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与穆斯林做生意时，威尼斯却同爱科尼安苏丹签订条约反对狄奥多·拉斯卡利斯。1219年再签条约，威尼斯人在苏丹地盘上获得了安全保证。

运兵、运给养、运战利品能够赚点脚力钱，销售东方物资可以赚点差价，但是威尼斯、热那亚哪能满足于赚这种苦力钱？“当十字军使用他们的舰队，不论用在进攻太尔城，还是用在西欧的运输，他们都要索取大量报酬。意大利城市舰队曾给予很多极为有效的帮助。1101年4月25日，鲍尔文一世曾和热那亚人缔结条约，规定热那亚在每个由于他们援助而占领的港口城市里，可获得一个‘居住区’和1/3的战利品。于是，十字军立即开始了对叙利亚海岸港口的进攻……”直接参战、瓜分地盘、圈租界、实践领事裁判权，这才是“威尼斯商人”的本性。仗着会划船，十字军所到之处，包括拜占庭，多有“威尼斯商人”的租界，实施领事裁判权。

十字军东征让“威尼斯商人”感受到了“海洋文明”的可贵，成就了他们几个世纪的辉煌。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部分城市也结成了商业性的汉萨同盟，英国与葡萄牙签订了航海通商条约。不过，直到14世纪末，欧洲仅仅在大西洋欧洲大陆岸边、地中

海沿岸游荡，与中国、阿拉伯商船的远涉重洋的航行有着质的差距。

欧洲国家无心创建海军，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传统：支持海盗。

有海运，便有海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政府支持海盗。在中世纪，一旦两个国家间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欧洲君主们往往会要求本国海盗攻击敌国的任何目标，以“敌船捕拿许可状”，将海盗行为纳入国家保护范畴。在海上讨生活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汉撒同盟，也经常干一些以海盗行为报复对手的勾当。在波罗的海，汉撒同盟不断遭到挪威海盗阿尔夫的掠夺，德国商人们联合起来专门搜剿他。阿尔夫逃回后，国王不仅将他晋升为子爵，而且将德国商人的搜剿活动看作是针对挪威的敌对行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战争”，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还广泛存在于欧洲和他们出没的世界。以海盗行为攻击敌国——“恐怖”活动，欧洲人是鼻祖。

欧洲国家还有一个传统：信奉发缺德财的“船难法”。

所谓船难法（欧洲所谓的习惯法），就是船只失事或者搁浅后，从难船上漂到岸边的货物，搁浅船上的货物，全部或者部分属于海岸土地所有人的财产。因此，海岸所有者——贵族们甚至专门安排手下，以种种手段诱使海船失事、搁浅。伏尔泰曾愤怒地说：“当时人们喜欢把北美人称作‘野蛮人’，其实我们欧洲沿海地区的农夫长期以来公然抢掠遇难的船只，杀戮航海的人，从这一点来说，北美人还不如这些人野蛮。”

靠抢掠夺天下，以武力治天下，不以抢掠为耻，习惯使然也。欧洲各国宫廷常常入不敷出，支持海盗甚至入股海盗公司，也就不奇怪了。

寻找“软柿子”

到10世纪，曾经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哈里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境况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差不多。偏偏在这个时候，西欧出现了一呼百应的罗马教皇。欧洲人立即抓住机遇搞十字军东征，过足了骑士瘾。欧洲人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强大的伊斯兰世界。

13世纪末、14世纪初，一个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民族再次登上西亚的舞台。唐朝时，突厥在与大唐军队征战中落败，其中一支西迁至里海一带，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逐渐壮大。土耳其人，是突厥的另一译音，就是这支突厥人的后裔。

饱受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熏陶，继承了阿拉伯地区发达的教育和科技、繁荣的工农业和商业成果的土耳其，迅速富强起来。经过卧薪尝胆般的苦心经营，土耳其士兵训

练有素，是最早大规模装备火枪火炮的部队，战斗力远超过欧洲骑士。

1331年，土耳其人攻占尼西亚城，打伤拜占庭皇帝。

1337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眼皮底下的尼科米底亚，戴克里先当皇帝时，他将这里建设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1365年，攻占亚得里亚堡，土耳其迁都于此。

1396年，彻底击败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三大欧洲强国联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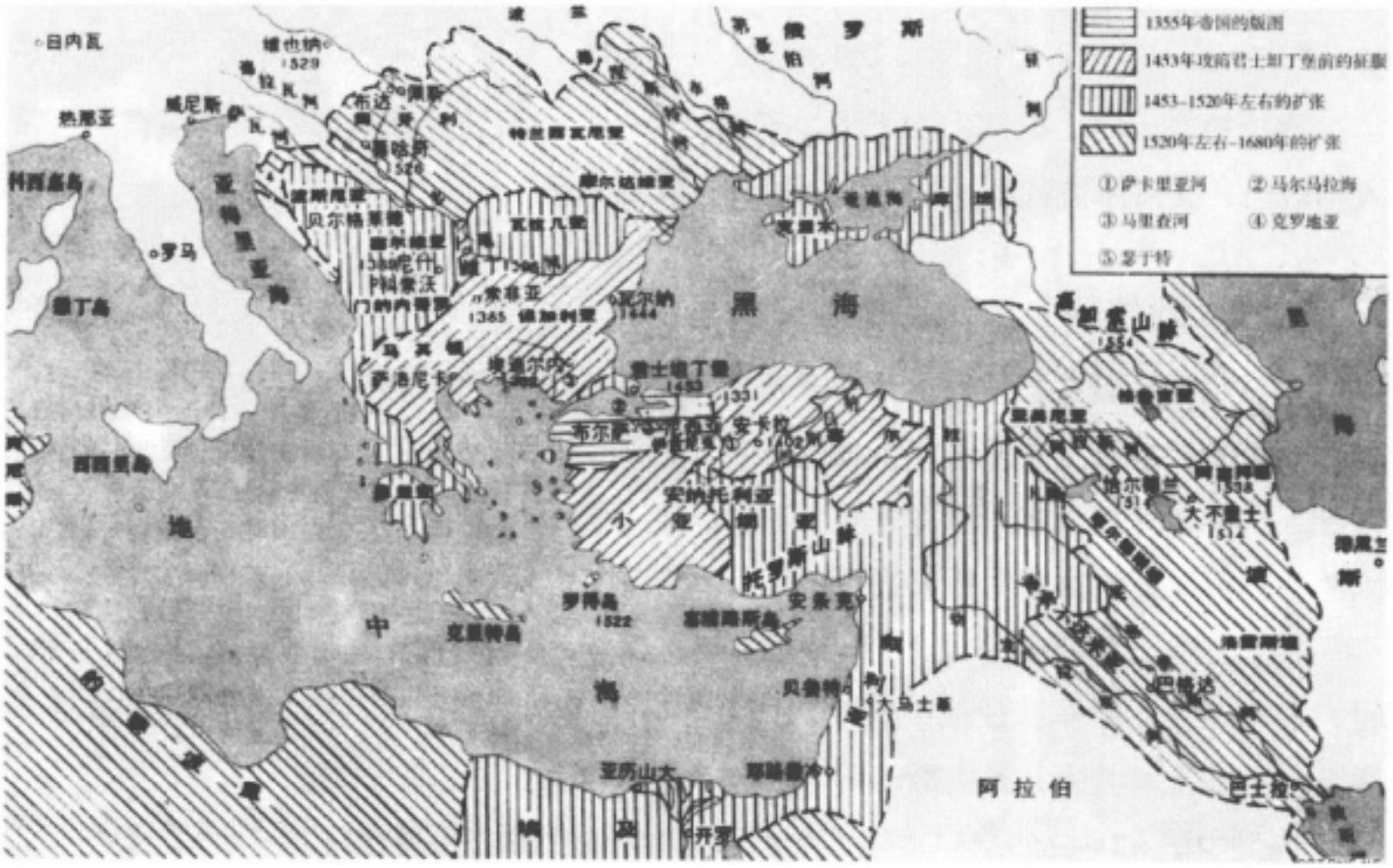
1453年，土耳其300艘战船和20万大军将东罗马付之一炬，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都城。

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占领匈牙利。

1529年，土耳其大军围剿维也纳，若非土耳其军队的主帅私心太重，奥地利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1525年，法国国王一再派使节向土耳其求援，帮助他们对付哈布斯堡王朝。

1536年，法国“卑躬屈节”地求得与土耳其结盟，“不管怎样，七年后包围尼斯的战斗和奥斯曼舰队冬季在土伦港停泊，都明确显示了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合作”。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地图

土耳其人在北非开疆拓土也很成功，地中海变作了土耳其人的内海。

面对穆斯林的强大，罗马教廷心急如焚，便拿出大把的银子，不屈不挠地张罗新的十字军东征。功夫不负有心人，1571年，欧洲两大海洋强国西班牙、威尼斯联手，与土耳其在地中海大打了一仗，这就是所谓的勒班陀海战。基督徒大胜，西班牙人还乘胜攻下了突尼斯。

“可是勒班陀海战和占领突尼斯的结果怎样呢？威尼斯人并未对土耳其人占上风，（土耳其）塞利姆二世的海军司令轻易地再度攻占突尼斯王国（1574年），那里的基督徒全被杀死，好像是土耳其人打赢了勒班陀战役似的。”伏尔泰说，“塞利姆二世死后（1585年），土耳其人在欧洲和亚洲仍然保持优势，他们在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进一步扩大了疆土。他的将领在西边占领了匈牙利的吉厄尔，在东边攻克了波斯的大不里士。土耳其近卫军使敌人闻风丧胆……”

1669年，由于威尼斯人胡闹一气，土耳其大军进攻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尽管多个欧洲强国轮番援助威尼斯，克里特岛依然成为土耳其的囊中之物。

直至17世纪晚期，土耳其海军始终是地中海名副其实的巨无霸。**随着土耳其军队践踏欧洲和地中海，一度代表欧洲“海洋文明”的威尼斯、热那亚舰队，不声不响地销声匿迹了。**

陈述上述一件件事件，是有价值的：土耳其太强大，强大到超过欧洲各国的总和！

尽管欧洲君主们痴迷宗教，西班牙正在大肆屠杀国内的穆斯林，法国正在残酷镇压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英国正在为哪一教派掌权而内讧，德国更是爆发了牵涉整个欧洲的30年宗教战争。尽管欧洲人西征美洲、南征非洲、远征亚洲，无不携传教士同行，但是，他们就是不敢打圣城耶路撒冷的主意，不去东征眼皮底下的、梦寐以求的“利凡得”，而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远涉重洋，进行“西征”、“南征”，奔赴蛮荒的美洲、非洲。

欧洲人所谓的海上大国、强国，不过是自己和自己比罢了。土耳其逐渐失去优势，并非欧洲先进、强大，而是国内政局混乱，骄兵悍将胡作非为、各行其是、擅立国君，全国上下乌烟瘴气。直到土耳其彻底衰落后，欧洲“海上强国”才敢回到地中海。

不敢在地中海玩海盗，但匪徒本性不改，就只好找寻新出路。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由阿拉伯人、犹太人水手组成的舰队，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休达

城。他随即被任命为该城的总督。以此为据点，他派人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海岸线，不断向南方探索，每到一地，便将那里洗劫一空，并建立起据点。“由于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倡导，他们在1419年发现了亚述尔岛。”虽然这个群岛距离伊比里亚半岛不过咫尺之遥，但毕竟是欧洲人第一次登上古罗马帝国地盘之外的海岛。

抢劫掠夺、贩卖奴隶，迅速给葡萄牙带来巨大财富。为了进一步扩大掠夺规模，亨利王子创办了航海学校，利用阿拉伯技术人员和阿拉伯人留下的科学典籍，批量培养航海人才，扩大抢掠队伍，继续“探险”之旅，先占加纳，再到刚果、安哥拉，将一船船奴隶、象牙、金银珠宝不断地运回欧洲。

西班牙人很快就加入这无本万利的行当中来。更雄厚的工商业基础，使西班牙后来居上。当葡萄牙人坚持不懈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探索时，西班牙人在参与非洲“探索”的基础上，开始另辟蹊径。1492年，哥伦布出现了，西班牙国王为他准备了三艘船和一些兵士。哥伦布带着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终身总督的承诺，成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并且带回了一批被掳为奴隶的印第安人。5年后，达·伽马完成了环球航行。随后，除巴西被葡萄牙“发现”、占领之外，西班牙国王占领了整个中美洲、南美洲。通过屠杀土著，实施占领和移民，这个广袤的大地变成了“拉丁美洲”。

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序曲。

阿拉伯人：欧洲海盗的师傅

有人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使西欧迅速繁荣富裕，由此走上了大航海之路。这完全是玩概念创新出来的“海洋史”。

“在1500年以前的很多个世纪里，由于其更为发达的农业和更为先进的技术，大部分亚洲国家都要比欧洲更为富有。据说13世纪来到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就曾为中国巨大的内河航运量所震惊。直到1750年时，欧洲人仍然惊奇于东方的财富、技术以及手工艺品等方面的成就。”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说，“欧洲航海家们的航程原本主要限于欧洲和周边的海域，在1400年以前，欧洲的船只基本上都只是围着欧洲的海岸线航行，向东最远不会超过黑海，向南最远到达地中海，向西不会超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向北则止于波罗的海。直至1492年之前，欧洲的船只仍然没能超越欧亚贸易线路的最西端。”

唱响大航海序曲的，不是“威尼斯商人”，不是大型商业集团汉萨同盟，而是葡

葡牙、西班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711年，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通过多年征战，占领伊比里亚半岛。750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被推翻后，唯一活下来的王室成员阿卜杜·拉曼潜入西班牙，于756年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科尔多瓦埃米尔国。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西大食。他们兴修水利工程，将大米、蔗糖等农作物引进来，改良了西班牙的农业。他们带来了玻璃、纸张、皮革的制造方法，以及刀剑甲胄制造的新技术；他们探采金银等各种矿产；他们发展丝织和毛纺手工业，仅科尔多瓦便有纺织工13000多人。他们热衷于海外贸易，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前面谈到的袭击西欧的海盗，正是这一时期的西班牙人。到10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发展成西欧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首都科尔多瓦居民50万人，而西欧其他国家最大的城市不超过5万人。他们容纳各种文化，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与阿拉伯世界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办有许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70多个，这里藏书丰富，不仅有大量阿拉伯人的作品，而且有古希腊罗马人的著作，甚至有来自中国的书籍。11世纪中期，由于内部分裂成几个相互战争的小国，不久，大部国土被基督徒夺回。

穆斯林跨海经商的传统，也被带到了这里。汤普逊承认："在默罕默德教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后的300年期间，阿拉伯文明在西欧是属于最优秀的文化……但西班牙摩尔人的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当然是和默罕默德的世界部分，而非和基督教国家进行……在12世纪，据说，有多到千艘船只经营这项利凡得贸易。在12世纪之前，地中海地区的萨拉森人的商业，比基督徒的商业要大得多……亚尔美里亚位于格拉那达王国内，是西班牙的主要港口，在那里云集着从叙利亚和埃及、热那亚和比萨来的船只。它以千所接待旅客的旅舍和四千所织造厂为自豪，此外还有铜、铁和玻璃制造工场。"

1492年，基督徒军队灭亡了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格拉那达穆斯林王国，西班牙的穆斯林政权终于灰飞烟灭。穆斯林给西班牙、葡萄牙留下了图书馆、学校和大量的科学文化典籍，留下了大批精于造船和航海、擅长制造枪炮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留下了航海的传统。基督徒统治下的西班牙，生产的大炮、火枪等武器，不仅满足了本地区使用，还曾畅销法国等国家。

在西班牙被基督徒"克复"之后，这里依然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而"城市商业的繁荣大多依靠摩尔居民的企业，而大部分的税款，也是由他们缴付的"。

欧洲的"海洋文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丹皮尔承认，这一时期，"由阿拉伯

语到拉丁语的翻译工作，在西班牙最是活跃……葡萄牙人在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家的指导下，首先开始（航海）探险”。

阿拉伯人到底教给了基督徒多少航海知识？

《新全球史》说：“12世纪初，通过在船尾安装船舵，船的灵活性得到改进（尾舵是中国人的发明，先是传播到印度洋；欧洲人知晓这项技术大概是通过地中海上的阿拉伯船只）……在帆船上，最重要的导航仪器是罗盘和星盘（很快就被十字标尺和反向标尺所取代）。罗盘是中国人唐朝和宋朝发明的，11世纪传入印度洋。12世纪中期，欧洲水手开始使用罗盘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导航……15世纪晚期，葡萄牙水手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时候发现阿拉伯人来确定纬度的仪器更为简便，于是就以他们的仪器为原型制作出十字标尺和反向标尺。”

汤普逊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出现了一类新的探险家……他们寻找新的商业航路。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关于这批探险家及其商业冒险活动的奇异成绩。对于海上主人翁甚至陆上主人翁，所有曾经指挥各民族命运的海陆军优势，再也没有像阿拉伯人的优势那样，在地理探险领域中，如此遍布着的。全世界就是他们所探险的全世界。他们的船只远涉重洋以寻找新航路，甚至像他们的哈里发在陆上开辟新通路一样；而他们所有这些活动的根源，在于闪族的商业本能……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阿拉伯人在亚洲、非洲、西欧迅速展开的征服更可令人惊异的事件了。我们的‘海军司令’（Admiral）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海上司令’‘Al-mir-ul-bahr’的来源以外，或者我们的‘船舶’（Barge）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战舰’（Barija）的来源外，还有什么来源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力求找到欧洲“走向海洋”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地理等原因，可最终的结论是：“在从约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相形之下，西方人正因为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他们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当然，中国人不是欧洲人的直接老师。

其实，当海盗，是无需多么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的。在航母、卫星、巡航导弹的眼皮底下，今天的索马里海盗，不照样玩得欢？只要不怕死、没有道德底线，就是一名成功的海盗。

遗憾的是，穆斯林作为老师，在教欧洲学生航海时，有一个重大疏忽：忘记了将和平经商、善待商人的伊斯兰商业道德教给欧洲人，以致不久后全球生灵涂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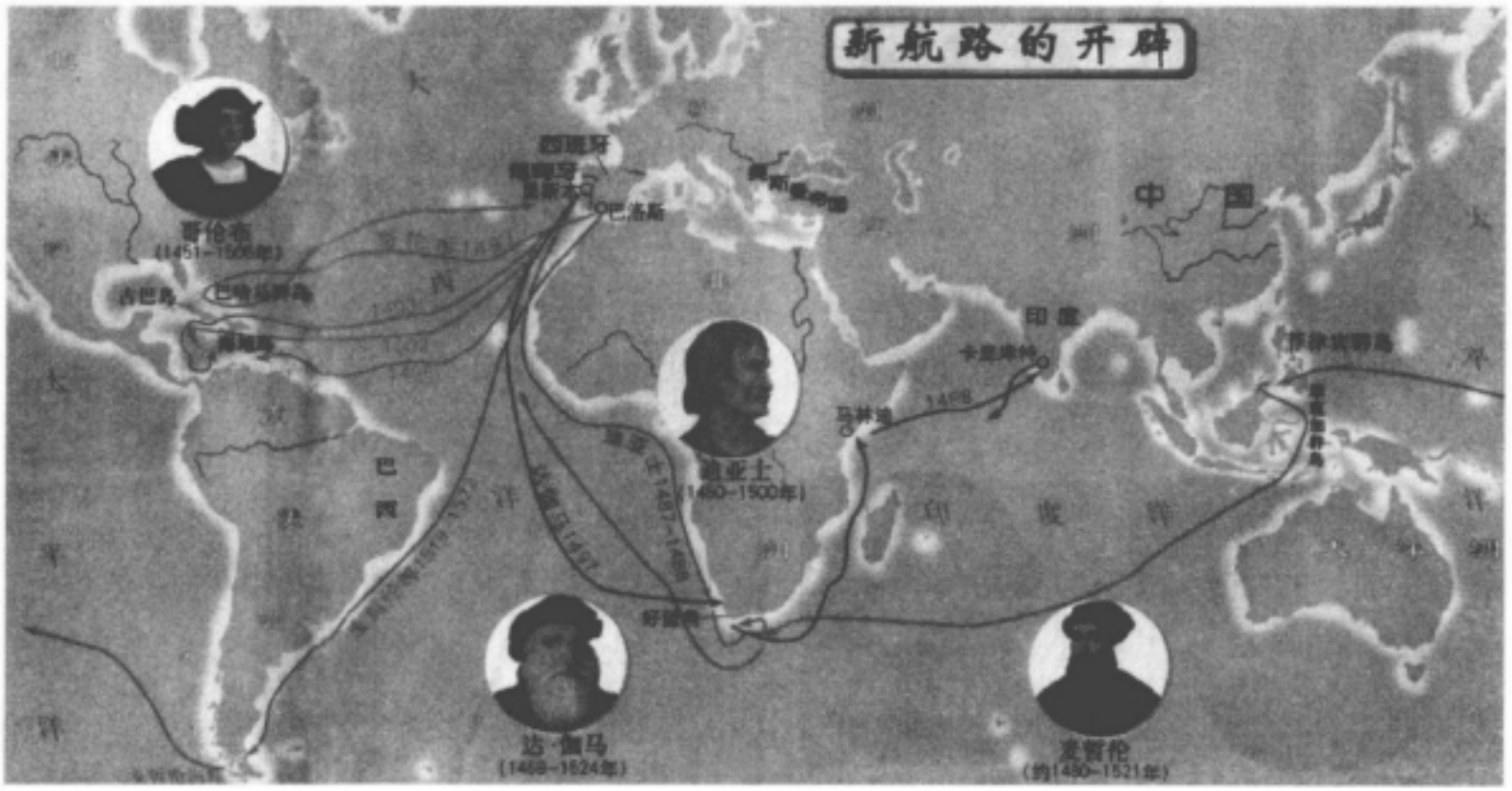
暴富暴穷的黑帮老大

哥伦布之流之所以声名远播，影响深远，在于他们与阿拉伯人、中国人、印度人的和平经商大不一样，与郑和发现新国家建立“朝贡”的外交关系也不一样，哥伦布之流传播出了一种全新海洋文明：掠夺、屠杀、占领。

哥伦布之后的400年时间，欧洲人过上了空前绝后的好日子：银子不足，到殖民地上去取；物资不足，到殖民地上去取；劳力不足，到殖民地上去取。如此丰功伟绩，怎不让欧美白人念念不忘！

哥伦布是在无尽的感恩戴德中出发的：“陛下赐予我无比的恩宠，封我为贵族，乃至于从那时候起，我就有资格在名字前加上‘唐’的尊称，并成为大西洋海军上将，成为所有我有可能发现和获得以及从今以后在大西洋有可能被发现和获得的所有岛屿和陆地的总督和永久总督。陛下还允许我的长子可以同样的方式继承，并且此后世代相传。”

哥伦布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他至死也不知道这是“新大陆”。他一边安排手下占领，一边回来上报喜讯，并上交了一批印第安奴隶，博得龙颜大悦。



新航路的开辟

达·伽马之流更是灭绝人性。一进入印度洋，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利用季风航海后，马上便翻脸“俘获了一条由麦加返回科泽科德的船只，船上有近400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幼童。在对船上所有商人进行掳掠之后，葡萄牙人把所有乘客锁在

甲板之下并放火烧船，杀死了一船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哥伦布的后继者们登上任何一地之后，无不是洗劫财宝，屠杀土著，占领土地。西班牙人屠杀墨西哥土著，绑架并残杀秘鲁的皇帝，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据时人估计，西班牙人消灭了1200万土著人，夸张与否已无从知晓，但“金子银子每天不断地运进西班牙营地”，这是真的。

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真的是蛮荒状态吗？曾经跟随赫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伯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在他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中是如此记录印第安人的墨西哥城贸易市场的：“广场上平民和商人熙来攘往，一切井然有序，我们见了大为惊奇，因为从未见过那种情景。陪同我们的那些首领一路指点。各种商品分开出售，绝不相混，而且都有固定的摊位。我们从金银、宝石摊看起，然后是羽毛、布匹、刺绣品摊，最后看出售印第安男女奴隶的摊位……市场上还有商贩出售粗布、棉花和搓成的线；也有人出售可可；整个新西班牙出售的商品，这里样样皆有，而且成列得有条有理，与我的家乡梅迪娜德尔坎波相仿，那里举行集市时，也像这里每条街都出售一种商品……广场上有几所房屋，有三个法官在屋里判案，还有若干执勤法警似的人物负责检查商品……那里也出售黄铜斧头、铜和锡、加拉巴木果壳碗和色彩鲜艳的木罐子。我介绍广场上出售的各种商品，似应告一段落了，因商品种类繁富，广场上人山人海，且又集中于柱廊一带，想在两天内看遍所有的东西，根本办不到。”

这里很繁荣，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西班牙本身。但是，这里武器装备极其原始，加之内奸配合，很快就被西班牙海盗们所征服。随即，他们又征服了南美。

占领、掠夺美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之后，西班牙曾经非常富裕。据统计，在1556～1650年这大约100年间，仅秘鲁的波托西矿区，就贡献出2750281公斤白银；另据统计，16世纪，从西印度群岛输入欧洲黄金181234.9公斤，白银16632648.2公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算一算，这相当于当今的多少亿美元，而当时欧洲“崛起的大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总共才多少人口。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说：“拉丁美洲提供世界3/4的金砂开采和90%以上的银矿。随着波托西矿的枯竭，白银主要来自墨西哥。”而这些，主要属于西班牙。西班牙王室是如此的有钱，伏尔泰说：“当他（指查理五世——笔者注）把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送往伦敦去同玛丽女王结婚，并取得英国国王称号时，这位王子把27大箱银条和用100匹马驮运的白银和金币交给了英国宫廷。”

然而，不到100年之后，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遭遇风暴损失惨重，被临时拼凑起来的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竟然从此一蹶不振。

“哈洋族”将西班牙、葡萄牙当海盗致富称为“崛起”，又将无敌舰队作为西班牙衰落、英国在海上崛起的标志。这是一个很搞笑的说法。

杀人放火，一夜暴富了，便可以称之为崛起吗？回答是：未必。

钱刚好够用，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人们会想方设法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钱突然多到用不完，很容易变成鸦片，让人飘飘欲仙，走上邪恶的不归路。一个人靠当黑老大一夜暴富后，便高烧得不行，醉心于雇保镖、买地盖房子、抽鸦片、养小三，而不办实业以图长远，继续打打杀杀的勾当，再回到赤贫甚至死于非命则是早晚的事。大航海时期的欧洲，便有大批这样的海盗。

从天而降的无数金银进入西班牙人口袋之时，恰逢西班牙国王身兼奥地利国王，大有复兴神圣罗马帝国、一统欧洲的气象。精神错乱的国王们，为了答谢自己兴奋的神经，将美洲的金银大把地投入到欧洲争霸战。然而，在没完没了的穷兵黩武中，除了不断增加冤死鬼，连身边的法国也没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显示霸主尊严，国王们追求金碧辉煌，肆意挥霍用金银从亚洲换来的奢侈品，竭力铺张排场，过足了老大的瘾。在内政上，西班牙更是荒唐、愚昧、血腥。穆斯林的工商业天才成就了西班牙的强大，而头脑发昏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腓力二世、腓力三世，持之以恒地建设“纯粹的基督教国家”，无数穆斯林被烧死，剩下的皆被驱逐。汤普逊教授说：“在西班牙，除了摩尔人的王国以外，生产相当落后，随着1492年摩尔人的被驱逐，西班牙王国的国民中，丧失了最勤勉的能工巧匠。”“西班牙的贫困、其人口的减少及其他建筑术的衰落，都是从1492年逐出摩尔人和犹太人开始的。在这以后，卡斯提尔不再能保持这种繁荣状态了。”伏尔泰证实：“（1609年）驱逐摩尔人给西班牙君主国带来了更多的危害。菲利普三世对付不了为数甚少的荷兰人，却不幸有能力把六七十万摩尔人从国内赶走。从前征服西班牙剩留下来的摩尔人，大多数已经手无寸铁，从前经商和种地，他们在西班牙远不如新教徒在法国那样可怕，却有用得多。因为在这个怠惰的国家里，他们是勤劳的……人们把这些居民送出国境，整整忙了两年。国内人口也减少了。菲利浦就这样弃绝了自己的庶民中最勤劳的人……大部分西班牙籍摩尔人逃至他们原来的居住地——非洲。有些人跑到玛丽·德·美第奇摄政的法国……法国利用了西班牙的错误。”“赶走了摩尔人之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贫乏更加严重，结果在西班牙旅行就犹如处身于阿拉伯沙漠中。城市里找不到多少东西……全国

各要塞成了废墟，港口里没有军舰，军队由于有指挥才能的将领被撤换而军纪荡然无存。”

从美洲抢来的第一桶金，并没有拉动西班牙的工业发展，没有促进西班牙的教育和科技进步，反而同于鸦片，成了加速腐蚀西班牙的催化剂。当它将优秀的工匠赶往英、法等国之后，“美洲的金银只是在西班牙过境，这个国家开支太多但生产不足。相反，金银流向了那些出口多于进口的工业国家”，推动了其他国家的发展。

西班牙的造血功能丧失了，将带血的钞票漂白、由黑老大变身为“实业家”和绅士的机会溜走了。

无敌舰队覆亡，如同杜月笙有几个马仔被杀，根本不值得一提。广袤无垠的殖民地，仍然属于西班牙，金矿银矿依然源源不断地上供，钞票多多，想要恢复海军，再建设一支就是了。事实上，西班牙很快便重建了自己的舰队，不久又收拾过英国海盗。倘若一支舰队被消灭，就会导致一个国家衰落，那么，二战时期，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岂不要衰落下去了？在大西洋、太平洋两线作战的美国海军，照样彻底消灭了日本海军、空军，甚至造出了原子弹——因为美国的造血功能是正常的。

伏尔泰也分析了另一航海大国葡萄牙衰落的原因：“葡萄牙政府在将近50年里毫不重视本国商人在巴西定居的事。最后，到1559年，才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殖民地，从此葡萄牙的国王们同时从新旧大陆获取贡品……结果怎样呢？这么多的财富使葡萄牙变穷了。葡萄牙大量居民移居到亚洲和巴西的殖民地，剩下的人寄希望于金子和钻石，停止经营真正的宝藏：农业和工业。他们的钻石和金子勉强可以支付英国向他们提供的必需品。”《新全球史》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道：“到了16世纪晚期，葡萄牙在印度洋的霸权逐渐衰落。葡萄牙是个人口稀少的小国，在1500年只有100万人口，无力长久地支撑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甚至“没有足够的军舰来执行将军的命令”，“葡萄牙船员中往往包括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水手，他们在为葡萄牙服役的过程中，熟悉了亚洲的海域。16世纪晚期，其他国家的投资人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探险队去开拓亚洲市场。跟随葡萄牙进入印度洋的国家中，荷兰和英国最为出色”。

西班牙、葡萄牙的发家史，无非是打打杀杀的历史。当西班牙有点钱便瞎折腾的时候，新一代黑老大闯入了江湖。英国、法国这些后起之秀，一边掠夺银子，一边源源不断地造出更新更先进的武器。如此，西班牙退出江湖的时间就不远了。后来，在蛮荒中长大的“农业国”美国，尽管不敢向英国叫板，却从美洲一直追到东南亚，只花了几个小时，便将西班牙人赶回了原籍。

19世纪初，发动南美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是如此评价西班牙的："它所拥有的那些军队几乎不足以将他自己的人民维持在被迫服从的状态中，不足以保护它自己不受邻邦侵犯。另一方面，当那个国家在缺乏制造业、农产品、手工业和科学甚至一种政策的时候，它还能做半个世界的独家生意吗？……如果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领域内的话，它可以将繁荣和权力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靠不住的征服、危险而不安定的商业和对遥远而强大的民族的强行勒索。"

钞票与国力是两码事，钱多，不等于国力强。一个人钱多，不等于智慧多武功高；一个国家的石油煤炭、金银铜铁再多，也不等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一个国家，一旦有了钱，得抓紧培育自己深厚的内涵，大办教育以增强国家的智慧，大办科技以丰富国家的筋骨，大办工农业以壮实国家的营养，大办军事以为国家筑起坚实的篱笆。

后来居上的黑老大英国的所作所为，也许是西班牙失败的最好答案。

英国：民间海盗转向国家海盗

西欧各国大多没有海军，却培养了不少海盗。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瞬间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荷兰、英国、法国等滨海国家，一些原来在近海打劫、荒山剪径的混混，纷纷加入到掠买奴隶、打劫非洲和美洲土著的行列中来。亨利王子进军非洲以来的三百余年里，活跃于非洲、美洲、亚洲的主力就是这群亡命之徒。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得到哥伦布成功的消息后，于1494年派遣卡波特乘一条仅18名船员的小船，进行横渡大西洋的探险。次年，卡波特再次横渡并到达北美。由于卡波特一行所到之处，偏偏人烟稀少，所获有限，得不偿失，英国的海上行动就此沉寂。

西班牙海盗的冒险活动的丰厚回报，激起了英国海盗们的热情，"民间"航海在英国迅速火爆起来。亡命之徒们纷纷跑到西班牙的非洲地盘上抢掠奴隶，再低价倾销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上。他们甚至抢劫西班牙人的商站，掠夺西班牙满载财宝的商船。**海盗们将部分财物孝敬英国女王，女王凤颜大悦，干脆入股海盗组织，当上了海盗股东，成为后台老板。**1579年，英国女王最亲密的商业伙伴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厄瓜多尔海面捕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型海岸船，船上载有1300条白银、14箱银币和数目不详的黄金、珠宝、中国瓷器。女王获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欣喜之余授予海盗头子先进称号直至爵士桂冠。对于英国如此荒谬的举动，西班牙在一再"深表遗憾"无效之后，决定用武力打击恐怖活动。



西班牙国王与英国女王成为死对头

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由来已久。仅仅在困扰欧洲国际关系的宗教问题上，双方矛盾就很深。德国著名诗人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宗教改革使尼德兰人感到难以忍受西班牙的奴役，唤醒了该民族砸碎这种桎梏的愿望和勇气，宗教改革也极大地给予了这个民族这方面的力量。腓力浦二世决定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干的一切恶事进行报复，因为女王把反对他的新教臣民至于保护之下，且担任了他想取缔的宗教派别的首领。”西班牙甚至策划谋杀英国女王。英国海盗抢劫商船，不过是两国战争的导火索罢了。

这时的英国，是一个连食盐、枪炮、火药、盔甲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属于欧洲“老少边穷”之地，“哈洋族”说它是军事强国，不是昏话酒话，就是鬼话。直到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开战前，英国依然保持着中世纪国家本色，既没有正儿八经的海军，也没有常备的陆军，仅有的34艘可以充作战船的玩意儿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船队。大敌当前，说女王不害怕不后悔那同样是鬼话。一个人关在王宫想了几天之后，她终于明白，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迎战。英国政府不得不沿袭中世纪的一套，征集全国商船，求助于海盗帮忙，恳请他们为国效力。好在这个海盗国家海匪众多，而且与王室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合作关系，加之他们长期被西班牙海军追杀，所以，都愿意前来勤王助战。这支由乌合之众拼凑起来的舰队，在临时委任的一名海盗出身的“海军司令”的率领下，“一不小心”取得了胜利。

侥幸取胜后，从女王到广大绅士，首先想到的是感谢上帝。烧香敬拜之后，女王立即下令削减海军预算，大家仍然像从前那样过日子，无人关心海军建设。

基佐在《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说："英国贸易发达，商船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有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且屡次做出严肃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商船仍旧缺乏保护，因为国王的舰只年久失修，水手们又久未领到饷银。巴巴里的海盗（即阿拉伯海盗——笔者注）竟敢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们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的事）。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海盗的一个大巢穴，发现其中有370个奴隶，有英吉利人，也有爱尔兰人。政府十分懦弱无能，苟且偷安，仅顾目前。因此，斯德拉福德不得不自解私囊，为一条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港口，使其免遭海盗的蹂躏。"

罗伯特·金·默顿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说："惠勒在17世纪初期写道，在大约60年间，航行于泰晤士河上的运载能力超过120吨的轮船不到4艘。威廉·芒逊爵士写道，到伊丽莎白去世时，在英格兰400吨级的商船或许也不超过4艘……1607年，皇家海军50吨级以上的舰只仅有40艘。"

从伊丽莎白到克伦威尔之前的英国国君，无不是一脑袋浆糊，除了不择手段地搞钱，便是关心宗教上的纯正性。指望无知昏庸之辈领路于"海洋文明"，岂不是白日做梦？

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块陆地，都成了西方人跑马圈地的天堂，谁先到达，甚至谁先看到，就是谁的地盘，只要能打得过这里的主人。直到今天，论证天下土地主权归属的依据，依然是这个"习惯法"。海盗规则、丛林法则成为"普世价值"的"国际法"，是对"文明"一词的最大嘲弄。

经常闯荡江湖的冒险家们，远比英国国王见多识广。此时，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合一，在人口上，英国算是欧洲大国。岛国自有岛国的特点，大批海盗在海上打打杀杀、亦匪亦商讨生活，打得赢就抢，打不赢就坐下来谈生意。其中有的人，花钱找国王买下了创建殖民地的特许状，从事更大的冒险活动——圈地淘金。冒险家们弄张特许状到手，不是他们有多么爱国或者有多强的法律意识，而是为了一旦在外惹出滔天大祸，可以化民间纠纷为国家间的矛盾，从而获得国王的保护。**英国国王出卖特许状，也不是真有开拓海外殖民地或者发展海外贸易的远见卓识或者宏伟理想，仅仅是为了捞几个零花钱而已。**

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一辈子只关心钞票和宗教。为了搞钱，他把肥皂、纸张等百姓日用品的销售权“收归国有”，然后作为“专卖权”出售换回真金白银；为了建立一个宗教纯粹的国家，他拼命发展国教和迫害清教徒。1606年，伦敦公司、普利茅斯公司获得在北美殖民的特许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1607年（距离西班牙人1496年建立圣多明各100多年），伦敦公司将120来名卖身为契约奴的英国农民送到大洋彼岸，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点詹姆斯城。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卖身为奴的英国农民、避难的清教徒等，不断涌入北美。这些人利用枪杆子，不断屠杀、驱逐当地土著，地盘越来越大。等到殖民地折腾到有点眉目了，1624年，英王便开始取缔“特许状”，先后将一个个殖民地收为国王领地，直接派官员管理。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时期的产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者都向美洲和亚洲派出了军事探险队，而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统治者则鼓励商业公司拓展亚洲贸易，同时赋予其从亚洲进口商品回母国的垄断权。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和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便成了各自国家在亚洲的代理机构。这几个‘东印度公司’看起来有些像私营公司（它们买进卖出货物，并在欧洲最早的股票交易市场上出售股票），又有些像一个小国家（拥有自己的陆军、海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这些东印度公司其实是殖民地帝国的缔造者。”

还有一批纯粹的海盗，也为英国建立圈占殖民地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摩尔根，手下有千余名海盗，他们袭击美洲的城镇乡村，到处烧杀抢掠，搅得西班牙殖民地不得安宁。这些家伙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巢穴，无意中，圈占了不小的领土，形成了可观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英国海盗一再遭到西班牙海军屠杀，也吃尽了苦头。

将海盗占领的地盘变为国家的领地，站在国家利益来看，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长远的事业，必须由具备长远眼光的主政者来经营。克伦威尔以前的英国君主既办不好，也不关心这件大事。英国海盗们在海外各自为政地死打乱拼一两百年之后，机遇终于来了。

克伦威尔既是商人，又是政客，还是军阀，因此，他既爱权力，又爱地盘，也爱钱。靠自己组建军队拼杀成护国公的人，当然比世袭国王多一点进取精神。他混成英国的老大之后，各种欲望极度膨胀，爆发出填不满的征服欲。他1649年出兵爱尔兰，1650年出兵苏格兰，1654年将爱尔兰、苏格兰彻底并于英国。控制英伦三岛后，大战荷兰，并于1654年赢得胜利，同时“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葡萄牙允许英国商人在

其殖民地经商。1655年打败西班牙，占领敦刻尔克，又出兵远航攻占了牙买加。与此同时，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商政策，充分利用殖民地资源发展英国本土的工商业，将殖民地牢牢挂在本国战略利益的战车上，彻底摆脱了西班牙式的简单掠夺模式。

克伦威尔称霸欧洲的战争欲望，以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征，大大刺激了英国的海军建设。罗伯特·金·默顿说："在共和政体时期，轮船，特别是大吨位轮船的数目迅速地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受到荷兰战争的刺激。亚当·安德森注意到，1688年英格兰轮船的总吨位比1666年增加了一倍；斯普拉特也指出，在以前的20年间，轮船吨位同样翻了一番……到了1695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舰船200多艘、总吨位超过112400吨，人员45000多人。正如索巴特所指出的，造船速度加快和船只规模加大的实际原因是军事上的需要。"

到1658年克伦威尔告别人世时，英国海军已甚为强大。1664年，英国舰队远航来到北美，一枪未发就占领了荷兰人的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至此，英国的军事力量正式投入到全球性的殖民活动之中。这距离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海战，已经80年了。

克伦威尔之后，一群以发财为中心的绅士组成的英国议会掌握了朝廷，建立了服务于他们的理性的政治体制，海上"贸易"成为英国国政的永恒的中心。

随着国家机器转变为少数人发财的工具，杀人越货的民间海盗行为，随即转变为国家海盗行为。英国军队紧跟在商人后面，深入世界各个角落。英国全球殖民活动的序幕开始拉开，英国控制的疆土如滚雪球一般迅速扩展。

法国：醒得晚动作快的海盗

欧洲另一个强国是法国。路易十四（1661～1715年在位）之前的法国国王，几乎都在忙乎国家统一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打内战，因而无暇顾及海军建设。伏尔泰说："当时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笔者注）有一位海军司令而没有舰队。枢机主教刚出任枢密大臣，王国百废待举，一年之内还不能建立起一支海军，可以武装起来的小战船几乎不到10艘至12艘。当时的海军司令蒙莫朗西公爵（后来死得很惨）只得登上联省共和国的旗舰，并且只能同荷兰和英国的军舰一起与拉罗舍尔的舰队对战。"

路易十四登基后，一辈子投身于欧洲大陆争霸战，终于打出了在欧洲绝对老大的

地位，使国内教会、贵族绝对服从于王权，成为“太阳王”。唯一令太阳王死不瞑目的，就是没有搞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

在欧洲大陆打仗，陆军是关键。路易十四不断扩充陆军，高峰时多达40万人，而且建立了完善的军衔制度、军服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军事技术发展迅猛。海军也是必要的，战船由1661年的18艘增长到1683年的276艘，他还将海盗船纳入军事编制。

伏尔泰差不多是路易十四的同时代人，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正当葡萄牙人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发现和征服新世界的时候，法国人还经常在比武场上耍枪弄剑。”直到17世纪初，“虽然濒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有港口，但却无船队。路易十三即位时，法国连一艘大船也没有”，“法国海军久已消亡，黎世留（路易十三的首相——笔者注）红衣主教曾使之稍加恢复，但在马扎然（1643～1661年任路易十四首相——笔者注）的统治下，它又复败落”。

法国政治制度的黑暗，路易十四之后的君主的无所作为，注定了它未来的殖民地少于英国。直到1789年革命前夕，农业经济占国民总收入的3/4，农村人口占80%以上；在全国人口中，教士15万人，贵族50万人，第三等级2450万人。然而，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样，农民为封建义务网所缠累，人身附属于领主，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事实上被固定在土地上面。即使有些农民想去当海盗，未经领主批准也是白搭。因此，尽管法国也有许多海盗很努力地闯荡江湖，甚至比英国还早一年在北美建立殖民点，路易十四也建立了东印度公司等机构，但是，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由于没有能够像英国一样大批移民定居，人口增加得太慢，最终有不少被英国人或者吃掉、或者同化掉了。

法国海盗也和英国海盗一样，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乔治·杜比说，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人在印度和马达加斯加已经立足。最可靠的成就是在加拿大和安的列斯群岛取得的。新法兰西——这是法国的农业领地，一个拥有督军、主教和督办的省——的殖民是科尔伯个人的功劳。他鼓励往那里移民”。

伏尔泰也承认：“法国能够和西班牙在圣多明各岛平分秋色，是靠了一帮铤而走险的、剽悍的新人，这是一些偶然聚合在一起的英国人、布列塔尼人、诺曼底人，其中主要是诺曼底人。人们称他们为海盗或美洲海盗……法国人能在岛上立足，靠的也是他们海上行劫的武力。”“此时路易十四内外交困，眼看着旧的法兰西日益衰微，也就无暇顾及新的法兰西了。当国家人力、财力都已告枯竭时，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人却趁着国家贫困之机，每个人都赚了将近4000万利弗。一个人在柯尔贝尔所创办

的东印度公司陷于破产之时，通过对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贸易发了财；另一个人则通过与困难重重、负债累累而又孤陋寡闻的政府打交道，取得了成功。后者就是那个名叫克罗扎的商人。此人既有钱又有胆量，敢于拿出一部分财产来碰运气。他请国王把路易斯安那特许给他，条件是他和他的合伙人在每艘船上带男女少年各6人，到那儿去繁育后代。路易斯安那当时不仅商业不振，人丁也很稀少。路易十四死后，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的想法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有害的），让法国人相信路易斯安那出产同秘鲁一样多的金子，而且会提供同中国一样多的丝绸。于是在有名的拉斯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法国向密西西比大量移民（1717～1718年），人们订出计划，要建造一座美丽而整齐的城市，名为新奥尔良。”

殖民地的油水，也让法国的眼睛放出绿光。乔治·杜比说：“自17世纪末以来，路易斯安那，也就是通过俄亥俄河谷伸向加拿大的整个密西西比河盆地，在1748年后布满了法国要塞，其目的在于阻止英国移殖民向内地延伸，从而为国王留有建立庞大的北美帝国的前景。在安的列斯群岛海域几乎均分领土和人口、导致将竞争转移到非洲以获取供应奴隶的‘岛屿’。同时，西班牙帝国在18世纪上半叶的衰落使得马德里成为英法两国继续争夺影响范围的一个对抗场所。在东方，从约翰·劳的制度破产中幸免的法国印度公司，尽管不如英国印度公司那样强大，也足以在1740年左右开始其扩张主义政策。”

英法两国的斗法开始了。

落后的政治制度，使得“法国在欧洲处处受牵制和被动挨打，舰队也被数量更多、装备更好的英国海军以压倒优势胜出，由此法国于1760年丧失了加拿大。随后在1760年至1763年间，英国又将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主要据点悉数夺走”。

法国革命时期，利用法国内乱并与整个欧洲为敌的大好机遇，英国痛下黑手，“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库拉索岛和特里尼蒂岛都值得夺到手；英国向1796年和1800年间占领的荷属圭亚那投放了巨额资本，使那里的生产增长了十倍。海军需要好望角这样的停泊港，英国于1795年占领了好望角。殖民地官员多数是贵族子弟，他们自发地推动殖民征服，以求有所作为”。

虽然打不过英国，法国却是世界上排行第二的海上强国。法国革命之后，革命家们掌权了，于是依靠快速增强的国力、实力强大的资本家们，大大加快了殖民扩张步伐。乔治·杜比说，儒勒·费里，这个曾经下令袭击中国福建水师，并在越南与中国军队大战的法国政治家，“根据他的理论，无论是出于军事原因（能够在全世界的

范围内获得补给站和海军基地）、经济原因（能够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和政治原因（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声誉来说是必要的，能把某国的‘语言、风俗、旗帜、武器和精神’带到世界各地），殖民扩张对于法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必不可少”。“1890年开始……政客和企业家为殖民扩张发动了宣传。1889年殖民学校的创办、1893年（由职业军人和志愿者组成的）殖民军的建立以及1894年殖民部的成立，为殖民事业提供了技术支持。法国大规模的殖民扩张由此展开，在十几年时间里，法国政府平定了印度支那，征服了马达加斯加以及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还为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的版图增加了摩洛哥”。

就此，英法两国主导的“海洋文明”形成了，西欧“大国崛起”了。

真实的海洋文明

哥伦布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海盗船所到之处，无不血花四溅，财富被洗劫一空，之后再实施占领。

16世纪是一个杀人越货的世纪。一些勤奋的海盗闯入“新大陆”，连抢带杀，捞得成船的宝贝；另一些懒惰的海盗，在海上守株待兔，专门打劫勤奋海盗的“商船”。无论如何，美洲的宝贝大多流入到欧洲，使欧洲仅白银总量就增加了两倍。

17世纪是一个争当美洲农民的世纪。地上的宝贝被洗劫干净了，但美洲大陆土地多多，于是，欧洲农民纷纷登上美洲大陆，赶走印第安人，种起小麦棉花烟叶来了。

18世纪是一个美洲大陆农业化、欧洲“工业化”的世纪。随着数以百万计的黑奴进入美洲大陆，欧洲农民纷纷变身为“农场主”，没有本钱的农产品涌入欧洲，使欧洲专门玩起“工业化”来。

19世纪是一个洗劫亚洲、非洲的世纪。有了本钱和底气的欧洲，完成了对亚洲和非洲的瓜分。

20世纪是一个海盗争霸的世纪。前几个世纪，有的海盗起得早，有的醒得晚，造成分赃不匀，于是以拳头讲道理。

不是说哥伦布、达·伽马的航海，是为了寻找印度和中国么？为什么19世纪以前，欧洲人活动的中心却是美洲呢？

原因很简单，印第安人好欺负，而亚洲人不好惹、惹不起。

前面说过，欧洲人因为被邻居土耳其打得满地找牙，而此时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正好是莫卧儿王朝。印度不仅拥有雄兵百万，而且火炮火枪装备齐整。中国始终是一

个统一的大国，而日本此时更是武士当道。因此，无论是最早跑到这里的葡萄牙人，还是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无不是赔着笑脸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恳求借个地方让他们建商站，和和气气、公公平平地做生意。

但是，欧洲的产品太低档了。在这里混江湖的欧洲人，只能拿金银交换亚洲的产品，运回欧洲或者美洲赚差价。为了糊口，他们甚至当起印度、东南亚、日本、中国等地商品的运输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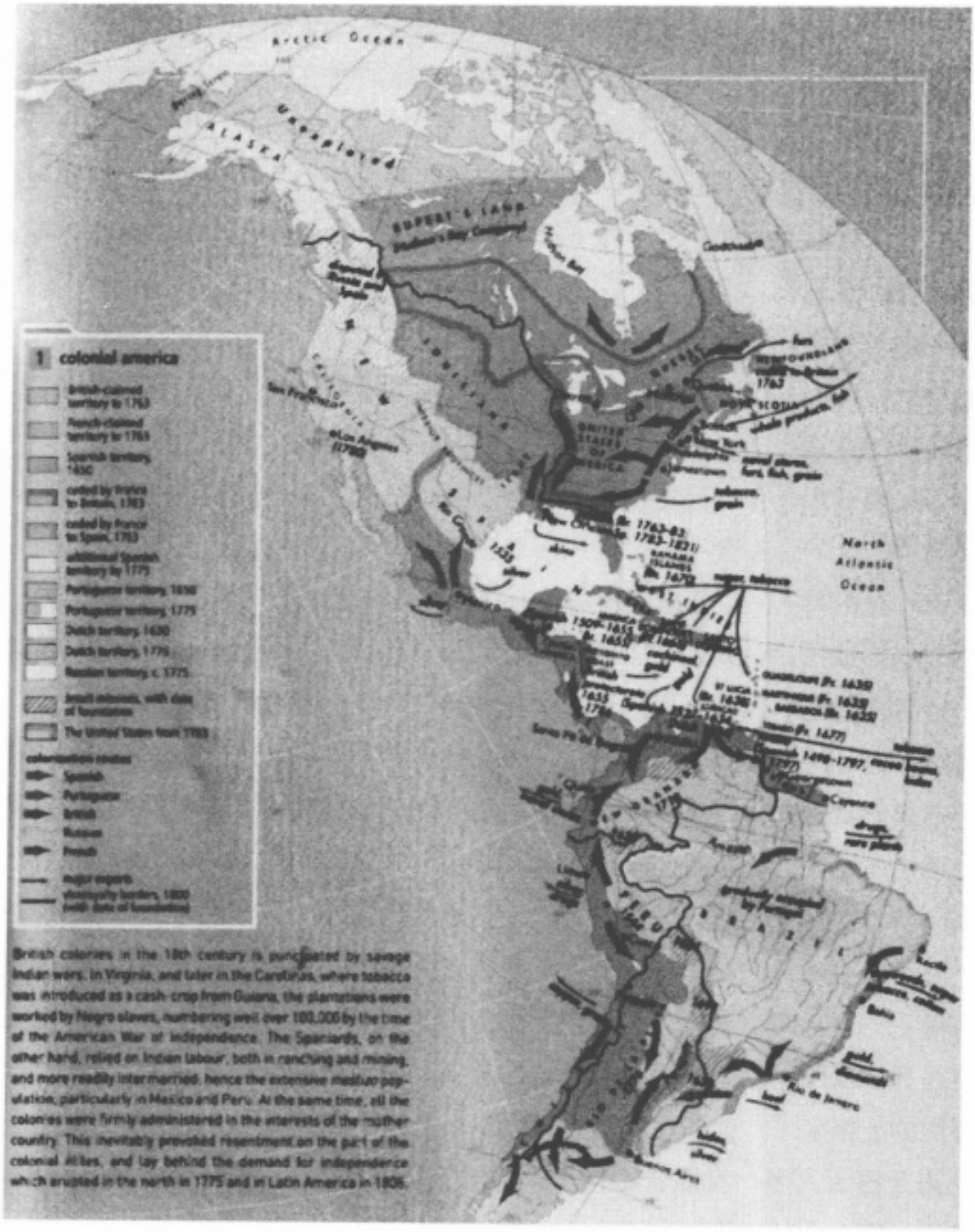
海盗就是海盗，靠劳动赚钱的事情他们是懒得干的。趁着印度南部还处于混乱状态，葡萄牙1510年占领了果阿。接着，他们发现马六甲是块宝地，又好欺负，它的印度总督阿尔伯克基便高呼："当马六甲被强大的要塞控制在我们的统治之下的时候，假如葡萄牙国王任命有经验的人到那里当总督和财务主管，那么当地的税收就将支付城市管理中产生的全部费用……这片土地应该由葡萄牙人统治，曼努埃尔国王应该被称为那里的真正国王。"于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

取得些许成绩后，葡萄牙人发了疯，派教士到日本去传教。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拥有一些日本教徒后，教士便鼓动日本教徒起来造反，企图颠覆日本政权。日本武士是没有隐忍之心的，于1639年下令："若信教者聚众图谋邪恶之事，必受惩罚。信神父布道者虽已藏匿，然时有该国（葡国）赠礼物以维持其生计之事件发生。鉴于以上问题，今后不准葡国大型帆船驶入。若其坚持来（日本），船只必受捣毁，船上所有人员必予斩首。"葡萄牙人以为日本武士说着玩玩，1640年派使者去企图缓和关系。结果，日本人真的让葡萄牙"使节团的脑袋和其他人的脑袋不在一处"。日本武士还立了块碑："今后凡从葡萄牙来此海岸的所有人，不管其是否水手，不管其是否误入此地还是为风暴所驱使，都将受到同样的处罚。即使葡萄牙国王，或者释迦牟尼，甚或基督徒的上帝来了，他们也会受到同样的处罚。"

西班牙国大人多，直接登陆菲律宾，以马尼拉为中心，依靠武力和基督教，通过不懈努力，建立了对菲律宾的统治。

这两个国家都曾一再到中国试水，均未得逞。葡萄牙通过恳求和银两，获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西班牙跑到了台湾，后又被荷兰人打跑。

不久，荷兰人也进入亚洲，在四分五裂的印度尼西亚站稳了脚跟。当家做主之后，荷兰人也开始头脑发昏，打起中国的主意来。《剑桥中国明代史》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政治和商业决策集权化及远远超过葡萄牙的暴政带到亚洲水域……（1604年）8月，一中队荷兰海军停靠澎湖列岛……（1604年）10月份，（中国）海军官员



18世纪美洲殖民地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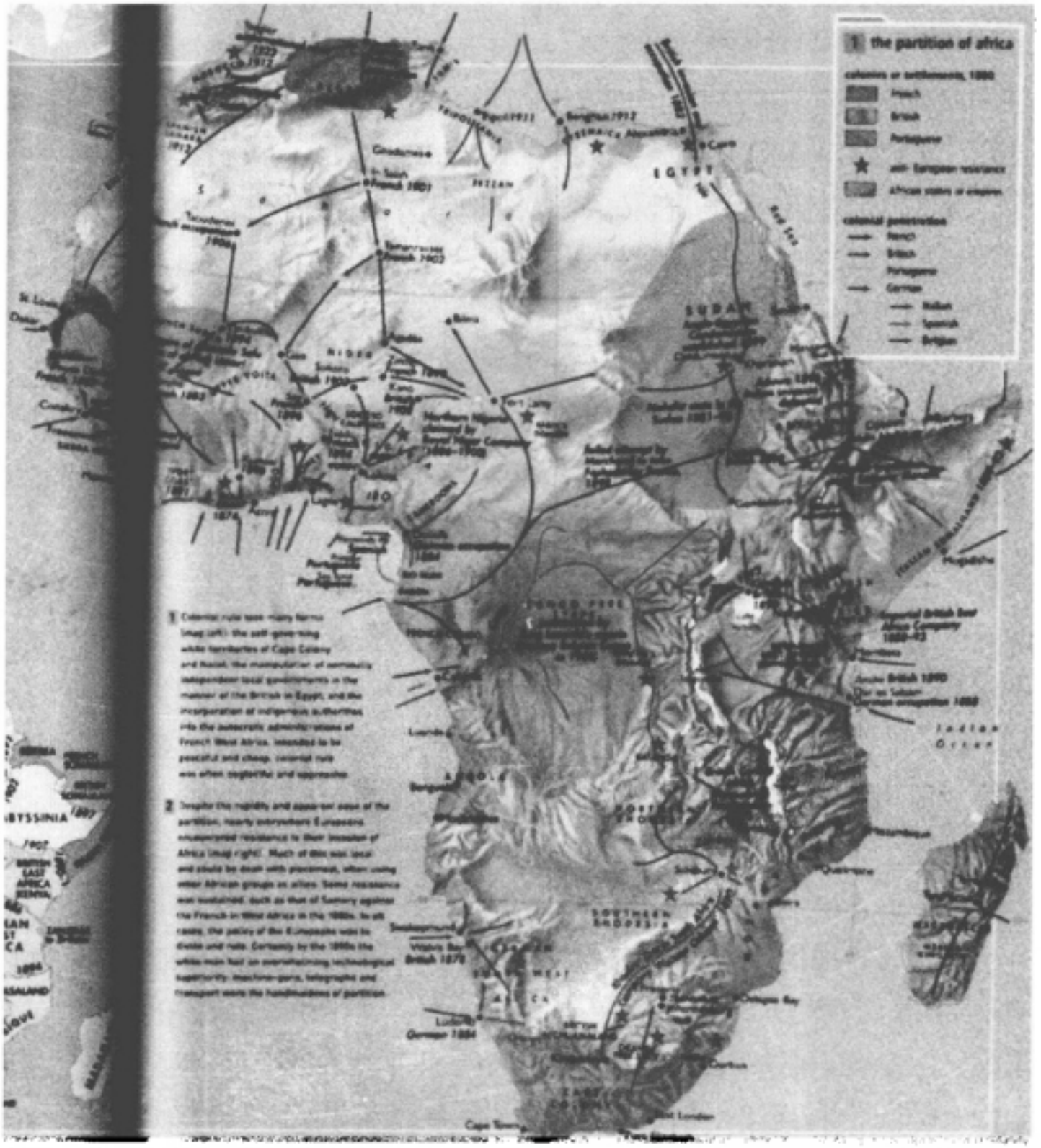
沈有容率领一支50艘作战帆船组成的舰队到来，告诉荷兰人，他们必须撤离澎湖，因为这是明朝领土……（荷兰人）最后只得放弃……1622年，荷兰人又恢复了对中国沿海的攻击……（1622年）7月，占领澎湖列岛……（1622年）10月、11月，荷兰人抢劫厦门附近地区的城镇，焚烧帆船，强迫中国俘虏修建澎湖岛上的堡垒，活下来的一些俘虏后来被船运到巴达维亚……1624年1月，荷兰船艇再次袭击厦门以南海面。

1624年2月初，（中国）载有5000多名士兵的40～50艘帆船在澎湖列岛北部集结。7月30日，这支部队向前推进，占领了除荷兰人堡垒所在地的主岛全部。此时，荷兰人的水源被切断，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谈判……1624年末，荷兰人全部从澎湖撤出，并开始在现在的台南地区立足……1642年8月，一支591人的荷兰军队攻占基隆城堡，由115名西班牙和155名菲律宾老弱士兵组成的防卫部队几乎没有进行多少抵抗……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所作所为惊人相似的是，荷兰人也对每个中国人征收人头税……1650年前后，公司从台湾得到的收入一半来自贸易利润，一半来自赋税、人头税及其他……1652年9月，上述种种紧张局势导致了郭怀一领导的武器简陋的大规模叛乱……（荷兰人）杀死了3000～4000叛乱的中国人……无论他们（荷兰人）怎样，都不能使他们抵挡住郑成功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于1661年4月30日在台湾登陆。郑成功的部队登上台湾时，几天之内荷兰对台湾绝大部分的统治即告结束……1662年2月1日，荷兰人投降了，允许他们有秩序地走出城堡撤离，而将积存的公司钱币、武器、货物留给郑成功。荷兰在台湾的出现，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向该岛移居的进程，但是，荷兰人居留太久，早就令中国人厌恶了。”

英国人不一样，专心经营印度，围绕孟买、马德拉和加尔各答三个“商站”，逐步深入。熬到18世纪中叶，机会终于来了，莫卧儿王朝没用了，马拉塔王国散伙了，印度散架了。1761年，在驱逐法国势力之后，东印度公司大显神威，什么“远交近攻”、“借力打力”之类的招数用遍了，终于，印度成了东印度公司的财产。英国政府眼睛放光了，1773年、1784年，英国议会决定：印度隶属于英国。英国政府似乎有点过河拆桥，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经营权也被取缔了。1849年，英国占领整个印度。英国在印度直接捞走多少银子？仅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它通过收税和抢劫，在印度榨取了10亿英镑。英国在印度抢走了多少宝贝？反正要想深入研究印度历史和文化，必须到英国去查资料。英国给印度带来了什么？1769～1770年，孟加拉大面积饥荒，1000万人饿死；1901年，印度再次大饥荒，400万人饿死。英国给印度留下了什么？至今印度次大陆上空仍仇恨连天、战云密布。

印度的财富被搜刮殆尽了，英国又将目光聚焦中国，法国随后跟进。在此过程中，也是中国不幸中的万幸，欧洲又有德国、意大利两个国家脱颖而出，美国也处处表现出雄起，亚洲还崛起了倭寇，这个世界再也不是“英法联军”独有的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时而密会合作，时而相互拆台，这里成了海盗们集中表演的大舞台。尽管他们把中国大地大卸八块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谁也不敢出兵实施全面占领。

在瓜分中国的同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唯一的“无主”地——非洲。鉴于矛盾重重、剑拔弩张的局面，谁都担心擦枪走火。1884年11月15日，在德国的主持下，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等欧美15国在柏林开会，经过三个多月的争吵，终于在1885年2月26日达成了《柏林会议总议定书》：“任何国家，如在其现有属地以外，今后再占领非洲大陆沿海的一块土地，或过去尚无此等属地，而今后将进行占领之任何国家，以及在非洲大陆已领有被保护国之国家，均应在进行占领时，分别通知本议定书之其他缔约国，以便彼等在必要时得以提出彼等之权利主张。”此后不到20年时间，



19世纪非洲殖民地地图

整个非洲大陆，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之外，被彻底瓜分。

欧洲人在非洲的所作所为，美国作家斯塔尔在《刚果真相》中讲述了自己的“游记”：**“凡是在白种人因贪求黄金而跟‘劣等民族’接触的地方，那里便发生种种残暴罪行。**白种人向来就是在那里从事剥削别人的，他们认为，白种人生来就是为着剥削的。如果我们要寻找凶暴、残忍，以及一切可怕的虐待行为，那我们几乎在黑非洲的每个地区都可以发现。这些行为出现于法属刚果、德属非洲、尼日利亚，甚至在乌干达。倘若我们一定要寻找这种行为，那我们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发现迫害、掠夺、杀人越货的勾当。在法国属地中，我们的的确确见到处死一位土著黑人的无比残暴的行为。只要我们有意去寻找这种行为，我们便可以写成一本惨绝人寰的英国人在非洲的罪恶史，但这是没有必要的……白种人每到一地，他们就劫掠、破坏、灭绝人口。”正是这部著作，揭露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统治下，1885至1908年间，比属刚果人口从2000万减少到了1000万！

到20世纪初，英国拥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世界人口的1/4，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法国的殖民地也多达1234万平方公里，在这场海盗“文明”中赚了个盆满钵满。

后起之秀们对此早就不耐烦了。

美国人早就警告欧洲不得干预西半球，因为那儿是美国人的地盘。但是，美国人绝不困守美洲，1895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亨利·卡波特·洛奇宣称：“商业跟随国旗。我们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足以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保护美国人民，并使我们的海岸免遭有效的攻击。”话音未落，美国吞并夏威夷，接着向西班牙开炮，随即占领菲律宾。

1897年，德国外交部长标洛就在议会宣称：“各民族在争夺统治大有前途的地区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把德意志排斥在外。德意志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外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天空，可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年，在侵略中国的德国舰队出发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给官兵们作出重要指示：“应该让每一个在那里的欧洲人，让德国的商人，尤其是要让我们可能驻在的土地上的外国人，以及我们要同其打交道的外国人，全都明了：德意志的米迦勒已经在那块土地上牢固地竖起装饰着帝国之鹰的盾牌，要断然地保护那些请求保护的人。”

英法不会因为别人牢骚满腹，就让出到嘴的肥肉。为了重新分配“大有前途的地

区”的统治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一战，是最值得中国人深思的。

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老大帝国都参战了。中国加入了英国阵营，后来进入了战胜国俱乐部；因为不堪英法蹂躏，土耳其站到德国一边，当上了战败国。虽然所处的阵营是敌对的，而战后，列强给予两国的命运完全一样。

在惩办战败国时，列强打算按既定计划彻底瓜分土耳其。过黑的方案，导致土耳其爆发革命，全国上下准备拼死一搏，并出兵将侵入土耳其的希腊军队赶下大海。早已全身伤痕的战胜国们害怕了，不敢去土耳其捡果实了，也就保全某些地区“独立”的既有成果了事。

中国的北洋政府一定十分庆幸站队正确，前往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一定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进入战胜国俱乐部。然而，代表们面对的是：中国也是被瓜分的对象，曾经的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英法美等列强竟然无耻之极地要转交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巴黎和会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一战的另一个成果是建立了“国际联盟”——二战前的“联合国”。《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所定之规约而从事战争者，则据此事实，应即视为对于联盟所有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禁止其他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之各种往来，并阻止其他任何一国，不论为联盟会员国或非联盟会员国之人民与该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之往来。”我们不妨翻开历史看看：自“9·18”事变到日本袭击珍珠港，西方列强中有谁将日本侵华视为对自己的战争行为了？

在信奉丛林法则的时代，骨气加武力，才是唯一的真理。当我们探讨五四运动时，也该跟难兄难弟土耳其通个电话，聊一聊对丛林法则的体会。

中国的海洋文明

欧洲有地中海、波罗的海、黑海等内海，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洞庭湖、鄱阳湖等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长江、黄河等巨龙般的河流。我们祖先爱水并在水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并不奇怪。

早在春秋时期，也就是希腊古典文明早期，中国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之间，就没完没了地展开了水上大战。各国有自己的船厂：“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也建有自己的军港：“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兵也，去县四十里。”舟师是

国家的主力军种之一，“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斧者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之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据《左传》、《国语》记载，吴、越、楚、齐等国之间，水战频繁且惨烈。

姑且不谈徐福海上取仙药、秦始皇弯弓射大鱼的故事，我们祖先广泛使用船舶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两条运河：吴国为称霸中原，修建了连通南北的邗沟；秦军取两广建造灵渠，打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古代中国，有河流的地方自不必说，没河的地方便挖出人工河，船运是最主要交通手段，乘船几乎可以驶达内地每个角落。中国的著名城市，无不临江、临海、临湖。

汉朝船舶载重量一般在二三十吨，活跃于国内，往返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开辟出了海上丝绸之路。汉承秦制，保有“楼船士”这一专业兵种，多次承担海上远征任务。

六朝时期，已建立起与东南亚地区密切海上贸易往来，经贸联系直达印度。西天取经的法显在斯里兰卡见到了中国的绢扇，思乡之情顿生，和西天取经的昙无竭、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等人一样，搭乘商船自印度到达中国。

及至唐朝，中国海岸线呈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吴门持粟帛，汛海凌蓬莱”的繁忙景象。唐朝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已发展成为国际性商贸港口。政府任由外国人自由行走于中国各地，接纳外国人侨居、定居，选拔不少“胡人”为官，确有才华者还当上了大官。首都长安是地道的国际化都市，胡人摩肩接踵，游览长安无异于参观一场世界食品和服装博览会。

唐人商船远航至印度洋沿岸。进出中国的洋人，多是搭乘中国商船。汤普逊说：“进入远东的真正大门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海上……波斯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早已存在。在巴士拉港口，常见从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锡兰和印度的马拉巴沿海而来的帆船。但是，如果中国帆船能冒险航行这么长距离的海路，阿拉伯帆船当然也能这样航行的。”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在玄奘西游之后过了不长时间，阿拉伯人即将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经常性和持续的关系。因此，在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从未长时间的完全断绝过。从公元7世纪起，一批穆斯林探险家便进入中国……我们甚至应当承认，中国人为使阿拉伯人学会向远东航行而作出了贡献，波斯湾的商人是乘

他们的帆船而在南海从事最早的几次远航……唐代仅在广州市就生活着10万名阿拉伯人……《中国印度见闻录》（这时期一名阿拉伯商人撰写的游记——笔者注）向我们提供了唐代中国的一种无疑是简单而又是忠实的形象。环地中海民族首次听到讲述瓷器和茶叶……他们接着再次证明最高的文雅、文明、智慧和最后的真正的哲学都在中国人一方。”

海盗也活跃于中国沿海地区。据《资治通鉴》记载，既有官方性质的海盗：开元二十年（732年），“渤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也有纯粹的海盗：天宝三载，“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州）、明（州），命河南尹裴敦复将兵讨之……夏，四月，裴敦复破吴令光，擒之”。据说，吴令光手下人马多达数百。如果在欧洲，只要吴令光承诺不再打劫本国，就可成为国王座上宾，国王甚至会成为其股东。但在中国，吴令光只有一个下场：杀无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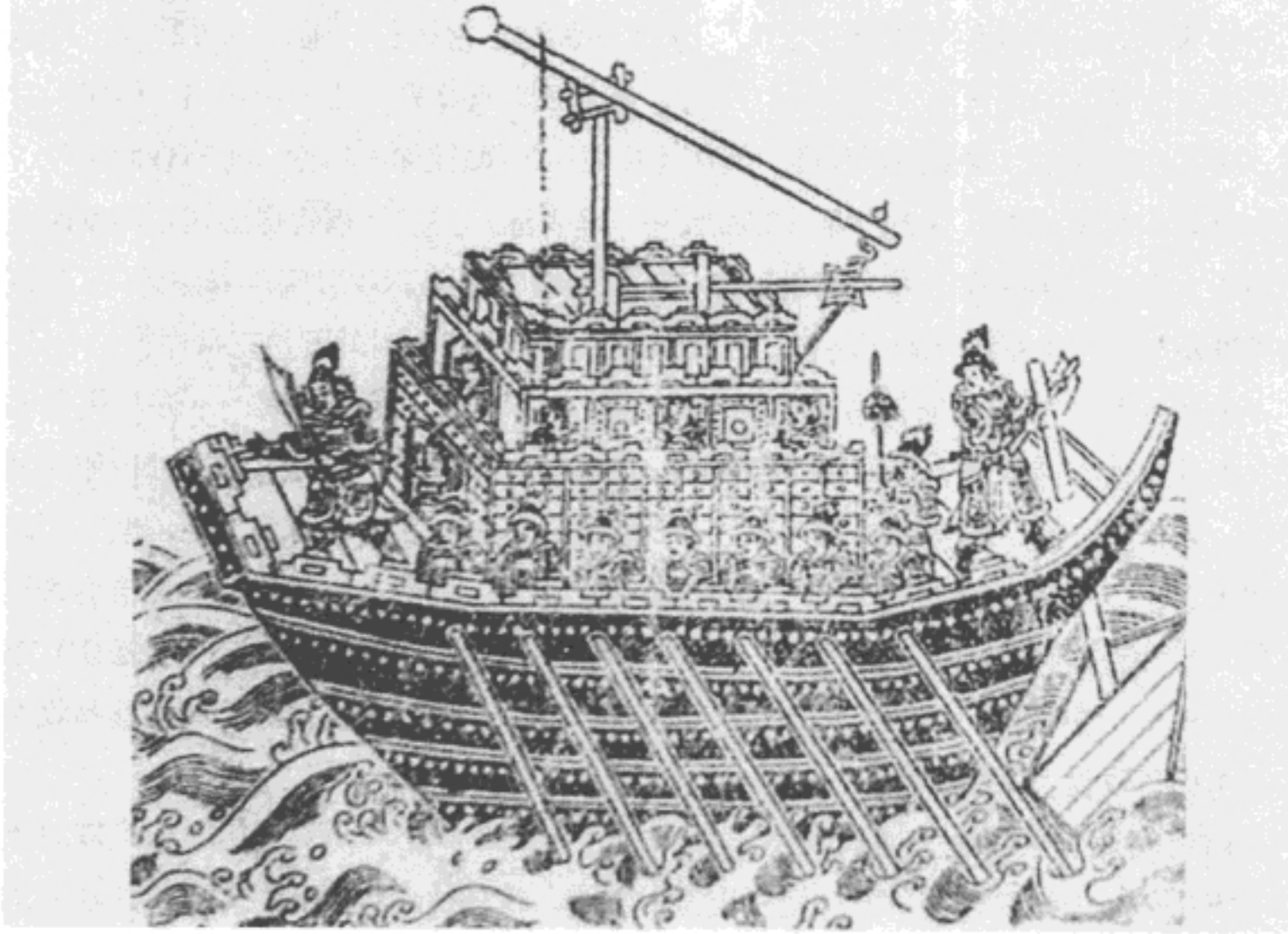
唐朝军事实力也反映在海上。据《剑桥中国隋唐史》记载：“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5年春，（唐）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　直趋辽东，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叫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暂地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到了宋朝，中国海员驾驶的船只由铁钉钉制，涂抹着防水油料，配备有水密舱壁，由帆布和竹子制成的风帆来制动，用舵导航，靠带磁罗盘的指南针辨别方向。”《新全球史》则记载：“中国的船只主要往返于日本和马来半岛，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船只冒险进入印度洋，并造访印度、锡兰、波斯和东非沿岸的港口城市。这些长途旅行有助于传播中国的航海技术，尤其是使指南针很快成为印度洋沿岸海员的共同财富。”

宋朝发达的海运，源于造船业的进步，也拉动着相关技术的发展。据记载，唐人李皋设计制造了轮船的祖师爷车船，发展到宋朝，已可建造出适应各种环境、满足各种特定需求的船舶，出现了福船、沙船、广船三大船型，还发明了船尾舵、水密舱，在帆、桅等装置上有很大改进，大大提升了船舶的续航能力和航海的安全性。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的一艘宋朝沉船，排水量370吨，远大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

的船只。这尚属中型海舶。

宋元的航海不是瞎打误撞。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一书指出，北宋以前，绘制海图是很重要的，“如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所说：‘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作为航海指南”，但是，“指南针的应用不仅可以指引航向，而且可以测定船舶在海中所处的经度……因为这些航线是依靠指南针测得的，所以又叫‘针路’，记载针路的手册叫‘针经’、‘针谱’。元代时，已经有了这样的手册。针经中一般都写明由何地开船，取何航向、航程多少以及船至某地等内容”。至此，人们在海上的活动空间大大拓展。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了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宋朝沿海民间出海经商风气极盛，不仅出洋经商、侨居海外者众多，外商来华、侨居中国者常见，而且市舶司（政府）对出海经商活动的管理也很细致，航海水平之高更是让人惊叹。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记载其广州亲历时说道：



宋朝时的战船

“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人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触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住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海上贸易给宋朝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财政收入，“崇宁置提举，九年之间，收置一千万矣”。据陈振《宋史》说：“北宋末年政府每年从税收和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利达一百多万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时统计，每年‘抽解’与‘和买’所得的税收及利润‘约可得二百万缗’”。

在宋代，沿海海盗也很猖獗。为了保证外贸的正常进行，港口城市的地方官很重视海上治安。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著名学者真德秀出任泉州知州，他组织官军、民兵进剿海盗，残余海匪南逃。他甚为忧虑：“今贼徒深人广南，正当舶回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岂不亏失国课（即税收——笔者注）。”“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闽广异路为限。”真德秀准备与广东水军联合剿灭海盗，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对外贸易正常进行。

利国利民之事，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宋太宗说：“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北宋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杭州、交州等地设置市舶管理机构（行政管理和税务征收机关）。南宋又增设温州、江阴和华亭（今上海松江）市舶管理机构。在宋朝，市舶司长官不仅级别高，而且直属于中央政府，海外贸易收益纳入中央财政收入体系管理。

航海发达，水战也演变为主要作战形式之一。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双方水师不断在江河湖海展开厮杀。“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在诗人陆游笔下，楼船与铁马已相提并论。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南下，皇帝赵构逃到明州

时，枢密院提领海船（大致相当于海军司令）张公裕报告说，为了皇上乘船南逃，现已征集并到达宁波的海船上千艘，其中来自福建的大船就有200多艘，广东转运使征募的海船先行到达。赵构在海上漂荡了5个月之久，直到张公裕率海军击败金军，韩世忠的海军再败金军，金军北撤之后，赵构才上岸。宋朝海上综合反应能力之强大，绝非虚夸。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出动战舰百余艘，千里奔袭金国在山东的水师，以火箭将其消灭，使金国海上南侵计划流产。南宋军队在对元军作最后抵抗时，海军力量成了最大的依靠。1279年，宋廷覆亡于广州附近时的最后一战，也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当时，宋军仍然拥有舰船数百，水军数万。此次海战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元朝政府基本保持宋朝以来的市舶管理机构。据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记载，中国的港口帆樯如云，商贸之兴盛举世无双。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见：印度“这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要想到中国，唯有乘坐中国船只，仅在古里佛（今加尔各答）就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商船，其中较大者有3～12帆，船员千名，每艘大船另配有3艘供应船，这样的船只唯有中国的泉州、广州能够制造。

元朝依托无与伦比的造船能力、远洋航行能力和军事力量，先后组织四次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分别于1274年出动战船900艘兵士1.5万人、1281年出动战船9000艘兵士10万人征讨日本；1280年出动战船100艘兵士5000人征讨占城（今越南南部）；1292年出动战船1000艘兵士2万人征讨爪哇。这里，我要套用汤普逊评价“地理大发现”时一句话：“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

“海洋文明”与“怀柔来远”

中国的国运因为来自于海上的敌人而改变，今天的中国人对海洋既爱又恨，念念不忘，确在情理之中。

明朝以前，在海洋上最活跃的是中国商人，唯中国拥有最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

明初，出于剿灭方国珍等海上势力的军事需要，朱元璋严禁百姓因私出海。不久之后的明成祖朱棣，也许是出于剿灭建文帝朱允炆势力的政治需要，继续推行海禁，“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从此，兴旺千年的海上贸易传统被阻断。明朝中后期曾经开禁并一度发达，但随着清朝再度“海禁”而归于彻底沉寂。

朱元璋并非不知道海军的重要性。朱元璋与陈友谅决定性的一仗，就是在鄱阳湖上打的，这一仗注定了龙椅的主人非他莫属。在夺取东南沿海地区时，他的海军便发挥了重大作用。实施海禁，他最初只是为了防止百姓以经商为名支援叛军，丝毫没有妨碍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对周边各国的军事威慑。为了防止海盗袭扰，他在沿海各地添造战船，加强戍兵，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在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沿海守军主动进击，剿捕海寇，平靖海疆。大明继承了宋元重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传统，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远洋作战能力持续加强，不仅船越造越大，而且建立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舰队。郑和率舰队七次远航，所到之处，扫平航线上的海盗，轻松铲除不归服明朝中央的小王朝，其舰队规模之大、航行距离之远、导航和动力技术之先进、作战和后勤补给能力之强，显示出明朝海军独步天下的不二实力。

中外专家对郑和下西洋给予高度评价。在我看来，将郑和舰队与哥伦布船队进行比较，都是毫无意义的。慈善家手中的枪，抢劫犯手中的枪，二者有可比性么？

如果郑和舰队“发现”了美洲大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不嗜征服的民族。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怀柔以来远，以德治国，以仁政赢得邻邦的尊重，以仁德与邻邦和谐相处，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思想。

在陆地上，中国早就“发现”了朝鲜、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海上，中国早就“发现”了日本、暹罗、爪哇、马六甲，并且沿着印度洋，一直“发现”到了非洲东海岸。中国一直远远强于他们，但始终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对于唇齿相依的周边邻国，一般是实施“羁縻”政策，通过建立朝贡关系予以笼络。邻国之间发生矛盾，中国会出面调解，以确保边疆的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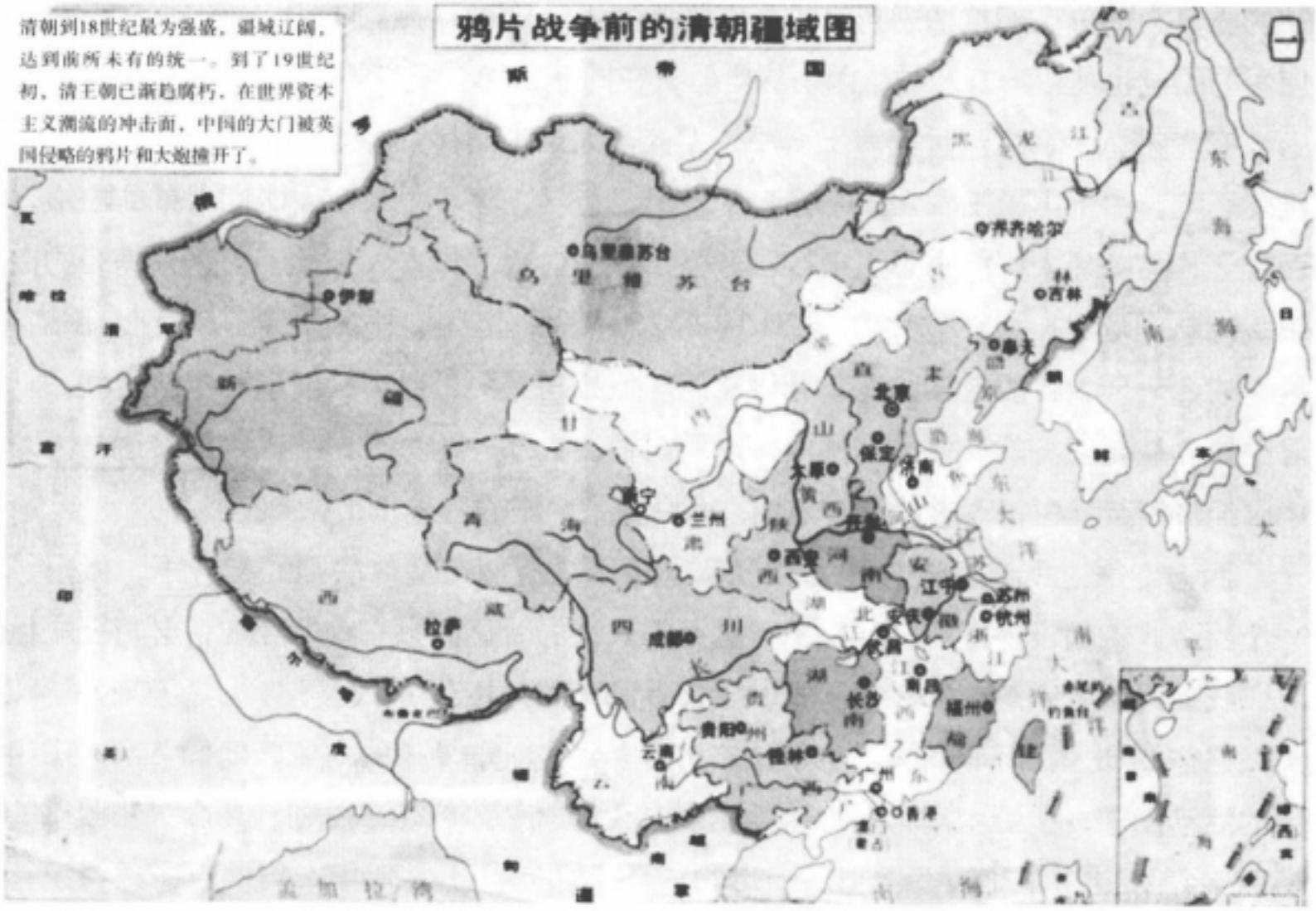
无疑，如果郑和舰队到了美洲，唯一的可能性，是建立双方的官方往来，随后出现民间的文化、商贸频繁交流，从而使印第安人迅速赶上欧亚大陆的发展步伐。

西方专家一直疑惑：中国何以在郑和之后主动退出海洋？

郑和舰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巡航，使明廷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海上是平静的。当此之时，正是“仁宣之治”时代。仁宣二帝及其辅政之“三杨”，仰仗明成祖的文治武功之余威，力求与民休息。宣德五年，因为鞑靼屡次进犯开平，宣宗下令将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岗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永乐年间重新纳入中国版图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也予以放弃。连对手都没有的海军，更是没有存在之必要。

其实，中国撤出印度洋和南中海的，仅仅是海军，中国商人从未离开这里。今天我们将东南亚视为外国，而明朝中期以前的中国人，最多认为这里是中国的边远之地。明朝中后期，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已在此定居或经商。据《明史·吕宋传》记载，仅福建省移居吕宋者就多达几万人。在欧洲海盗们“全球航行”发现这个发现那个的时候，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十分活跃，定居海外的人口数量远多于欧洲“移民”，而且形成了一股股不小的民间武装力量。

《剑桥中国明代史》从多方面证实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地图

“中国人早已在一个穆斯林国王赐给他们的地方定居了，该地横跨从马尼拉流来的帕西格河，大体上在比龙多地区，那里从当时至今，一直是中国人人来人往居住的中心。”

“中国与吕宋的贸易资料可以在西班牙首次航行到这一群岛的记录中找到，麦哲伦1521年的记录、罗阿萨1527年的记录，都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在马尼拉居住及贸易的中国人的数目，从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约1万人，1603年达到3万人。”

“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证据显示，在墨西哥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社区。其他中国人经过穿越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矿中心。”

造船和航海技术，明朝也处于领先地位。《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及明代水运时赞叹道：“仅仅船的种类就证实了明代对船的设计的高超水平”。杰克·戈德斯通说：“除了先进的航海技术，亚洲各国还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和先进的船尾柱舵轮、水密隔舱和大三角帆等远洋航海方面的重要技术。19世纪时，印度洋和中国海面上行驶的船只大部分是阿拉伯三角帆船和中国式的平底帆船。甚至许多欧洲的贸易公司所使用的船只也是亚洲制造的，因为这些船只在同等价格下质量更好。”

有专家认为，这一时期海上贸易，尤其是大量银元存留中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工农业水平领先于世界，每年，除了中国商人赚回大量的白银，西班牙、葡萄牙人都给中国送来数以万公斤计的白银，日本人也动不动送来满船的白银。《新全球史》说：“1565～1815年的250年中，坚固、快捷、装备精良而且载货量大的西班牙大帆船定期往返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尔科之间，从马尼拉满载着亚洲的奢侈品到墨西哥交换白银。大部分的贵金属流入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繁荣，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加，而白银是中国的基础货币。”

西方专家之所以高度关注郑和舰队，是因为他们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做出了一个西方式的假设：郑和舰队是不可抗拒的武装力量，如果它继续存在，必将征服世界。我们对明宣宗解散郑和舰队耿耿于怀，则是因为不久之后达·伽马之流来到了亚洲。这些欧洲人，既非商人，也不是旅游者，而是一群地道的海盗。他们首次走出自己的活动圈子，便野生动物般地恃强凌弱，大肆屠杀、掠夺、占领。高鼻梁灰眼珠的蛮夷跑到这里胡作非为，优越感十足的华夏子孙自然不服，华人华侨曾多次组织起来，民间武装力量也行动起来。《新全球史》也说：“马尼拉的中国商人最为著名。

他们在城市中有特别的商业区域；到了17世纪中期，马尼拉的42000人口中，有1/10是中国商人。他们给西班牙商人供应丝绸，然后这些丝绸就被装在大帆船中运往墨西哥，这种大帆船也因此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中国商人的成功引来了嫉妒。心怀怨恨的西班牙和菲律宾居民在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1762年以及1819年发生的六次大规模暴力冲突中，屠杀了上千名中国商人。”仅1603年即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军队就屠杀菲律宾华侨25000余人！本来，这些大鼻子非常害怕明朝政府进行武装干预，遗憾的是，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且困于辽东战事，西班牙人确认明朝政府无暇关心化外之事后，才大开杀戒。

关于清朝，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清朝拒绝“对外贸易”，搞“闭关锁国”。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说鸦片战争是为了逼迫中国开放海禁，为了与中国通商，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通商”角度看，清朝从未实施过的“闭关锁国”。清朝初年闭关二三十年，完全是因为战争需要。平定台湾之后，康熙24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可以说，几乎开放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对外贸易。自此，海关制代替市舶司制。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其中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22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　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中国陆地边疆，如新疆的六城地区、蒙古高原的恰克图，因为清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外贸易也很活跃。“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仅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价值达120万两。比尔德夫妇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中说：“在以1840年为止的10年间，单是美国对华贸易一项，就达到了7500万美元，这个数字比汉密尔顿时代胆小的人认为国家绝对无力偿还的美洲革命时期债务的总数还要大。”由于欧美产品质量低劣，中国商品质优价廉，中国始终处于出超之中，鸦片战争前140年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几亿两之多，以致限制采矿的清朝，白银变成了通用货币。

与西欧不同，清政府将政治和商业分得很清。清政府只管收税，将海上贸易业务完全交给“十三行”负责，用西方的说法，可算作“特许”，说“十三行”垄断是可以的。而全英国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国做生意，唯有找英国“东印度公司”，别无分店。也可以说“十三行”腐败。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个繁荣的印度任其肆意搜刮，竟然连年亏损；公司连年亏损，股东们依然连年索要巨额分红。尽管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国独立的乱子，但是这家海盗公司依旧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

如果和阿拉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一样，大家都是纯正的商人，清政府的外贸政策没有任何问题。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亚洲几千年来和平的、自由的、买卖公平的经商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仗剑经商：打不赢就“商”，打得赢就强买强卖、屠杀、抢掠、占领。

明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清朝也始终没有发现这一主导地球的“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1795年，英王乔治三世写信给乾隆帝，提出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之类的无理要求。乾隆帝也以为英夷来访是为了经商赚钱，还正儿八经地做出了“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之类的答复。

“亚洲大陆的强大势力印度莫卧儿王朝和中国明朝的统治者并不介意是谁在从事沿海贸易活动，只要税收和贸易商品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到内地就可以了。”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道：“这一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洋人在南亚、东南亚胡乱开枪开炮，大清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危机感。“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

世道变了，枪炮才是硬道理。

“海洋文明”带给中国什么

鸦片战争前的400年间，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只要与中国做正经生意，欧洲人从来是只赔不赚。2000多年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太发达了。

中国地盘大、人口多，直到18世纪，欧洲海盗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中国。更重要的，中国不是原始的美洲，也不是土邦主导的印度大陆，而是文化一统、政体一体

的铁板江山。即便北洋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张作霖、吴佩孚、段祺瑞等人都是誓死不当汉奸的汉子，列强依旧圆不了真正瓜分中国的梦。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从1492年到1900年，欧洲人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他们到达美洲、澳洲，土著几近灭绝；他们到达非洲，黑人差点被卖光；他们到达亚洲、北非，在抢光值钱的东西后，这里成了为他们储藏物资的仓库。

霸占香港之后，海盗们从未停止过占领中国的梦想，英国法国在南方、俄国在西方北方“探险”，耍流氓。对于暂时无法彻底征服的中国，他们使出了全部招数：传教、贩毒、抢劫、勒索赎金、武装占领。

今天，“哈洋族”正在扯开嗓门大骂义和团“愚昧”、“野蛮”。但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他们（指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说是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欧洲人的过错。”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科罗斯托维茨详细记述了八国海盗的行为：



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时局图

占领天津后，“银行和钱庄被洗劫一空……哪怕只有一点价值的东西，远征军也准备运走。负责征收盐税的盐道金库被日本人没收了。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官员随处可见”。

杀入北京后，“北京的图书宝库翰林院只留下一堆堆瓦砾，而中国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了（联军）篝火的引火物……日本军事长官入城以后，马上没收了中国金库的

银子。总之，日本人全部行动的特点是计划性很强……似乎连外交官们也喜欢干这类勾当，他们搜集了相当珍贵的收藏品。有人告诉我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名字，但我姑隐其名。其实，我已听说，有些人是带着科学目的而为博物馆进行搜集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剥夺方式：把抢来的全部东西登记造册，在英使馆当众拍卖光，卖的钱由士兵们均分。有一天，我来到这个拍卖场所，几乎外交团全部人员和很多军官都在场”。

闯入皇宫后，“放御宝、玉玺、勋章、外国君主赠品等物的房间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匣子扔了一地。我发现同伴们的衣袋都明显地鼓了起来，怪不得虽然天炎热，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却穿上了大衣和斗篷”。

海盗们通过白河，将抢劫物资运往天津，再海运回国。“河上满载着军用物资的船只来往十分频繁，有苦力拉着纤吃力地移动着。华人很不愿干这个活，一眼注意不到，他们就丢下船不管，逃跑了。士兵们把他们捉回来，强迫他们再拉。有几个企图逃跑的船夫被枪杀。我目睹了，那真是相当残忍的场面。”

海盗们向北京周边侵略，沙俄司令指令下属：占据铁路，“至于开平煤矿，虽属私人公司所有，条件稍有不同，但我认为这些矿山像属于中国和中国商人的财产一样，也可以占领”。

撤往天津后，“联军肆无忌惮地抢占中国人及欧洲人丢弃的房屋地产”，原来没有设租界的，“占了租界之后，比利时人马上沿着我们地段南边的界线埋他们的桩子，一直到铁路边上”。已有租界的，比如“这时，在法租界的边界上，开始清除废墟，以便在中国郊区范围内新辟一些街道。法国总领事解释说，多占点中国地段的打算，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郊区住过破坏租界的义和团。他认为扩张租界的最有利时机到来了，并用中国暴徒的行为来为自己辩解”。

所作所为与十字军荼毒拜占庭毫无二致！700年过去了，欧洲人道德水准没有半点进化！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爵士对该书作者说：“我预料，联军的讨伐，尤其是准许抢劫将使我们更加威信扫地。”

“哈洋族”大骂义和团，赫德爵士若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仅仅贩毒、抢劫，还不是完满的海盗。索马里海盗的主要收入是绑票，西方海盗也是如此。西班牙人在美洲绑架印第安人的皇帝，就发了大财。他们以战争绑架清政府，更是索取了天文数字般的赎金。

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琉球事件、马

嘉理事件、伊犁事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拉萨事件等8次战争赔款，中国累计支付赔款达13亿两白银，是清廷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的13倍！

13亿两白银，在当时可以做多少事情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些数据：

如果用来办工业：湖北兵工厂，创办费220万两白银，采用德国最新式设备和技术，能生产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汉阳铁厂，耗银500余万两；江南制造总局，耗银54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天津机器局，耗银22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甚至造过潜艇；福州船政局，包括6年时间生产15条舰船和福州船政学堂办学费用，耗银535万两；开平煤矿，耗银80万两，1895年产煤25万吨。这些在当时颇具水平和规模的企业，总投资不过1200万两白银。

如果用来办军队：北洋水师从创办到覆灭的20年时间，购买全部舰船、火炮等军事装备总费用800万两，其他日常运行累计支出不足900万两，合计1700万两。这就是说，仅用赔款的1/10，可以创办7个北洋水师，并确保舰队的训练和装备的不断更新。

如果用来打仗：1875年3月，左宗棠正式着手筹备收复新疆事宜，组织训练了约7万人大军后，1876年6月正式出兵，长驱数千里，到1877年11月战争全面结束，耗资800万两白银，其中还包括创办兰州机器局的经费。这一仗，确保了我国对新疆的主权。

国土、金银珠宝、矿产……西方列强到底从我国掠夺了价值几何的财富？不知道。

生命、文物、建筑、国防设施……西方列强到底毁灭了价值几何的财富？不知道。

百年来，到底有多少中国少儿因战争与掠夺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不知道。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000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476982000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又相当于1895至1913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

海盗文明，几乎抽干了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鲜血。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仅在1779年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据《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中国人口约4.3亿。这就是说，此后60年里，中国人口没有增长！

“海洋文明”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怀柔”——讲道德讲道理的时代过去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讲武力讲强权才是唯一出路。

圖局時



第5章

商業文明——端着刀枪做生意

儒家重农也重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了这么一个写入教科书的“定论”：儒家学说重农抑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有人进一步发挥：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摒弃儒家学说。

了解儒家经济学，必须从汉朝入手。汉朝，是儒家治国的试验田。

自汉武帝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历代政府经世治国的法宝，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很巧，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史记》，专列一章“货殖列传”，追记了此前的名商大贾，实录了当时的工商状况，引用先贤言论论证了工商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司马迁是不是儒家？不知道。至少，说汉武帝抑商纯属乱弹琴。“哈洋族”若想证明汉朝重农抑商，首先必须封闭由汉朝打通、被西方命名的“丝绸之路”这条商道。

发生在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的著名的“盐铁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大讨论。朝廷召集全国数十名儒学大师进京，与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问题。学者们根据儒家思想，宣称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官营盐铁是“与商贾争市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以实现“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广利农业”。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做好服务，政府从商人口中夺食是不道德的，也不得干预工商业，让工商业自由发展，以藏富于民。这场讨论，使小政府、大社会、低税率，政府和官员不与民争利，成为历代朝廷治国的信条。此后2000年，历朝政府很少干预工商业活动，尽量创造良好的治安、交通、交易条件，商税税率也很低。

《剑桥中国秦汉史》说：汉朝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便将市场纳入统筹考虑，并重视市场管理，改善道路交通，努力做好服务工作，“这一时期的商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城市市场商店里的坐贾，一是流动于城市之间和到外国的行商。”“后汉时期管理洛阳市场的市长的工作人员由36名不同名称的官员组成，他们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业税。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查制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政府“竭力维护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商业为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仅“前汉时期临淄的商业税年达黄金千斤或铜钱百万”。

汉朝城市经济繁荣，“汉代大城市就是从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地方：在现在陕西的首都长安，在现在河北的涿、蓟、邯郸，河南的荥阳、宛、洛阳，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今广州城附近的番禺等。城镇的总数肯定有1500个或更多（至少每个县有一个镇）”。“洛阳为后汉首都时的人口总数据估计有50万左右”。

汉朝制造业发达，“前汉前期的另一个大规模私营工业是制盐，据说一个制盐户为此而拥有1000名流民。另一个私人制造业是纺织。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一个大官张安世的妻子据说雇用700个家务奴隶进行纺织”。

汉朝工商业处于世界优势地位，输出的是工业制品，输入的是原材料和硬通货。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中国主要出口丝织品，也出口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石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来自罗马诸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新全球史》说：“特别是在汉朝，政治稳定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较高的农业产出，支撑了冶铁和丝绸业的发展，中国的产品在中亚、印度和波斯帝国，甚至在地中海地区，都非常畅销。”《剑桥中国秦汉史》证实：“公元前111年，武帝征服南粤以后，南海的贸易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和印度洋，这些国家以珠、玉、天青石、玻璃等物换取中国的黄金和丝织品。”

汉朝的大商人多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贤者所以富者”，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司马相如是汉朝的大文豪，卓文君的父亲便是当时的大商人。司马迁说他“富至僮千人”，“拟于人君”。富家千金卓文君，因精通诗文音律而成为司马相如的知音。千年后的徽商、晋商以诗礼传家，经商不忘读书，是所谓儒商，即源于此。

“历史学家估计，公元前220年，即秦朝刚刚建立不久，中国人口大约2000万，

到公元9年，即西汉末年，人口增长了三倍，达到6000万。同时，尽管征收的赋税只是生产的一小部分，但是帝国粮仓囤积的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有时白白的糟蹋掉了。”《新全球史》说。

宋朝：“成熟的资本主义”

“农业生产的提高，交通系统的改进，人口的增长，城市化以及手工业生产等多种因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新全球史》说，“贸易与城市化的发展使唐宋时期的中国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性的社会。商人取道海路和陆路前来中国从事贸易。来自阿拔斯帝国和中亚的穆斯林商人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恢复，与中国大的贸易中心连成一体。甚至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穿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一些大的城市如长安和洛阳的居民，对来自外国的商人一点儿也不陌生。事实上，在唐朝大型的国际都市里，来自波斯的乐师和舞者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与此同时，取道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马来半岛的船员，在富庶的南方港口城市——如广州和泉州——也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商业社区。当时的记载称，879年，起义军领袖黄巢在洗劫广州并对其实行恐怖统治的时候，屠杀了12万外国人。”

在中国，“8世纪后期和9世纪是商人阶级大展宏图的时代”，《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唐朝中央政府“把政治权力分散到各镇治所，这意味着许多这样的城市成了地区性大都会——有大批富裕官户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的大规模行政中心。同时，在财政方面又给了各镇新的自由，此举意味着该镇的岁入被就地使用而不是上缴京师。在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最后破坏之前，虽然人口超过100万的长安仍是唐代最大的城市——在这方面它又高居世界之首——和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心，但有几个镇的中心已发展成大城市。其中较为重要的为长江中游的成都、江陵以及扬州、广州和汴州（开封）。这些商业繁荣和行业俱全的大城市成了地区中心。小城镇和地方集市网络在它们的郊区发展起来，其中有些网络还涌现在地方军戍守的镇的周围。到9世纪，以地区市场体系为基础的各级新的定居地开始在现存的各级行政中心旁边出现，从而使城市发展的过程呈现崭新的面貌。”

“唐朝时期，帝国都城长安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约有居民200万。宋朝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新全球史》说，“在唐宋时期，许多中国城市都以拥有10万或更多的人口而自豪。”《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证实：“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

划而设计的，但可能最多只有50万居民。虽然它是世界上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万。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1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100万人口，但在12世纪初被宋朝放弃后就衰落了。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和路有人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年的统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册人口150万，附近的常州路100万，嘉兴（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到250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地发现有450多万人口。这些数字所表现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城市又多又大，宋朝建立了城市管理体制——厢坊制，并推广到县城一级。首都东京设有军厢、厢、坊三级，相当于今天的区、街道、居委会，每级机构配有专职官吏。根据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东京城区划设置、户籍状况资料可知，城内普通居民有97750户，城外居民数与之相当。生意做大了，宋朝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商业税务法规《商税例则》，规范国内贸易税收，将对外贸易的管辖权也收归中央统一管理。

长期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达，使宋朝“已产生了一个富裕、自觉并对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强烈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小资消费者众多。平心而论，宋朝小资的层次比当今要高得多，他们大都精通琴棋书画，情高趣雅；许多沦落风月场的女子，也能填词作画。当今火爆的所谓爱情词曲，至多是宋朝的等外品。宋朝的娱乐业也是大俗大雅，城市里的勾栏瓦舍融衣食住行、歌舞娱乐于一体，仅缺网聊、卡拉OK，许多小资终日泡在这虚拟的天堂，才高八斗者可享受免费吃住娱乐的VIP待遇，著名诗人柳永在这里过足了小资瘾，写出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佳作。

《清明上河图》画出了北宋首都东京的繁荣景象，《东京梦华录》又以文字有所记载。想宵夜吗？带你去其中一个：“马行街铺席：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　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燠物、石逢巴

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

到小区里逛一逛，你会发现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皆可圈可点。《东京梦华录》介绍道：“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幅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见军铺收领到鬪争公事，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借动使，戏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若，次日取之。”

唐宋人的生活好，是因为他们能赚钱会赚钱。“唐宋时期，中国大量出口瓷器。考古学家在整个后古典时代商业网罗的遗址上，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瓷器：中国瓷器出口到东南亚、印度、波斯和东非各港口城市，使许多富有人家的餐桌熠熠生辉。唐宋时期的瓷器产品赢得如此高的声誉，以至于精美的瓷器通常被称作‘中国器具’。唐宋时期的工匠们还改进了冶金技术……同瓷器生产技术一样，冶金术很快流传至中国境外。”《新全球史》说：“在中亚、东南亚、印度、波斯和东非各港口城市，富商和统治者身着中国丝绸，餐桌上摆放着中国瓷器，中国经济在唐宋时期的快速增长，就这样促进了整个东半球大部分地区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当时，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

唐宋商人能赚钱，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有一胡人上书唐玄宗，说“海南”有许多“珠翠奇宝”，倒卖可赚大钱。唐玄宗动了心思，准备派大臣杨范臣去干这事。杨范臣对曰：“这与民争利的事情，可不是朝廷该做的。”唐玄宗立即作罢。宋朝也是如此，禁止官员经商，从商人口中夺食。

“唐宋时期的贸易增长如此之迅速，以至于中国出现了作为市场交易手段的钱币——铜钱——的短缺。为缓解这一短缺，中国商人使用支兑业务来弥补铜钱的不

足，其结果是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唐朝初年，信用券也被广泛应用。”《新全球史》说。《剑桥中国隋唐史》证实：“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废弃了原始币制……这些事都交给银匠去做，他们开始发展原始形式的银行和信用制度。后来货币政策最重大变化——纸币的出现——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促成的。”及至宋朝，《新全球史》说：“到了11世纪，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当局均发行印制的纸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交子”、“会子”之类——现代纸币的祖师爷了。

有人说宋朝“积弱积贫”，宋朝一点儿也不穷。北宋中后期，仅货币性财政收入，一般都在6000万缗以上，约为唐代最高数的6倍半。南宋以半壁江山，财政收入“逮淳熙（1174～1190年）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据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元通史》记载，因为战争绵延，宋朝常备军120万人以上，军费开支经常占70%以上，但是，宋朝官员、将士的待遇优厚，在教育、医疗、灾民救济、公共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出手大方。直至元军攻占四川，才导致南宋财政崩溃。宋朝实行食盐专卖，有的盐井由政府经营，征召附近的男丁当工人，待遇是“岁给户钱四万，日夫给米二升”，也就是管吃管住，另外每年发给工人家庭四万钱。大多数时候，宋朝一斗米不足100钱，东京城闹市区一间房的月租100至200钱。就这，大家还嫌工资太低，想方设法逃避。

《剑桥中国隋唐史》说：“由于解除了这些束缚，再加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南方新土地的开发等刺激，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已经成熟了。”

不比不知道

统一度量衡是商业繁荣的基础。早在秦朝，我国就完成了全国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而欧洲各国全面完成国内的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是19世纪的事情。18世纪，在法国走街串巷卖布卖米，商人得准备好几种尺子和秤杆。

货币和金融是商业的血液。唐朝诞生了银行业和信用制度；宋朝几乎普及了纸币；元朝时纸币成为通用货币。元朝同时期，西欧大多数国家内普遍使用N种硬通货。

常年商品市场是商业繁荣的前提。最晚在汉朝，我国就普遍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唐朝形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商业中心，每个县至少有一个常年商品市场。直到15世纪，西欧才出现个别的常年商品市场。

城市化程度是商业化水平高低的标志。汉朝国土面积至少是13世纪末法国的10

倍，据《剑桥中国秦汉史》，全国人口不足6000万，西汉首都长安“据估计，至少有8万户，最多达16万户”，还另有至少1500个城镇。13世纪末的法国，人口多达2000余万，而“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工业发达是商业繁荣的物质保证。中国的对外贸易，输出的是瓷器、丝绸等手工制品，输入的是金银和粮食、石材、木材等原材料，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清朝中晚期。14世纪中期，欧洲工业最发达的佛罗伦萨的“200个大企业”“雇佣了3000多人”，即平均每个“大企业”员工不足20人。相比之下，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岳父的雇工便达上千人。

文化开放是商业繁荣的思想保证。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就是不排外，能够宽容、善待外来文化和外国人。汉朝与匈奴战争不断，但不歧视匈奴人，归顺汉庭的匈奴人，只要有才，一样可以做官。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民，在中国自由地求学、经商，大批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生活在中国的穆斯林、犹太人，多取汉名、用汉字、读汉书，参加科举考试，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同当地人通婚，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欧洲正好相反，对异教徒极度排斥、百般刁难，随意剥夺他们的财富甚至生命，使得外国人无法融入社会主流，始终成为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群体。欧洲的犹太人善于经商，就是欧洲人逼出来的，因为欧洲“法律”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想当农民也不成。犹太人一旦发财，多逃不过被国王没收或被基督徒抢劫的命运。

政府开明和支持是商业繁荣的政策保证。中国历代政府积极改善交通、治安、税收等经商环境，在进行城市建设时，首先会考虑到市场的规划，安排专人管理市场日常事务，全国商路畅通无阻。13世纪时，仅莱茵河的德国段，关卡最多时竟达到62处，一船货物的60%被征为捐税，而且贵族们还经常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商船。正因为欧洲政府如此“重商”，半武装性的商业自卫组织“汉萨同盟”才应运而生。18世纪的法国，国内关卡林立，在法国国内转运商品的花费，比从中国运到法国还要多。

中国是否可以称为工商业文明或者城市文明呢？当然不行！

文明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工商业主导全社会经济生活时，才能称之为工商业文明；只有全社会大部分人口谋生于城市，才能称之为城市文明。

工商业最发达的宋朝，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接近20%。这和法国19世纪初期的水平相当。倘若这也叫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当今社会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来称呼？

哥伦布交换

别看今天的欧美人生活得挺自在，但在1500年以前，欧洲贵族的生活，比中国普通百姓还要差许多。吃饭，他们还只有刀没有叉，只有煮熟后撒把盐的食物，而调味用的香料，吃饭用的瓷器，必须从东方进口，更不用说食物种类了；穿衣，只有粗糙的麻布和毛织品，而舒适的棉织品和丝绸，必须从东方进口，更不要说什么饰物了；饮料，他们只有酒和奶，品茶喝咖啡，更是之后的产物，当然还是要靠进口。至于提升生活档次的花样繁多的手工艺品，欧洲人更是得依靠东方了。

拜哥伦布所赐，美洲大陆成了欧洲海盗肆意蹂躏的所在。

美洲大陆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没有沙漠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宝藏不可胜数，这里的主人印第安人不仅人口总量不大，而且还在以石刀、石斧为武器。从欧亚大陆随便开进几个人，只要没有道德底线，瞬间便可拥有一座金山。

首先闯入美洲的西班牙海盗们确实做到了。他们绑架国王，拿到赎金之后又撕票；抢光地面上的金银之后，逼迫印第安人当奴隶挖金矿银矿。一夜之间，西班牙变成了一个金银王国。

稍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金银本身没啥价值，只有当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可交易的产品时，金银才有用武之地。16世纪以前，与亚洲相比，欧洲的经济社会落后得一塌糊涂，说此时欧洲人的工商业发达，绝对是开国际玩笑。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此时欧洲工业落后得一塌糊涂，欧洲市场能够找到的东西，只是“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稍微上点档次的东西，都要从土耳其运过来，而土耳其正在和欧洲闹别扭。于是，欧洲闹起了畸形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专家们称之为“一场最大的价格革命”，尤其是白银的购买力，不到原来的20%。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都在享受“价格革命”的痛苦。

要想让金银成为真正的财富，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工商业发达、物产丰富的亚洲联系起来，实现金银的全球循环。海盗们便将美洲的白银成船地送到中国、印度，以换取各种工农业产品。

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欧洲和东方的不对称的贸易开始了。初到亚洲的欧洲人，尽管在东南亚岛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敢于坐地称王、胡作非为，但是对国家统一、中央政权稳固的国家，在几次试水被打得

头破血流之后，再也不敢乱来，只好老老实实做生意。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中国产品“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中国文明的这些方面成了晚明时期世界的奇迹，当时西方商人首先来到中国，主要是寻求手工业技术制品、瓷器、丝绸和锦缎、玉石和珍贵木料的雕刻、漆器、精致的金属制品，以及丰富的无与伦比的其他贵重物品。但除了用于奢侈品交易的高级产品，中国的手工业者以其深厚的创造力生产了无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和用品：从鞋、帽以及车、犁，到刀、梳子、剪刀、铁锅、各类纸张、皮革、编织品、陶瓷品和世界上最雅致的家具——真是一份无穷无尽的清单”。“16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开始在马尼拉交易，他们就发现从中国来的商品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也要低廉一些”。“在马尼拉，几乎所有航运到新大陆去的货物都是中国人带来的，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及技术性手工工作都是中国人从事的……西班牙人很快认识到，不论他们怎样地害怕和鄙视中国人，但没有他们的贸易和工业，他们不能生存下去。（在大屠杀过后）中国城内活下来的商人得到保证，贸易可以照常继续进行”。“1573年，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开始直接贸易后仅两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中国货物，包括生丝、丝和棉织品，以及2.2万多件的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据估计，早在16世纪30年代，每年大约有4万至6万件中国瓷器从亚洲运到里斯本。到了40年代，据说里斯本的上层人物已经身着丝服、品尝中国茶，按照葡萄牙图式专门订购明朝瓷器了……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每年大约将6000公斤至3万公斤白银运到澳门”。

欧洲商人们也曾带来许多欧洲产品，但是，往往无人问津，“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

《新全球史》说：“随着中国和印度从欧洲获得的白银越来越多，白银的价值和其所能购买的货物数量也开始下降。”《剑桥中国明代史》证实：“在1568～1644年间，金银比价由1：6扩大到1：10，甚至到1：13。另一方面，在1577至17世纪20年代早期之间，中国的银与铜的比价从1：229缩小到1：112。”这就是说，经过半个世纪的外贸，白银在中国的价值下降了一半。

以西班牙为代表，因为有的是银子，所以，也没有什么“出超”、“入超”的概念，也没有发展“民族工业”的想法。即便是欧洲本地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也懒得生产，更何况勤劳能干的“摩尔人”早已被他们清理干净，因此必须大规模地从邻国进口。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甚至在整个18世纪，欧洲“9/10的铸币（银币）来

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铸币支付进口，转手交给英国、荷兰和法国”。

尽管西班牙葡萄牙最早在海上扑腾，最早在美洲大陆占据广阔而富饶的殖民地，最早与繁荣的亚洲展开贸易，但是，从工商业领域来看，他们仅仅充当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足量的等价交换物的角色；站在交通的角度看，他们仅仅充当了探路者和领航员的角色。完成这一使命后，他们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坐冷板凳当观众了。西班牙唯一可以值得炫耀的：曾经很有钱——尽管是抢的。

西班牙、葡萄牙奔波于大洋的帆船，对人类社会的直接贡献，便是“哥伦布交换”，实现了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农作物和家畜的交流。小麦、葡萄、马、牛、羊、鸡等进入了美洲，而玉米、土豆、番薯、番茄、花生、烟草等等在欧亚大陆生了根。

据傅衣凌《明史新编》：玉米，在嘉靖年间，由中国西北传入内地；番薯，在万历年间由华人华侨从安南和吕宋传入福建；花生，经葡萄牙人沿海传入，在万历年间已经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广为种植。据南炳文、汤纲《明史》，美洲作物还另有传入途径：玉米，因滇缅陆路传入，在明末已在云南、贵州、四川、河南高山丘陵普及；番薯，也经印度、缅甸传入云南。这些对土地质量要求不高而产量很高的农作物的引入，对中国意义重大。总之，明朝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显然，‘不变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事实上更能迅速而广泛地采用这些作物，把它们用作食物，并在新型经济中利用它们。”

对于欧洲人而言，仅仅接触亚洲，就收获无限。从此，他们用瓷器吃上了带多种调味品的饭菜，学会了品茶、喝咖啡，穿上了柔软舒适的棉布和丝绸，生活乐趣大大增加，生活质量一日千里如旋风般提升。工业革命，是从亚洲学会了种棉、纺花、织布之后开始的；美国独立，则是茶叶惹的祸。

“哈洋族”缺少饿肚子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活动中，工商业不可能扮演主要角色。

从经济方面看，由于可以用来交换的物资并不丰富，贸易所能带来的财富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宋朝工商业高度繁荣，杰里·本特利不吝美誉地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据周一良推算，在宋朝政府货币性的财政收入中，全部商税的贡献率也才占到1/5，漆侠《辽宋西夏金元通史》的数据也大致如此，说明农业税始终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我估计，海上对外贸易对宋朝商税的贡献率至多不过1/10，也就是

说，占政府货币性财政收入的2%。在全社会的产品主要是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金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商业是建立在“衣食无忧”的基础或者假设上的。500年前的人类历史，根本容不下这一“假设”。

任何一部中国编年史，无不被“斗米千钱”、“饥”、“大饥”、“人相食”之类的字眼所拥堵。汉朝400余年，重大灾害多达473次，平均每年一次多。据邓云特统计，从公元前1766年到1936年的3700余年时间里，我国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258次，其中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平均每年1.42次。

在农工商都甚为发达的宋元时期，《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说，金国“全国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够供养全国人口，但是能储备较充足的粮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同时期的南宋，农业技术水平和气候条件优越，农作物种类多样，正常年份，粮食亩产量接近北方的两倍，基本具备防御大灾之年的能力。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坚持“以农为本”，但仍出现过许多次全国性的或者大面积的饥荒。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导致全国生灵涂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饥荒。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出现饥荒，必将是灾难性的。无怪乎中国皇帝每年都要亲自祭拜社稷，祈求一个好年成。直到清朝，皇帝们都要亲自扶犁耕地，表示自己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而且以免税政策鼓励粮食进口。即便是农业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在谈农业问题。

欧洲人也是人，离开了人间烟火，他们也会饿死。欧洲与中国同处一个地球，大气环流、地壳运动也不会让欧洲年年岁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柏拉图在设计“理想国”的时候说，建立一个城邦，“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有了它才能生存。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以及其他等等”。长期以来，欧洲的农业技术水平远低于中国，且农作物单一，产量很低。在中世纪欧洲，粮食，是各国禁止出口的东西，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两个贵族的领地之间，也很难看到相互间的粮食交易。

据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关于许多饥荒，有着一种奇异的周期性，也常有着一种奇异的地方性。中欧洲，在查理曼时代，即在790～793年，曾受灾深重；它又在805～809年之间，遭受一次灾难；法国在842～843年之间也遭受一次灾难……洛林省和东法，在这一世纪曾遭受两次接连三年的饥荒：一次在1003～1006年之间，又一次在1031～1033年之间……北德意志在1066～1072年之间，连续遭受了四次谷物歉收……在12世纪中期（1145～1147年），饥荒蔓延全欧……12世纪的结束像它的开

始那样，也有着遍地灾荒（1195～1198年）。在13世纪，1224～1226年、1269～1273年和1280～1282年，都是艰苦的年代……”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他说：仅14世纪上半叶，法国“1304年饥荒；1305年饥荒；1310年饥荒；1315年饥荒……1330～1334年饥荒；1334年饥荒，人口大量死亡”。英国“1315～1316年普遍饥荒……1321年半饥荒；1325年普遍旱灾……1351年普遍饥荒”。

和中国人一样，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欧洲人永不间歇地战天斗地以扩大农田面积。地球人都知道，荷兰的国土多是围海造田的成果；发现“新大陆”之后，无数欧洲人跑到美洲垦荒、当牛仔。

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说：

“面包对每个人都是基本食品，对于穷人更是每日不可缺少的基本食物。如何获得如此珍贵的面粉呢？买吗？那只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才能设想。买卖关系在长时期中不能说决然不存在，但确实很少见，而且十分困难。对领主来说，最有把握的还是叫人在领地上播种，而对农民来说则要在采地上自己动手了。土地，面包的源泉！”

“在整个法兰克时期，文献中都提到拓荒……从16世纪起，开垦荒地的活动又到处恢复起来——人们征服土地的欲望是多么坚不可摧！……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期，在全国开展了排干沼泽地的工作，该工作由一批技术专家和实业家给予指导，由几家大贸易公司——主要是荷兰人的公司——资助，这是在农业中最早运用资本主义方法的一例。18世纪，农业继续沿着同一途径发展，并更加急剧地飞速前进。为了支持这样的事业，金融公司组织起来了，甚至是专门为此而创建金融公司，王朝政府则给予扶助……有些荒原或削平山丘的沙石场上，尤其是布列塔尼和吉耶那地区，大的农庄继续在扩大，新农庄也建立了起来……要想确定18世纪末期以前每一个时期、每一种土壤、每一类耕作的平均产量是十分荒唐的。但我们手中的材料可以证明，在旧日法国，如果收获能达到播种的3～6倍，人们就很满意了。”

“17世纪和18世纪，在上层资产阶级家族中，一直延续着这种占有土地的传统。这种传统也灌注在贵族世家之中。合并耕地、牧场、森林和葡萄园，对发了财的商人来说，确保了他的后代命运能立于比商业冒险更稳固的基础上。科尔贝写到：‘这些家族只有建立巩固的地产，才能很好地保持下去。’它也增加了家世的声望，占有土地和迟早总能增加的领主权力给予了他们尊敬，为他们准备了授爵。对于那些真正的贵族，则使变动的租税收入得到稳固。对所有有钱人，原来的贵族和新发家的贵族，

或纯粹的平民，到了18世纪又增加了新的购置土地的理由：在当时，对动产进行投资是很少既有利可图又十分可靠的。人们当时购买土地，如同在以后购买国家债券、铁路债券或事由股票一样。真是长久的事业！”

法国付出如此努力，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依然常常被饥荒所困扰。1789年的法国革命，粮食歉收、食品短缺就是重要诱因之一。革命期间，法国多次出现粮食减产，因为英国舰队封锁法国港口，美洲的粮食运不进来，法国人不得不饿着肚子一边闹革命，一边与敌国军队作战。

在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中，列出了一张关于就业人口比重和物质产出的表格：

年代	农业		工业和手工业	
	人口比重（%）	物质生产中的比重（%）	人口比重（%）	物质生产中的比重（%）
1855～1864	66	46.8	34	53.2
1865～1874	65	46.9	35	53.1
1875～1884	64	43.8	36	56.2
1885～1894	61	41.1	39	58.9
1895～1904	58	39.2	42	60.8
1905～1913	58	39.8	42	60.2

尽管法国的工业持续增长，在GDP中处于控股地位，但是，全国绝大部分人口依然汗滴禾下土，忙碌在农田之上。直到1931年，在法国的人口统计表上，城镇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今天，法国更是让农业“公共事业化”，以巨额补贴予以保护。

17世纪70年代，号称海上王国、商业王国的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90年之后的英国，在广大“资产阶级”议员的运作下，专门颁布了“定居法”，禁止农民离开地主从事别的行当，强迫他们老老实实地呆在土地上务农种庄稼。按照“哈洋族”的说法，这才应该是典型的“重农抑商”法律。

到了18世纪，英国人通过战争、屠杀与驱逐，开辟出一片又一片“新大陆”。肥沃的美洲土地，印第安人培育的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在黑奴们的刀耕火种之下，每年生产出足以撑死西欧人的农产品。

在北美的殖民地中部地区，就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美誉——面包殖民地，而《美国文明的兴起》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观的场面：

“每年都有物产像流水那样从1765年已占有的辽阔的农业地区滚滚外运……中部各殖民地向港口城镇云去准备装船的牲畜、木材、木瓦板、铜板以及为立即建屋用的成型构件，还有堆积如山的玉米、面粉、咸肉、亚麻、大麻纤维、皮货和豆类……”

“多年以来，骑马放牧者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在德克萨斯喂养牛群，然后在春天来临时，把牛群赶往北面，在横过平原的一路之上，使牛群吃到新草而肥壮起来，然后出售给市场。例如，在1884年的12个月中，估计差不多有100万头牛被4000名牛仔赶往北面……在那儿，他们以无足轻重的成本，生产大量的牛肉，极为丰富地供给吃牛肉的美国民族和千百万欧洲人民。”

欧洲人原本也是以素食为主的，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洲，让欧洲人逐渐变成了肉食动物。就这样，欧洲人的身高、体重迅速增加，超过了东方人。

英国拥有日不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通过种种“法令”实行“重农抑商”，禁止殖民地创办任何生产加工型工业企业，即便是针头线脑、螺钉螺帽，也必须从英国本土运过来。**殖民地上的奴隶主们，驱赶着无数奴隶在无边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棉花，不劳而获且收入不差，也自得其乐。**英国人终于不愁吃不愁穿了，“重商主义”、“圈地法令”应运而生，大批良田被圈起来养羊发展毛纺业，“工业革命”诞生了。

对于上述充满“普世价值”的历史事实，不知道“哈洋族”作何感想。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是春不雨，斗米千钱……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谞入奏事，上问：‘榷沽之利，岁入几何？’谞久之不对。上复问之，对曰：‘臣自河东来，所过见菽粟未种，农夫愁怨，臣以为陛下见臣，必先问人之疾苦，乃责臣以言利，臣是以未敢对也。’上谢之，拜左司郎中”。裴谞，是一位专门为朝廷做生意赚钱的官员，他深知，在“斗米千钱”的时刻，谈工商业是不妥当的。

工商业很重要，但是，吃饱肚子更重要。我坚信，整天吃不饱饭的专家，绝对不能洋洋洒洒写出“重农抑商”的鸿篇巨制来。50多年前，我国曾经雄心勃勃地赶英超美，坚定地走工业化道路，全民大炼钢铁，结果被迎面而来的饥荒摧残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继续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重农”方针。直到几乎每个县建好一个化肥厂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推广普及了，中国人才又有力气做生意。这些，都不过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欧洲人的新农庄

当海盗也要靠机遇。西班牙海盗闯入美洲，一下子撞上大运，比如墨西哥，比如秘鲁，不仅曾经的印第安帝国留下的宝贝多，地下的宝贝也多，而且这里印第安人人口密集，可以供他们任意驱使。抢劫完印第安人的帝国之后，他们很快在墨西哥、秘鲁撞上了两个巨大的银矿，于是就地抓来印第安人开矿，西班牙国王按照银产量的1/5收取皇粮国税，从欧洲来的淘金者蜂拥而至，美洲大陆一下子诞生了萨卡特兰卡、波托西两大城市。据说，1600年，波托西人口多达15万，放到欧洲，这也是了不得的大都会。

西班牙在美洲的“工商业”活动，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开展的其他贸易业务，就是圈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掳掠印第安人，按照欧洲人的口味养猪放牛，种植大麦和葡萄，建起一个个农庄。和挖金银相比，种地赚不到啥钱，农业当然是副业。

美洲并非处处堆满黄金白银。在巴西，葡萄牙人就没有找到金矿、银矿。在痛恨上帝不公的时候，葡萄牙人还是决定因地制宜，围起土地种甘蔗制糖。不成想巴西的印第安人没有种地的传统，纷纷躲到深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葡萄牙人只好花钱从大洋彼岸的非洲抓来黑奴，大办甘蔗园和糖厂。通过十字军东征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蔗糖的欧洲人，自此不缺糖吃。

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海盗们所到之处，也是没有现成的宝贝的地方。一些法国人到北美后，只找到些毛皮，送回去后发现利润也挺高，索性定居下来，与印第安人做毛皮买卖。当然还有一些人深入到北美中部，不屈不挠地寻找黄金。荷兰、瑞典等国的海盗们也是一无所获，索性安营扎寨，一心一意地种地打渔。当然，终日在海上飘荡的职业海盗们，依旧将脑袋别在腰带上，继续着杀人越货的勾当。

在专家们看来，号称重商的英国，情况就要复杂一些。1606年，英国的绅士们带着西班牙式的梦想，集资组建的伦敦公司，花钱在詹姆斯一世手上买来在美洲圈地的特许权，再花钱买来100余名契约奴，聘用史密斯为队长，前往“特许地”“弗吉尼亚”寻找黄金珠宝。绅士们的梦做得很认真，一次又一次地增派淘金高手，一次又一次地催问寻宝的消息。《美国文明的兴起》说，队员们也天天念叨着黄金，“不存在什么别的希望，不干什么工作，只是想挖黄金、淘黄金、炼黄金、装运黄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史密斯队长深知自己运气不佳，在对淘金绝望之后，望着没有黄金但肥沃异常的弗吉尼亚土地，突发灵感，当“公司向史密斯要求黄金，他给了公司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一幅该地区的地图，一张资源草图，以及关于哪一类移民适合

殖民地事业的正确意见”。无可奈何中，绅士们为了收回本钱，公司也算从谏如流，招更多的契约奴去种地。“据估计，公司在其从1606到1624年的存在期间总共输送去了5649名移民，到这一时期结束时，那块殖民地只剩下1095人。有些人感到幻想破灭，已经逃回到英国；大多数人已经葬身在弗吉尼亚。”为了让这些契约奴们安心定居在这片蛮荒之地，好好当农民，公司“1619年，自冒风险遣送了90名‘年轻、纯洁而讨人喜欢的’少女，并‘在她们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以旅费的代价出售给移民们为妻’”。就这样，无意中，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建立了。

在这里，伦敦公司没有种粮食等普通作物，移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转而种植烟草，甚至把烟草种到詹姆斯敦的街上。从烟草的收成中有每年获得相当于现在获得7.5万美元的巨额财富的少数事例，所有的冒险家的头脑似乎都被立地致富的前景搞得晕头转向了。”

弗吉尼亚的成功，使海盗们认识到，还是圈地最可靠，大批人涌入北美，大批人涌入弗吉尼亚。国王也关注这里了，“1624年，特许状被废除了，殖民地改成了一个直接在国王权力下进行治理的殖民地。这样，伦敦公司在一种无利可图的投机事业中虚掷了15万英镑，但进行了一些指明殖民地事业成功之道的试验之后，落得个屈辱的下场”。不过，后来绝大多数的“民营”殖民地，也归于国王领地名下。

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是一个中小地主为主的国家，英国的下议院就是被这帮人的代表把持着。地主们得知美洲有一望无际的可耕地，统统眼睛发绿。1629年，获得英王颁布的圈地特许权的马萨诸塞公司出现了，当然，这家公司的股东们吸取了伦敦公司的教训，事先与国王谈妥了一切——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而且将公司总部设置在美洲前沿。不过，这家公司也很不幸：马萨诸塞土地贫瘠。一心来种地的人们不得不饱尝艰辛，另寻沃土。

另一个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是，英国国王提前一步当上了本国基督教教民的老大。早年亨利八世热衷于不断地养小三和离婚结婚，与教皇翻脸后，亨利索性抛弃了罗马教廷，亲任本国的教主，开始了国教运动。自此，英国的宗教市场乱成一锅粥，国王镇压异端成了家常便饭。好在英国农民对绅士们的人身依附程度不高，遇上宗教迫害，不少人逃亡大陆当贱民、做苦力。**美洲神话也激起异端们的渴望，他们与商人达成了极其不平等的协议后，被卖身到美洲的土地上。装满逃命的清教徒、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五月花”号船，就是达成卖身7年的契约之后起航的。**为了共同应对将来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出发前，这些人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全文为：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吾等签约人，信仰之捍卫者，蒙上帝恩佑的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陛下、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的忠顺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吾王及基督信仰和荣耀的增进，吾等越海扬帆，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证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据此于耶稣公元1620年10月11日，吾王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暨苏格兰第五十四世君主陛下在位之年，在科德角签署姓名如下，以资证明。

这样一个被整死也要效忠国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约定，竟被有些人炒作成了“意义重大”的“民主与法治”的宝贝。清教徒们不知道，美洲殖民地，也被国王派遣的总督和教士们统治着，异端们被驱逐、吊死是家常便饭。异端们大都逃到人迹罕至处，另行搭建房屋，开垦荒地。就这样，无意中，又整出了罗德岛、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等殖民地。如此这般，英国在北美的地盘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在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的基础上。

地盘大了，地多了，种不过来，怎么办？这难不倒有2000多年买卖奴隶的传统、有管理农奴的经验的欧洲绅士。早期，在英国殖民地上忙碌的奴隶，主要是来自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帝国的公民——白奴，而不是黑奴。白奴的主体，也不是弗吉尼亚的开拓者似的契约奴，而是另一类——真正的奴隶。《美国文明的兴起》说，随着北美对白奴需求的快速增长，“当年伦敦街头充满着被称作‘幽灵’的绑匪；没有一个工人是安全的；就是乞丐也害怕同任何提起‘美洲’这个可怕字眼的人交谈。绑匪使许多家庭失去了父母，把丈夫同妻子拆散，从此他们好比被死神吞噬了一样，永远消失了。儿童可以从没有出息的父母那里、孤儿可以从监护人那里、寄人篱下的人和不受欢迎的亲戚可以从那些不愿再维持他们生活的家庭买到……未经主人同意，他们不得结婚，或离开他们工作的地方，或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必须绝对听从主人的使唤，可以因懒惰和玩忽职守而受到严厉的处罚……英国清教徒对于驱使白种男女长期充当他们的奴隶，也没有显示处不可克服的厌恶情绪。克伦威尔认为爱尔兰人很适合当奴隶，因为他把那些在德罗赫达大屠杀中没有被杀死的卫戍部队，统统在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出卖为奴，并且他的代理人还专门在爱尔兰搜索男女儿童，拍卖给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甚至克伦威尔的本国同胞有时也陷入了罗网。现今伦敦的档案

中，有70个英格兰人的一份令人怜悯的请愿书，说明他们被人从普利茅斯绑架走，在西印度群岛以‘每人合大约1550磅食糖的代价被卖出’。”英国绅士们对自己的同胞也真够狠的——“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白奴人数超过50万人”。

绑匪们的恣意妄为，严重影响了王国的安定团结，舆论和政策转向鼓励从外国搜罗奴隶。“在契约用工之外，不久又加上了黑奴：第一批是1619年由一艘荷兰船运到弗吉尼亚去的。但这类新奴隶是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人数才变得很多。”30年后，弗吉尼亚的黑奴约300人。**17世纪后期起，大批黑奴被贩卖到英国的殖民地上。**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的1770年，美国黑奴人数超过50万人；1820年，猛增到200万；1860年，美国仅南方地区就有黑奴395.4万人。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到1850年，在南北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4倍。”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十万计从印度、中国、日本、东南亚等世界各地掠卖去的奴隶。

《新全球史》说，据统计，“仅大西洋奴隶贸易就从非洲社会掠去了1600万人口”，其中400多万在抓捕或运送过程中死亡，“到19世纪末，安哥拉2/3的成年人口是妇女”。英国的利物浦、美国的纽波特，就是靠黑奴交易发展为“城市”的。乔治·勒费弗尔说：“据估计利物浦的‘黑人贩子’每年有30万英镑的进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间，他们装备了110至120艘船只，卖出了30万以上的奴隶，价值达1500多万英镑。”

百万奴隶，在从印第安人手上抢过来的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上农牧，以至于英国本土的绅士们“也关注同他们的一项主要产品进行竞争的殖民地羊毛，也关注殖民地的一般物产，因为这些物产正以不断增长的流量注入英国和大陆市场。他们有些人惊人地预见到，生荒地生产的廉价小麦总有一天会摧毁英国的农业”。

这，就是英国开始大航海之后最主要的“贸易”——掳掠奴隶建设殖民地农庄。

英国的这些活，西班牙都干过。其实，相对而言，西班牙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统治得比英国要好得多，既不像英国殖民地那样条块分割，也把印第安人收拾得妥妥帖帖。拉丁美洲远没有北美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那么血腥，这里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相互通婚，已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大家和睦相处，同心种地放牧，一派和谐景象。乔治·勒费弗尔说：“据洪堡估计……他认为在拉丁美洲1600万居民中，黑人占5%，印第安人占47%，还有32%的混血儿。”当然，欧洲的等级制被复制过来，纯种的白人位居社会最高层，而纯种的印第安人、黑人自然属于社会最底层了。

西班牙与英国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钱太多又不会花就会变成坏事。西班牙守着

金山，就此沉醉于将美洲的白银送到亚洲，换取亚洲的奢侈品的美好生活中。亚当·斯密说：“的确，拥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国家享受着这一巨大贸易的全部荣耀与光辉。不过，其他国家尽管有意在排挤他们的令人厌恶的限制，也常常能享受到这一贸易的实际收益的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其他国家工业的实际促进，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国工业的促进还要多。仅就亚麻布一项而言，据说，这些殖民地的年消费额可达300万英镑以上，当然，我不敢保证这一数据的准确。但是，这一巨大的消费量几乎全由法国、弗兰德斯、荷兰和德国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仅提供一小部分。”西班牙开辟的广大的殖民地，不过是为西欧的一些国家拓展出了一个购买欲望强烈、支付能力雄厚的超级市场。

西班牙将殖民地当做自家的钱袋子，而北美殖民地则成了英国自家的血库。

暴发前夕的英法工商业

和东方相比，西班牙工业落后，而此时的英国工业更落后。1581年出版、同时期英国人撰写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详细描述了当时英国的工业水平：“我们从海外购买的其他一切商品，如丝绸、酒类、油类、木材、染料、钢铁、蜂蜡、亚麻布、粗斜纹布、毛线、床罩、地毯及各种壁毯和挂毯、各种香料，以及白色和棕色纸张、喝酒和陈设用的玻璃器皿、窗用玻璃、别针、缝针、小刀、匕首、礼帽、提花织物、纽扣、花边等杂货……关于盐和铁，这两样东西虽在国内生产，却只够供应一半，至于石油、焦油、柏油和松香，我们国内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作者伤心地指出：“外国人用我们的羊毛制成织物、便帽和粗绒裤；他们用我们的生皮制成西班牙皮制品、手套、腰带；用我们的锡制成盐碟、汤匙和盘子；用我们的碎麻破布制成白纸和棕色纸。你们想，为了购买这些东西的每一项，我们要运出多少钱财呢？合并起来的款数超出我们的估计。对于手套，除了在法国和西班牙制造的以外，谁也不会满意；或者说粗绒裤，那就必须是在佛兰德染色的；要买呢绒，就必须是在法国印染的；要说提花织物或服饰上的金线，那就必须是威尼斯或米兰的产品……还要为他（指国王——笔者注）的战争购买设备，这是绝对省不了的，例如盔甲，以及各种大炮、铁锚、钢丝绳、沥青、柏油、钢铁、手枪、黑色火药和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他必须从海外买来，其价格由外国人规定……我不知道这是否由于我们长期疏懒，还是由于付出较高的伙食费用，或者由于我们英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更习惯于游手好闲……那是我问一位装订工人为什么我们国内没有像外国人那样制

造白纸和棕色纸时他做的说明。当时他回答我说，有一个时期我们国内是造过纸张的。他说，最后那位工人看到他造的纸不如从海外运来的便宜，就不得不放弃造纸了。”

与西班牙展开海上大战前，英国工商业就是这幅模样——说它的工业等于零毫不夸张；商业活动自然是有的：出口羊毛，进口农产品以外的一切。

这一时期英国最重要的“贸易”活动，就是德雷克爵士及其同行的海盗生意。西班牙人在抢劫的同时，还附带做点正经生意，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曾经环航世界，沿途恣意抢劫；他那肆无忌惮地无视私有财产权的洗劫财宝以充私囊的行为，想必是会使那些曾在罗马街头沿途掳掠的蛮族哥特人欣羡不止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说：“和平的收益还从德雷克和霍金斯这样一些海盗掠夺的战利品方面得到增加，这些海盗袭击美洲的西班牙城镇，追击抢劫从墨西哥和秘鲁开出的满载金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劫夺从东印度群岛开出的、载有巨万的香料和贵重物资的西班牙商船。金银从新世界倾入欧洲一条不断上涨的河流。据洪博尔特估计，从16世纪初期的每年5.2万镑上升到16世纪末的每年28万镑。英国的制造业者和商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这个流入的金银财富中获得了他们的十足份额。”

法国的工业，也远强于英国。伏尔泰说：“英国在查理二世时期还没有这样高的收入。它还依赖法国的工业，在贸易方面法国对英国每年出超800多万（利弗）。当时英国人还不会制造布匹、玻璃、黄铜、青铜、钢铁、纸张甚至帽子。南特敕令的废除才使他们得以建立这些新的工业。路易十四的奉承者赞扬他把有用的法国公民撵出国外，从上述这一事件就可判明这些人是否有理。因此，到了1687年，英国感觉到逃亡到他们那里的法国工人给了他们很大的好处，就给了这些工人150万法郎，而且用公众的钱在伦敦城里供养了13000名这样的新市民达一年之久。”

乔治·杜比在《法国史》中说：“内夫估计，1525年左右欧洲铁的年产量为10万吨，其中法国的产量为1万吨。”此时，欧洲的工业的确还是毛毛雨，在中国，天顺五年（1461年），仅山西省阳城县的私营铁冶，年产铁就在800万斤以上。

仗剑经商，强买强卖

某些专家习惯于将“海洋文明”、“环球航行”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或者以1500年为“新纪元”来撰写世界史。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姑且不谈奴隶贸易，仅以中国为基点，就持续循环着这样一个商业链条：美洲的银元进入中国——中国的

茶叶进入欧洲——欧洲的手工业品进入美洲——美洲的银元进入中国。乍看起来，“海洋文明”是以贸易为中心的，就好像今天中国商船往返日本、美国，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国家创造大量的“外汇”储备。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际贸易并没有为英国、法国创造财富！

乔治·勒费弗尔说：

“在18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2倍，吨位增加了3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9630艘，载重量达145.3万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3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18世纪初的600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1900万和出口额2000万。”

“从1798年起，已有伊姆拉的计算可作依据：1798年的实际进口额应为5650万，出口额为4260万，入超达1390万。1799年的数字是：进口额5690万，出口额4630万，入超达1060万。可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处于入超状态。”

“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5.42亿，进口额达6.11亿，但其中2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2000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

这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4年里，法国公司出口额为700万利弗，而购回的货物则达5000万利弗。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贸易逆差200万英镑左右……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赚取巨额利润。”

但是，非常奇怪，“无论如何，欧洲正变得富裕起来，西欧当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何种程度，人们却说不清楚。据说，英法两国的国民收入在18世纪翻了一番；两国增加了税收和发行了公债”。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上的获得的税收是有限的，那么，财富从何而来呢？换句话说，宗主国到底是如何统治殖民地的呢？如果不赚钱，英法等国干吗辛辛苦苦地夺取这么多的殖民地呢？

答案是：英法两国的财富来自于损人肥己的殖民政策，以政策抽取殖民地的鲜血。

英国是最早建立强有力的议会的国家。英国议会的议员，全部是地主。国王赏赐土地的老牌爵士地主，呆在上议院；中小地主或者新兴地主，呆在下议院。1640年代

革命期间，老牌贵族几乎被克伦威尔等人灭了种，后来进入议院的绅士，多是靠自己打拼起家，危机意识和创业精神强，头脑精明主意多，尤其没有道德底线，只是坚信钞票才是硬道理。此时，英国虽然占有一些殖民地，海盗船也比较多，工业能力还十分有限。即便是船只数量、水手人数及航海经验，比起荷兰来，英国的竞争力也差远了。1651年，“为增加本国航运和鼓励航海”，克伦威尔颁布了《航海条例》：“自公元1651年12月1日起及从此以后，亚洲、非洲或美洲，或该三洲的任何部分，或属于该三洲的任何岛屿，或该三洲通用地图或图片所载明或记述的岛屿”所出产的任何东西，要想进入英国或者其殖民地，必须使用英国船只运输。“这样，与贸易完全自由的时候比较，我们不仅在购买外国货物时要买得更贵，而且在出售本国货物时要卖得更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但是，“该航海法制定的时候，英国、荷兰两国虽然实际上没有战争，但是两国之间的仇恨已达到极点……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为明智的一种”。果然，没多久，两国开战，英国取胜，跃升为第一号航海大国。

随着殖民地快速膨胀，奴隶贸易越做越大，殖民地农庄越开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如此循环推动，“从垄断国内市场获得最大好处的是商人与制造业者”，《航海条例》使英国的制造业迅速成长。亚当·斯密说：“商人与制造业者集中居于城内，容易结合，并且习惯于行业中盛行的独断专营风气。他们一般先取得违反各自城市居民利益的专营特权，后设法取得违反所有同胞的专营特权。”“赞助加强此种垄断的国会议员，不仅可以获得理解贸易的赞誉，而且还可以在一个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层中受到欢迎和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议，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议的权力，那么，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免不了要受到最大的名誉侮辱和诽谤。”况且，议员们想想也是，英国不能一天没有粮食棉花，殖民地能够输送最廉价的粮棉，那就让他们专门干这个吧，其他的事情就由本土来干吧。从此，议员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专门针对殖民地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法律。1732年，制定所谓的“制帽条例”，规定殖民地制帽厂雇佣员工不得超过两个人，产品不得销往其他殖民地。1750年立法，禁止殖民地建立和扩建铁切削厂、铁板制造厂、炼钢炉。如此等等的法律，使得殖民地上，任何工业品都必须而且只能从英国进口；殖民地上的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必须而且只能出口到英国进口。诸如此类的“重商”法律，可以用箩筐装。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从自己的

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乔治·勒费弗尔说，“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40%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区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400万镑，亚洲约为100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土地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人们在伊姆拉的结算中注意到，进出口贸易不是英国致富的主要原因……从伊姆拉的计算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开发海外领地中得到的收入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贩卖黑人、种植园投资、印度公司职员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产品的商业投机。毫无疑问，伊姆拉的结算不仅对英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殖民大国都是有效的。”此外，“由于有运费、保险、回扣和通过剥削殖民地所获得的收入，英国的外汇结算仍有顺差”。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欧洲的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有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的，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暴力强制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大循环”正式粉墨登场。

1749年曾游历美洲的瑞典旅行家卡尔姆写道：“英国各殖民地的财富和人口事实上增加得那么快，他们不久将和英国竞争。为了维护宗主国的贸易和富强，英国便禁止各殖民地开设那些会跟英国竞争的手工工场。除了少数规定的地方外，各殖民地不得在不列颠领土外贸易，外国人也不得和美洲殖民地贸易。诸如此类的限制多得很。”北美殖民地为此甚为不爽，便起来造反闹独立，这是后话。

欧美人开口闭口“自由贸易”，实际上，他们的发家，一靠抢劫，二靠垄断——在垄断的范围内抢劫，抢光垄断的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崛起”后，罗马教皇为他们分划地盘，各自做各自的“贸易”，谁也不能“自由贸易”到对方的地盘去。英法两国未出道之前，这两个国家的海盗十分失落，只能偷偷摸摸地将从非洲虏获的黑奴运到西班牙的殖民地销售。英国彻底打败西班牙之后签订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西班牙允许英国海盗在西班牙殖民地自由贸易黑奴。由此来看，这群没有道德底线的英国绅士后来逼迫中国同意自由贸易鸦片，并且写入中英条约，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国家，即使在国内，也是没有自由贸易环境的。稍微有点油水的生意，政府都作为“专利”卖给商人垄断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特许权。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获得特许权，垄断了英国在印度、东南亚、中国的贸易权。任何英国人，要想在这里独立的做生意混日子，唯有给东印度公司缴纳好处费，在指定的范围做指定的生意，并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管制，这就是所谓的“港脚商”——获得东印度公司授予的特许权的商号。

说起来颇为可笑，就是这个东印度公司一船茶叶，引发了美国独立。这都要怪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不全面，它做任何生意，都还被其他公司的特许权控制着。比如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了茶叶，即使是这批茶叶的销售目的地是美洲殖民地，《美国文明的兴起》说，东印度公司也必须先千里迢迢运到英国，“英国的茶商从该公司在英国的机构进货；美洲的进口商向英国的批发商买进茶叶；殖民地的零售商从当地的进口商那里得到供应，从而迫使殖民地的消费者支付四层利润”。

美国独立前夕，东印度公司已处于破产边缘。好在它的股东们多是活动能量超大的爵士，通过运作，英国议会专门为东印度公司减免了许多税费，接受了许多负担，并通过了“茶叶法”，授权东印度公司“可以为了它自身的利益直接从事这项买卖——用它自己的船只装运，通过它自己在殖民地的代理商直接出售茶叶”。北美的“消费者有权直接向公司购买茶叶，而不必经过中间人的插手……其价格远比在伦敦合法进货或者通过荷兰走私的美国商人所取得价格低得多”。对于广大的北美百姓而言，减少中间盘剥环节，便民利民，这是多好的事啊！但是，它侵犯了部分美国商人的既得利益，经他们一忽悠，美国人民觉醒了。东印度公司的船一开到波士顿，美国人民就将整船的茶叶倒进海里。英国绅士政府生气了，战争开始了，法国荷兰西班牙一插手，美国独立了。

美国独立后，英国便将目标转向自然条件优越、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印度。

倘若说英国是依靠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高实现商业扩张，那绝对是鬼话。杰克·戈德斯通指出：“在对亚洲开展海上贸易的前两个世纪中，就联系着欧洲、非洲、中东、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巨大欧亚贸易市场而言，欧洲商人在其中一直都是小角色。直到1700年左右，欧洲商人的主要成就还仅限于将越来越多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从亚洲直接运到欧洲，从而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的消费量。”

英国人善于学习、敢于仿制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在印度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在中国了解了瓷器制造技术、丝绸纺织技术之后，立即回去山寨。杰克·戈德斯

通说：“仿制亚洲商品是欧洲人为停止向中国和印度输送更多白银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东印度公司将大量印度染色棉布和中国丝绸运到英国，严重威胁了英国本土羊毛、亚麻及丝织业者的生计，以至于他们在18世纪早期说服了议会，把在英国境内贩卖亚洲丝织品和印度染色布的行为列为非法……然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手工业者从未生产出质量和价格能够与中国瓷器、亚洲棉制品和丝绸相媲美的产品。”

印度的棉纺织业颇为发达。在没有搞定印度之前，英国棉纺织业被印度产品挤压得一塌糊涂。等到彻底征服印度之后，英国立即启动“关税壁垒”，将进口印度的棉纺织品关税提高到70%～80%；同时，撤销“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印度棉花进口到英国的关税。1814～1835年间，印度输入英国的棉布由125万匹跌到30万匹，而英国输入印度的棉布从100万匹激增至5100万匹，致使印度手工纺织业主大批破产。

1775～1784年，英国年均原棉进口73.6万磅，而1780～1789年间，英国年均原棉进口突然激增至155.1万磅，1785～1794年间，又增至年均244.5万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英国原棉进口激增的时间，正是印度被彻底征服、变成英国殖民地的时刻。《新全球史》指出：“到了19世纪，（英国）殖民官员将棉花种植业定位于满足英国棉纺工业需要……印度出口的原料棉的价值从1849年的1000万卢比增加到1860年的6000万卢比，1913年更达到4.1亿卢比。印度从英国进口的棉织品的价值则从1814年的5万卢比攀升到1829年的520万卢比，1890年达到3000万卢比。因此，殖民政策将印度从世界主要的棉纺中心，改变为原料棉的主要供应地和英国棉织品的主要消费地。”

如此这般，英国“产业结构”算是调整完成了。英国通过“法律”，将它的农业“外包”给全球殖民地，只剩英伦三岛需要工商业，需要工人和商人。殖民地是英国的第一产业，英伦三岛专心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英国用枪炮打出来了3350万平方公里、人类1/4的人口的市场，用铁血消灭了殖民地上有竞争力的任何生产能力，用屠杀与掠夺带回了无数的财宝以及南非的金矿钻石矿，万事俱备，只需要英伦三岛开足马力搞生产就行了。英国拥有无尽的市场，能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而且能卖出好价钱。英伦三岛的居民们挖空心思琢磨如何提高产能，终于，飞梭（1733年）、水力纺纱机（1769年）、珍妮纺织机（1770年）、走锭纺纱机（1779年）之类的成果一个接一个诞生。于是，“工业革命”了，大工业化了。到1800年，已有500台瓦特蒸汽机投入使用，其中38%用于抽水，其他用于纺织、炼铁等工业领域。

英国开始“工业立国”。“到1800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合在一起生产得还多。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机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英国开始“城市化”。还是在“1800年，大约1/5的英国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的规模大约1万多人。而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庞大的乡村社会被城市化了，全国有1/3的人口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伦敦人口更是多达650万，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

英国人过上了惬意的生活，吃得好，身体好，干劲足，让当时殖民地不多的19世纪中期的法国人十分羡慕。乔治·杜比说：“我们还是来听听勒克勒佐的领导者德塞利尼本人的说法吧！……关于饮食问题，他如是说道：‘我们知道，在法国刚开始修筑铁路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来自英国的工人在工作上更为出色，而且他们在法国时仍保持他们吃肉的习惯。法国人的伙食要差得多，干的活儿也少，但是他们慢慢地学习英国人的饮食方式，从而在干活的力气方面与后者相差无几了。’”

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科技、经济、军事上的绝对老大，放眼全球找不到竞争对手了，便开始大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高调，向世界“敞开怀抱”。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快乐地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林木生产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逐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替我们种植茶叶；在东西印度扩大了我们的咖啡园、甘蔗和香料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菜园主。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是分布在美国南方，而现在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去了。”

英国高喊“自由贸易”，不要说殖民地人民，就连欧洲的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也懒得理睬。这三个国家只是一门心思扩军备战，准备用枪炮说话。

丹皮尔教授有一段话，很值得“哈洋族”玩味：“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在希腊，这种生活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之上；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生活是靠了得自印度群岛的资源；19世纪时，这种生活是靠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靠的是什么呢？一目了然。

法国：变革与工商业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在促进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近代化上，法国始终发挥着旗手的作用。没有法国的助推，欧洲也许还要晚些时间走向近代化。“农耕法国”、“农村法国”走向“工商业法国”、“城市化法国”的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

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时代，和中国人对开元盛世的感情一样，是法国人引以为豪的欧洲“艺术、军事和法律之母”时代，也正好是英国革命、克伦威尔专权并使英国迅速崛起的时代。

与路易十四同时代的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这样记录社会剧变：

“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对应于我国明末——笔者注）登位时，巴黎居民不到40万。城内宏伟壮丽的建筑不到四座。王国的其他城市与现在卢瓦尔河彼岸的市镇相似。整个贵族阶级与世隔绝，蛰居于乡下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中，残酷压榨种地人。通衢大道几乎无法通行，城市没有警政。国库空空如也。政府在外毫无信誉可言。”

路易十四登基后，通过多年努力，“克尔伯刚整顿好国家财政，路易十四就免除了百姓从1647年到1656年的全部欠税，特别是免除了300万人头税。到那时为止，一直无法通行的公路不再废弃荒置，并逐步变成今天路易十五统治下的这种模样，受到国外人士赞赏。不管从哪个方向去巴黎城，除了个别几处以外，现在都可以在两旁植树的坚固的大道上旅行五六十里。从1662年起，国王就对本国臣民免征所有外国船只缴纳的货运税。他还为本国人提供一切方便，使他们能以较少的费用自己运载货物。海外贸易就这样诞生了。现在还存在的贸易部就是那时建立的。国王每两星期主持一次部务会议。敦刻尔克和马赛被宣布为自由港。这一有利条件不久便把近东的贸易引向马赛，把北欧的贸易引向敦刻尔克。西印度公司创立于1664年。东印度公司也于同年成立。国王把相当于今天600多万的巨款赠给该公司，并请有钱的人都来入股。王后、亲王，和整个宫廷提供了当时的货币200万。各高级法院捐助了120万利弗；金融家捐助了200万；商会捐助了65万。全国上下都出资支援他们的主子。1669年国王又出资创建北方公司，并像对两个印度公司投资一样，对该公司进行投资。那时做生意并不使人降低身份，失去体面，因为连豪门巨宅也仿效国王，在各家公司入股。他对

每吨出口货物津贴30法郎；对每吨进口货物津贴40法郎。所有在王国港口内造船的人每吨运载量可以得5利弗补助。从1663年到1672年，每年都要新建几个工场。从前需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细呢，现在在阿布维尔织造。国王除了发给工场主一笔可观的奖金外，还为每架开工织机预付2000利弗。1669年王国拥有毛纺织机达4.22万架之多。当时英国有一种精巧的织袜机，生产速度比针织快十倍。大家都知道法国政府后来怎样用钱把这个秘密买来。与此同时，他在创立科学院之后，于1661年立即开始修建天文台。就使用价值、规模大小、工程难易而论，最光辉的工程要算连接两个海洋的朗格多克运河了。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想从事一些更伟大、用途更广、但也更加艰巨的工作，即法律改革。首先颁布了民法，其次是水利森林法。然后几乎逐年颁布了各项制造工业的章程、刑事法、商法、海运法。甚至还创立了一种有利于我国殖民地的黑人的新法律。各个港口都成立了船舶修造指导机构，研究船舶具有何种式样最为合适。在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土伦、敦刻尔克和阿弗尔·德·格拉斯等地修建了五个海军兵工厂。这些海军也用来保护贸易。马提尼克、圣多米尼克和加拿大等殖民地以往萎谢衰落，现在则是一派繁荣景象，并得到过去一直没有期望过的好处。因为，从1635年到1665年，这些殖民地一直是法国的负担。1664年，国王派遣一批移民去卡宴。不久，又派另一批去马达加斯加。路易十四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弥补法国因忽视海洋而长期以来蒙受的损失和不幸。而此时，其他邻国都已经在地球的另一端建立了殖民地”。

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意义重大，但作用十分有限。农民占法国全部人口85%，国家财政始终捉襟见肘，这与没完没了的欧洲大陆争霸战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政治、经济体制。“根据1788年3月编制的预算——这是就制度下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预算，支出约6.29亿，收入约5.03亿，赤字达1.26亿，占20%。”乔治·勒菲弗尔指出，直到1789年，“法国当时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资本集中刚刚开始起步，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外，工人还有待培训，使之适应新产品的制造和新工艺的采用，因此必须调动和集中工人，以保证生产的同步进行。最后，运输问题尤为严重。国内几乎没有运河，陆路交通很少维修……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叶里和芒特，每年过往的船只仅有200艘和400艘……国内的税卡林立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主义。省际粮食交流才刚刚开始，各省几乎普遍种植葡萄。首都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输送不超过7.5万吨，南部地区更鞭长莫及。”

法国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是大革命之后的事情。法国革命“摧毁了古老的贵族特

权，不仅从社会方面，而且从经济方面沉重打击了教士，在农村，它解除了领主制的奴役网，在城市，它结束了一切形式的垄断，从行会体制到特许商业公司”。束缚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枷锁被打碎，为法国工商业，乃至欧洲大陆工商业的发展，打开了通道。

法国学者米涅撰写、182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说：“他（指拿破仑——笔者注）进入马德里，但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而是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半岛居民面前。他对他们说：‘我取消了异端裁判所，这是时代的要求，欧洲的要求。神甫的职责是指导信仰，而不应该对公民施以任何外在的、形体的裁判权。我取消封建权利，人人都可以开设面包房、磨坊、宿店，设置捕鱼网，自由经营工业。’教皇与法国的敌人保持联系，就剥夺教皇的财产；教皇以开除他的教籍相威胁，法军就进占了罗马；教皇用诏书恐吓他，拿破仑就在1809年把教皇从世俗国王的宝座上推下来，并且像押解犯人一样把他押送到萨沃纳。拿破仑通过它的体系的悲惨结局，却给了欧洲大陆以一个很大的推动，他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欧洲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的基础被彻底动摇。由于往来频繁，各国民族混杂起来；边界的河流上建起了桥梁，在阿尔卑斯、亚平宁、比利牛斯三大山区开辟了公路，使各个地域日趋接近。拿破仑使各个国家的物质方面发生了变化，就像法国革命使人们在精神方面起了变化一样。封锁政策补充了军事政府的推动力，由于封锁，大陆上的工业得到改进，从而取代了英国的工业；制造业生产代替了殖民地贸易。拿破仑就这样在扰乱各国人民的同时，促进了他们的文明。他对本国的专制统治，使他成为反革命者；而他的征服欧洲的思想却使他成为欧洲的革新者。好几个欧洲国家在他到达以前毫无生气，在他到达以后却生气勃勃。”

米涅所说无疑有热情洋溢的成分。事实上，工业发展依然是缓慢的。乔治·杜比说：工商业“在1835年至1845年间，其增长速度是农业活动的两倍。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与技术革命的关联不如英国那样密切。来自农村的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对新制造方法的研究不足。水力机阻碍了蒸汽机的使用，并且在冶金工业中依然占主导地位。”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对照英国热衷于工业革命，唯有一种解释：市场有限。

到拿破仑三世时代，情形大变，法国工业飞速发展时期。乔治·杜比说：“据统计，1847年法国工业界有4835台蒸汽机，共计61360马力。1870年法国工业界有27088台蒸汽机，达到了33.6万马力。在冶金业和纺织业，机械化和行业集中度的发展依旧

十分迅猛。在1847年，400多台高炉共产出59.1万吨生铁，及至1869年，不到300台高炉就产出了138.1万吨生铁。1862年，鲁贝－图尔宽的29家纱厂平均每家拥有9000个纺锤，到了1869年这个数字已成为1.8万。同样是在鲁贝，据统计，1863年有3900家纺织厂，到1869年则达到了1.2万家……在商业领域出现并增加了许多大商店……法国的现代银行网络不仅遍布巴黎，而且扩展到外省，这些网络曾经是各地极度缺乏的……1851年时，法国仅有3552公里的铁路，现在则达到了1.75万公里，它把全国的市场连接了起来……佃农的收益也超过了100%。”

注意上述增长数据时，乔治·杜比又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830年，法国的出口占国民经济的13%，到了1860年则达到了29%。至少我们的出口从1840年以来就得到迅速增长，自1850年以来增长更为迅猛。我们出口农产品，但主要还是制造业产品，工业品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1830年占国民经济的近7%，到1860年至少是翻番了。”

更应该注意到的是，法国的出口增长，是与不断地对外扩张相伴的。乔治·杜比说：仅仅拿破仑三世期间，“在被平定的阿尔及利亚，拿破仑三世宣称自己‘也是阿拉伯人的皇帝’……法国人还开始在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这可是圣西门的夙愿。法国人还开始插足远东，参与了让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行动。1859～1867年间又在交趾支那建立殖民地，1863年迫使附近的柬埔寨王国接受法国为他的保护国，最后一直推进到老挝”。

我们更不能忘了：自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的身边，无时不晃动着法国人的影子。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都有法国大兵参与；而且法国人还“孤军”对华开战，摧毁了马尾船厂，与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交战，将中国的广西、云南化作他们的势力范围。

随着法国殖民地的迅速扩大，敌对了数百年的英法两个超级大国，终于认识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坐在一起商谈起相互减免关税的商业协定来。后来更进一步，两国结成战略同盟，齐心协力对付后起的挑战者。20世纪，以德国为代表的愣头青们，两次起来造反，两次则被英法联手摁了下去。

中英自由贸易

欧洲的“商业国”，最害怕的就是做正经的自由贸易。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亚洲，倘若不是自己的殖民地，英国的工业品便基本上没有优势。正是征服印度之

后，英国产品才在印度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剑桥中国明代史》说，“1567年海上贸易的部分解禁，使东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一段暂时的大繁荣，当时纺织品、瓷器、漆器被大量运到日本的长崎销售，并运到马尼拉再转运至全世界。当时马尼拉召见厅长官安东尼奥·德·莫尔加详述了中国商人通过马尼拉进行丝绸和其他纺织品的国际贸易的情况……莫尔加在他的货单的最后列了一个杂货类，‘有多少纸张也写不尽这些珍奇物品’。他写的纸也来自中国。中国商人在这项贸易中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营市场上有需要的货物，而且因为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商品很快适应外国的规格，包括式样。在图样上迎合西班牙人的爱好，这使中国丝绸在进入17世纪之际，支配着世界的丝绸市场。与此相似的是，景德镇的瓷器制造者，特别在1620年御用订单减少后，就转而按照日本和欧洲的风格制造瓷器……景德镇的陶瓷工特别擅长迎合。他们独特的青釉底瓷器在17世纪欧洲市场上称为‘china’，此字也被用来称呼中国。”

在鸦片战争前夕，乃至战后20余年时间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英国始终处于劣势。

据杰克·戈德斯通研究，1800年前后，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与英国基本相当，比其他欧洲国家富裕，而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更高。中国的市场消费能力不成问题。

令英国人郁闷的是，他们拿不出让中国人产生购买欲望的东西。1795年，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绝非浮夸。《剑桥中国晚清史》说：“1760年以来，外国人通过广州参加中国贸易已经完全有了基础，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已达到了使欧洲的海上贸易和中国国内的内陆贸易进行接触的程度。的确，后者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往往超过欧洲的商品。中国从外国得到的是原棉、白银以及通常是销路不佳的毛织品，而输出的则是昂贵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1840年以前，这类贸易在中国国

内增长仍然无法统计。”“驻广州的英国散商多年来已经与正规商业沾上边，他们输入伦敦的打簧货、中东的没药、马德拉斯的檀香木、马来亚的戴帽，等等。他们的大宗商品已经是印度原棉……印度棉花曾经是港脚行号的主要靠山，但（1819年起）它不再能通南京棉花竞争，因为南京棉花不再是经过陆路，而是用帆船南运广东，从而减少了运费。甚至打簧货也卖不出去，因为广州人已经学会了仿制。”

美国是中国的另一个贸易伙伴。《剑桥中国晚清史》说：“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卡特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运来檀香木，到1830年这里也被砍伐殆尽。绕道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然后将鹰洋运到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两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

俄罗斯在新疆、蒙古高原与中国做生意。《剑桥中国晚清史》说：中国的“进口货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鸦片、吸烟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主要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格从200到500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绸缎、羽纱、棉布、棉纱、瓷器、基连、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

在对西方的贸易中，中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进口棉花等原材料，出口制成品。

欧洲纺织业向来落后。亚·沃尔夫说：“这种织机大约在公元4世纪传入欧洲，一直沿用到18世纪初”。杰克·戈德斯通说：“中国家庭纺织工人中的佼佼者能够生产出二至三倍与他们欧洲同行的工作量，因此就18世纪60年代发明于英国的水力机械而言，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提高。中国人尤其擅长生产优质纱线并将其织成轻软布料，因而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商人仍从中国购买大量优质棉布贩回欧洲售卖。”“甚至直到19世纪早期，英国还在为找不到可以用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货物而发愁，因为在那时中国人的眼中，欧洲制造的产品属于劣等品，没有什么价值。正因为如此，英国人鼓励印度种植一种具有成瘾性的毒品——鸦片，并强迫中国人接受鸦片贸易以平衡英国对华贸易赤字。”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在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2600万元”。仅就主要针对欧美的海上对外贸易一项，“嘉庆年间（1796～1821年），广州（海关）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000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21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2261000两）的1/3还多”。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减少，中国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1840年为52.4万英镑，1842年为96.9万英镑，1843年为145.6万英镑，1844年为230万英镑，1845年为239万英镑。由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基本无销路，1846年之后，送来的英国商品逐步减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到100万～170万英镑。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1864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直到1865年，中国才首次出现入超。从1876年起，便形成了一直入超的局面。而自此时起，一方面，因为战争和洋务运动，清政府持续大批采购西方的武器和机械设备；另一方面，英国对华鸦片倾销更为猖狂。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从1864年到1927年，中国进口货净值约201.89亿海关两，出口货净值约157亿海关两，入超约40多亿两。与进口增长相伴的，是鸦片进口的激增。1843年，进口鸦片36669箱，到了1859年增至62822箱。从1840年到1894年，进口鸦片380余万担，价值17.4亿海关两。鸦片始终是洋人的拳头产品，而英国的怡和、宝顺商行扮演了头号角色。《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到183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1820吨……乔纳森·斯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中国）吸烟人占总人口10%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合理数字，也许3%～5%的人烟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的人数是1500万。”

随着英帝国枪炮而诞生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仅使中国彻底失去了关税的自主权，连内地税自订权也丧失了，连中国海关的首长也变成了洋人——行政权一并到了英国人手中，甚至连鸦片贸易合法化也堂而皇之地被写进了条约。英国商人大展宏图的时代终于到来。英国“商人”到底是一幅怎样的嘴脸？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869年，由于种种原因，英国当局授权阿里国与中国签署一项较为平等的协议，“可是，英国的商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在香港和中国的，都对阿里国的外交政策抱藐视的态度，嘲笑他关于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资格享受文明国家权利和特权的国家’的思想。他们竭力反对协定中的各项条款，特别反对在香港派驻被认为是一名税务官和密探的中国领事”。

英国完全是建立在武力和暴政掠夺殖民地人民之上的，并非当初的工业技术水平多么了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变成工业国，就是依靠武力掠夺和贸易保护的结果。倘若是真正的自由竞争，英国早就破产，何来“工业革命”！

数字游戏与“商业文明”的启示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明代国家选择了既不限制也不鼓励的商业政策。”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明清两朝，也始终坚持“不与民争利”的政策，政府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

低税制，就是对工商业活动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朱元璋一上任，便诏令“田器等物不得征税”、“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这一富民、便民精神，明清两代均较好地执行。朱元璋、朱棣分别在南京和北京的交通便利处，专门建好“塌房”，以供商人转运货物。朱元璋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以货物价值的3%征税的税率，一直执行到清朝光绪年间。清朝同样重视商业，清世祖说：“榷关之设，国家借以通商，非以苦商。”清世宗说：“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从来关榷、盐税之设，所以通商裕国。”“困商实所以自困也。”

相比之下，杰克·戈德斯通说：“1789年，英国农业税收取了农业总产值的约7%。英国税收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在于英国收取非常高的商业税和消费税（主要是关税），这些大约收取了制造业和商业总收入的28%，并占据了皇家总税收的82%。”

一个国家拥有三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千万人口，在欧洲便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国了，而中国则是一个国土千万、人口数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国家。用当今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巨大的内需，就足以将工商业做得有声有色，造就无数富豪。事实上，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的工商业做得十分出色。《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明朝乡村的商业气息十分浓厚，“明代商业经济成长的可靠标志是市场（市、集）的成长”。明朝中后期，“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和金融业中心之一的苏州，在16世纪后期人口迅速增长，总数超过了50万，使它也许成为世界最大而且肯定是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清朝国内商贸渠道畅通无阻，内陆交通条件持续改善，商业一直繁荣兴旺。清朝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造纸业等十分发达。南京城有织机“三万余”，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家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景德镇繁荣依旧，云南年产铜1456万斤，陕西“处处皆有纸厂”。雇工千人的工场数不胜数，不少人富可敌国。晋商王廷荣设票号一次性投入本金银千万两，南钱庄、北票号汇通天下。《剑桥中国晚清史》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工商业和城市建设只字未提。事实上，清朝的中心城市，“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

口”，此外，“天下商贾聚”于广州、南京、杭州、扬州、天津等地。举目江南，不辨城乡。就城市化程度而言，鸦片战争时，中国胜过西欧总体水平。据杰克·戈德斯通研究，1500年的世界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印度的维查雅瓦达、开罗、杭州、伊朗的大不里士、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印度的高尔、巴黎、广州、南京，4个在中国，整个欧洲只有1个；1800年的世界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伦敦、广州、日本的东京、伊斯坦布尔、巴黎、那不勒斯、日本的大阪、日本的京都，中国3个，整个欧洲也是3个。而世界第一大城市，一直属于中国。

前面说过，鸦片战争前，中国百姓并不穷。杰克·戈德斯通说：“如果我们对衡量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些基础指标进行观测——如预期寿命或一个家庭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我们会发现1800年时的中国人和英国人是一样的，他们都远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如意大利和德国的人们。”不仅如此，清朝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通过举办“社学”，普及到了乡村一级。只要考上了县学，便可接受管吃管住的义务教育。这，远远领先于西方。

1793年英国马戛尔访华使团随员爱尼斯·安德逊撰写的《英使访华录》，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之一：“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在通州至北京的）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这条河（指大运河——笔者注）的河口是一个大市镇。一位高级官员的官邸就在这里，围在坚固的石墙之内。这是一座大厦，四周有按中国风格装饰点缀得很富丽的角楼。大厦面临港湾，广阔迷人的景色一望无际。现在是一个市镇接着一个市镇，风景之美无以复加，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指沿赣江经江西赴广州途中的‘南雄城’——笔者注）是一个相当大而有商业的地方。这些街道和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甚为狭窄，但路面铺砌得很好，打扫得洁净便于行走；房屋则主要是木屋，一般是二层楼，屋内外虽不甚雅丽，而几间店铺装饰油漆尚称可观。”他并不认为中国与英国有什么差距，除了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的数据，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观察，不能不发现一个悖谬的结果：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1725年为白银36106483两，1841年为38600750两，历经百余年，几乎没有增长！清朝有“永不加征”田赋的规矩，即使充分考虑明清两朝的低商税税率，也可以推论出：百余年来，工商业基本没有进步。

19世纪是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并全面进入工业领域的时代。杰克·戈德斯通说：“对于这个开始于1700年前后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共同之处在于革新的加速。”“在

整个19世纪早期，帽子、鞋子、手套、服装等的生产和农业的播种，都还是完全依靠手工业来完成的，照明也主要使用油灯和蜡烛，出行则基本依靠马拉车……而在此后的1850～1900年的这半个世纪中，蒸汽机、柴油机、电力和蒸汽涡轮合并在一起，形成了似乎无穷无尽的能源动力；廉价的钢、铁、铜和工业制砖使得大规模的新式建筑成为可能；绝大部分日用品的原材料也得以在工厂中用自动化的机器进行生产，取代了工匠店铺的手工制作。”

近代商业是近代工业的延伸。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工商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工商业从男耕女织的手工作坊和依附于农业的地位走出，使“重商”成为可能、趋势和必然；由钢铁构成的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硬度”和实力的数据。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是帆船、汽船组成的混合舰队。据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朝的GDP总量大于英国。这很可能是真实的。清朝人口基数大且增长快，当大清帝国依靠人口优势争取商业优势的时候，英国却依靠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大踏步前进。1750～1900年间，英国的棉纺织业的生产增长了700倍；煤炭产量增加了50多倍；生铁产量增加了300多倍；蒸汽机使用量增加了2000倍。如此增长率，大清帝国无论如何也是追不上的。

中国工商业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属于代次级别，即手工作坊与近代工业、茶叶生产与枪炮生产、国内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差别。看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当乔家经营茶叶转瞬富甲一方，为大清贡献GDP的时候，英法德美商人正在向中国推销舰船枪炮和生产舰船枪炮的母机。当清朝的GDP增长方式依然与300年前一样的时候，英国、法国、德国的GDP已经转向靠机器生产、生产机器来支撑了。当茶叶GDP与机器GDP相撞的时候，茶水就变成罂粟汁了。没有时代精神的科技内涵，这样的GDP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也会全面失败。从这个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仅仅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如果仅得出上述启示，是不能正确认识今天这个世界的。比如，今天，为什么国家商务部总在和西方国家吵架？宣称自由贸易的西方，为什么有不少东西我们拿着钱买不到？为什么西方热衷于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民主政治问题，而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危机熟视无睹？

的确，1864年之后，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是因为文的还是武的，反正中国在外贸上处于入超地位了，中国工商业的总体竞争优势消失了。那么，1864年之前呢？再往前看，单说纺织业，18世纪之前，中国的纺织技术和产品质量，均远高于西方，为

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呢?

我们还是回到经济学的思路上来。早在宋朝，中国就诞生了水力纺车，但是，明清两朝，即便是河流密布的南方，水力纺车也没有派上用场。中国纺织技术太成熟，家家户户都有先进的纺车织布机，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自然用不着任何先进的纺织技术。

中国纺织技术进步，是因为千年畅通的丝绸之路，是世界市场拉动了中国的纺织业。但是，明朝中期以后，环布中国周边的商道，先后被西方人掐断了。西方列强以武力霸占、垄断中国的传统市场：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荷兰霸占了印尼，葡萄牙在马六甲这一咽喉设关建卡、肆意抢劫，英法垄断了印度和印度支那，日本气得关上了对外贸易的大门。在国际市场日益萎缩的背景下，任何一种有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何用之有？需求不足，才是制约纺织技术发展和规模化生产的根本原因。

中国信奉与人为善、和平发展，中国人以德为先，做生意讲究买卖公平。在外贸超级发达的宋朝，政府便禁止商船和商人携带武器出海，明清两朝也恪守这一规矩。因此，当欧洲人侵入东南亚、南亚之后，中国商人吃了大亏。西班牙人生意做不过中国商人，便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大肆屠戮；荷兰人不断打劫中国商船；英法两国就更别提了。

中国的工商业输在明清两朝，不是输在工商业本身，而是输在“仗剑经商”。

显然，任何单纯的经济学理论都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因为，国际贸易是政治和军事的延伸。重复一下美国政治家洛奇的话：“商业跟随国旗。”

如此说来，中国政府的确不重商。按照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应该将凡是打得过的地方一律占领，无论你们制造的东西好不好，都必须停产，按照我开出的价格购买我的东西。

西方的商业文明，让东方人懂得了一个道理：出门经商，必须携带打狗棍；没有管用的打狗棍，千万别出门。

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到了19世纪
期，清王朝已渐趋腐朽，在世界资本
主义潮流的冲击面，中国的大门被英
国侵略的鸦片和大炮撞开了。

第6章

科技文明与「李约瑟难题」



希腊文化无需“复兴”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总有这样的故事：功夫平平甚至为零的张三李四，一不留神掉进某一山洞，看到刻在壁上的失传数百年的绝世武功图谱，依葫芦画瓢地练了几天后走出洞来，就成了威震天下的绝世高手。

关于西方“文艺复兴”的解读，其中一个版本便是如此神奇。西方人说，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并复兴了失传十几个世纪的古希腊文化，所以，西方的“武功”天下第一了。这个西天来的故事，到了“哈洋族”的嘴里，更是天花乱坠了。

可是，在欧洲，希腊文化从未失传，而且始终得到很好的传承。

丹皮尔说，罗马兴起后，“罗马在摧毁了希腊化的国家之后，才终于被迫代替它成为希腊文化的旗手”。

西罗马坍塌之后，拥有希腊半岛和曾经的希腊化王国的东罗马帝国，将希腊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希腊语晋升为官方语言，“公民”们说希腊语，读希腊书，写希腊字，后来连皇帝也是血统纯正的希腊人。帝国高度重视继承古希腊遗产，既有公立的“高等学府”，也有不少私塾，无一例外地在教授古希腊留下的知识。吉本说：“在西部君主国败落之后，皇权的威严便全部体现在君士坦丁堡的亲王们身上，在他们中查士丁尼是第一个。在60年的分离之后，他们重新获得古罗马的统治权，并借助通过征服得到的权力，使用了罗马人的皇帝的庄严头衔……而拉丁语逐渐被人遗忘也可从他的统治开始时算起……当东部政府使用拉丁文办理各种事务时，文学和哲学却都使用希腊文，而这一丰富和完美的语言的大师们也绝无可能去羡慕他们的罗马门徒的借来的学识和一味模仿的风格……我不打算在这里畅谈拜占庭的希腊人的各种作品，尽管他们通过他们对古人的辛勤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值得现代人纪念和感激。

现今的学者们仍可以受益于斯托贝乌斯的哲学漫谈，受益于苏伊达斯的语法和历史词典。策策斯的千年史，该书汇集了讲述600个故事的1.2行诗，以及塞萨罗尼卡的主都尤斯塔休斯对荷马的评论，这位作家从他的丰饶之角中倾倒出了400位作家的名字和权威。根据这些原著，这些众多的著述家和批评家的作品，我们也便大致可以估计出12世纪时已有的丰盛的图书宝库了。荷马和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的光辉，照亮了君士坦丁堡。”据说，流传至今的希腊圣贤的著作，其最初来源正是这个希腊帝国。

无疑，在欧洲，希腊文化始终是兴旺发达的。

很不幸，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希腊帝国既没有发酵出理性的哲学、人文的思想，也没有培育出拿得出手的几何、代数、天文、物理、医学成果。正如伏尔泰所说，希腊帝国的皇帝、贵族和政治家们“从古希腊学到的只是摇唇鼓舌，争论的只是宫廷琐事”，即便是历史著作，“他们写得并不好，只谈宗教信仰”。斯塔夫里阿诺斯不得不承认，尽管“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最不幸的是，倘若拿希腊帝国与邻居穆斯林地区进行横向对比，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个世纪，希腊帝国都黯然失色。

希腊帝国被穆斯林灭亡后，随着希腊贵族们逃难的细软——正版的“古希腊”的作品一股脑地涌入西欧，就此，希腊文化完整地被传播到了西欧人的圈子。从传承关系上看，西欧人无疑是希腊帝国正宗嫡传的弟子。西欧人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显然是对千年希腊帝国十分不友好的无视或蔑视——典型的欺师灭祖行为。

天上掉下个牛顿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西欧一搞文艺复兴，就出来了一个科学巨匠——牛顿。

难道有什么魔咒，使得希腊人的后裔不能将希腊文化发扬光大，只有翻译成拉丁文之后才能光芒四射？

这个世界当然没有什么魔咒。

科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天才们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牛顿的贡献，我们都知道。那么，牛顿做出如此贡献，必须具备怎样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基础呢？必须具备怎样的科学研究的设备条件呢？而据称是古希腊留下

来的相关成果又如何呢？反过来说就是，仅依靠至少是1500年前的科技成果，能否培育出牛顿？

姑且抛开物理学、天文学不谈，单说数学——开展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

亚·沃尔夫陈述了希腊人的数学成果：“希腊人已从根本上奠定了数学的基础，欧几里得更是极为完整地使之臻于系统化。阿基米德和阿波洛乌斯对数学科学尤其是圆锥曲线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接着，托勒密的《至大论》提出了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的纲要。”

这就是说，如果牛顿所能继承的数学成果仅仅是希腊人的东西，那么，也就基本局限于《几何原本》——当今的初中生的几何水平，而且是无代数学作支撑的几何。

然而，事实上，牛顿不仅代数学水平很高，能够将代数、几何融会贯通，而且直接玩起了微积分。

难道牛顿是神仙？如果谁相信阅读古希腊的“原子学说”后便能发明原子弹，那么，他可以坚持是《几何原本》让牛顿和莱布尼茨创造了微积分。

“文艺复兴”与阿拉伯学派

前面说过，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西欧的“全盘阿化”，全面学习、传播阿拉伯的科技文化的一个过程。由于阿拉伯人是异教徒，所以，人们搬出欧洲的古希腊来做幌子，仅此而已。

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由于日耳曼人的“疏忽”、懒惰和崇拜教皇，意大利成了最少遭受“蛮族”蹂躏的一块宝地，成了东罗马、教皇、日耳曼人三方都管又都不管的地带，而且意外地诞生了N个威尼斯之类的“城市共和国”。少数“城市共和国”因为无地可种，人们由打鱼卖盐，慢慢发展到经商为主。所谓经商，主要就是将从西欧抓来的奴隶，卖到阿拉伯世界或者拜占庭等地，换来“奢侈品”在西欧倒卖。无论繁荣发达的穆斯林西班牙，还是地中海南面的北非，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与意大利咫尺之隔的西西里，原本就是阿拉伯人的地盘。为了与穆斯林做生意，他们进出穆斯林地区，自然也会有穆斯林到这里来居留。为了便于与穆斯林交流，这里很早便诞生了世俗学校。

十字军东征大大推进了向穆斯林学习的进程。阿拉伯地区的繁荣富庶，彻底摧毁了基督徒的自信心；阿拉伯地区先进的科技文化，更是让基督徒心服口服。汤普逊调侃道：“甚至教会也受到影响：欧洲人对它的尊敬已经丧失，而对它的畏惧也开始下

降……教廷一向是十字军最热心的提倡者，而现在亲眼看到他所提倡的运动，反过来竟然打到自己头上了。”**西欧进入全面学习、引进、消化阿拉伯人科学技术的时代。从饮食服饰到行为礼仪，从卫生习惯到居住环境，从文学艺术到哲学科技，他们无不虚心学习，以至今天大量的科技词汇的源头就是阿拉伯语。**

最典型的是西班牙。他们完全占有了穆斯林留下的一切，大量翻译阿拉伯文献，全面接受了穆斯林的衣食住行方式。但是，他们将穆斯林的遗产当做取之不尽的金山，只知索取，不肯做任何创造，甚至连维护也懒得做，甚至以上帝的名义屠杀、排斥异教徒。

认钱不认人的意大利商人的眼界要开阔得多，痴迷宗教的也少得多。学习、消化阿拉伯学问的中心，非意大利莫属了。丹皮尔说，直到西班牙被基督徒占领之后很久，在翻译阿拉伯文献方面，“在重要性上次于西班牙的是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在这些地方，有不少著作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这是因为这些地方与君士坦丁堡有外交和商务关系，而且居住有一些阿拉伯人和希腊人”。这里最早出现世俗学校，就不足为怪了。

汤普逊认为，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只有城市的人在城里居住，武士与贵妇们则住在他们的庄园上，以便管理他们的闭关自守的领地；但是在意大利，上层阶级却在城里拥有住宅，大部时间在城里度过的……在意大利北部，有闲的智识阶级的城居生活，却为文艺复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任何创新。丹皮尔说得好，“文艺复兴绝不限于文学。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智识发酵，虽然文学是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自然不能用伊斯兰教义来推动。欧洲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世界，直到17世纪，布鲁诺被教会烧死之类的事情还在频繁发生。人们思前想后，请出了基督教世界的“古希腊”学说。

随着与阿拉伯人的交流，在世界流行数百年的造纸术、印刷术进入了欧洲。丹皮尔说：“大约在1世纪末，中国已经发明了纸，据说这是蔡伦的功绩，而木版印刷出现在8世纪。造纸的技术随着后期十字军输入欧洲，约100年后，活字版的发明使旧式模板印刷变成了实际而有用的技术，因而代替了在羊皮纸上抄写的笨拙方法，使书籍得以广泛流传。”乔治·杜比说：“印刷术也传入法国，1470年，索邦大学成为巴黎

的第一个印刷术的受惠者，里昂也设有印刷所。”羊皮纸退出历史舞台，书籍大量出版，大大加速了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

教会学校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引进可以容忍的“阿拉伯学问”。起初是医学，丹皮尔说：“救治病人是基督教的义务，而医学也就成了复兴最早的一门学科。寺院医学起初是巫术，里面稍微混杂一点儿古代的科学。”接着，根据研究神学的需要，引进了数学和天文学。尽管开的只是一道门缝，但也让西欧多了一线曙光。

这个学习过程是漫长的。丹皮尔说：

“1180年左右，在赫尔福德的罗吉尔的领导下，出现了一个阿拉伯学术中心”。

“1209年，巴黎的大主教管区会议禁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来又再一次禁止。但是1225年，巴黎大学就正式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列到必读书籍的目录里去。”

“13世纪既出现了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的成功的、受人称赞的工作，也出现了罗吉尔·培根的悲惨的一生……大概直到1292年尼古拉斯死后，培根才获得释放。”

“13世纪以后，西欧的学术发展有一段停顿时期。黑死病逾百年战争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安定的生活与平静的研究都不可能……”

“这时阿拉伯语已被公认为是研究学术的经典语言，所以凡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东西都是权威的，正如早期（和后来）的希腊语著作一样……由阿拉伯语到拉丁语的翻译工作，在西班牙最为活跃。这里自1125年到1280年有一系列的翻译家针对许多题目孜孜不倦地工作着。”“那时候科学文献的通用语言是阿拉伯语，从阿拉伯语译出的书籍，即使作者是希腊人，也见重于当时。当时说阿拉伯话的民族以及杂居其间的犹太人对于科学感到真正的兴趣。中世纪欧洲正是同伊斯兰教国家接触，才从早期的观点，过渡到一个比较富于理性主义的心理习惯。”

拜师学艺

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十分发达。《新全球史》说：“到10世纪，被称作马德拉萨斯（madrasas）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出现，而到12世纪，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主要城市中，它们已经是必要的机构了。穆斯林统治者对这些教育机构提供资助，以求将有文化、学识、受过伊斯兰神学和律法教育的学生招募到行政管理的职位上来。廉价的纸张提高了学者教诲学生的能力。”

穆斯林世界紧邻中国和印度两大科技强国。安田朴指出：“代数对于中国人则

具有把希腊人吸引向几何的那样诱惑力。大家甚至还坚持认为（这也并非没有可能性），由阿拉伯人在西方传授的著名代数学（阿拉伯文作aldjabr），事实上最早是由汉代的中国数学家们通过印度斯基泰世界而传给他们的。这其中翔实可靠的内容是阿拉伯文的《代数书》（Kitab aldjabr），它是自一种印度斯基泰语译来的，写于当时与中国保持着持续关系的东伊朗地区，这部名著主要是传授了‘契丹的代数学’。”

这一时期传入欧洲的还有中国人熟悉的算盘。丹皮尔说，10世纪末、11世纪初，曾经走南闯北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将算盘、星盘和阿拉伯数字一并介绍到西欧。遗憾的是，由于学艺不精、无力创新，西欧人的“算盘主要用来做加法和减法，但在中国和日本也巧妙地用来计算较复杂的乘法和除法以及开平方和开立方”。亚·沃尔夫在《15、17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说：“15世纪时，这种行式算盘在欧洲商业上广泛应用。在16世纪，德国及其邻国仍然通行用算盘算账。到了17世纪，算盘的应用为从意大利传来的笔算法所取代。”所幸的是，此时，欧洲会造纸了，有的是用纸张进行笔算。

《新全球史》说：“印度的数学、科学和医学吸引了在印度北部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的注意。印度笈多王朝时期深奥的数学传统，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处于记账和运算的目的，对穆斯林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穆斯林很快采用了他们的‘印度’数字，而后来的欧洲人则因为是通过阿拉伯穆斯林学到的这种数字，而称之为阿拉伯数字。印度数字使穆斯林学者发展了令人瞩目的高等数学，在代数、三角学和几何学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印度学者能进行精确的天文计算，促进了穆斯林天文学的发展。同样，印度医学因为能治疗疑难杂症和解毒药的使用而吸引了穆斯林。”

戈德斯通说：“在前近代科学传统中，1000年前后的伊斯兰世界是最为先进而且最有可能引进现代实验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地中海的穆斯林世界变得十分普遍，仅巴格达就拥有36个主要的公共图书馆，在每个重要的市场里，书商们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一个现存的当时书店的记录中，列出了它曾拥有的60000种书籍，涵盖了宗教、法律、数学、科学、天文学、药学、古希腊名著、印度文学、诗歌、寓言和游记等等。”

吉本说得更加简单明了：“如果我们把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的拉丁人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在其相应的知识、工业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加以比较，那么我们的粗野的祖先，便必须满足于居于三等民族的地位。”话糙，但理不糙，谁也不要生气。

欧洲的贵族们变成了彻底的“阿拉伯奴”，或者“哈阿族”。“十字军的第二代说阿拉伯语，像他们说本国语一样地流利；他们穿着东方服装，他们模仿东方人的礼节。”**阿拉伯世界的科技文化知识，开始进入那些走出了城堡的欧洲人的视野，最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丹皮尔说：

造纸术。“造纸的技术随着后期十字军输入欧洲，（在8世纪的）约100年后活字版的发明就是旧式模板印刷变成了实际而有用的技术，因而代替了在羊皮纸上抄写的笨拙办法，使书籍得以广泛流传。”

哲学。“正统的穆斯林经院哲学及其理性的哲理神学，主要是在巴格达活动的波斯人阿尔-加扎利创立的。同样的见解也流行于西班牙，但西班牙—阿拉伯思想学派的真正名声应归功于1126年出生于科多瓦的阿威罗伊的工作……到了13世纪，阿威罗伊就成了意大利南部、巴黎、牛津等大学公认的权威。”

化学。“说阿拉伯话的民族研究炼金术有700年历史，他们的工作中心先在伊拉克，后在西班牙。在他们手里，炼金术发展成为化学，又在他们那里发展成为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化学，主要是经过西班牙的摩尔人。”

医学。“佩斯东海湾那不勒斯南面萨勒诺（Salerno）城的学校是最早的非宗教的新学术发源地……他们的学校一直兴盛到12世纪才由普及于欧洲的阿拉伯医学所替代。”“有一位医学家和哲学家名叫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980～1037年）……他的《医典》或《医学纲要》是古代和穆斯林全部知识的总汇，是阿拉伯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后来这部书成了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直到1650年，卢万与蒙特佩里耶的学校还在用它，而且据说至今仍是穆斯林国家的主要医学典籍。”

物理学。“最杰出的穆斯林物理学家是伊本-阿尔-黑森。他在埃及阿尔-哈金统治下工作过。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光学方面，在实验方法上有很大的改进。他使用球面和抛物面反光镜，并研究了球面像差、透镜的放大率与大气的折射。他丰富了有关眼球和视觉过程的知识，并用有力的数学方法解决了几何光学的问题。他的著作的拉丁语译本，通过罗吉尔·培根和开普勒，对于西方科学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

天文学。“默罕默德·阿尔-巴塔尼（约850年）在安提沃奇天文台重新计算了春秋二分点的岁差，并制成一套新的天文表。他的工作由不像他那样有名的学者继续下去。在1000年左右，三角学有了进步。伊本·容尼斯或尤纳斯在开罗进行日月食观测，并加以记录。他可算是最大的穆斯林天文学家。他的工作得到埃及国王阿尔-哈

金的鼓励。阿尔-哈金还在开罗设立学院……他（指阿尔-比路尼——笔者注）是哲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生于973至1048年间。他进行过大地测量，他所测定的经纬度达到了相当的准确程度。”

荒唐野蛮的十字军东征，使生活在低矮阴冷的城堡中的欧洲贵族，第一次开眼看世界。在持续200年的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之中，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生活，于是抛弃城堡走进城市；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高雅、文明，于是抛弃了野蛮武夫的恶习；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文化知识，开始读书办学；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科学技术，于是开始理性地思考这个世界。

再说牛顿

杰克·戈德斯通说：“很多过去被当做是欧洲数学家在16、17、18世纪中得出的了不起的新概念，今天都被发现其实是阿拉伯、伊斯兰数学家在差不多4个世纪以前的想法。现代数学研究的风格，在很多方面也都更接近于阿拉伯、伊斯兰数学成果，而不是古希腊。”

亚·沃尔夫说，在希腊人之后，“更晚些时候，主要借助于印度和阿拉伯，出现了通用的数系和代数学的雏形”。他进一步说明道：“12世纪，希腊—阿拉伯的数学学问开始明显渗入西方基督教世界。它的主要方式，是由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学者翻译例如西班牙的摩尔人学校中流行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大约在1120年由英国修道士巴斯的阿德尔哈德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不久就成了中世纪大学的标准教本。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阿拉伯数系日渐引入西欧。所谓阿拉伯数系就是由九个数和零的符号所构成。这个系统开始时缓慢扎根，但到14世纪末，至少对科学研究来说，它已牢固地确立起来。在13世纪里，几部拉丁文著作阐释了如此从阿拉伯引进的数学知识。同时还做了独创性的发展。他们为欧洲的代数学方面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最早的是比萨的列奥纳多的《算经》（1202年），这个意大利人博览群书，云游四方。列奥纳多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从阿拉伯权威典籍那里引入的方法（他用了大量例子说明这些方法），解出了一次和二次方程，并且还求出了初等级数的和……14和15世纪里，数学的进步微乎其微……三角学是数学在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手里得到实质性发展的不多几个分支之一。在编制对应于一个给定半径的圆周上各个角的弦表时，他们已经用等于近代的正弦的倍数之半弦，代替亚历山大里亚的简单弦。他们还原则上引进了余弦和正切。雷吉奥蒙达努斯

系统地总结了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在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方面的先驱工作。”

其实，阿拉伯人早就玩起了高等数学。在阿拉伯学者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人的不断努力，才为牛顿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数学基础。

牛顿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光学家。哥白尼“使欧洲天文学发生革命的那些思想，同这些亚历山大里亚人大相径庭”，大惑不解的人们找出阿拉伯人的天文学著作一对照，发现哥白尼的书竟然是原文原图照抄照搬。这就难怪了：牛顿出生前不久的1582年，欧洲仍普遍使用1500年前恺撒颁行的儒略历，累积误差已多达10天；而牛顿的祖国英格兰，直到1752年——牛顿去世20多年后，才予以纠正！英格兰天文学发达吗？不好说。倘若和古希腊时代或者托勒密时代一样，牛顿们完全靠两只眼睛搞“天文研究”，那可不行。亚·沃尔夫说：“近代光学史可以认为是从17世纪初开普勒的基础研究，也就是从折射定律的精确表述开始的。”但是，开普勒的光学知识也并非从天而降，“最伟大的中世纪光学家是阿拉伯人伊本·海泰姆或者叫阿尔哈曾（11世纪），他的书在17世纪以前一直被奉为权威典籍。他教导说，光从一个物体的每一点呈球性传播出去；他还用实验测定了折射率，从而发现，托勒密的粗糙的折射定律仅对小的角度有效。阿尔哈曾研究过许多特殊的折射和反射情形，注意到光线具有在倒回时顺原来路径折返的性质”。

毕竟，到了17世纪中晚期，巴黎和伦敦才诞生天文台。

当代学者托马斯·索厄尔指出：“有许多已成为西方文明的文化部分的东西源于那个文明之外，常常是源于中东和亚洲。比如说国际象棋的游戏来自印度，火药来自中国，各种数学概念来自伊斯兰世界。公元8世纪穆斯林征服西班牙，让西班牙变成了把地中海世界和东方关于天文学、医学、光学、几何学的更先进的知识传入西欧的传播中心。西欧后来在科技方面所达到的世界领先地位，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然后欧洲文明的科技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传播到美国或澳大利亚这样的欧洲分支社会，也传到了各种非欧洲的文化中，日本也许就是其中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牛顿等人确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至少，“第一个肩膀”就是从阿拉伯地区传来的学问。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文艺

文艺复兴与大航海的起始时间差不多，此时的亚平宁半岛，经济繁荣，城市化、商业化程度高，是欧洲最为富庶的地方；这里的教育也甚为发达。因此，这里拥有一

群有知识的有钱有闲者。文艺复兴，就是这个圈子里的游戏。正如司汤达所说：“在1585年前后，除去宫廷豢养的弄臣或者诗人，就没有人想到用语言讨人喜欢。”我们可以将文艺复兴说得很热闹，这一时期也确实诞生了许多“文艺”作品，但是，对欧洲科技进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乔治·杜比指出：“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包括法国）在技术领域有过一场革命的话，那肯定是夸张的。”

罗曼·罗兰写道：“‘我为教皇服役，’米开朗琪罗后来说，‘完全是不得已。’”无论我们如何夸耀古希腊学说多么理性、多么人文，文艺复兴，无论是否“复兴人文主义”，无论是否将“人文主义”精神传遍欧洲，客观的事实是，神学依然绝对主宰着欧洲人的大脑。丹皮尔指出：“我们不要忘记，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用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相互敌对的观点，是后来才有的……一般说来，一切学者都接受了有神论的根本假定，这并不是因为护教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个假定是普遍接受的资料，任何宇宙学说都必须同它相符合。”牛顿也匍匐于上帝的脚下——并没有谁强迫他，他研究地球之外的东西，完全是为了证实上帝创造了“最美丽的太阳、恒星和彗星系统”，当发现其中不合规律之处时，他便恳请上帝出来干涉与修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牛顿，与其说他是科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企图用科学来解读《圣经》的神学家。我们在肯定牛顿伟大的同时，更应该发出感叹：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他该会有多大的成就！

在西方稍微有点历史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无不是教会的遗产，而教会创办学校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培养神学人才，毫无世俗目的。16世纪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仅设立了神学、希伯来语、希腊语、民法和医学等五个“钦定教授”席位。在谈及16、17世纪英国的大学教育时，罗伯特·金·默顿说：“在16世纪中期，重点肯定是放在各人文学科上。哈维时代剑桥大学的医学课，主要讲授逻辑和神学而不是医理。设置在新成立的格雷沙姆学院的数学和天文学课程，肯定是出于‘航海的实践需要’。自此之后，在设置各种科学教习方面逐渐出现了一种明确的倾向。例如，17世纪开始时，剑桥大学的占主导地位的课程无疑是经典、修辞学和神学。数学遭到轻蔑，而各门科学实际上被忽视不置。大约直到这个世纪中期，数学研究在作为一种学术势力方面才取得了某些知名度。”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开设了“医学”课，而英国的卫生状况无法让人恭维。亚·沃尔夫说：“16、17世纪里，医学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虽然它们的价值竟主要

维系于当时医学之落后……无怪乎人们辛辣地讽刺这些开业医生，例如下面这段韵文就是嘲笑18世纪一个声名卓著的伦敦医生约翰·科克利·莱特索姆的：当病人来看病时，我让他们服药，放血、出汗；如果之后他们希望死去，哎哟，那自然 ！我是莱特索姆。”据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一书记载：“对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忽略，意味着不洁的食物和水是一恒在的危险。个人卫生标准在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与最低层同样不好。1665年，查理二世的朝臣逃离伦敦大鼠疫，到牛津大学避难。他们直到第二年初才返回伦敦，离开时在每个角落——烟囱、书房、煤房、地窖——留下粪便。同年，塞缪尔·配皮斯某晚投宿于一处陌生人家，发现侍女忘记提供室内夜壶，这时他并未点蜡烛到厕所去，而只将粪便拉到火炉里——还拉了两次……在18世纪的市镇，市里的沟渠（经常充满死水）通常用作厕所；屠夫在店里屠宰动物，将尸体不能吃的部分扔到街上；死兽在街上兀自腐坏、溃烂；粪坑被挖在近水井的地方，因此不免污染水源的供应。另外，教堂下方埋骨所里的富人其腐坏尸身发出令人难受的气味；都市墓地随着人口增加而变得过度拥挤，众多的腐烂尸身开始污染附近的空气。18世纪初期伦敦的一个特殊问题是‘穷人的洞坑’，大、深、开阔的洞坑里，穷人的尸体被一行行、一排排地堆在里面。唯当洞口堆满尸体后才被土覆盖……1742年，约翰逊博士将伦敦描写成‘堆满一堆堆脏东西、连野蛮人看了都要瞠目结舌’的城市。有众多证据显示，确实有相当大量的人粪‘在晚上被丢到街上，当时居民都关紧门户’。人粪然后又被堆积在附近的公路和沟渠，以致进出伦敦城的人‘都被迫停止呼吸，以避免吸入粪便所引起的恶臭’。”劳伦斯·斯通指出，正因为如此，导致英国各种传染病不断。众所周知，著名的法国香水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而诞生的原因就是法国到处臭气熏天，人们甚至拒绝洗澡。

大学教育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倾向。在分析英国人的职业兴趣时，罗伯特·金·默顿指出：“在这个世纪（17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诸学科比科学更受人尊崇。文学是一个人可以为之完全献身的一项职业，而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人可以偶尔搞搞的业余爱好。数学还没有被认为是‘自由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无趣味的是，约翰·厄尔的《社会缩影》（Microcosmographie，1628）描述了54种‘人物’和‘类型’，但却没有包括一个科学家。威廉·罗宾逊在写给奥特列的信中，议论说科学肯定受到轻蔑，不受到尊重。沃利斯1635年在伊马努尔学院，他注意到‘数学几乎不被当做学术研究’，而鲜有学生学习一门如此不重要的学科。”

崛起的英国如此，欧洲大陆也无一例外。乔治·杜比说，在路易十四时代，“除

了某些孤立的异端地区，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已受到天主教会教育的洗礼。教区招募学校教师时必须征求教区神甫的意见和许可”。亚·沃尔夫说，欧洲人正在冲向前所未知的新的世界进行探险，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释和探讨，“大学可望带头，或者至少参与这个理智解放运动。但是它们根本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们受教会控制。哲学仅仅是神学的侍婢，而大学则是教会的灰姑娘。事实上，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是，绝大多数现代思想先驱都完全脱离了大学，或者只同大学保持着松弛的联系”。

亚·沃尔夫承认：“文艺复兴通过与自然主义的异教徒相接触，而向基督教世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凉风。但是，它更关心的是书本知识，而不是对自然的第一手研究。而且在大学里，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证明不利于科学研究。”

宗教改革的价值

前面说过，罗马教廷为了敛财不择手段，为了地位和利益与各国大打出手。姑且不说教廷内部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风流淫乱之类的丑闻，也不说教皇们的私生活以及为自家亲属谋取种种暴利，单说它对欧洲百姓的控制，已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庇护五世1566年上任后，颁布自创的法律：没有得到病人重新忏悔的证明书，医生对他的诊治不得超过三天；穷人初次犯过，手绑在背后，在教堂门前罚站一天；二次犯过，鞭打游街；三次犯过，舌头穿洞，罚海外划船……

当时，到社会第一等级的教会任职，是欧洲社会最好的职业。平民人家的孩子如果能够进入教会，而且混得不错的话，就可以彻底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地位。靠有权有地位的舅舅的帮助，哥白尼便在教会谋得了一个不错的差事；在情妇“妈妈”的精心运作下，卢梭差点在大贵族们的帮助下获得令人眼热的神职。贵族人家，只要有两三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安排一个“出家”，一方面光耀门楣、获取权势，另一方面减小瓜分家产的分母。

和中国的出家人粗茶淡饭枯守青灯不同，欧洲的贵族和尚尼姑并不清心寡欲，依然过着贵族日子。司汤达在《意大利遗事》中说，16世纪晚期，高级贵族们的“女圣·你帕拉塔修道院当时有43位女修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贵族使女：她们是从贫穷贵族中找来的年轻女孩子，第二批用饭，每月从修道院的财务手里领一个埃居做零用……女圣·你帕拉塔修道院的高级贵族小姐，可以有五个丫鬟”。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教廷的子民开始起来造反了。饶有趣味的是，1517年，马丁·路德一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大字报，便天下响应，出现了抗议派，

也就是新教。16世纪中期，德国半数人口成为新教徒。1560年，英国正式告别罗马教廷。到16世纪末，路德派、加尔文派、英国国教已是兵强马壮，足以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了。

对于异端，罗马教廷是十分残忍的，而宗教改革者们也绝无宽容之心。席勒指出：“也从未证实有一种无限制的公道手段对待天主教的，福音新教在其掌权之地也是压制天主教的。加尔文教徒自然同样缺乏改善意义上的宽容，他们从未约束过自己。”正因为如此，才在德国大地上爆发了长达30年之久的宗教战争（1618～1648年），消灭了1/3的德国人口。

罗马教廷烧死了热忱的泛神论者布鲁诺，亚·沃尔夫说：“至于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至少也像天主教一样容不得异端。”“加尔文对于自由思想的迫害并不亚于罗马的宗教法庭。”丹皮尔感叹道：“幸而他没有中世纪教会的权力做后盾。”

无论如何，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绝对控股的局面，教派的分裂与争吵，为自由思想打开了一道门缝。阿拉伯世界的思想与学术，欧洲人从海外带回的各种信息，循着这道门缝不断涌入。而欧洲国家之间的敌对与战争需要，让各国的门开得越来越大。

宗教改革的直接意义，就是激活了死水一潭的欧洲，促成了人员的大流动。

有许多法国人背井离乡，乔治·杜比说，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之后，“大约有30万新教徒成功地离开了法国。他们中间有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有家中的幼子、商人、农民以及一批真正的技术精英和企业主，他们移居日内瓦、荷兰和柏林——向所有的避难所迁移，这些地方变成了敌视法国和它的国王的中心”。

也有很多英国人逃离故土，基佐说，对于那些不信奉国教的英国人，“官吏们到处追捕他们，迫害他们……这使许多受迫害的人只好离开英格兰，他们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并在那里依照他们的信仰创立教会。专制独裁者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法国、荷兰、日耳曼等国的工匠到英国来操练他们的工艺，并曾取得执照，担保他们可以自由信奉他们原来的本国宗教，但现在却取消了他们的执照，有许多人就离开了英格兰，单是诺里奇教区就失去了3000名这样的勤奋的外国工匠。”

当然，还有很多人被赶下海，有的躲到北美，有的逃到南非。

互动，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有效的手段。亚·沃尔夫说：“在近代最初的科学史上，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一样，英国和荷兰在科学领域里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的经验学会了采取宽容的态度；两国都与天主教进行斗争；它

们的政府更倾向于对那些探求自然知识的人采取一定程度的容忍态度，给予相当的自由。荷兰实际上变成了许多学识渊博的法国人的避难所，这些法国人在祖国感到不安全，因为那里的天主教对大学控制得相当严密。”罗伯特·金·默顿说，在英国，“大致地说，在1600年前后两个半世纪中，上层阶级送儿子到国外留学作为他们教育的一部分，这种实践相继地从试验变成习惯，最后变成一种制度。到17世纪中叶，这种制度彻底的建立起来，而‘大旅行’成了雇佣作家的一个主题”。

罗伯特·金·默顿提供的一组数据，多少可以证明宗教改革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他说，英国“每10位科学家中有7位肯定是英格兰或苏格兰圣公会教徒，另外3位要么没有宗教信仰，要么信奉其他新教派别。很难找到罗马天主教徒”。在欧洲大陆，“在1666～1883年建的欧洲（法国除外），尽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人数分别为10700万和6800万，但在被命名为巴黎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的科学家名单上，却只有18位天主教徒，而新教徒则占了80名”。在整个欧洲，“尽管天主教徒的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多，但在著名的科学家中，新教徒实际上多于天主教徒”。

战争与掠夺：技术进步的催化剂

军事需求，是推动相关科技进步的良药。在中国历史上，战乱不已的春秋战国、辽宋金元，军事装备技术的发展，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没有一战、二战，也许人类至今还不知道核能，还没有进入太空。

当中国进入江山一统、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明朝的时候，西欧正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战之中，从穆斯林那里传来的任何有助于军事争霸的技术，都被迅速投入使用，并得以不断改进。

法国和西班牙是欧洲战场的两大主角。乔治·杜比说：1448年，法国“在重组军队的同时，查理（七世）还建立了常设炮兵。大型臼炮和小口径轻型长炮分布在24处‘基地’中。大炮几乎完全用于攻击和防御堡垒据点，但在最后几次战役中，开始出现在野战战场上”。此后的法国和西班牙两军相逢，一般都要炮轰两小时之后，骑步兵再冲锋搏杀。1515年，“法军在马里尼昂曾取得过大捷，这场‘巨人之战’的胜利，特别得益于王家炮兵的300门大炮的威力；但是10年后的帕维亚战役却是一场灾难：西班牙的火绳枪部队——当时的一种新型军队——摧毁了弗朗索瓦一世疯狂冲锋的骑兵”。

“伴随着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出现了许多军事技术上的变革。火器——毛瑟枪

和大炮——对刀剑的优势，在这个时期（17世纪）初次变得明显了，”罗伯特·金·默顿指出，“自从14世纪初以来，大炮和‘火罐’已在战争中使用，但直到三个世纪以后它们才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

到了17世纪，英国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晋升为欧洲强国之一。罗伯特·金·默顿说：“1632年，海军军火库中拥有81门铜炮和147门铁炮……在1683年，差不多有8396门大炮装备在英格兰战舰上，大致带有350000至400000发炮弹……这些需要或许不仅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为兵器提供原料的炼铜、炼锡和炼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改进铸造技术的一个巨大刺激’。不仅如此，增进了大炮的效能，就能迫使人们改进防御技术，这又进一步提出了吸引工程师与科学家注意的技术问题。”现实的军事技术的需求，无疑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罗伯特·金·默顿列举了17世纪英国学者们在武器装备方面研究的内容，包括射弹的轨道和速度、铸造和改进武器的工艺过程、枪膛长度和子弹射程的关系、反冲现象和火药实验等。

尽管欧洲军事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没有明显的优势，欧洲最牛的哈布斯堡王朝常被土耳其折腾得神经错乱，它手下的诸侯动不动就投靠土耳其。17世纪下半叶，即清朝初年，伏尔泰是这样描述这个时代的：“当时欧洲对土耳其人十分惧怕。土耳其人同时向德意志皇帝和威尼斯进攻……土耳其人在这次包围康迪之役中，显得优于基督徒，甚至在通晓军事技术方面也是如此。现在还能在欧洲见到口径最大的炮，是在土耳其阵营内铸造的。”

对于海盗而言，抓上一把刀就敢去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欧洲海盗之所以能够在太平洋、印度洋横行无忌，除了因为他们手上握有刀枪，船上装满大炮，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道德底线。**

“大航海”给西方带来无穷的财富，欧洲诸侯之间的争霸战的军事需求，直接刺激了政府关心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冒险家大发横财，让科技人员产生了更多的欲望。

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1666年，法国科学院成立；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

英国皇家学会也好，巴黎科学院也罢，起初只是少数有钱有闲有知识的人定期聚会，探讨学问交流心得的地方。由于他们的学识和成果引起了官方注意，在相关人员的运作下，才从民间走上了官方认可的舞台，并获得了国王的特许和资助。不过，这里有很多禁忌，比如宗教问题。

只要我们了解了欧洲“特许权”的内涵，就不会夸大这些机构的作用和能力。在英国，皇家学会聚会的地点曾被占做兵营。今天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确实很牛，而弗拉姆斯提德奉命到这里上班时，政府只管发工资而不提供科研经费，这里只有一名“除了领工资什么也不懂”的助手，于是他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来添置一点基本的观测仪器。在法国，创办巴黎科学院的首相科尔佩尔死后，督导卢瓦对科学活动嗤之以鼻，科学院的活动一度停顿。卢梭是一名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在《忏悔录》说，在场面上的朋友们的帮助下，“1742年8月22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里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当然，卢梭遇上的也许是另一帮人。

这些机构的建立，最大的意义是科学研究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英国皇家学会获得了解剖被处决的罪犯的尸体的特权，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可以享受国王付给的津贴。亚·沃尔夫说：英国皇家学会“这个年轻学会对发展科学的真正意义，与其说它对科学知识积累作出了共同贡献，还不如说它对它所积聚的那些杰出人物产生了激奋性的影响”。

科研工作本身依然以民间的、个人的活动为主。罗伯特·金·默顿说，在17世纪，航海的需要，“使数学和天文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由耐普尔发明，并由亨利·布里格斯、艾德里·安伏拉克、埃德蒙·冈特和亨利·葛利布兰德所发展的对数，不仅为天文学家，而且为航海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第一位皇家天文官弗拉姆斯蒂德认为，正是改进航海方面的兴趣，直接导致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建立……正值迪顿为一种在海上确定精度的精确方法申请奖励之时，牛顿清楚地列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步骤，以及由此引出的科学问题……另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是对指南针以及整个磁学的研究，这好似因为这种研究可能具有实际用途……结果哈雷绘制出了第一张等磁偏线地图……另一个在航海上相当重要的实际问题，就是确定潮汐的时间……航海事业另一个引起人们极大注意的问题是森林资源的枯竭，这导致使用尚未成材的木材来建造船只……（英国）皇家学会将‘繁殖树木’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之一”。

但是，这些均属“技术”，而非“科学”。亚·沃尔夫解释说：“农业、建筑、

矿业、玻璃与陶瓷制造以及纺织工业等重要技术，在18世纪末以前，从科学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如果说有的话。有时实际上倒是科学向已有的技术学习，而不是科学交给技术方法什么东西……早期的科学院全都致力于实用的发明。巴黎科学院实际上发表了二十卷关于适用技术的集子，详尽论述了所有有关问题，并附有插图。”

启蒙运动：让欧洲穿越时空

牛顿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服务上帝，而非有任何世俗目的。但责任不在牛顿，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精英们的沙龙，就将宗教和政治列为不可触及的红线，所有人的所有智慧，都必须在宗教和政治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倘若再诞生一个牛顿，他依然必须“带着枷锁跳舞”。科学史家们说：基督教神权是科学的大敌。其实，基督教神权所阻碍的何止是科学进步！它热衷于政治和军事，是政治家们的敌人；它占有无穷的地产、农奴、财富，是经济界的敌人；它粗暴干预百姓的家庭生活，比如婚姻，是百姓的敌人。说它是欧洲的公敌一点不为过。

西方贵族从来就不屑于科学技术。姑且不说今天的西方富贵人家的子弟主要接受何种教育，反正20世纪初，法国的上流社会最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子弟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在他们看来，法语说得如何无关紧要，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即懂西方的古典文学），养就一身贵族气质，才是重中之重；不懂希腊语、拉丁语，则与畜生无异。拒绝功利性、鄙视商业和体力劳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因此，贵族不言利，至于赚钱与劳动的理工科，那是下等人的事。

偏巧，一群不屑于科学技术的法国绅士发动的启蒙运动为发展科学扫清了障碍。

18世纪是欧洲贵族的世纪。来自世界的金银、物产的堆积，不动产价格的暴涨，投资回报的暴利，将城市装点得花团锦簇，让贵族们纷纷逃离乡村城堡，住进城市，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惬意生活。贵族云集的结果，是城市娱乐业高度繁荣，欧洲真的“文艺复兴”了：音乐家、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等等雨后春笋般冒出。

此时的欧洲贵族社会，颇似中国六朝时期。官位必须占着，但未必会好好做官；钞票必须捞足，但未必会好好经营；只有一点值得高度重视，就是融入上流社会圈子，并且混出点名气来。闲暇时，贵族们就聚在一起闲扯。这个闲扯的圈子和场所，就是沙龙。无论是谁，要想出名，必须进入这个清谈、神侃的圈子，且与圈子的名人对话。只要得到圈子主角的认可，便可一夜成名。读一读《世说新语》就会知道，没有两把刷子，还真没办法在这圈子混下去。

物以类聚，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凑到一起神侃，火花相撞，对现实的不满与新的认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入。于是，神侃的圈子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伏尔泰等人就是这样成为大腕的。乔治·杜比说：“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或是重要的文人不是通过沙龙成名的。确实，正是经由上流社会与文人发生交往的沙龙，哲学表达方式逐渐形成。”有趣的是，法国的沙龙的召集人往往是贵妇人。出身贫贱的卢梭，颇有女人缘，也得以进入这个圈子，与大腕、高官交游，并迅速走红。精明的出版商立即跟风而上，将大腕们的作品发行到每个角落。

本来，宗教的改革，新大陆的发现，西亚、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引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古希腊罗马学说的重新解读，对人类社会认识的千百种思路，像无数根钢针，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不像那些行尸走肉的贵族，都不是吃素的。丹皮尔说：“18世纪中，只有在法国，科学才渗透到文学中去，其他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有像丰特列尔那样的人，像伏尔泰那样的人，与像布丰那样的人。”他们猛烈抨击这个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专制的世界，发起了一场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中，大师们在广泛学习吸收阿拉伯科技文化知识之后，掀起了学习、研究、借鉴中国文化的高潮。

明朝以来，有许多教士到中国传教，有的还在中国朝廷任职。人们熟知的，在明朝有利玛窦，在清朝有效力于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郎世宁。他们将中国的典籍和有关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欧洲，使欧洲出现了持续一个世纪的中国热。中国诸子百家的作品、小说、诗歌、戏曲等等，成为欧洲红极一时的畅销书，有人干脆靠假冒中国作品出版销售赚钱。大师们在阅读了教士们翻译和撰写的作品之后，认为应该通过向中国学习一切，来彻底改变欧洲。许多人写出了让孔子与苏格拉底争论的作品，以孔子完胜而告终。伏尔泰认为中国是政治上最完美的国度，用今天的话说，欧洲应该全盘中化。莱布尼茨，这位创立微积分的大学者，甚至认为，汉语是世界最完美的语言，应该作为世界通用语。莱布尼茨还认为德国应该联合强大的中国来抗衡法国。歌德高度赞扬中国的三流小说。中国产品成为欧洲最畅销的商品，有身份的人以饮茶、使用中国瓷器、穿着中国丝绸为时尚。欧洲戏曲舞台风行中国题材的戏剧，各国宫廷以上演中国戏曲为荣。贵族们模仿中国园林建造自己的宫廷，“后来很快甚至整个欧洲也追求中国园林艺术了”。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未能成为主流。

启蒙运动是综合人类智慧的结果。广泛学习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丰富了大

师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不仅直接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还被认为“助长了欧洲艳情”。谈情说爱、男女私会，逐渐被社会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诸子百家的著作，更是成为大师们论证历史与时政的有力的理论依据。孔子不信神，中国政府不信神，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天文学，等等，为他们否定神权和《圣经》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儒家的仁爱和平等思想、中国的科举制，为否定王权和世袭制树立了榜样。如此等等。这个时期大师们的著作，少有不涉及中国的。伏尔泰曾言：“用中国来挫败无耻之徒。”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丹皮尔说：“18世纪后半期，这种观点的改变变得更加普遍了。社会上各界最有能力的人，对于宗教多抱怀疑态度，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伏尔泰对于教士与他们教义的抨击，不过是普遍的思想倾向的一些最机智的例子……在英国，17世纪中叶，宗教上的分歧意见是尖锐的，但到了18世纪，教会是容忍的，而且大半是宽大为怀的。”

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批量出产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时代。封建专制、三权分立、人权等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语和概念，《论法的精神》、《忏悔录》、《爱弥儿》、《哲学辞典》、《哲学通信》、《哲学思想录》等等今天的经济学、法学、文史哲等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我可能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人类最宝贵的财产是自由”，“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成功的秘诀，在永不改变既定的目的”，“一切学科本质上应该从心智启迪时开始”，“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这些所谓的格言警句，也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历经长达一个世纪的启蒙运动，欧洲上层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世界观改变了。宗教不再权威和神圣，社会必须变革，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思想解放大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发生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鼓励下，1789年，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爆发了大革命。革命党人在杀死国王的同时，关闭了教堂。不久，拿破仑让欧洲大陆各国君主落荒而逃，完全失去体面。欧洲翻天覆地，人们从灵魂深处摆脱了神权、王权的束缚，走上了理性思维的道路，走上了自由创造的道路。

早在1794年的法国革命时期，为了军事工业的需要，革命党人就创办了巴黎综合工业学校，该校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法国不断推进学校世俗教育，实施初等

义务教育，并于1880年以法律的形式，将宗教势力彻底逐出各类世俗学校。即便在持续的政局动荡中，法国科学院、法兰西学院等机构也得到政府、工商界、媒体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和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研究，不再是业余爱好者从事的活动，或是哲学思辨的副产品。”

思想自由了，才会诞生科学。让欧洲人主宰整个世界的，是新技术下的工业革命，是坚船利炮，以及后来的坦克、飞机。而造就新技术的，是在新思想指导下，学界精英们建立的全新的自然哲学体系。

丹皮尔说：“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19世纪看作是科学时代的开始的话，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19世纪中有了迅速的发展。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在研究自然……但在19世纪里，我们就看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应用和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法拉第的电磁实验促成了发电机和其他电磁机器的发明，这些发明又向科学家提出新问题并给予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新力量。麦克斯韦对于电磁波的数学研究，50年后带来的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这些技术又给科学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总之，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传递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

乔治·杜比说：“我们知道，19世纪后半叶是个技术革新爆炸的年代，从蒸汽动力向电力和石油动力的革命性过渡已然开始，此间工程师和学者们所起的作用要比工匠和业余人员更为重要——虽然汽车工业的最初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业余技术爱好者们。我们也知道，技术革命从此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不妨想想，没有美国人贝尔，哪来的电话（1876年）？没有美国人爱迪生，哪来的留声机（1877年）和电灯泡（1879年）？没有美国人伊斯特曼，哪来的柯达相机（1888年）？同样，没有赫兹（德国人）、布兰利（法国人）、波波夫（俄国人）和马可尼（意大利人），又哪来的无线电报呢？”

欧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至多也就200年。

这是欧美穿越时空的200年。

天问时代

屈原的《天问》，最能代表中国春秋战国的求索精神。从《甘石星经》到“勾股

定理”，从《考工记》到墨家，从都江堰到无数出土文物，无不证明这是一个绚丽多彩科技创新时代。的确，很少有人胆敢否定春秋战国。

汉朝，中国人自主打通了“欧亚大陆桥”，直接结果就是让罗马帝国硬通货枯竭，下令禁止进口中国丝绸。其实，中国出口的远不止丝绸，还有代表那个时代最高科技水平的工业产品：铁——世界上最优质的铁。在欧洲，一部儒略历就用了1500余年；在中国，管100年的历书都不多，宋朝300余年历史至少采用了14部历法。不是中国历书不精确，而是中国天文学太发达，因为汉朝就诞生了伟大的张衡。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教育，因为中国人的至圣先师孔子，便是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朝以来的中国史，就是一部教育史。

唐朝一建立，唐高祖便于武德七年下诏要求各“州县及乡皆置学”，后来明确了中等教育州学县学的的规模：“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人，下县二十人”，对乡学未作硬性规定。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学校有学生6.7万人。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的学制为最高9年，律学为6年。唐太宗更是重视教育，“数幸国子监”，“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每年选送学生，由尚书省选拔就读中央学校。

宋朝教育更胜，设立太学的同时，还创办了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业学校，专门划拨房屋田产以确保地方官办学校教育经费，公立学校学生一律管吃管住。大观三年（1109年），全国公立学校学生167622人。更多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宋朝办学之风兴盛，富人们纷纷出资办学，龙山书院仿照官学对学生管吃管住，富翁曹诚建好应天府书院后移交政府管理，现存典籍提到的书院有600余所。南宋首都临安，每一里巷都有一两所学校；广大农村，乡有乡学，村有村学；另有义学、家馆、冬学等。

在中国，妇女亦能受到教育。唐宋两朝，才女辈出，唐朝有著名的薛涛，李清照可做宋朝的代表。宋朝曾举办女子科举，淳熙年间，女童林幼一中选；嘉定年间，女童吴志端则通过了国子监的考试。

古代学生的启蒙读物，如《千字文》、《三字经》，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中至历史知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炉，易读易记，朗朗上口。当今中小学教材，与之相比，未必能及。

科举制度将全社会推入全民机会均等、自由竞争的新时代。唐朝的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内容一样，设有明经、明法、明算、明字、三史等诸多科目。用今天的话讲，明法、明算、明字、三史等科招录专业技术人员，其他科目则招录公务员。进士、明经两科的出路是做官，所以二者在社会上影响更大，这和美国总统竞选远比诺贝尔奖评选受世人关注一样。

唐朝的考试须过四道关。一考经史（儒家道家经典和历史知识），即测试理论水平；二考诗赋文章，即测试文学水平、写作能力；三考策论（针对现实问题谈看法说思路），即测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三考通过，吏部安排面试、试用，根据面试结果，分配到相应岗位试用，最后分配具体工作。如果新科进士觉得分配的岗位与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不符，他还拥有三次申请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进士科的录取比例极低，每次多则40人，少则20来人，显得至为珍贵。

汉朝以来，中国士人大都博学多才，有着很高的综合素养，故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卓有建树。张衡曾两度任太史令；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甄鸾曾先后任司隶校尉、汉中太守；祖冲之曾先后任公府参军、娄县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而科举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不仅没有束缚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将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世界上第一位给风定级、发明了更为先进的浑天仪的李淳风，早年任李世民秦王府记室参军，后进入太史局任职；大天文学家僧一行，本是李世民的功臣张公谨后人、世家子弟，为躲避武则天的迫害才出家为僧；创建三角形系数表的宋朝数学家贾宪，曾任左班殿直；官至宰相的文豪欧阳修是植物学专家；著名文学家秦观留下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蚕桑专著《蚕书》；著有《数术九章》的大数学家秦九韶自中进士后终身为官；百科全书式的大科学家沈括，既任地方官，也曾带兵打仗；在天文学、药物学方面均贡献突出的苏颂，更是官至宋哲宗宰相；著有数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测圆海镜》的金元时期大数学家李冶，早年考中金朝词赋科进士，曾任钧州知事；南宋大数学家杨辉也是地方官员；即便元代的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让数百年后西方数学家崇拜不已的大数学家朱世杰，亦皆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宋朝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科技成果的展示会。漆侠的《辽宋西夏金元通史·教育科学文化卷》指出：在宋朝，“许多科学成就和技术发明，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其中，有不少更是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数学方面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天文学方面的天象观测精密化、历法的编制；物理学方面的人工磁化的发现；地学方面立体地图的制作；农学方面地力常新壮理论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中

的运用；技术方面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应用；雕版印刷的普遍化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配制的精化及火器的发明和应用；瓷器烧造技术的大发展及各色名瓷的涌现；机械方面水运仪象台的创制；纺织方面的水力大纺车的创制和缫丝技术的成熟；建筑方面用材制度的数量化、科学化和大型桥梁的建造；冶金方面灌钢技术的进步，及湿法炼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车船的大发展及实际应用、优良海船的建造及远洋航行；等等；无不是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

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最关心矿冶业。宋朝矿冶技术就达到很高水平。据《辽宋西夏金元通史·社会经济卷》记载，宋神宗熙宁后期（1074～1077年），国家矿产岁课获铜21744749斤、铁5659646斤、铅7943350斤、锡6159291斤。根据“十分为率，官收二分”的二八抽分制，不考虑偷税漏税成分，此时全国产量约为：铜6.5万吨、铁1.7万吨、铅2.38万吨、锡1.8万吨。而1525年左右欧洲的铁产量：法国1万吨、德国3万吨、英国0.6万吨。宋朝煤矿开采同样了得：“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西方专家说：1600年前的科技发明主要来源于中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则明确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隋唐以来的“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莫名其妙的“李约瑟难题”

据说，当今学界存在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具体内容是：

“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这段话可概括为：古希腊才是世界科技的源头，中国凭什么曾经超越欧洲？阿拉伯人占有了古希腊的全部成果，中国凭什么与它并驾齐驱？

对于其中的有些问题，我们不妨反问：科学技术的基础是数学，难道中国发达的数学，也是“经验之学”？《几何原本》几无代数学根基，难道依然完美无缺？一切科学的基础是教育，难道文盲的中世纪欧洲，中国也不能超越它一下？“有机的自然观”，其本身难道不是科学的理论？

我们最需要思索的是：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中国与“科技”关系上的微妙变化，始于明朝初年。

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立大明王朝，中国就此告别开明、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结束，社会从此进入君主极度专权的时代。朱元璋作为元末一股并不起眼的力量，最终战胜各种势力，并君临天下，实属中国历史的悲哀！

作为皇帝，朱元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N个第一：

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开创了事无巨细、乾纲独断、君权不受约束的恶劣先例；

虐待大臣，开创了廷杖大臣、动辄满门抄斩，甚至“剥皮实草”的惨绝人寰的恶劣先例；

创办臭名昭著的锦衣卫，开创了法外侦捕刑讯的恶劣先例；

蔑视文人，开创了制造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和肆意杀戮文人的恶劣先例；

钳制思想文化，开创了随意删改古圣先贤著作、指定学校教科书、直接干预科举考试的恶劣先例；

极端仇富，开创了可以任意掠夺个人财富的恶劣先例。

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万马齐喑的黑暗时空，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了君明国兴、君昏国衰的“一人之治”时代。

朱元璋对官员刻薄寡恩，对朱家子孙赏赐无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据《明史》记载，明代皇帝的嫡长子为太子，其余诸子皆封为王，年长建藩就国，成为藩王或亲王。亲王嫡长子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封郡王。郡王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

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皇姑称大长公主，皇姊妹称长公主，皇女称公主，其婿称驸马督尉……据《明太祖实录》：“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此外，还有巨额岁贡，如每年亲王给钞25000贯、郡王2800贯，“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若遇婚礼、丧事、造宫，以至于供给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也由朝廷买单。

朝廷官员的待遇，却是“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为止。自后为永制”。另有年俸钞，1～4品官300贯，5品官150贯，6品官90贯，7品官60贯，8品官45贯，9品官30贯。

可见，朝廷一品大员（总理级官员）一年的俸禄，还不如一个“镇国将军”——皇帝的曾孙；县长（正七品）的年收入与中等农户（60亩上下土地）的相当。定的标准是米，发的却是钞票，而明廷却按照N年前的米价折算成现钞发放，以致官员俸禄实际上近乎一无所有。《明史》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官员收入不高，而生活环境与支出，即实际生活成本大不同于农家。官员如不贪污受贿，连起码的体面都没有。清朝“萧规曹随”，基本沿袭明朝的做法。明清两朝，清廉的官员若携家属赴任，吃饭都成问题。

唐宋政府给予官员相当优厚的待遇。据唐仲荦《隋唐五代史》，唐朝“除了按品级和职任授予大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分廨田以外，还按品级给禄米，自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从一品，米六百石，到正九品，米五十七石，从九品，米五十二石不等。此外又有俸料钱（月俸、食料、杂用钱）等”。唐朝政府除了给官员工资，给“职务消费”（俸料钱）、还给“股份”（“永业田”是可以继承的）。据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宋朝官员的俸禄名目繁多，大致可分为本俸、添支和其他俸禄三大类。”“宋朝的一个普通知州，其正常收入包括月俸35贯（1贯相当于1000文钱），每年还赐绢60匹、罗1匹，以及工作津贴每月35贯；如果当一个知县，也将有月俸15贯，每年赐绢12匹、罗1匹、绵20两，以及工作津贴20贯……知州的基本收入可养活120人，知县的基本收入可养活60人。”

隋唐以来的官员基本是通过科举产生，因此，官员的待遇反映出当政者对知识阶

层的基本态度。

今天的人们总爱谈人权，其实，中国社会“人权”的萎缩，是从朱元璋开始的。仅仅在不久前的宋朝，丞相坚决反对的事情，皇帝是很难办成的；再早一点的唐朝，没有宰相签字画押，皇帝的圣旨，是不能发布的。

如果我们对清朝有何不满，反观明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单就皇帝个人修养来说，即便最昏庸的清朝皇帝，放到明朝也属于优秀者。

明成祖早年便跟随父亲征战沙场，称帝后继承乃父之风，终生勤于政事，内削藩篱，外靖边陲，成就了明朝的至强至盛。在海上大宣国威的同时，终生致力于开疆拓土，多次御驾亲征，直至驾崩于出征漠北的军营之中。

正所谓富不过三代，过于强势、专制的父辈，往往造就安于守成、不知进取的后人。倘若明朝沿袭唐宋精英治国的政治体制，皇帝庸碌一点，问题也不是太大。朱元璋为了根绝一切可能影响朱家天下变色的因素，创立极度专制体制，国家的兴衰全看皇帝的素质如何。遗憾的是，其后世子孙大多只是继承了其专制作风，而抛弃了其积极进取、勤政不倦的精神。朱棣的后人，鲜有清醒、远视之人，甚至连守成的兴趣也没有。皇帝混蛋，而大臣们又不敢乱说乱动，也没有乱说乱动的权力，天下就没治了。

但是，即使明朝政治有一万个不对，比起同时期的欧洲各国也要优秀许多。

在尊师重教上，明清不逊于唐宋。朱元璋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明清设立社学，将公立学校普及到了乡村，使我国学校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完善、发达的状态。地方官员将发展教育作为出政绩的主要手段之一，私立、“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学校若雨后春笋。明朝时，我国的全民识字率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即便是鸦片战争前，我国的全民识字率至少高于法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借用同时期欧洲人的耳闻目睹说：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识字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出版业的规模反映出来。晚明出版书籍的种类之多，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生在一个印刷刚开始影响知识和使拥有任何数量的书籍成为可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在进入17世纪之际对‘这里有大量书籍流通，而且售价低得出奇’的情景惊讶不已。利玛窦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出版的书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在学校教育上，“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河间府学堂

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叶至晚明（学堂）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

明清教学内容和教学体制也颇为先进。从国子监到县学，除了讲授儒学经典，均教授兵、刑、天文、河渠、乐、律等培养学生“治事”能力的课程，所学课程每年进行结业考试，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之后，方可参加相应的科举。因此，要想获得“高考”的门票，并非易事。清朝国子监也设有算学，学制五年，合格后服务于钦天监。

明清士大夫，大都修养全面。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担任工业和建设部长（工部尚书），工作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明朝带兵的指挥官，多是文官；清朝的军区司令（地区总督），清一色文人；晚清名臣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多是有“功名”的书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书呆子，古代也会有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儒林外史》的范进纯属夸张，“孔乙己”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艺术。

有人把明朝时洋教士传入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说得玄乎其玄，实在贻笑大方。前者是纯粹的几何学著作，后者教人们笔算加减乘除开方。洋教士不知道，仅唐朝学生的数学教材，就足以让16世纪的欧洲数学家瞠目结舌、脸红得发紫。据《新唐书·选举志》：“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学完全部教材需14年。《几何原本》固然有其优越之处，而《辑古算经》将几何问题代数化——数学的发展方向，水平超越《几何原本》何止一个数量级。宋朝的数学更是辉煌。宋朝秘书省亲自组织印刷了《九章算术》等数学书籍，当欧洲人还在使用羊皮纸的时候，宋朝“国子监算学科”的学子们就在阅读官方出版的数学读物。难怪宋朝涌现出贾宪、沈括、刘益、秦九韶、杨辉等一批数学大家，仅秦九韶贡献的“秦九韶法”、“孙子剩余定理”，直到18世纪，欧洲数学家才琢磨明白。顺带一说，宋朝杨忠辅编制《统天历》将岁时定为365.2425天，而明朝时的欧洲还在使用1500年前罗马帝国颁行的儒勒历，累积岁差已达到10天之久。洋教士将《同文算指》带入珠算发达的中国，则纯属

班门弄斧了。

然而，纵观明清两朝，士大夫队伍在科学发展上鲜有作为，与唐宋士大夫井喷般的创造力相比，形成极大的反差。

因为有钱有闲有知识，中国汉朝至宋朝的官员，和16至19世纪的欧洲显贵一样，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明清官员生活贫困，失去了开展科学研究的热情和经济基础。至关重要的是，皇帝们对官员的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地步。明朝稍有个性的丞相级人物，能臣如张居正，奸臣如严嵩，下场都极为悲惨。朱元璋设锦衣卫，朱棣建东厂，朱见深又搞一个西厂，明朝的皇帝，没有唐宋君主那么开明豁达；专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开阔胸襟。因治国理念不同，出现党派之争，本属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贬谪，但无论当权者还是失利者，多能礼敬对手，对对手的才华赞不绝口。明朝则不然，党争变成了无视国家利益的倾轧。即便边关告急，他们仍以党派利益为是非标准，非忠即奸，有我无你。所有的党派，既是党争的受益者，也是最终的受害者。东林党因此博得了巨大的虚名，但也受尽苦难。势如累卵的辽东战场，能征善战的将领熊廷弼、王化贞、毛文龙、袁崇焕等先后成为冤死鬼；孙承宗为避祸自保称病辞职；无路可走的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降清。边关无将，局面终不可收拾。

明朝对民间管理甚为宽松。明中晚期，民间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尤其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工商业发达，蜘蛛网般的水路，星罗棋布的城镇，肥沃的农田，勤劳的百姓，成就了好比堂的苏杭鱼米乡。这里官宦世家不可胜数，“诗礼传家”的巨商富贾云集，文化底蕴深厚，教育普及，“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三言”、“二拍”如实地勾画了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高级官员王阳明在挑战正统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贽在永不停歇的叛逆，盐工出生的王艮也在深入思考，知识阶层在中华大地躁动着。商人们大办实业，大兴贸易，无视官家礼节；穷人们或读书或经商或打劫，总之不安于现状。一个福建省就有数万人寓居海外；一个海盗便能调集数千武装人员向西班牙军队开战。

此时的中国，与18世纪中晚期的法国社会精神面貌颇为类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法国要高，国民受教育程度更是远高于法国。我们注意到，《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陈实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民间文化、出版更是繁荣，《水浒传》、《三国演义》、

《金瓶梅》、《西游记》、《西厢记》、“三言”、“二拍”等等畅销不已。珠算的全面推广应用，对于社会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电脑的普及。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复兴之势。

《剑桥中国明代史》证实：明朝的“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也许，如果没有空前的天灾，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不会起事，明廷则可能会剿灭努尔哈赤发动的叛乱；也许，民间清新空气会最终荡尽紫禁城污浊之气，揭开士大夫身上的枷锁，重现清明政治。再给明朝一点点时间，何愁历史不能改写！毕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饭袋，明朝的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即所谓综合国力，大大优于整个西方。

杰克·戈德斯通说，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科技创新，10世纪29项，11世纪38项，12世纪27项，13世纪34项，14世纪37项，15世纪18项，16世纪36项，17世纪43项，18世纪7项，19世纪2项，“科技创新曾经使中国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这种创新随着17世纪后期清政府的军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当英国闹革命、欧洲接近启蒙运动门槛的时候，中国进入了清朝。

较之明朝，清朝专制深入到了全民的灵魂深处，文字狱连绵不绝，从官场到民间，死于文字狱的士绅罄竹难书，大批爱舞文弄墨的百姓命丧黄泉。仅乾隆帝就制造文字狱110余起，禁毁书籍3100余种、15万余部。深得党争之利、深知党争之祸的清朝，开“密奏”之风，鼓励告密，严控官员言行，所以清朝连“朋党”也没有。不可理喻的是，靠武力夺得天下的清朝开国元勋们，竟然蔑视先进的武器装备，拒绝将撞击式燧发枪装备部队，更别提改进与创新了。

清朝的士大夫，不仅生活清贫，而且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飞来横祸。曾国藩竭力拯救大清时，无时不是小媳妇般低眉顺眼。闲暇时光，少数有留名青史志向的，一头钻进故纸堆，考订起“子曰诗云”来。对现实社会和大清周边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们也毫无兴趣。张衡那样一边撰写大赋一边研制地动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士大夫们连访仙、礼佛的勇气和兴趣也没有了。王维“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参禅打坐，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烂醉如泥，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偶尔到湖心亭赏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唐宋士大夫那种“醉卧沙场君莫笑”、“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气，那种“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情，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胸怀，皆从中国大地消失，“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创新源于激情。没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状态、可想可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来不缺千里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会环境。

自此，知识分子全面退出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开始吃老本，一直吃到鸦片战争爆发。

启示：高科技不如烧火棍

明朝创造了专制，清朝发展了专制。封锁舆论终将使统治者自己成为聋子和瞎子，专制的结果，必然是专制者自己变成笼中之物、井底之蛙。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既不知道对手是何方神圣，也无足以领兵御敌的亲王郡王，而且兵器和战力远低于清军入关时的水平。

鸦片战争是失败了，而且败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十艘帆船、一两万人的军队千里迢迢的远征，在沿海地区开了几炮，就搞定了几亿人口、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清帝国。

抗战时期，100多万以飞机、航母、坦克、毒气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始终未能战胜汉阳造、中正式步枪的中国！

过于关注鸦片战争时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个莫大的误会。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清军镇江守军仅1500人。英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结果，有备而来的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仓促应战的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1：3。其伤亡比例，还低于抗战时期国军对日作战1：4的损失。

科技很重要，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很重要，而统治者的蓬勃朝气、昂扬斗志更重要。没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

晚晴在历次对外战争爆发前，都是战和主意摇摆不定，也从未以举国之力背水一战；更没有一个条约，是在战争打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后签署的。1883～1885年的中

法战争，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高层犹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师、马尾船厂在糊里糊涂中毁于一旦。即便最值得骄傲的收复新疆战争，战前，仅“海防”、“塞防”问题就争论了一年，若非战功赫赫、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左宗棠坚持，也许新疆就此远离祖国版图。

晚清规模稍大的对外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唯有收复新疆战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国家之力保卫主权的战争，但军费、武器、粮草还是左宗棠自己筹措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精锐之师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时，海军未作动员，陆军精锐没动一兵；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的糊涂决定，被掌握精锐之师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指为“矫诏”、“乱命”，这些高层精英拒绝对列强开战，使之再次成为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

最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关于甲午战争的过程，国内有无数文章作过详尽的描述。如果站在两个国家对战争机器的把握的高度来分析，应该另有一番体会。

甲午战争，如李鸿章所说，不是中日两国交战，而是李鸿章的淮军与日本国在打仗。

慈禧有意造成全国派系林立的局面，让蓬勃兴起的“洋务运动”属于各自为政、自生自灭的地方性工作，全国的远强于日本的海军、陆军、军事工业，始终无法转化为国家的综合实力。直到甲午海战前，国家花费巨资组建的海军、编练的新式陆军、创办的各种兵工厂，无不处于“军阀割据”状态，隶属于各个总督，既没有一个能提调全国陆、海军的“陆军部”、“海军部”，也没有一个统筹管理军工事业的部门。

李鸿章深知，一旦打起来，就成了他和淮军的内部事务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谢天谢地了。正如李鸿章所料，《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舰船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在陆地上，在日军进攻威海时，军港之外的清军未得到指令，面对中日交战，竟然作壁上观。

单以北洋水师对付日本，至少也可打个平手。军事专家们认为，双方各有所长，

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日方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稍占上风，双方实力差不多。因为清廷战和主意不定，北洋舰队出海时连弹药也没有足额配备，交火不久，北洋舰队就没了弹药。

如果仅仅海战失败，还可与“科技”挂钩，大骂清廷多年不购置新型舰船，那么，陆战的失败，就找不到任何“新型装备”的理由了。当时，清朝陆军约90万人，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70%完成西式训练；日本陆军26万人，且一半以上为预备役，武器也逊于清军。而且，日军是越海作战，清军是以逸待劳，清朝还有强有力的军事工业作后盾。和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比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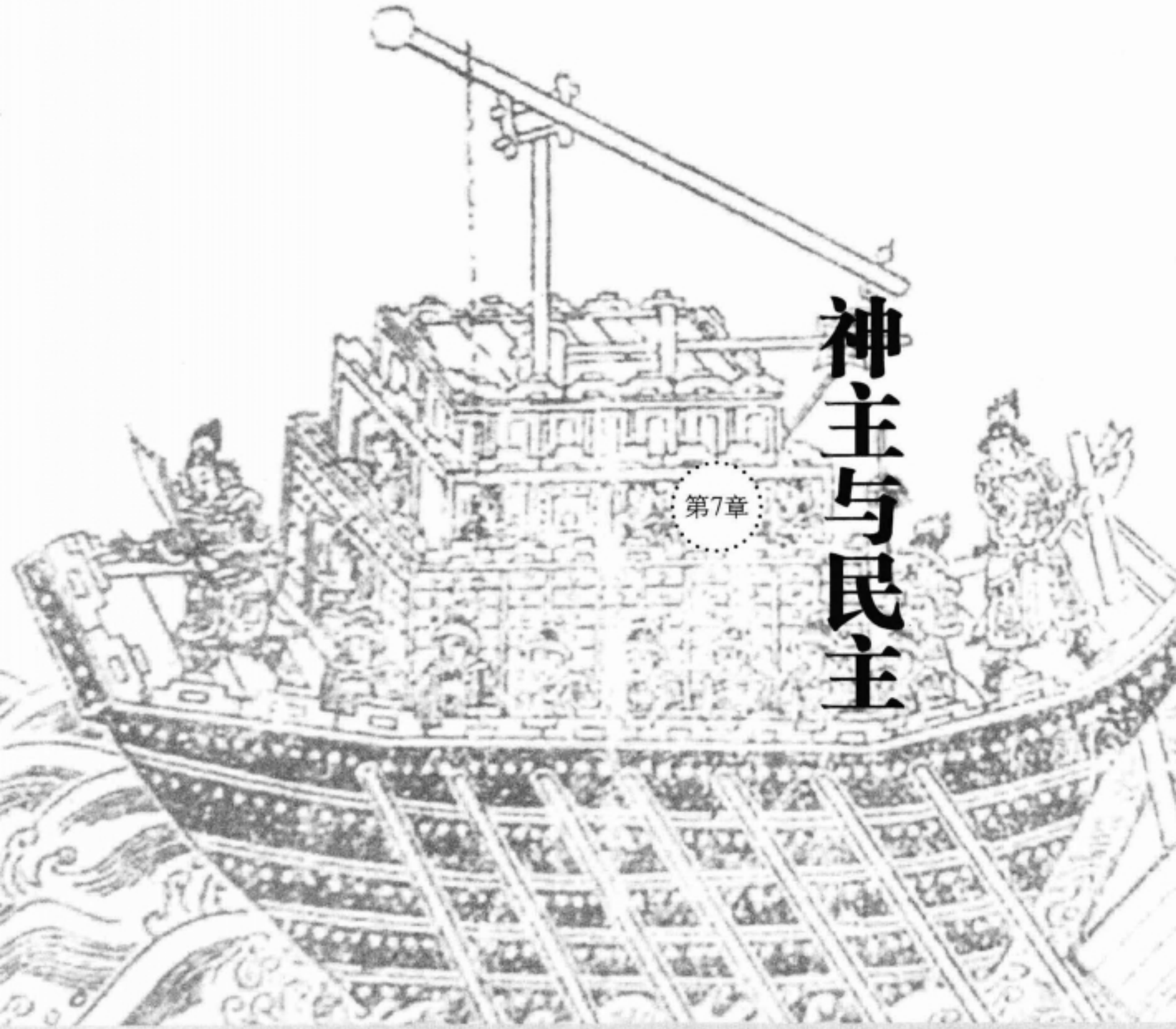
更为荒唐的是，当日军占领旅顺、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认输，宁愿送上台湾、辽东半岛和一年的财政收入，坚决不打了。难怪，40多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认为，他们一旦占领了南京，中国就会举国投降。

不难想象，即便晚晴具备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士兵们手上必将依然是长矛大刀；即便生产出原子弹，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烧火棍。

事实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尽心竭力办洋务，而且这“洋务”并不差，至少强于日本，但结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打赢了，在不远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会到来。

什么叫作高科技？由开明政治所创造并掌握的最先进的手段，才是高科技。



第7章

神主与民主

前面说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信神。之后的西方世界的人们都信神，尽管此神非彼神，但是，在他们看来，只有神，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是自己必须顶礼膜拜的“主”。神主，才是西方历史的实质。

在中国，孔子、孟子不信神。在汉朝以降的帝王的心目中，不信神的儒家学说，才是最大的“神”。孔子主张以“仁”面对这个世界，呼吁劳心者以“仁政”治理这个世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主，才是中国历史的轨迹。

契约是怎样炼成的

日耳曼人闯入罗马帝国地盘，打出一片天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批亲兵以家丁的身份，跟在蛮族领袖身边。一方面，太多马仔总跟自己一起吃住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大片土地需要信得过的人去看管，于是，头领决定派他们出去做封疆大吏。也许是因为没有货币概念，也许是为了省事，也许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头领拿出一点地盘给这些马仔，以那块地上的收获为其养家糊口的薪水。

老大分封的时候，一般会举行一个仪式。亲兵跪在老大面前，宣誓效忠后，老大讲几句话，伸出双手授予亲兵一块石头或者一把草或者一根树枝什么的作为信物，表示将某块地授予他了，这便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契约”。尽管文盲们没有搞签字仪式，但也不要小看这契约，较长一段时间，身着兽皮的武夫们还是守信用的。

马克·布洛赫解释道：“11世纪末以后拉丁语契约，几乎毫无差别地称一个人为领主的附庸或miles。从字面意义上，miles一词应译作士兵。但是法文文献从该词出现之日，就将它译作骑士。更早时期的书记员心目中所知道的自然是这个方言词汇。士兵是披坚执锐、跃马冲锋的典型，而附庸的使命首先是以这种方式为领主效命。”

原来，在拉丁语、法语中，“契约”的意思是：附庸、骑士。

天上不会掉馅饼，马克·布洛赫说，附庸必须向大领主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一，必须世世代代当亲兵做护卫。“根据规定，附庸的首要义务是军役。‘爪牙之徒’必须首先跨上战马，披坚执锐为领主效忠。但是附庸很少单独行动。如果这位附庸也有附庸，那么他的附庸自然会聚集于他的麾下共同分享他的特权和威望。除此之外，风俗习惯有时也要求至少有一二位侍从追随在身边。”“附庸还经常需要与他的附庸同伙轮流守卫领主的城堡，这种情况有时只发生在敌对行为期间，有时则是始终如此，因为一个要塞不能无人防守。如果附庸本人拥有设防家院，则必须向领主开放。”

第二，必须世世代代上贡。“领主希望附庸的钱袋也能为他所用的时期已经到来。这种财政义务比任何一种制度更清楚地显示出，封建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依附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结合力。农奴、庄园的所谓自由租佃者、国王的臣民，以及附庸，任何臣服于他人者，都必须在其首领或领主需要时提供财政援助。所以，领主有权从依附者那里索取贡献。”

第三，必须送儿子当人质。“就附庸与领主的关系而言，附庸长期处于一种补充亲属的地位，他的权力及地位与血缘亲属相同……骑士的儿子很少在父亲家中长大成人。习惯法规定，在儿子仍是孩童时，其父就要将他托付给领主或者领主之一来抚养。只要封建习俗尚存某些活力，这种习惯法就要遵守。在领主的家中，骑士的儿子一边充当侍童，一边学习狩猎和战争技艺，稍晚些时候就学习优雅的礼仪……在中世纪欧洲的其他社会中，也盛行类似的习俗，通过青年人的媒介作用，这些习俗有助于加强领主与附庸之间由于居处分离而不断出现断裂危险的关系纽带……将一个重要的人质放在领主手中，会使每一代附庸重新享受到参与领主亲密家庭生活的乐趣。”

第四，老大有权干预附庸的家事。“丧父者是附庸之子时，领主也干预其婚姻……领主对附庸个人事务的权力却有更加清楚的规定。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附庸制最遥远的源头上。5世纪的一部西哥特法宣称，‘如果一位家兵只留下一个女儿，那么她将归主人管理，主人将为她找一位门户相当的丈夫。但是，如果她违背主人的意志而自选丈夫，那么，她就必须将其父从主人那里得到的所有礼物归还主人’……国王作为君主，有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权处理女性臣民的婚姻。”

如此侮辱人权的“契约”，亲兵们却乐意接受，因为早在查理曼时代，“法律”便让小领主们得到了丰厚的精神补偿。

“任何一个从其主人那里得到过一个索里图斯的东西的人，都不得离开其主人，

除非其主人想杀死他，或想用棍棒打他，或想侮辱他的妻女，或想抢夺其遗产。”

“如果任何一个自由人违反其主人的意志，离开其主人到另一个人的王国里去，则该王国的国王不得收留他、保护他，也不得让自己的人收留他。”

“人们认为，农奴犯罪，至少涉及死刑判决的罪行，应由农奴的领主而非其他人做法官，不管领主是否有正常的审判权，也不管被告农奴的居住地何在。简言之，固附于土地并非农奴的特点，相反，其突出特征是他对另一个人的严格依附，以致无论他走到哪里，这种依附关系都与之相随并固着于他的后代身上。”

物质回报更为可观，“首先是（向农奴收取）人头税，其次是禁止与非同等身份的人通婚，也不能与非同一领主的依附者通婚，除非得到领主的特别许可，而获得许可的代价是很昂贵的。最后是（向农奴收取）遗产税”。

契约就这样达成了。不同等级的人，对上帝造出的大地行使不同的权力。欧洲大地上，“从这时起，几乎一切东西是以不动产使用权的方式给予的：森林管辖权，森林内狩猎权，某一个地方的一份税收或酒税，护送到市场去的商人们，君王或高级爵爷宫廷里的审判厅，设在他的那些铸造货币的城镇里的铸币厂，出租开设市场的那些地方，公共火炉房，城镇里的公共炉灶，最后，一直到可以在森林里看到的蜂群。总之，整个世俗社会都变成了封建的。”随着拥有世袭领地的人群的出现，欧洲诞生了一个稳定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甚至延续至今。

这种模式，与中国的周朝有那么一点相似。周朝建立后，大封诸侯，设立了人们熟悉的齐国、鲁国、宋国等众多诸侯国家。每封一位诸侯，都会搞一个隆重的仪式。由司空主持“授土”仪式，司徒主持举办“授民”仪式。和欧洲一样，诸侯是天子的附庸，不仅要给天子上贡，而且要随时服从天子的出征作战的诏令。不过，中国诸侯的权力远没有欧洲诸侯那么大。这要归功于周天子和他的谋臣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用今天所说的文件，用西方学者的说法则叫做成文法，明确规定了诸侯的权利与义务。周天子每封一个手下，都会专门下一个正式文件，如分封唐国，出台了《唐诰》；分封卫国，便出台了《康诰》。诸侯们必须依据这些书面“契约”治理国家。诸侯手下的主要或者关键的官员，是由朝廷任命的。《礼记》说：“大国之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诸侯上任时，天子还会赏赐一批“国人”给他，这批人，既是他的部下和军事力量的主体，更可能是天子的杀手锏。所以，西周400年，天下太平。

契约就是门锁，防君子不防小人，更是防书生不防武夫的窗户纸。小领主们得到

封地之初，感激涕零还来不及，何况原本是一块儿打江山的光屁股兄弟，双方一般不好意思翻脸。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下一代、下下代，相互间没有哥们交情了，就未必那么老实本分了。有兵又有钱的武夫们，当他们发现老大是一只病猫时，必然开始动心思了。中国周朝，当朝天子头脑清醒时，天下是太平的。周幽王胡闹一番之后，局面立刻不可收拾。西欧正是这样，当贵族间的矛盾在老大那里得不到公正处理时，贵族们先是搞两人“决斗”，继而是领地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私战，就此天下大乱，契约变成废纸。

铁血出契约。等到国王重新雄起，兵强马壮，再次变成“上帝的使者”了，贵族们立即恢复马仔心态，严格遵守契约。国王即使再混蛋，也得把他当作神供着。英王亨利三世灌了一点迷魂汤，法王圣路易便将诺曼底、安茹等的大片江山拱手送给了英国。圣路易的大臣们尽管十分不满，也只能背后发发牢骚，在圣路易面前，依然将法兰西人教养和礼节表现得十分到位。

契约社会

贵族与平民的划分，在欧洲，最晚起源于罗马共和国时代。吉本说：“在各个朝代和各个国家中，贵族和平民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最为彻底的，也许莫过于在罗马共和国的初期便已确立的贵族和平民的分界。财富和荣耀、国家机关的职位、各种宗教仪式，几乎全都属于贵族所有，他们令人十分不堪地保卫着自己的纯洁的血统，把依附于他们的平民完全置于奴仆之列。”

罗马帝国有皇帝、贵族、胞族、平民、奴隶这五个世袭等级。经过无数次政变、内战、屠杀等天灾人祸，罗马共和国留下的贵族血统，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而灭绝了，至少是从政治舞台消失了。当新贵们通过武力取得一切之后，又将五大等级填补得完好无缺。世袭等级制被有效地继承了下来。

蛮族们进入文明地区之后，必然是学样。最吸引蛮族老大眼球的，当然是皇帝的宝座。基佐说，闯入罗马帝国的蛮族的领袖们，“他们在那里看到一个空位，即皇位。那里存在着权力、称号和蛮族所熟悉并赞美其宏伟、欣赏其效率的一套政权机构。当然，他们强烈地企图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际上，这些正是他们一切努力的目的。这种事实到处出现：克洛维、希尔德贝尔特、贡特朗、希尔佩里克、克洛泰尔等都不断地努力要取得皇帝的称号，行使皇帝的权力；他们希望像皇帝分配其执政官、惩治者、州长那样分配自己的公爵和伯爵；他们试图重建一切已经崩溃了的税收、征

募和行政制度。总之，蛮族的君王虽然目光短浅而又粗野，却力图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实堂堂王权的庞大机构。”加洛林帝国散伙以来，谋求皇帝名号成了一代代国君的最大梦想，拿破仑就过了一把皇帝瘾。孤悬海外、血统不正的英国国王没有资格当欧洲的皇帝，占领印度后，英王抢到印度皇帝的衣钵，好歹也算圆了当皇帝的梦。

欧洲大地上，国王是大领主的领主，大领主是小领主的领主，小领主是农奴的领主。“谁没有领主呢？但人们已形成这种观念，即一个人一生连一次自由选择权都不能行使，自由没有了。换言之，每一种世袭关系纽带都被认为具有奴役性。孩子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决定了其身份的这种必然联系……他们的先辈不仅决定了自身的地位，而且预先决定了其后代的身份。由于重要的同化作用，私生子、外来人或‘外国人’、犹太人也有此种情况。这些人失去家族和民族的所有天然援助，依照旧的惯例自动地被付托于定居地的诸侯或首领，接受他们的保护。封建时代使他们成为农奴，隶属于赖以为生的土地上的领主或当地拥有最高审判权的人。”

世俗社会被分为世世代代不可更改的三大等级，按照苏格拉底的分类，国王在理论上是全国最大的领主，是神用银子造成的人；国王之下的大大小小的领主，就是我们常说的贵族，是神用铜造出来的；所谓第三等级，便是最底层的农奴，他们自然是用不太值钱的铁造出来的。

神用金子造出来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神最信得过的神职人员——教会人士。

自此，西欧各等级各安其位。吃什么、吃多少，穿什么、穿多少，住什么、住多大面积，诸如此类，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1294年，美男子菲利浦颁布圣旨道：“任何女自由民都不得保有一辆四轮畜力车。”“任何男女自由民都不得穿灰色皮袍或貂皮长袍，如果现在有的，从下一个复活节起一年内应当停穿。他们不得佩戴任何首饰和宝石，也不得用金银头带。”“公爵、伯爵、男爵，一年有6000或者更多利弗的土地收入的，一年可以做四套衣服，不能更多，他们的夫人也一样。”

马克·布洛赫说：“配得上贵族这一称号的等级显然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必须拥有自己的法律地位，这一法律地位必须肯定其所要求的优越性，并使这一优越性实际有效。第二，这一地位必须是世袭的——不过它具有这样一个限定条件：根据正式确立的规则，只有数量有限的新家族才可以加入进去。”

进入贵族行列的起步价，是获得“骑士”称号。骑士称号从何而来？红胡子腓特烈说，只有祖先是骑士的人才是合法骑士，他下令禁止农民的儿子获得骑士称号，禁

止农民携带长矛和佩剑，因为这是骑士使用的武器。西西里的罗杰二世、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普罗旺斯伯爵查理二世也先后发布“法令”：只有祖先是骑士的人才可以成为骑士。1119年前后，根据“十字军东征”的需要，圣殿骑士团成立。它由两类血统不同人员组成，一类是身着白色斗篷的世袭“骑士”，一类是身披褐色斗篷的地位低贱的“军士”。在后来出现的第二个《骑士团规则》中，更是要求加入骑士团的必须首先是一个骑士，同时还必须是“一个骑士的儿子，或从其父系来说是骑士的后代”。

骑士的字面意义就是骑马打仗的战士。在欧洲，拥有骑士称号，首先表明他是贵族，并不说明他一定能在马上冲锋陷阵；反之，真正能够马上冲锋陷阵的，未必是“骑士”。欧洲骑士，大多是手捧祖宗留下的巨额家产的纨绔子弟。一天，在利穆赞宫廷，几个骑士相互炫耀自家的财富，一个跑到一块田地上耕种银块；一个以蜡烛做柴禾烧火做饭；另一个则一下子烧死了自己的30匹马。欧洲所谓的重装骑士团，就是这样一群队伍组成。难怪欧洲骑士遇上成吉思汗的蒙古勇士后，统统作了活靶子。

贵族也有贵族的苦恼。起初，契约也对大领主有所要求：大领主必须保护小领主的安全，不能向小领主索取过多的钞票，如此等等。事实上，国王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里普利安法典规定：

“任何人用暴力抢走国王的任何一个下属人员或依附于教会的人员的东西，就得付出一笔和解费，其金额要比抢走其他里普利安人东西时付出的和解费大三倍。”

“如果罪行是一个依附于教会或依附于国王的一块领地的人犯的，那么这人将付出的和解费，其金额为其他法兰克人应付的一半。如果他否认犯罪，他必须带着36个保证被告无罪者一起出庭。”

“一个依附于国王领地的人，不管他是罗马人，还是自由人，不能成为判处死罪的对象。”

“国王和教会属下的奴隶不由辩护人来辩护，而由他们自己辩护，并允许他们用誓言来为自己辩护，也可以不回答可能对他们提出的传票。”

“任何背叛国王者，将丧失其生命，其一切财产悉被没收。”

犯上作乱者杀无赦，这可以理解；但是国王家的奴隶也高人一等，小贵族们能不郁闷？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自然是农奴。“9世纪初叶，帕利西斯的蒂埃斯村中各家族的146人中，只有11人为奴隶，130人为农奴，此外有19名缴纳人头税的‘被保护’人。在圣路易统治时期，（法国）几乎全部人口的身份均被称为受奴役者。”

农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多地由他对另一个人的从属关系来规定。这种从属关系却是十分严格，一直禁止他与庄园以外的人通婚，这自然也限定了其家族的地位。他与一位完全享有自由权的妇女结婚被视为门不当户不对；教会法拒绝他担任圣职，而世俗法则施以从前用于奴隶的体罚。”

作为农奴，没有改变身份的任何可能。“在各个地方，某些大宗教团体过去一直拒绝奴隶出身的圣职申请者，它们也只是在这方面表现出贵族精神，然而，现在它们决定接纳他们，条件为他们是贵族等级的后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你是农奴，想出家做和尚、道士都不可能。

周朝有比较明确的等级制度，将国民分为国人和野人两大等级，但是，只要有合法的手续，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才华出众，国君们都会不拘一格大胆重用。孙子、吴起、苏秦、张仪等等，今日布衣，明朝卿相。众所周知的蔺相如，瞬间由“舍人”跃为上卿。相对而言，最重视出身门第的时期，也许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六朝时期。不过，六朝从未将寒门关闭在政坛大门之外，只要战功卓著或文才突出，照样可以做大官掌大权，寒门公卿不可胜数。

欧洲农奴们也提过意见。997年，诺曼底的一些农奴们觉得领主在森林和水资源的管理上不太公正，集合起来想讨个说法。他们推举出几个代表，准备拟定游戏规则。诺曼底公爵知道后，派出部队将这帮人抓起来，一律剁掉手脚之后扔回去。37年后的1034年，这里的农奴们又瞎起哄，这一次，公爵就没那么仁慈了，他大开杀戒，几近血流成河。自此，“平安无事”。

这样一种安定团结的契约社会，一直维持到一战结束。

家族制度与族权

五四时期，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对中国家族制度深恶痛绝，认定儒家学说为祸首，他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儒家的忠孝学说导致家族制度形成；家族制度催生专制政治；专制政治致使全社会“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奴隶之孝子顺孙”。为了与家族划清界限，他辱骂自己的父亲是“老贼”，亲手痛揍自己的父亲，与父母分割家产，而且宁可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给自己的儿女用于上学。

什么是家族？一个男人成家后，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又各生了五个儿子，

这二十五个孙子也先后成家有孩子了。这位男人和他的夫人去世时，指定他们的长子担当领袖的角色。这个由血缘关系凝结成的团体，便是家族。

家族制度有其弊端，所以，自古就有人反对家族制度，存在虐待长辈的忤逆之徒。

古希腊圣贤德谟克利特说："照我看来，生儿育女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看到有儿有女的人，有很多而且很大的危险和麻烦，至于他的好处则是很少、很不足道而且很微弱的。""凡是觉得想要一个孩子的人，照我看来，还是在他的朋友的孩子中间去挑一个的好。这样一来，他将能够有一个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的孩子，因为他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

德谟克利特真的不想要孩子吗？也不是。他说："当人碰到运气好，有个好女婿时，就使他得了一个儿子，但是如果碰到运气不好，那就外加把女儿也失掉了。"显然，德谟克利特不仅想要儿子，而且希望嫁出去的女儿给他带一个好女婿回来。

德谟克利特说不想生孩子，一定是儿子打老子之类的事情看多了，受到了严重刺激，才说出这样的气话、伤心话。

世界上最著名的"儿子打老子"的故事，就发生在欧洲。日耳曼人踩死西罗马后，曾一度基本统一西欧，并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加洛林王朝。814年，查理曼死后，他唯一的儿子即位，即虔诚者路易。这个路易，儿子多却结果悲惨。他身体康健的时候，三个儿子就开始闹分家，打得死去活来。这三个浑小子甚至勾结天主教会，共同对付父亲。在刀兵相见之中，他们将父亲、后母、同父异母弟弟，俘虏后关入荒山野岭的破屋子，令其饥寒交迫。伏尔泰伤心地叙述道："他的儿子罗退尔以亲临目睹其父亲受辱为乐。祭台前铺着一件悔罪衣，大主教命令皇帝解下肩带、佩剑和外衣，匍匐于悔罪衣之上。路易面朝地，请求公开忏悔。"

在全世界的各个家族中，主流是亲情，儿子打老子的仅是珍稀的"极品"。共同的血缘关系，使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相互扶持，实乃最大的人性。

我国古代家族制度很发达。汉光武帝在地方豪强家族的鼎力支持下，恢复了刘家的天下，随即造就了功臣之后邓、窦等外戚世族轮流掌权，多个家族掌控朝野的局面。六朝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士族社会，以致隋唐时期，豪门大族的势力仍然极其强大。唐人柳芳列举道："过江则为侨姓（在西晋灭亡时，跟随晋室逃奔江南定居的世家大族，被认为是侨居者——笔者注），王（琅琊王氏）、谢（陈郡谢氏）、袁（汝南袁氏）、萧（兰陵萧氏）为大；东南则为吴姓（主要指今江浙地区的本地人，这里古属吴国——笔者注），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

（太原王氏）、崔（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卢（范阳卢氏）、李（赵郡李氏）、郑（荥阳郑氏）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京兆韦氏）、裴（河东裴氏）、柳（河东柳氏）、薛（河东薛氏）、杨（弘农杨氏）、杜（京兆杜氏）首之。”唐太宗命大臣编写《大唐氏族志》，顺带将天下家族排个座次，但没想到，在初稿中，任朝廷黄门侍郎的山东崔　竟然位居第一等。在唐太宗明确“深表遗憾”并“严正抗议”之后，皇族才被列居第一等，外戚跃居第二等，崔　列第三。家族势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武则天嫁女儿前，误以为女儿未来的两个妯娌不是出身名门，差点下令未来的亲家休掉这两个儿媳。

直到唐末，家族势力才全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但是，人类天然的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忠于家族、回报家族，依然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自然举动。据《资治通鉴》：“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范仲淹幼年丧父，多受家族成员欺负，但是，他成年后，无时不关心着苏州的家族。他省吃俭用捐献巨资，为家族购置田产兴办义庄，专门资助家族贫困成员。他在《告诸子书》中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吾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颇有影响的江西义门陈，陈姓子孙300余年同吃同住同耕耘家族田产，自办学校教育家族少年，家族包办婚丧嫁娶，鼎盛时期家族成员多达四五千人。

直到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一个村子甚至附近几个村子同属一个家族，这样的现象极为普遍。所不同的是，解放前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如今为三口之家所取代。

欧洲也不例外，因为欧洲人也是人。

古希腊的城邦，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家族或家族联盟。古罗马也是起家于血缘关系上的部落联盟。到了中世纪，马克·布洛赫说：“在整个封建欧洲，当时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兰西岛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们、姐妹们以及以血缘和婚姻维系的亲属。’”

中世纪是贵族的天下。所谓贵族，首先是显贵的家族；贵族是家族制度的产物。中世纪，大小领主的后人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共同保护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

的城堡里。马克·布洛赫说："大贵族本身并非总是这些群体性活动的局外人。博骚家族几代人均控制着普罗旺斯地区的各个伯爵领，虽然这个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都认为整个采邑的统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罗旺斯'伯爵'或'诸侯'的称号。"大贵族如此，小贵族也一样。"许多小领主，特别是法国中部和托斯坎尼地区的小领主，像农民一样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至少共同保卫其城堡。这些人是'衣衫褴褛的共同继承人'。"

身为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为求自保，更是重视血缘关系。马克·布洛赫说："在整个乡村，到处都是为数众多的'兄弟会'。这些'兄弟会'由若干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组成，他们共用一个炉灶，同桌进餐，耕种同一块共有地。"

由于个人命运与家族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家族会干预个人和每个小家庭的生活。为了保持家族的地位，长辈会以"父母之命"干预孩子的婚姻，会为了家庭利益干预孩子的个人兴趣和发展愿望；为了维护家族的财产，家族会干预其成员的财产继承。

和中国人一样，欧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长辈决定。古希腊人的婚姻，也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成的，从达成婚约到迎娶新娘的程序、礼仪，还与中国传统婚俗颇为相似。马克·布洛赫说："在一个个人十分渺小、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婚姻（我们知道，婚姻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远远不被视为个人选择的行为。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父亲决定的事情……亲属们可以干预这类事情，有时候是与父亲联合加以干预，尤其是他父亲不在世时，就更是如此。"所以，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欧洲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

家族财产虽然分别为某一家庭直接占有，但是家族成员认为它属于家族利益，所以个人财产所有权，往往最终为家族所掌握。在欧洲，某人想将属于自己的财产卖掉，必须首先卖给家族成员。否则，即便是已经卖给家族之外的人，在规定的范围按照约定的顺序，家族成员在偿还已付价钱之后，仍然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这就是曾盛行于欧洲的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马克·布洛赫说："即使在个人财产明显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个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能够完全摆脱家族的羁绊……起初规定，每一份土地以可以接受的价格转让之前，应首先售给亲属——前提是土地已通过继承关系获得。这是一个重要且保留下来的限制条件。最后，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家族对土地买卖的控制简化为对亲属权力的简单承认：一旦土地出售，在

规定的范围按照约定的顺序，亲属在偿还已付地价的基础上，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中世纪社会有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普遍性，其他制度几乎无出其右。英国是唯一的例外。但即使在英国，某些城市习惯法中，也有这种制度。这种赎回权制度盛行于从瑞典到意大利的各个地区，任何一种习惯制度都不会更为根深蒂固；在法国，只有大革命才将它废除。”

最重要的遗产莫过于爵位。一个伯爵有三个兄弟、五个儿子，谁来继承这爵位？谁都想继承，矛盾势不可免，兵戎相见也不为怪。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就是一个争夺继承权的故事。为了继承权，欧洲大地一度硝烟四起，欧洲人称之为“私战”。后来，欧洲人统一规定：只有长子能够继承老爸的位置，即所谓“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并非欧洲的特产，中国的周朝也立下这规矩。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官方又出现了“立贤不立长”的新思路，谁德才兼备谁当继承人。在中国民间，长子始终是接任家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中国的长子继承的仅仅是家长的地位，并不包含财产，因为其为家庭成员所共有。欧洲人不一样，为了确保财产分流，想方设法把一切留给长子。“这意指将幼子和女儿排除在财产继承的资格之外，这不仅造成他们婚姻的延迟，而在许多情形中更意味着完全剥夺他们结婚的机会”，劳伦斯·斯通说，在英国，“到50岁而从未结婚的女儿的比例，从16世纪的10%，上升到17世纪初的15%，1675至1799年间则将近25%。就优子而言，从未结婚者的比例从16到17世纪有一类似的锐升，尽管1600年后有据可查的单身汉比例始终徘徊在20%到26%之间。18世纪时，当时人确实认为单身汉比例在上升”。为了钱剥夺儿女结婚的权利，这只能发生在人道主义的欧洲，巴尔扎克就勾勒出一个法国形象：葛朗台为了确保财产“安全”，取缔了独女结婚的权利。

家族间复仇，是造成中世纪西欧的“私战”的另一主要因素。大家关心、看重家族利益，当家族利益受到外力伤害时，全体家族成员必然鼎力维护。每个家族都有族长，全体成员听从他的指挥。只要家族成员受到外人伤害，在族长的带领之下，家族全体成员将拿起武器来，惩罚杀害或者虐待其家族成员的行为。基佐说：“一种十分有害的战争习俗在法兰西王国内流行。如果某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或使他残废，或受重伤，则受到伤害的人，或者他的朋友们（假如他死了），可以对冒犯者的亲属进行报复，虽然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并且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于是，他们白天黑夜地寻找他们，一找到其中的一个，便立刻杀死他，或使他残废，或打伤他，无需警告他或使

他防备，虽然他毫不知道他族中的那个人犯的是什么罪。”11世纪，勃艮第两个贵族家族在葡萄收获季节的发生了纠纷，双方的械斗搏杀持续了30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于非命。

这种复仇行为，为西欧不少地区的法律所认可。**在卡斯蒂尔的塞普尔维达，地方法律规定，复仇者只要与原来的受害人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就可以向杀害亲属的凶手复仇而不被认为是犯罪。**这样的法律，令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判例也不少。据《资治通鉴》，唐玄宗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案子：杨汪冤杀张审素，若干年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杀死了杨汪，当他们追杀杨汪的同谋时，被官府抓获。朝廷终审此案时，出现完全对立的两派，张九龄认为为父报仇理当从宽；裴耀卿和李林甫认为应依法处死。唐玄宗出来给张九龄做工作：“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也。”于是，依法处死了这两个孩子。

欧洲人的“奴性”

西方早期的智慧主要存在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教义。欧洲百姓不犯上作乱的“奴性”，便源于此。

古希腊头号圣贤苏格拉底说：“我要对公民们说：你们彼此虽是兄弟，但神还是用不同的东西把你们造出来。你们之中有些人具有统治的能力而适于统治人，在创造这些人的时候神用了金子，因此这些人也就是最珍贵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这些人就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再有一些人是农夫和手艺人，这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统治者应当把这个神谶引以为戒，即：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在他看来，每个人出生前，就已经确定好属于哪一个等级。苏格拉底还说，金子做的人会生出金子做的儿子，银子和铜铁做的人会生出相应的儿子。至于他经常提到的奴隶，自然是等外品，只不知他认为奴隶是用什么做的。

第二号圣贤柏拉图认为，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他据此勾画出了自己的“理想国”。柏拉图也是一个以精神力量——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德”治天下的倡导者。他这种以“文化治国”的理念，与中国儒家“以德治国”思想颇为一致。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的是仁政，希望官员们以琴声感化百姓，少用、尽量不用刑法；而柏拉图却是更注重暴力，对不认同他的文化予以严厉打击，对死硬分子予以人身消灭。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神的名义设计并实施管理的，“我们制定有关不敬神的法律如下：如果一个人在语言上或行动上犯了不敬神的罪，任何人见

到了就应该起来维护法律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就应该立刻依法把这个人送到法庭。如果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拒绝这样做，一经有人揭发，他就要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审判。国家里面要设三个监狱：第一个是在市场附近的普通监狱；第二个是在午夜法庭附近，将称为‘感化所’；第三个要设在国土中心的某个荒野山区，要用某种果报惩罚的名字来称呼。当他们监禁期满后，如果其中有人思想健全，就让他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如其不改，再度被定罪，就应该把他处死”。

第三号圣贤亚里士多德主张以“善”治国，他遵守老师和师祖的等级制学说，认为“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

西方有学者认为，基督教教义是古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最后成就。《圣经》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谁比你官大，你就必须听谁的话；他叫你交税就给他钱，因为上帝授予他指挥控制你的权利，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听上帝的话，“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也许希腊人善于活学活用圣贤们的教诲，希腊人曾经在西亚、埃及实践了其治国学说，建立了一批专制黑暗的“希腊化”国家。在促进罗马走向独裁的道路上，他们又成功地展示了其聪明才干。吉本气愤地说：“让人把皇帝神化是他们的行为中唯一脱离惯常的谦虚谨慎的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下流的、亵渎神灵的献媚方式的创始者是亚洲的希腊人，而第一批被神化的对象则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从帝王转移到亚洲的总督们身上的，罗马的行政官便常被通过一连串的建坛、建庙、举行庆典、供奉牺牲的闹剧而被封为地方神灵。”于是，“任何一个生前死后不曾被视为暴君的帝王死去以后，元老院一定严肃宣告他已跻身神灵之列，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被尊为神的仪式总是和葬礼同时进行”。

对于罗马皇帝，“由于罗马人天生的奴性，一些行政官、元老和一些骑士都自愿对他宣誓效忠，一直到这种原不过是一种个人讨好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宣誓效忠的严肃仪式”。这就是欧洲人动不动就搞宣誓的来源。感觉最过瘾的，莫过于罗马帝国皇帝的尊贵体验。“人们出于虔诚加之于最高神灵的最崇高的称号和最恭顺的姿态，一直被为了谄媚或出于恐惧应用于和我们自己秉性相同的生物。俯伏在地亲吻皇帝的脚的表示尊敬的方式，是戴克里先从波斯的奴役制度中借

来的；但它却一直延续下来，并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希腊王国的最后一代。除了星期天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暂不使用外，其他日子凡是朝见皇帝的人，不管你是已授予王冕或紫袍的亲王，是出使代表他们的独立的君主的使臣，是亚洲、埃及或西班牙的哈里发，是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国王，还是古罗马的拉丁皇帝，都必须行这侮辱性的礼节。”有些人经常拿中国臣子给皇帝下跪说事，拿大清皇帝要求英国使臣下跪说事，殊不知，不久前，英国使臣、法国使臣到了君士坦丁堡，到了罗马教廷，必须趴在地上，亲口舔一舔希腊皇帝、罗马教皇的脚丫子。

“天朝”形象的知识产权，也许应该归属于欧洲，而不是中国。希腊皇帝偶尔出行，“每逢有这种活动前夕，便有传令官向全城宣告君王的这恩惠的或虔诚的意图。然后有人打扫、清洗街道；在路上铺上鲜花；在阳台和窗口都陈列着最名贵的家具、金银器皿和丝绸帷幔；并且严令禁止有人吵闹喧哗。队伍最前面部分是带领他们部队的军官；在他们后面是一长串的政府的行政官员；皇帝四周由他的太监和奴仆护围着，到了教堂门口，他会受到主教和教士们的庄重迎接……从观众中、宴会上和教堂里也同时发出同样的欢呼声。为了表示皇帝的权力无边，这欢呼还由或真或假充作某些特定民族的雇来的民众，分别用拉丁、哥特、波斯、法兰西，甚至英吉利语重复叫出”。为使皇帝享受到“天朝”的感觉，希腊王国的大臣们真是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

西欧贵族们为了表达对国王的忠诚之心，除了定期向主子交钱交物、亲自带兵为主子看家护院，还要将他们的年幼的儿子送到主子那里“接受教育”、“伺候主人”，并创作出“民歌”：作为马仔，“他应真诚地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封建领主，并首先保卫自己的封建领主；他必须是一个开明的真正爱正义的人；他必须和正直的人做伴，倾听他们的话并从中获益；他必须学习应用展示的本领，使自己仿照亚历山大国王的榜样，成就伟大事业；骑士都必须根据这条规则来律己。”

在西欧，身上没有高贵的血液，想当上国王，比做梦还要假。17世纪中叶，英国贵族们犯上作乱，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运动。议会原本指望吓唬一下查理，希望他知难而退后，双方议和也就罢了。岂料开战以后，仗打得没完没了。查理被活捉后，拒绝做起码的妥协，搞得议员们下不来台，加之克伦威尔等人又动了邪心思，只好处死这昏君。国王一死，克伦威尔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坐上了龙椅。尽管克伦威尔让英国迅速成为欧洲强国，但是，克伦威尔死后，英国贵族们死活不肯相信他的儿子属于龙种，迎请与昏君有血缘关系的查理二世回来当国王，并将克伦威尔的尸体从棺材中拖出枭首示众。尽管查理二世混蛋，他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更混蛋，但是无人敢取而代之。最

后，还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女婿威廉回国，借机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

翻开欧洲历史，英国国王原本是法国人，西班牙国王原本是奥地利人，本国国王不会说本国语言，为了谁当甲国国王，乙、丙两国军队打得稀里哗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原因何在？因为这些国家的王室相互通婚，全是亲戚关系，当某国国君无后，唯有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从别的国家找人来当国王。如果有几个国家认为自家的王子有资格坐上这把龙椅，便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最有趣的是，尽管英国国王不会说英语，西班牙国王听不懂西班牙话，但是，王公大臣和平头百姓，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推翻他。西欧的等级意识是如此之强，对血统是如此之留恋，以至于将家谱即血统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人类学。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在为获得国王敕封“爵士”而奋斗不已。

西欧百姓更是遵纪守法。西欧人民一致认为：完全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农奴儿傻蛋。国王的后人才能当国王，哪怕他是外国人；贵族的后人永远是贵族，哪怕他是白痴；农奴的儿子只能是农奴，尽管他是天才。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从罗马帝国到1789年的法国革命，180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民就没有正儿八经地造过反，更没有一个王室是农奴们推翻的。尽管欧洲大陆战争不断，天灾连连，但是，百姓们直到全家、全村饿死，也想不到搞一次起义。期间几次有点动静的闹事，还是为了宗教教义之争惹出来的，绝无犯上作乱的意思。

都说欧洲农奴受尽压迫与剥削，但是，当面对“革命”的时候，欧洲百姓迸发出的对国王的忠诚度，让人惊叹不已。基佐在《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详细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克伦威尔等人抓住国王查理后，为了显示“公正”而公审国王。议员们怎么也没想到，审判时，广大伦敦市民竟然站在昏庸无耻的国王一边，齐声呼吁“要秉公审判”、“上帝拯救国王陛下”，议会命令军队弹压也无济于事。几次公开审判，都是如此。索性，议会关起门来直接宣判，结果数十名审判员中，没几个肯在判决书上签字。克伦威尔威逼利诱，生拉硬拽，“最后得了五十九人的签名，也许是由于内心态震动了，不然就是有意如此，胡乱涂鸦，几乎辨认不出来”。议会强行砍下查理的头后，“群众浩叹了一声，声音深而且长，有许多人向斩首的砧板跑来，用手巾蘸国王的血……”正宗的“人血馒头”故事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

法国革命期间，誓死保卫国王的，也是受压榨最深最苦、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法国农民。雨果的《九三年》生动讲述了这样的历史：整个旺代地区全民皆兵，与“共和军”展开了殊死搏杀，“为了保卫这尊大炮，600个农民曾经毫不畏缩地在大

炮周围倒下了”，“军火缺乏的时候，他们数着念珠念经，冲到共和军的炮队里，去抢他们弹药箱里的火药”。对共和军俘虏，他们极其残忍，或活埋或锯掉双手。

中国百姓不一样，遇上不满意就会造反。谁领头造反成功，谁就当皇帝。朱元璋是要饭的和尚出身，刘邦原来是乡镇派出所长，他们打下天下后便坐天下，没有人认为不合适。文盲李逵一直认为，皇帝的龙椅，他的宋江哥哥也是可以坐的。翻开中国历史，秦、汉、唐、元、明、清，均为普通百姓武装起义所摧毁，唯有宋朝亡于外部力量。

国人总在谈“奴性”，比起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中国人差远了。

欧洲的女权

五四以来，不少精英人物痛感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将中国妇女受虐待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殊不知，无数证据证明，欧洲妇女的地位一点儿不比中国女人高，可以说处境更糟。

圣贤苏格拉底是这样教导雅典女人的：“一个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来：她的责任是管理她的家务，看管屋里的东西，以及服从她的丈夫”。

德谟克利特说：“接受一个女人的命令，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德谟克利特还谆谆告诫道：“女人不应该动口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少说话对于女人是一种装饰，而装饰简朴，在她也是一种美。”

欧洲的最高法律《圣经》之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言论。《马太福音》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男人写封休书，便可休掉妻子；被丈夫休掉了的女人，连再嫁人的机会也没有了。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女人没有公民权，对社会事务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唯一对希腊妇女开放的公众职位是宗教女祭师”。“同亚洲西南部和安纳托利亚的都市社会一样，希腊城邦也采取了严格的父系家庭结构。男性家族首领统治着家庭，希腊妇女生活在父亲、丈夫甚至儿子权威的阴影之下。”政治和社会活动也与罗马的女人无缘，她们属于家庭所有，“罗马法赋予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家长以绝对的权威”。直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女人才被承认是公民中的一员。

没有公民权，自然就失去了财产继承权。雅典规定，没有兄弟的女人，可以继

承自己父亲的财产，但是，她不能直接继承，必须通过她的丈夫转赠给她的儿子。所以，对于雅典女人，生儿子是天大的事情。怀孕、生儿子固然有利于继承财产，但也给女人套上另一枷锁，因为雅典还规定：男人去世后流产遗腹子是犯罪；有孩子的寡妇必须留在夫家抚养孩子。

罗马法规定：“让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过了法定时间之后，结第二次婚，而在第一次婚姻中已有孩子，则她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对她在结婚时得到的财物保有用益权，但全部财产应由他们的孩子继承，因为最神圣的法律已给这些孩子们保留了在其父母死后继承全部财产的权利。”老公的财产不属于老婆，老公死后，老婆只配担当一个看家人的角色。

进入中世纪后，蛮族国王依葫芦画瓢，搞出一些更直白的东西来。

勃艮第法律写道：“如果一个勃艮第妇女在她丈夫死后，再结第二次婚或第三次婚，如果他每次结婚都生有儿子，则她活着的时候，可以根据用益权占有婚姻的赠与；但他死后，他的每个儿子都可以继承他的父亲给予他的母亲的财产；因此这位妇女无权把她作为婚姻的赠与得到的任何财物给予、出卖或转让给他人。”

萨利克法律写道：“萨利克的土地不得落入妇女之手；继承权只可以移交给男子。”

1128年，法王胖子路易颁发给拉昂自治市特许状——拉昂自治市“基本法”时说：“如果此地的任何人在他女儿或孙女或亲属出嫁时，给了她土地或金钱的，如果她死时没有后嗣，则应将她身后留下的别人给予她的土地或金钱归还给予的人或其后嗣。同样，如果一个丈夫死时没有后嗣，则应让他的一切财产，除了他给予他妻子的妆奁以外，都回到他亲属的手里；他妻子生时可以保持这笔妆奁，但她死后，这笔妆奁应回到她丈夫的亲属手里。”

因为欧洲女人被看做生育机器，所以西方人和东方人一样，高度重视女人的贞操。在希腊，为了确保女人的贞洁，女人们被隔离在一个外人基本看不到的地方，“居住在城里的上层妇女在家里消耗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如果要外出，必须有仆人或者监护人陪同，她们经常要戴面纱以避免其他男人的注意”。一旦发现妻子有不轨行为，希腊男人和罗马男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可以随意处置她，包括杀死、致残、出卖为奴。

日耳曼人有对偷情妇女严惩不贷的传统。据《日耳曼尼亚志》记载：“这个地区人口虽然稠密，但通奸是难以听到的，一旦被发觉，立刻就会受到丈夫的惩罚。他铰

掉妻子的头发，并把她的亲属集合起来，然后剥掉她的衣服把她逐出家门，穿行整个村子，当着她的父母一边追她一边用鞭子抽打她。”进入中世纪后，西欧妇女的境况更为可悲。男人们离家远行时，为了确保妻子独处时不红杏出墙，发明了将女人阴部套上铜铁锁链的“贞节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贞节带还是畅销产品。据说，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这玩意儿还在市面上流行。

欧洲社会绝不宽恕“有污点”的妇女，即便她是贵妇人。中世纪晚期的人如此描述这个时代的上流社会：“这个时候，天下太平，常有盛大的宴会和马上比武，贵妇人和少女们的各种保护者都集合在他们知道的宴会的地方，这种宴会是普通而常有的，当时的优秀骑士都穿戴得十分体面地前来参加。但是如果偶然有一个名声不好或有污点的贵妇和少女坐在一个好名声的贵妇和少女旁边，那不管她作为贵妇的地位有多高，她的丈夫多么富有、多么高贵，有时那些本身品德良好的骑士，会毫不羞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们面前，让有好名声的妇女坐在有污点的妇女面前，并当众对她们说：‘夫人，对这位夫人和姑娘坐在您的前面请勿生气，因为虽然她也许不像您那样高贵或富有，但她是没有污点的，毋宁说是属于品德优良的行列。而人们并没有批评你这一点，对此，我是很生气的。但对应该得到尊敬的人表示敬意，这是没有什么惊异的。’优秀的骑士这样说了，就请那些有好名声的妇女坐在第一排，为此，她们在心里感谢上帝，因为她们被认为纯洁，并由此而受到尊敬，而被邀请到第一排就座，其他的人则承认自己的错误，耷拉着脸感到羞愧。通过这件事，一切贵妇都有了好的榜样。”

婚姻由长辈决定，出嫁后绝对服从丈夫，未经允许不迈出家门一步，这就是欧美妇女婚后便回家做全职太太的来历。

一方面，欧洲社会很重视女人的贞洁；另一方面，欧洲的小家碧玉们，很难将第一夜交给自己心爱的另一半。伏尔泰告诉我们：“领主们发明了一种特权，名为初夜权，或称破瓜权、先占权，即与庶民的新娘睡第一夜的权利。一些主教、修道院长也以大贵族的身份享有这种权利。甚至到上个世纪（指17世纪——笔者注），某些领主放弃这个权利时，还要他们的臣民出钱。这种奇怪的权利遍及苏格兰、伦巴第、德国以及法国各省。”

食色，性也。一夫多妻，是古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在古希腊，雅典的妓院、妓女数不胜数，海港皮拉埃乌斯就是著名的红灯区。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便是泡妓女的高手。和宋徽宗的李师师一样，雅典名妓阿斯帕西娅，因为被伯里克利泡上了，

也获得了流芳千古的荣耀。罗马皇帝多淫乱不堪。埃拉伽巴卢斯到处找女人，连神庙里的女尼也不放过，性交姿势和春药研究成了他唯一支持的科研工作。罗马皇帝还将心比心地制定法律：被派担任某省总督之类的官员，如果尚未结婚，政府将为他配备一名专门的姘妇，就跟配备骡马车仗一样。伏尔泰说：在中世纪欧洲，“法兰克的几个国王，贡特朗、卡里贝尔、希吉贝尔、希尔佩里克、达戈贝尔都同时有好几个妻子”。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普有3个正式妻子和24个外室，15个私生子，甚至专门为一个他宠信的外室组建了所谓的金羊毛骑士团。欧洲男人为了争风吃醋而打打杀杀的故事，那就多得没法说了。马克·布洛赫说：“历史提供的证据更加明晰无误。我们知道，贵族的婚姻常常是一宗平凡交易，贵族家族中私生子成群结队。”

在古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于男子，但也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不堪。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爱情诗无数，多以女性的身份创作。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女子再嫁，直到宋朝，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宋朝法律规定：夫亡百日（起初为6年）之后，便可改嫁。宋太祖、宋英宗都曾亲自劝大臣之妻改嫁；宋真宗皇后刘氏、宋仁宗皇后曹氏，都是改嫁而来。著名词人李清照原为相府儿媳，夫死之后便改嫁他人。直到明朝，再嫁才开始受到非议，但也只是不够光彩罢了。

“哈洋族”极力夸奖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的“人权”。但是，劳伦斯·斯通告诉我们，这时的英国女人等同于牛马，英国男人可以如此处理妻子：“依照1772年时的记载，先生‘套一根缰绳到太太的脖子上，然后领太太到市场，在那儿将她公开拍卖，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仿佛她是一匹传种雌马或一头乳牛。通常在拍卖前即已安排好一位购买者’。此一拍卖显然是仿照牛只拍卖的程序而来……它发轫于中世纪，但证据显示它到18世纪末才变得普遍，然后在19世纪渐息，最后一桩买卖据记载是在1887年。”

鸦片战争前的1793年，英国马戛尔访华使团随员爱尼斯·安德逊撰写的《英使访华录》说：“认为中国妇女被关在屋子里不许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在北京城内）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1/4是妇女，这个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当车子开始移动时，我轻轻地和这些殷勤的妇女们握手，她们报我以甚为文雅的亲热。从在场的男子们中间也看不出他们对我的举动有什么不满之处……因此，在这城市里，女子，显然地，并未被剥夺她们所应享有的这部分自由。”显然，此时的中国男人并不“封建”，而中国女人比英国女人更“自由”。

在11世纪，即中国北宋时期，西欧教士吉贝尔特·德·诺根特，如此这样歌颂他自己的母亲：

“我母亲的善良的表情，她的罕有的语言，她的始终宁静的面容，并不是生来鼓励那些看到她的人的轻浮举止的。而在上流社会妇女中很罕见或者几乎从未见过的是，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上帝赐予的纯洁，正像她被天意保留下来去谴责那些滥用上帝赐物的妇女那样；而当一个妇女不论在她自己屋里或在自己屋外成为这种指责的对象时，她总是避免参加进去，她一听到这种指责就感到苦恼，就好像这种指责是落在她头上的。”

“我刚诞生8个月，我父亲就逝世了……我母亲那时虽然还很年轻而美丽，但她决心守寡。她履行这个誓言是多么坚定啊！她做出的稳重的榜样是多么伟大啊！”

“她生活在对上帝的深深的敬畏之中，并以一种平等的爱，对待她的邻居们，特别是那些穷人。她谨慎地管理我们和我们的财产。”

“我的母亲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抚育我成人。”

“我刚刚学会最初步的几个词，我母亲就急着让我受教育，把我托付给一位语法老师。”

随便翻阅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位西欧的伟大母亲，与中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母亲形象完全一样：恪守妇道，不事二夫，潜心持家，睦邻友好，善良仁爱，倾尽全力抚育子女，让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

将其中的上帝、贵族之类的洋名词换一换，不就是中国的“贤妻良母”形象么？

英国革命：贵族圈子的游戏

即便在英国革命之前，英国国王也远没有欧洲大陆的国君们过得滋润，大一点儿的事情就得与贵族们商量着办。这倒不是英国人有修养有文化，而是因为它孤悬海外、经济文化落后，日耳曼村寨的原始民主传统保持完好。这也不等于英国国王权力不大，或者贵族们有多大的自由。所谓的《大宪章》到底有多大价值，完全看当政国王的个人能力。培根在议会胡说八道了几句，在得知女王不高兴的消息后，他迅速改过重新站队，出卖曾经给自己通风报信的朋友，才保住了贵族地位。

英国革命，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延续，而国君詹姆斯和查理的昏庸，将宗教之争发展成了一场贵族内部的混战。早年，天主教在欧洲牛气冲天，罗马教皇声称自己才是欧洲的老大，有的神父甚至宣称国王们还不如一个普通教士高贵。教廷任意搜

刮财富，设立审判庭，把各国搞得支离破碎，国王们未必心甘情愿，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忍气吞声。1520年，马丁·路德，一个普通的神职人员出来扒教会的皮，贴出大字报说：“教皇、主教、神父、修士应称为‘属灵的等级’，君王、领主、工匠、农夫则是‘世俗等级’，这是纯粹的虚构。这是莫大的谎言……认为只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或确认对《圣经》的解释，这是恶意编造的谎言。”他宣称：“基督教的世俗权力应毫无任何障碍地履行其职责，不管它是否涉及教皇、主教或神父；谁有过失，就让谁受到惩罚。”他的法国追随者约翰·加尔文更是编写了《基督教教义》，跑到瑞士终身致力于这一事业。这两个人创立的被称之为新教的基督教，很快将欧洲宗教市场搅和得乱七八糟。国君们自然大呼过瘾，即便是站在罗马教廷一边的国王，也趁教皇成为病猫的机会，将本国土地上的教会纳入自家门下。自此，欧洲的国王们不仅是本国的政治领袖，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有了自己的“国教”，国王成了当然的教主。不过，在任一国家，事实上既有大批的天主教信徒，也有许多新教徒，而新教还存在着派别之争。随着“国教”的诞生，宗教市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由于基督教教义强烈的排他性，首先引发了德国的三十年战争。

德国那边硝烟尚未散尽，英国也大肆迫害“异端”，仅1630～1640年这十年间，被迫逃往国外的清教徒就有6.5万余人，另有大批人四处躲藏。17世纪，英国总人口才500万，就是说，逃亡者超过全国人口的1%。其实，这不过是欧洲各国虐待“异教徒”的一个缩影。倘若说1640年的英国革命有多少民主内涵，那是瞎说。英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宗教势力发挥了作用。贵族们的宗教组织对国王的宗教倾向十分不满，而且发现他不过是一只无能的病猫，便想教训一下他，完全没有更换主人的意思。1641年议会通过的《大抗议书》是他们行动的“政治纲领”，开篇便大谈“耶稣会的罗马教皇派——他们憎恨法律，把法律看作是阻挡他们久已渴望要改变及颠覆宗教的障碍物……罗马教皇派复兴和加强的后果与证据便是议会给国王陛下两度拨款之后，竟于牛津被解散了……”总之，议会中的造反派，将他们与国王之间矛盾，视为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斗争。

查理最终被杀，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不肯服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议会一再以武力强奸民意，长老派、独立派的争权夺利，培育出了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武夫。基佐在《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说：“胜利是彻底的，不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它是用欺骗和暴力赢来的。这样的方法使他们自己的成功很不体面，尤其是正在

以法律名义进行改革的时候，正在口称要恢复法律的尊严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一句流行的口头话，说凡是责难国王的事，议会自己没有一桩未曾犯过。”

等到克伦威尔用枪杆子将议员们赶出议会大厅时，其中有些人是有所悔悟的。因此，克伦威尔一死，他们便迎请新国王。之后，随着“光荣革命”，形成了所谓君主立宪制度。

支撑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有两大“法律”：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前者的主要内容为：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废止法律，不得随意征税，不得建立常备军，臣民有权向国王请愿，新教徒有权置备武器。后者的主要内容为：与天主教会有染者无权继承王位，即使当上国王也得滚蛋。重中之重，是不能让天主教势力主掌英国。

英国是一个贵族国度，其所谓的议会，不过是贵族们谈天说地、偶尔议论国政的俱乐部。议员没有薪水，只有特有钱且很有闲的人，才有兴趣干。事实上，无论是选举权还是被选举权，只有拥有相当数量的家产才能获得。18世纪中叶，英国725万居民之中，仅15万人具有选举权。直到1832年“改革法”，依然将财产多少作为获取选举权的门槛，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当百姓为此向国王请愿时，议员们顾不得“臣民有权向国王请愿”了，派出军队大加杀戮。

在狄更斯的笔下，1775年，“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国家那样自吹自擂有多大道理……一向很忙碌然而总是无益有害的绞刑手，更是忙个不停，时而绞死一长排一长排各种各样的罪犯，时而在星期六绞死一个在星期二抓住的侵入私宅的抢劫犯，时而在新门监狱烙成打的犯人的手，时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厅门口烧小册子（指宣传品——笔者注）。今天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明天处死一个可怜的小偷，因为抢了一个农民的小孩六个便士”。

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在18世纪，“从原则上说，英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人身保护令’并不能使穷人免受‘拉伕’之苦，许多穷人被招工头骗上王家船队充当海员，不平等在事实上和习俗上仍占上风。土地所有权仍掌握在几千个大家族之手，爵士和乡绅在郡区和教区为所欲为，领主制的痕迹仍未消失。显贵们在联姻和社交等方面怀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如同大陆各国那样，霸占着各种名利双收的职务……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人们钻营进入国会，往往只是为了扩大谋取财利的地盘。由贵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机构，本身就十分软弱，加上收受贿赂、滥用特权和安插亲信，就变得更加腐败了”。

18世纪：伏尔泰的世纪

所谓民主，通俗地说，就是政治家以平等的心态对待百姓，有钱人以平等的心态对待穷人，有地位的人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普通人。总而言之，没有平等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一个存在贵族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贵族社会，就是少数人靠世袭占有全社会多数权利的社会。要建立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消灭贵族。这一点，任何精英都应该赞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便是贵族主导的社会。一战结束，英、法、美三国的胜利，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

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民主与法制的认识的，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恰恰在这个18世纪，来自于美洲、亚洲、非洲的源源不断的财富，使贵族们生活得无比舒心，他们办沙龙，办酒会，办舞会，办赛马会，其奢华放纵多姿多彩，远远胜过他们的祖宗。**18世纪，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思想空前解放，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歌舞升平的时代，因此，这个世纪被称为欧洲“贵族的世纪”。**

此时的德国，由贵族地主们主导的普鲁士王国，正欣欣向荣，兵强马壮，攻城略地，一路凯歌。汤普逊教授证实：“迟至1750年，在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总计为8000农户的田庄中，大约有4500户是农奴。”乔治·勒费弗尔说：“在普鲁士王国，农民即使不是西欧通常含义的农奴，至少也是依附于土地和受贵族任意处置的‘家奴’。”什么民主法制，在这里绝对是海外奇谈。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首次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不仅建立了30万人的常备军，农奴制得到很好的坚持和发扬，还创立了秘密警察组织。

至于欧洲另一大国俄罗斯，农奴制度正方兴未艾。乔治·勒费弗尔说：“俄国的农奴与奴隶相差无几，因为贵族可以不连带土地单独出售农奴，甚至把农奴送往西伯利亚流放。”想要验证这段话并不难，因为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在中国可以轻松找到。当然，这也正是俄罗斯大肆扩张，成就地跨欧亚的大帝国的黄金时期。

法国不仅是令欧洲大陆望而生畏的国家，更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是欧洲贵族的礼仪培训中心。法语是欧洲贵族的通用语，巴黎是欧洲贵族的精神之都，法国贵族制度之完善自不必说。在这个2500万人口的国家，国王的侍从人员多达1.5万人。国王非常需要钱，“为了增加收入，国王把他在行政、司法、财务和军事方面的部分权力作价出让，同时也让贵族担任某些要职，借以抬高官职的价格”。乔治·勒费弗尔说：

“例如在法国，捐纳官职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在法国人多势众，由于官职是用钱买来的，官员对王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们根据自己的职务，分别在审判所、税务所和财务所组成维护自己特权的集团。”法国的宗教事业极其发达，“据一般估计，法国约有13万名教士，其中担任世俗职务和教职的各占一半”。至于国王手下的贵族们，狄更斯说：“那些缺乏军事知识的军官，对船舰一无所知的海军军官，不懂业务的文官，混迹于这最坏的世俗世界、眼睛色迷迷的、一张嘴放纵惯了、而且过着更放纵的生活的厚颜无耻的教士，这些人根本不称职，却胡编瞎吹，冒充内行。”抽空阅读几部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作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贵族知识是丰富的，言谈是高贵的，举止的文雅的，唯独对百姓没有一丝人文关怀，对正事没有半点知识和兴趣。

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一统欧洲的神权，结果不仅使国君们的王权变得至高无上，而且戴上了宗教领袖的桂冠。在整个欧洲，“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只要听话！）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伏尔泰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纪，”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时说，“在那个阶段的人类社会，人民是什么？是无知。宗教是什么？是不宽容。司法是什么？是没有公正……伏尔泰直接面对这种轻薄无聊、凄惨忧郁的社会，独自一人，眼前是各种力量的联合，宫廷、贵族、金融界；这支不自觉的力量，是盲目的一大群人；这批无恶不作的法官，他们媚上欺下，俯伏于国王之前，凌驾于人民之上；这批神职人员，虚伪、狂热、阴险兼而有之。伏尔泰，我再说一遍，独自一人对这个社会丑恶力量的大联合，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闪电———支笔……他战胜了古老的法典、陈旧的教条，他战胜了封建君主、中古时代的法官、罗马天主教式的神甫。他把人的尊严赋予黎民百姓……让我们向这个人讨教，他有益于人类的生命在一百年前已经熄灭，但他的作品是不朽的。让我们向其他强有力的思想家讨教，向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讨教。让我们与这些伟大的声音共鸣……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吧！”

启蒙运动唤醒了欧洲人的理智，热血首先在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沸腾。法国学者米涅撰写、法国182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是一部实况录像片：“（1789年）7

月14日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黎的运动传到各省，在各城市，人们情绪激动地反对旧官吏，也反对特权等级。在乡村，人们纵火焚毁城堡，农民烧掉领主的租契。现在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废除各种特权。8月4日晚，诺阿耶子爵发出了信号：他提出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并废除人身劳役。夏特莱公爵建议免除什一税，将它改为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建议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还有各项建议，如废除贵族领主裁判权，废除卖官鬻爵的恶政，免除免税的特权和租税的不平等，废除僧侣的临时收入、罗马教廷的‘首岁教礼’和神职人员的名目繁多的与没有名目的俸金等等，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提出并且通过了。这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它把人们从奴隶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获物、强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它废除了作为私权残余的贵族裁判权，从而建立了公权制度；消灭了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就预示着免费诉讼制度的到来。这一夜是从一切属于个人的制度到一切属于国民的制度的过渡。”

血腥之下无民主

无疑，1789年的法国革命，对推进欧洲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国走到今天，远不是靠一场革命实现的。

启蒙运动对封建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神权和教会的毫无保留的否定和鞭笞，这样一种文化的持久传播，培育了一批激进、偏执，甚至心灵扭曲的革命家。法国革命，是他们发起并主导的，正是他们送给人类一个《人权宣言》；但也正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干出些令民众恐怖的践踏人权的勾当。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欧洲是带着浓重的、刺鼻的血腥气进入新时代的。在法国革命中，革命家们持续进行着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不断做出今天看起来哭笑不得的决定。

那个时代的精英们，尤其是对法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雅各宾派，他们口称人权，“以人民的名义”开展工作，实际上，他们的言行毫无“人权”可言；他们大谈民主，但容不下半点不同意见。所有曾经的政治盟友，统统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将敌人从肉体上消灭，是他们进行革命的唯一手段。

米涅说：为了威慑保王党人，“于是，组织了一个可怕的庞大的检察机构，进行住宅搜查；监禁革命派认为身份和言论上形迹可疑的一大批人。这些倒霉的被监禁者，主要是僧侣和贵族两个反抗阶级中那些被控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人

……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在三天中，全部被一个由公社支持领导的、约300人的行刑队杀死。这帮人肆意杀人，而神态自若”。

乔治·勒费格尔的《法国革命史》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格里尔的统计可惜只涉及死刑判决：总数约在17000人左右。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世纪要高得多……此外，监狱恶劣生活条件是凡人死亡率很高。这类死亡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统计，格里尔认为总数约在3.5万至4万人之间……关于嫌疑犯的人数，圣波尔一个县共关押1460人，估计全国约有30万，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的恐怖经历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在被处死的名单中，85%属于第三等级，即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而教士仅占6.5%，贵族占8.5%。”在两三千万人的法国，这是多么可怕的惨状！

屠杀保王党，滥杀持不同政见者，枉杀合作伙伴，人人自危。时人为了自保，目睹亲人被杀还得装出高兴的样子。极端的反人类的场面，出现在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著作中，读来让人颤栗。

我们欣赏有关法国革命的油画，知道法国妇女们在革命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男革命家起草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而女革命家奥兰普·德古热也发表了《女权宣言》。奥兰普·德古热不仅没有争得女权，而且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知道，这些革命家自称是卢梭的弟子，而根据他们制定的选举法，如果卢梭活着，因为贫穷，他只有当观众看学生闹革命的份儿了。

创造疯狂者，必被疯狂所杀。雨果不无调侃又甚为悲伤地说：“他们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韦尼奥9个月，马拉5个月和3星期，勒倍勒蒂叶—圣法若只有1天。”恐怖政治的头号主角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时，百姓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

对宗教和宗教组织，他们甚为极端。米涅说：“他们强迫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在国民公会背弃天主教，又强迫国民公会下令‘信仰理性以代替天主教’。教堂被封闭，或改为理性教堂，各城市举行庆祝活动，因而出现了不信神的种种丑恶场面。”

为了表示彻底革命，他们坚决告别历史，“规定了一种新的纪元，他们改变了年份的划分，改变了日和月的名称：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代表星期；规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基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12个月，每月各30日，从9月22日起，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

月为秋季……”

满地流淌的鲜血教训了生者，获得“民主权利”的百姓发现民主不是个好玩意儿，让那些言必称民主的精英掌权，远不如有个国王的好。有国王在，只要老老实实当顺民，一般不至于掉脑袋。“共和五年芽月的选举——改选1/3的议员，其中‘常任议员’占半数——使右派获得大胜。在90个州中，仅有一半仍忠于共和国……右派在选举中了压倒优势。”

拿破仑称帝，得到了广大法国人的高度拥护。拿破仑倒台40年后，获得“普选权”的900万法国选民，高喊着“皇帝万岁”，先用选票支持重建帝国，再用选票将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送上皇帝宝座。自此，天下太平。

路易·波拿巴虽然专制，但在建设上的确不负众望。在短短18年时间里，不仅农村和农民赢得很大实惠，工人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巴黎2.5万座老旧建筑被拆，代之以7.5万座新式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宽阔的林荫马路。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吸引了1000万人次参观游览，巴黎再享世界文化之都的美誉。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第二帝国轰然倒塌。没有了皇帝的政府军，大肆屠杀巴黎公社的社员。人口不过两三千万的法国，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3万人未经审判被杀，3万人被投进监狱。

第三共和国建立了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混合型“民主制度”，但是，共和国政府丑闻不断：包括总统在内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卖官鬻爵；政府总理和高级官员、国会议员上百人集体贪污受贿；草菅人命的德雷福斯大冤案，更是让法国人民丧失了对政府和法律的基本信任。

伟人说得好：历史总是螺旋形进步的。雨果说，法国革命，“在这只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雨果以尊重生命、尊重人格为主调的一部部作品，大约成了当时法国精英们的主体认识。人类社会正是以这样一种复杂的形态前进着，人们在失望中创造并推动新的希望。在流逝的时光和认识的更迭中，法国终于建立了比较合理、稳定的共和制，并逐步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

跌跌撞撞向民主

19世纪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更不存在“民主”神话。

1848年，意大利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行政权只属于国王。他是国家的最高

元首。他统帅一切武力，包括海军和陆军；他宣布战争，缔结合约、盟约和商约；他任命所有行政机关的官员，以及为了执行法律，他可以发布一切必要的命令；但不得搁置法律延不执行，也不得特免对法律的遵守。”设立了议会，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终生任职；平民院议员选举产生，只有占全国人口2%的富人，才具备参选议员的资格；两院都由国王召集。

1871年，德意志帝国也通过了德意志宪法。皇帝拥有统帅帝国军队、签订国际条约、任免国家官吏的权力，帝国宰相只对皇帝负责。

德意两国的老大比清朝皇帝也差不到哪里去，庞大的奥地利帝国一如既往的高度专制。沙俄皇帝的权力从来就超过西欧君主。

重点说英国。英国国会有上议院、下议院。上议院是贵族院，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撇开它不谈，专说下议院，即所谓平民院。**英国的平民院，从来不对真正的平民开放。**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刚刚经过1832年深化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规定：市镇中年收入10镑以上的房主和年付10镑以上房产租税者、农村年付10镑田土租税的60年长期田地租用者、年付50镑田土租税的短期田地租用者、年付2镑地税的自有土地者，方才享有投票权。在全国2500万人口中，选民仅80万挂零，占3%。这80万人之中，有资格去参加议员竞选的又是微乎其微。英国法律规定，议员是白干活没有工资的，农村地区议员必须有年收入600英镑以上的地产，城市议员年收入必须在300英镑以上。想进入平民院议政吗？行，先拿大把的银子来给我瞧瞧！

由富人们选举产生、爵士和富豪组成的议会和政府，是不会关注草民利益的。“工业立国”之后，英国各行各业雇佣了无数童工，没日没夜地工作，仅“在这个矿井的18个男人和孩子中，至少有6个女孩”。出于“人道”考虑，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工厂法”，规定工厂日工作时间“决不允许超过12小时的最高限度，吃饭时间不计在内。工作决不允许延长到晚上九时以后，亦不得在早上六时以前开始”。1832年，22岁的工人马修·克拉布特里说，他8岁进入工厂上班，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工作，“最好的时候，我在家的时间不超过8小时，包括梳洗、吃饭及做一切事情的时间”。“我碰巧迟到时，总是挨打。我早上起床时，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通常在去工厂的路上一边哭一边跑”。此时，他身边有很多童工，“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很少人能读写”。

缺乏人性最典型的事件是：1845～1849年，英国领地爱尔兰粮食连年歉收，爆发了严重的饥荒，英国政府始终见死不救，致使100万爱尔兰人饿死，150万人移民海

外，爱尔兰人口由820万锐减到540万，就此种下了爱尔兰人对英国的离心，最终发展为独立战争，直至前些年方才安静下来。

1838年左右，忍无可忍的英国草民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收效为零的“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重要人物、晚期的领导人甘米奇撰写的《宪章运动史》，详细地记录了这场运动。运动领袖之一奥布赖恩是这样评价英国“民主政治”的：“今天在英国，除了企图用暴力来统治国家的那70万依靠地租、利润和利息为生的人（指有选举权的人——笔者注）以外，根本无法律可言。他说，不要再向他们提起什么女王、内阁和下院了；他们都不过是那70万垄断者的傀儡，他痛斥这些垄断者和阴谋家。”

起初，草民们一边集会，一边递交请愿书：“敬请贵院十分慎重地考虑我们的请愿，作出最大努力，通过合乎宪法的各种方式，制定一项法律，对每个精神健全、未被宣判有罪的法定成年男子，给予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规定未来的议会选举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每届议会的任期无论如何不超过一年，取消议员资格的财产限制，议员在议会供职期间享有应得的报酬。”**石沉大海之后，草民们继续集会游行，政府以不变应万变，一律派军队、警察予以血腥镇压。**“1840年1月13日，星期四，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提到庭，听候宣判……审判长向被告们讲话，提到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接着就宣布对被告处以古老的、野蛮的刑法，并指示将他们押回原处，然后再从那里押赴刑场，执行绞刑，直到气绝身亡。然后将他们斩首并肢解尸体，遵照女王陛下的旨意，予以处理。最后，他照例希望上帝怜悯他们的灵魂。”在许多议员也觉得过火之后，“极刑的处分免于执行，对被告们改处终身流放出国”。

领袖们改变策略，策划选举自己的人进议会，以此改变议会，于是组织参加了1841年和1847年大选。甘米奇说：“宪章派提名麦克道尔医生为候选人，他在选民举手表决时，以绝大多数当选，但在正式投票选举时，只获得了55票，而对方却获得了414票。这种可笑的代表制必须在此一提，以便后代可以看出在文明的19世纪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提出了宪章派候选人，在竞选坛上，看来几乎每次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在他们在参加投票选举，而选民使他们只占少数时，情形也是如此，这证明选民阶级与非选民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同情。”

另一主要领袖奥康纳，坚持和平运动，幻想通过征集签名证明“民心所向”，赢得议会支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奥康纳把请愿书送交下院，据他说，签名者有

570万人……（一天后——笔者注）索恩利代表有关公众请愿书委员会提出报告。据他说，在13名诉讼用品店员工的协助下，奥康纳听说的那份由57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经过审查，发现仅有1975496人的签名……奥康纳不信13名员工能在这一段时间内点清190万人的签名……”结果奥康纳发了疯，被送了进精神病院。

直到1918年，英国才取消了下议院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规定年满21周岁的成年男性、年满30周岁的成年女性，均有下议院的选举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美国学者H.S.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中如此比较19世纪的美国与欧洲：

“在整个19世纪，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和文学、宗教和政治，无不体现着平等观念，现实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

“在美国，平等肇始于普选权之前。那时别的国家有了一种类似的平等政治，但对于阶级区别和阶级意识几乎无任何影响。在美国，平等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心理上的。即使有人极富，有人很穷，但从某种奇特的意义上来说，在经济上是平等的……宦海沉浮取决于情况本身，而不是由先前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教育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公立学校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可以入学。运动场也同样重要，它有自己的标准，有体育才能和技术的人，都可以得到奖赏，像开发边疆和学校的情况一样，也是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垒球像英国的板球一样，被称为美国的全国性运动，它的特点是不拘器械、不拘场地，可以由很多人一起玩，而英国的板球规则则严格得多，运动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形式和程序。”

“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态度最突出地表明了这种平等观念。在欧洲的贵族看起来，他们那种态度简直糟得很，而在欧洲的民主主义者看来却好得很。因为这方面的表现，最明显地说明美国人对他们的无阶级社会感到非常满意……每一个英国绅士都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做才像一个绅士，而美国人就整体而言却更多地意识到他们和对方同样是人。”

“在政治方面，美国是民主的，但平等观念表现尤为突出。要想在政治上得到成功，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切莫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如果说美国人有时也容许他们的政治家穿礼服，却要求政界首脑们的穿着和平民百姓一样。”

这位美国学者自我感觉19世纪的美国“民主”是大大优于欧洲的。这位学者也许忘了，此时美国拥有“自由世界”人口最多、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奴隶，1861年还发生了以黑奴问题为主题之一的内战。与此同时，白人们正哼着小曲“西进”，屠杀、

圈禁印第安人。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劳工运动此起彼伏，《美国文明的兴起》中说：面对罢工工人，“在巴尔的摩，士兵出动之后不久，就枪杀了9名罢工者和旁观者。在匹兹堡，发生了正规的对阵战；当士兵向聚集在一起的罢工者前进时，遇到了抵抗，发展成为游击战争，结果若干人被打死，一些车站、车库和数百节货车遭到毁坏，损失达数百万美元。哥伦布城的罢工工人向城区进发，从各方面威胁各个工厂。在布法罗和雷丁，工人同民兵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伤亡了很多人。在芝加哥，警察企图驱散在街头集合的罢工者，发生了整天的战斗，结果19人被杀，大批人受伤。在圣路易，大量劳工同情者嘲笑和非难警察，后者进行报复，逮捕了所有在中央劳工大厅开会讨论形势的代表。即使远至太平洋沿岸，也可以听到工人和警备委员会进行战斗的回声”。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海盗们正在大肆掠买华人到美国做苦力，比尔德夫妇指出，“共和党控制的华盛顿政府于1868年签订了一项条约，正式批准了这一行动”。被掠卖到美国的华工是如此之多，以致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执行与中国人有关的某些条约条款的法案》，即排华法案。排华法案规定10年内暂停华工来美，合法留居美国的华工欲离美复来者，需在离关时登记，领取回美证明，否则为非法；中国政府所发来美证明需经海关官员认证；中国人无权入美国籍。到了1902年，排华法案把地域扩展到所有美国属地，对象扩大到教师、学生、商人、旅游者。直到二战期间，出于建立牢固的“同盟”关系的需要，美国国会才于1943年12月17日废除排华法案。

今天，我们看到奥巴马当选总统，而就在几十年前，为了黑人获得平等“人权”游行示威而被投进监狱的马丁路德·金，还呆在监狱梦想：“在不远的将来，让爱和兄弟情谊的璀璨星辰，以其全部的美丽光辉，照耀我们伟大的国度。”

一战消灭了德意志和奥匈两大帝国，二战让意大利王室消失，使欧洲的贵族阶级基本消失，代之以资产阶级，欧洲社会逐步“平民化”，首先实现了男人的“人权”平等。英国妇女通过绝食，换来了投票权。美国、法国跟着学样，女人被当做公民对待。**大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妇女作为整体，才成为社会真正认可的“公民”**。谈论西方绅士的“女士优先”时，记住西方妇女获得公民权的时间是有益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生而平等，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也是一样的。从原始民主制，走向专制，再回归到民主制，欧洲人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说欧洲人有什么特殊基因，本身就是对“人人生而平等”的一种反动。

中国的“专制”史

相对于欧洲，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制迥然不同。

秦朝一统江山（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实实在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2000多年来，朝廷统一委派官员治理各地，全国通行同一部法律、同一种文字和货币、同一个度量衡标准，只有一支绝对从属于皇帝的军队。皇子公主的封地，也得如此。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法律上讲，中国百姓与官员之间，只有上下级关系，都是皇帝的臣民，他们的政治地位——人权是平等的。早在汉朝就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县太爷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据《汉书·百官志》：“（县令县长）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所谓“显善劝义”，指的是要通过文化教育——教化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禁奸罚恶，理讼平贼”，即要通过法治搞好社会治安；所谓“恤民时务”，是要体察民情，处理好日常民政事务；“秋冬集课”，是要对下属进行考核管理；而“上计于所属郡国”，则是要定期向上级领导报告工作。官员没有政治特权，至于官服、百姓见官下跪之类，不过是官员作为朝廷的化身，享受到的一点虚荣罢了。

《剑桥中国秦汉史》说：“与其他的许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秦汉法律）目的在于畅通政府的职能，并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手段来支持政府的稳定。这些条文表明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们远不是古典的，不再是仅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权时代的风俗习惯上；它们非常清楚地表达了统治者的意图。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具有实际含义的法规组合体，普遍适用于全体居民，只有那些继续使用等级原则的领域例外……秦汉时期的爵制给受爵的人一些特权，包括犯罪减刑在内。但是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以外，其他列侯和贵族并没有特殊地位。”“家长虽有权力处罚家庭成员，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不能伤残和杀害他们，即使处死奴隶也要提交县令办理。”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中国大地上人人平等。

官职是一种职业。为官期间，作为朝廷的代表，尊荣备至，但没有谁保证其后人可以为官，实际上，他本身很可能出身寒微。秦汉以来中国百姓，无论是谁，只要他有足够的才能，均可做官，甚至当上宰相；有冤屈，他甚至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告御状，虽然未必能成功，但是法律赋予他这一权利。作为百姓，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去读书，可以去种地，可以去经商，除了皇帝，无人能够干预其合法行动，因为他不附

属于任何人。

自秦朝以来，曾经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贵族”，逐步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这正应了孔子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此后2000余年中国社会的走向。

与欧洲的世袭制不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世袭制度便逐渐解体，各国君主纷纷主动向有识之士敞开入仕大门，进入到学者治国阶段。只要肯头悬梁锥刺股，朝为布衣暮登卿相。人才济济，百花齐放，成为春秋战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剑桥中国秦汉史》：“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汉朝将为国育才、选才法制化。据《剑桥中国秦汉史》：“仕途可以使一个人从吏员的卑贱身份变成某官署的高官，从而成为制定国家政策和做出重大决定的政治家。”“从理论上讲，仕途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但事实上对商人和巫师有限制，有时还限定商人入仕所必需的财产额（指禁止财产太多的人做官——笔者注）。”“吸收文职官吏主要是通过地方官员或朝廷高官的推荐。他们被要求物色有适当的品质、即德才兼备的人；有时他们奉命寻找能批评国事的人。如果一个官员举送的人证明不是合格的人选，这个官员就会受惩罚。自公元102年起，建立了分配名额制度，以确保帝国各地按人口比例定期输送人才。”“对送到都城的候选人有时要进行考试，这些人被要求回答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开始建立的太学，可能对知识的教育有着极大的推动。在太学里，可以补充一批通晓国家活动或者精于行政先例的人士……太学的目标是培养官员。”

所谓“物色有适当的品质、即德才兼备的人”，就是“察举制”，主要内容为“举孝廉”。汉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下而上的人物品行才学的品评考察，各乡村、郡县会根据百姓口碑将人物分为若干等次，这类似于今天的民主测评、推荐制度。列入“优秀”等级的人选，政府还会派官员微服私访实地考察，确认真实可靠后，将“群众公认”的德才兼备者推荐朝廷考选任用。

汉朝根据公议遴选人才，也鼓励自荐，全社会勇于自荐，敢于担当，人才辈出，朝气蓬勃，从皇帝、皇亲国戚到士大夫、平民，都充满着催人奋发的进取精神。卫

青、霍去病、张骞、班超、班勇、傅介子、赵充国等等，无以计数的英雄无不是怀有“匈奴不灭，无以家为”的壮志。汉朝尚武，张骞出使西域，马援出征匈奴、乌桓，李广年过六旬愿为前锋，赵充国以70岁高龄自请平定羌乱，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郑吉等文臣亦常常率兵出战。岁举之孝廉，也是经过一定军事训练后，再安排担任实职。

汉朝诞生了一个富于教养、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阶层——“士”。《剑桥中国秦汉史》转述了桓谭对“士”的描述：“乡村的士以其关怀和忙于家族事务著称；县治一级的士精通文学；郡一级的士忠于其上级，是正派的行政官；中央一级的士是心胸宽大和有才能的学者。在所有这些士之上是国士，这是一些其才能远远胜过平民的人物，他们思想丰富，具有远见卓识，他们能规划天下大事，并取得巨大成就。”

正是这个阶层，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情怀，主导了中国2000余年的历史，至今引导着全国的读书人。我们背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们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无不是在赓续这种伟大的精神，传承这一伟大的文化。

在汉朝的基础上，隋唐创造了科举制；到了宋朝，门户观念从中国大地销声匿迹。

有唐一朝，据统计，除开其他科目，共计录取进士6762人，平均每年23人。宋朝科举发展到极致，300年间，共取士11万人。唐高宗时期宰相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及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宋朝皇室子孙也走向考场，先后有2500余名宗室子弟获进士出身，凭着个人的才华赢得了社会尊重。

宋真宗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读书改变命运。北宋共有宰相71人，其中进士出身的65人；副宰相153人，其中进士出身的139人。

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孤苦的韩愈，通过科举

官至吏部侍郎、省部级干部。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无资，其母用棍子在地上写字，教他读书识字。通过科举，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也就是副总理级官员。范仲淹靠在附近寺院读书，通过科举，官至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官员。明朝总理级的杨士奇、严嵩等大官，亦出身贫寒。及至清朝，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祖祖辈辈是农民。

在中国，再大的官，其子孙如果不喜读书，下辈子也别想出头。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大地上，最晚在宋朝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全社会成员平等，无一例外是皇帝的子民，没有任何人可以特殊；全社会分官、民两个阶层，但社会角色转变的机会均等，没有任何人可以特殊。

这与欧洲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长期以来，直到拿破仑扫荡欧洲大陆之前，欧洲平民的儿子永远是平民，即便你再富；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哪怕他再穷。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是先天的，谁也无法改变。

我们都看过《锄美案》，陈世美是一个穷得透顶的书生，祖祖辈辈只怕没出过一个有身份的人。他一不小心考中状元，并被招为驸马。公主嫁给出身贫寒的状元、榜眼、探花，在中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欧洲，门第悬殊的人联姻，除非“冬雷震震，夏雨雪”。欧洲最浪漫的爱情故事，无非“王子与公主”、“农夫与村姑”的自由恋爱。英国王子娶法国公主，法国公主嫁奥国王子，才是正常的。如果国王娶了平民女，他的王位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宋朝简史》中有一段十分有价值的论述：“赵宋政权主要依靠士大夫阶层作为其统治的基础，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制度全面发展，从而对宋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宋代科举失败者中也有不少人会从事其他职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通过文学或学术活动，而保留着读书人或者说儒士的身份。无论成败，围绕着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这个儒士群体，就是宋代的士人群体。与前代相比，这个士人群体没有与生俱来的特权身份，没有世代相传的官职，大多来自平民阶层，入仕者在失去官职后，也还是会沦为平民，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就是我们今天通所谓的“社会精英”。

有人曾经大加鞭挞“读书做官论”。跟我们一样，古人读书也是为了“改变命运”。数百年甚至1000年前，没有工厂企业和科研院所，也没有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没有跨国公司，可供全民选择的职业，除了种地、经商，就是做官了。贫寒人家土地有限；经商，平民百姓拿不出本钱；当官待遇丰厚又稳定可靠，能够较快地改变贫寒

子弟命运。有此一途，为何不走？难道像同时期的欧洲，搞贵族世袭制才对不成？

法国的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中国皇帝有一个定义：“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这就是说，中国皇帝拥有天下的最高权力。凡是读过高中的人，都学习过《孟子》、《战国策》的一些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国王们是以平等态度对待大臣、说客的。汉朝及其以后，除了少数个人修养极差者，中国皇帝的权力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中国有高于宪法的宪法——儒家学说。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必须按规矩出牌，臣子必须精忠职守；任何情况下，臣子必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人格得到充分尊重；倘若皇帝太混蛋，就“乘桴浮于海”，别陪他玩了。孟子来得更直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国君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所以朱元璋十分讨厌孟子。但是，即便在清朝，皇帝也必须认真处理每一位大臣的奏章，即便这奏章很不招人喜欢。

在分封制的欧洲，官职主要是世袭的。1190年，法国国王查理颁布“圣旨”：元帅一职由安茹伯爵的世袭地占有；诺曼底将军这个职位，则属于乌梅家族世袭财产。基佐感叹道：“这就是战争的一个全面指导者，一个唯一赋有指挥军队、指挥作战的权力的将军。许多文职官制已经变成世袭的了。但高级军事官职如果变成世袭，其危险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许多场合，封建的特权就是如此。”当然，不是所有的官职都能世袭，需要文化的官职就必须交给有文化的教士来担任。

在中国，只有龙椅是世袭的，但官位要交给有才之人，即所谓“天子传子，宰相传贤”。可能是沿袭周朝制度，汉朝实行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剑桥中国秦汉史》说，汉朝中央“政府由两级组成，即三公和九卿……三公的职责是议政与监督，负责全面地指导；九卿则负责规定的行政范围的特殊任务……三公这一集体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组成。三人之中丞相的地位最高，被描述为皇帝的助手，对国家各种事务都有责任。作为‘行政的首脑’，上奏给皇帝的公文必经他手，因此他可以行使权力有选择地上呈下级官员提出的建议。有时同时设两个丞相，作为分割最高权力的手段。御史大夫一职对有野心的丞相说来是一个牵制。与丞相一样，御史大夫关心的是向下级官员发布命令。他的特殊责任是考察文职官员的表现，有时他甚至负责检查丞相对国事的处理。作为政府工作记录的持有者，他能考察建议中的措施是否与国家已制定的规定相矛盾……从理论上讲，太尉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与另外两公平级”。但凡有重大政务，一般是在皇帝召集、宰相主持下举行朝议。决定权固然在皇

帝之手，但是，倘若宰相有不同意见，可以明确表示“不奉诏”或者“封还诏书”，要求天子重新决策。一旦决策敲定，由宰相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落实。汉代宰相拥有类似于当今“国务院办公厅”的丞相府，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三四百人，自主权很大，可领兵作战，可参与审判，可任免下级官员。

唐朝也搞三权分立，建立了更科学合理的三省分权的中枢：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专施执行。尚书省下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大部门，具体实施军政事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集中三大衙门的首长和有识之士一起商议国事。唐朝行政运转程序为：凡有军国大事，皇帝将方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中书省。中书省将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阅修改后发还中书省。中书省将修改后的文稿送交门下省。门下省审议后，如认为没问题，就转交尚书省执行实施。倘若门下省认为不妥，则“封还”中书省。中书省必须重新起草，奏报皇帝，如此这般，再走一次同样的程序。皇帝固然可以自主地任免宰相，但是唐制规定，皇帝与宰相们共商大事时，必须所有宰相同进同出，杜绝了皇帝与个别宰相密谋营私的可能性。因此，唐朝官员都很有个性。唐“玄宗和姚崇一期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难以从命……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唐高宗新建的宫室比较豪华，狄仁杰便上书痛斥营造官员司农卿韦弘机，这位倒霉的官员下了课。太学生魏元忠上书评朝政提建议，高宗见他说得有理，立马让他为官。明显讥讽皇帝祖宗的《长恨歌》，可以大张旗鼓地在社会广为传颂，宫廷也毫不避讳。因此，唐朝大政“鲜有败事”。

宋朝实行军政分立，设立了总参谋部——枢密院。中书、门下、枢密院的首长均为宰相，这就是宋朝的两府。宋朝皇帝多有修养有才华，“与士大夫治天下”，政治宽松，十分尊重朝臣意见。即便是犯了严重过错的大臣，也就是贬谪边远穷困之地而已。宋朝官员也是很有个性，当宰相们坚决不同意皇帝的决定时，要么皇帝收回成命，要么宰相提出辞职。这两种结果，宋朝都一再出现。因为寇准的坚持，宋真宗不得不北上亲征；因为不接受宋神宗修改新法的指令，王安石辞相。宋人吕陶说：“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从四品——笔者注），悉禀圣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正四品——笔者注）而下，即已经进擢，或记禄至中散大夫者（从五品——笔者注），皆由堂出，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正六品——笔者注）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也。”宰相们可自主任免四五品官员；四五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干部。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在宋朝，更多的是

一朝宰相一朝臣。一人就任宰相，便重组“内阁”，朝中重要岗位一概任用志同道合者。甚至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随宰相而变化。欧阳修将古文“运动”进入了科举之中；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其《三经新义》成了学校教科书；史弥远当政，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无论怎么解释，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皇帝为丞相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政治舞台。

宋朝思想自由、学者如云、出版业高度发达，不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传播自由，儒学内部也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在宋朝，朱子理学只是儒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支。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在学术上争论不休的儒家著名学者就有：“心学”的陆九渊、“湖湘学派”的张栻、“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叶适等。他们创办书院，亲自讲学，出版专著，围坐论道，将中国思想文化推进到精致无比的新阶段。“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即使挖苦当朝天子耽于歌舞不思复国，南宋朝廷也不追究。

无疑，宋朝及其以前，是士大夫主导社会的时代。皇帝所谓的专制，主要在于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担任百官之首——宰相。

明、清是无宰相的朝代。没有宰相，也就没有了“封驳”，没有了不同意见，皇帝说啥就是啥。一个军长，手下既无副军长，也没有参谋长，这支军队命运如何，就全看军长的了。**今天，人们每谈及中国的落后，无论对人对事，往往归罪于“封建”，归罪于“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这些看似深刻的结论，其实毫无历史依据。**今天，许多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认识或印象，皆源于明、清。

从朱元璋废相开始，天下“事皆朝廷总之，”没有皇帝的“批红”，什么也办不成。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这八天时间里，朱元璋收到各类奏章1666件，涉及3391件事情。朱元璋夙兴夜寐，废寝忘食，事必躬亲，认真处理了每一件事情。不得已，他设立了一个秘书班子，来协助自己处理繁杂的事务。

朱元璋是亲手打天下的，在守天下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凭空坐上龙椅的后人，未必就这么认真了。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20余年不理朝政，出现许多官员退休或者死亡后，长期没有新的官员接替的严重问题。官员的选拔权在皇帝一人手上，而皇帝又不管事，日积月累，大量工作停摆。甚至发生了因案件无人审理，被抓入牢房的嫌疑犯把牢底坐穿的荒唐事。

我们也许奇怪，明朝那么多皇帝既不上朝，怎么还能控制政局？由于国家不设丞

相，军政大权由皇帝一个人掌握，皇帝不上朝不发指示，至少在大事上没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仁宣时期出现了被后世当作丞相的“大学士”、“首辅”，清朝有所谓军机大臣，实际上，这大学士、军机大臣，仅在“级别”上与丞相相当，在行政权力上，与丞相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定范围内的事情，丞相可以不需奏请而作出决策，以朝廷意志颁行。而大学士、军机大臣，对任何事情只有“票拟权”，即提出处置建议供皇帝参考，是否采纳，完全取决于皇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不带“长”的参谋，没有任何指挥权。如果皇帝不表态，大家唯有一个处理办法：拖。

我们总在说“专制”，这，才是帝王专制。

所幸的是，明朝经过太祖、成祖两位强势皇帝的文治武功，将周边的各种势力清剿得差不多了，将内部可能造反的“藩王”整治得服服帖帖了，他们的后人基本上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内、外部威胁，胡作非为仍可为太平天子。

唐宋不一样。整个唐朝，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沿边的奚、契丹、突厥、回纥、党项、羌、僚等等，对手不可胜数。宋朝更甚，北宋有辽、西夏、金等强悍对手，南宋有强敌金、元。有宋一朝，没几天安生日子。宋朝皇室有一个可怕的家族病——癫痫病，俗称羊角风，宋孝宗有这毛病，宋理宗很多时候糊里糊涂。宋朝国家大政并不完全依赖皇帝，所以一切运转正常。

唐宋时期，皇室好比出资人，即股东，皇帝是股东会的全权代表，而丞相班子就是国家的经理班子。丞相班子根据皇帝的治国思路，在皇帝的授权下负责国家的日常经营。皇帝固然有权随时任免丞相，但是，只要丞相在位，便享其利、谋其政、行其权，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决定，不越权干预。丞相班子少则三人，多则五六人，国家大政的失误也就少了。

而明清，皇帝将股东、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了。国运系于一人，那就可怕了。明清之交的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清朝的皇帝们固然很勤政，但是，将偌大个中国交给皇帝一个人，累死他也是管不好的。

儒学功罪千秋评

儒家学说成为正统，始于汉武帝。自此2000多年来，儒学主导着我国政治思想界。

作为一国之君，必须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治国主张，汉武帝选择儒家学说作为自己治国思想本原，是无可厚非的。

儒家学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汉初的司马谈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分之为十家。后人将小说家除外，其他的合称“九流”。《汉书·艺文志》认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杂家出于议官。据其渊源和实践，纵横家潜心于合纵连横，接近于今天的外交学；农家相当于今天的农学；名家则专注于“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是哲学；阴阳家侧重于天文地理的研究；杂家专门归纳综合各家学说，不知道如何对应今天的专业，姑且称之为社会学。总之，上述各家皆属于专业技术领域，与治国扯不上多大关系。

具备让国君感兴趣的条件的，只有儒、道、墨、法四家。

所谓“清庙之守”，实即巫祝之类的神职人员。原始的科学技术均混杂在巫祝的“方术”之中，因而墨子很重视科学技术，《墨经》中就有力学、光学等理论探讨。墨家的政治主张，我以“兼爱非攻、共守清贫”来概括。兼爱非攻是指人要有爱心，反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主张。共守清贫就是尚贤尚同，即能人治国、官民平等、人人劳动生产、人人有饭吃，这同样是理想主义。以墨子的学说，治一村可以，治一乡镇也许还行，治一国显然是行不通的。至于其重视科学技术，则另当别论了。

法家学说已在秦朝实践过，效果显然不佳。“文景之治”是道家的代表作。汉武帝以前，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在政府占主导地位，留下的内忧外患让汉武帝头痛不已。

值此危难之际，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做出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选择。《剑桥中国秦汉史》说：“皇帝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而且大多数高级官员也来自儒家，同时大批身份较低的儒弟子被安置在中级和低级的政府职位上。甚至地方权贵、有势力的家族和氏族的族长、大地主、成功的商人，或者有重大影响和普遍号召力的地方军阀，开始以儒家作为自己的模范。在某种意义上，儒家的胜利是全面的。”

在治国方针上，“巩固工作让位于扩张和积极的主动行动；建设性的政策被采纳，以加强中国的国力和解决它存在的问题”。

在施政纲领和目标上，“政治家们计划改进国内的施政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计划组织经济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计划消除入侵的威胁和改善中国在边远地区的利益。到公元前108年，汉朝的军队已经向外推进到最远的距离，新的移民冒险活动也正在

组织之中。公元前105年的宗教仪式（指泰山封禅——笔者注）显示了汉皇室对号称取得的丰功伟绩的自豪感”。

在发展教育和官员培训上，“按照汉儒的信条，人在世上的地位，由他靠教育而得以显露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这被解释成一种合乎道德、遍及宇宙的原则”。“培养中国官员的进一步措施表现出一种偏爱与孔子有联系的传统著作的明显偏见。这就是在公元前136年为博士设置官制之事，目的是让这些人专门研究《易经》、《诗经》、《书经》、《礼记》和《春秋》五部指定著作的诠释。这一十分重要的诏令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经籍的观念即由此产生，据此还开了以这些著作培训官员的先例。”（关于发展教育等内容，前面已论及）

在文化建设上，“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突出表现出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引人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给称之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从宇宙角度解释人事，认为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约死于公元110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迁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是范例”。

在经济建设上，“时新派政策的采纳主要是由于桑弘羊（约公元前141～前80年）的影响。在当时所有的人中，他也许最能看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问题和潜力。他出生于洛阳一个商人的账房，在儿童时代，他已因善于心算而享有盛名。我们还听说在建立盐铁专卖制时两名大司农的助手脱颖而出……时新派政治家们主张通过自由经营去鼓励农业。他们同意大庄园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地产越大，向国家缴纳的税越多，所以他们准备利用发展庄园的结果来改善国家的财政。但是，他们主张对其他类型的生产——如矿业——实行国家控制制度，准备直接使用征募的劳工从事这类劳动并从产品中获取利润。此外，他们不希望让私人工商业巨头分润这类财源。他们认为，应把贸易作为分配中国产品的辅助手段来加以控制。因此，他们准备设置官员以监督国内市场交易，同时建立国营商队携带丝织品前往国外……国家完全控制了铸造新铜钱的资源，这种铜钱在唐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正式货币”。

在外交和军事上，“武帝朝制定中国政策的政治家们像注意组织经济那样注意外交事务，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从消极态度转为积极主动的明显变化。这时，帝国已强大得完全能够发动深入亚洲的远征，并能重新建立、重新装备和延长北方的防线，在新

进入的领土设郡，在海外派远征军，以及在以后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路线上促进贸易的发展……在朝廷中，愿意采取新的冒险行动和为汉帝的冒险下大赌注的先驱者有了地位。外戚自己也参加远征，他们决心凭借战争中的勇敢和胜利来保证其家族的有利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扩张和殖民政策与这几十年为了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而采取的措施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收获，到公元前104年，约有20个新郡被列为帝国的行政单位。在15年内，中国北方几乎根本没有受到侵袭。中国的权威已在西北显示出来，在以后几十年中，匈奴在公开与中国对抗时将犹豫不定。除了以丝绸换取马匹和玉器外，中国已学会种植和利用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三叶草）、石榴和葡萄树。在长安城，汉帝举办宴会、展览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使来访者深感汉帝国的富强，其中有些外国人（如匈奴的金日磾）被说服为汉帝国效劳，甚至升任最高的文官，其他许多人因被封为帝国的侯而为汉朝效忠”。

总体的成效是，“到公元前100年，时新派政治家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国内的风气和纪律也许已达到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新兴的官员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在边远地区，农村和市镇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暴力的威胁。中亚的非华夏国家终于对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武装力量表示尊敬，它们即使不是自始至终地欢迎，也愿意容忍每年从长安出发的大商队。那些擅长贸易和了解物资集散问题的专家负责汉代的国库。更为突出的是，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号称长治久安。它立国刚刚一个世纪多一点，国家的宗教和符瑞都表明它对自己的权威有了信心。通过这些方式，政府求得了有才之士的忠诚、地主的合作和农民驯服的效劳”。

从此，汉朝长治久安，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对此，李泽厚有个评价：“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同秦始皇以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它最为可贵的地方是抛弃了法家那种蔑视人的思想，至少在表面上确认强调了儒家仁学中的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不论今天人们如何指责他们的思想是虚伪的、骗人的等等，他们毕竟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精神的崇高性，反对人的兽性化，反对一切残忍的反人道的行为。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在汉代继续保持和流传下来，终于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正是汉代思想的宝贵成就。”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仅仅是将儒学确定为官方经世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也从未刻意压制其他学说。诸子百家著作照样流传，各派学者依旧开门办学。道家汲黯、司马谈，法家张汤、公孙弘等，还被委以重任。

事实上，儒学本身便很开放、豁达，从未摆出唯我独尊的架势。在儒家思想主导下，中国始终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与基督教独霸欧洲形成鲜明对比。汉朝为儒道佛三足鼎立奠定了基础，六朝正式形成鼎立格局。唐宋以来，更有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传入。清朝在北京还始终存在东正教堂。2000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尊孔的文庙与佛寺、道观、土地庙、清真寺等一样星罗棋布。中国历代帝王无不坚持以儒学治国，尽管其中虔诚的道教徒、佛教徒不可胜数，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其他任何宗教实行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中国百姓一边以儒学修身齐家，一边各拜各的神灵。

反观18世纪以前的欧洲，除了基督，谁还能找到另外一个神？

儒家学者多甚为开明。直接促成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就吸收了大量的道家、阴阳家的理论来充实儒学。唐朝儒家学者，无不深受道家、佛家思想的熏陶、影响。李白既胸怀天下，又高喊散发弄扁舟；王维既畅想边塞建功立业，又写禅意盎然的辋川诗。宋朝干脆三教合一，在程朱理学中很难分辨谁是谁了。清朝大儒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无不主动学习吸收外来文明。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最重要的成果，是奠定了文人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以此为开端，逐步建立了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从而造就了我国的士大夫阶层，炼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情结，铸就了我国的民族之魂。

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修灵渠建驿道，将中华大地打造成了一个物质上的整体。如果我们称秦皇之功为华夏筋骨血肉的话，那么，汉武帝独尊儒术则是练就了民族魂魄。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至今，人们沿袭汉朝的称呼，称中国人为“汉人”（与汉族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说的是“汉话”，写的是“汉字”，穿的是“汉服”。辉煌如唐朝，从中央到地方，亦汉朝的正宗传人自居。

儒家学者认为，以文化论华夷，只要认同中华文化，不分肤色不论种族，都是中华的一份子。汉朝时匈奴人，唐朝时胡人，明清时西洋人，都可以在朝为官，甚至官至丞相。一个民族，血缘只是一方面，共同的文化基础才是根本。

我不赞成将中国人分成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之类的做法，中华大地的每一个成员，都只是华人或者汉人。今天所谓的汉族，很难说谁是血缘纯正的“汉人”。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西夏、清等几次大的

“民族”融合，即便汉朝，也多次将大批的“少数民族”移居内地。2000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无数“外族”人改用汉姓，与汉人通婚。斗转星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们即便再花费十倍的气力，也无法找到曾经主宰中国半壁河山的鲜卑人、契丹人、西夏人、金人等先民的正宗后裔。而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地位的如匈奴、氐、乌桓、夫余、肃慎、巫蛮、长沙蛮等等，更是无迹可寻了。很可能，你说自己是汉族人，按照父系或者母系，你的远祖就是契丹人或者鲜卑人；很可能，你认为自己是满族人或者蒙古族人，而你的远祖恰恰是当年的汉人。

汉朝以来，匈奴动辄万人归附中央迁居内地，进而汉化，以至于在中原一度建立自己的王国。北魏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朝代，追根溯源，隋唐便是北魏的继承者。北魏王朝的创建者鲜卑人，起源于呼伦贝尔草原，逐水草而居，不断南迁，最终入主中原。494年定都洛阳后，北魏孝文帝下令：禁鲜卑语，改用汉语；禁鲜卑服装，改穿汉服；禁鲜卑礼仪，改用汉人礼仪；实施汉人官制、法律，创办汉化学校。孝文帝认为“魏之先出于黄帝”，“夫土者，万物之元也”，所以，他决定将皇族改姓元。鲜卑人的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独孤氏为刘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步大汗氏为韩氏等等。隋唐皇室的先辈是汉人，世代在北魏、西魏、北周为官，与鲜卑贵族通婚，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还是亲戚，他们的母亲都是鲜卑人。

辽、金曾长期统治中国北方，统治者全盘照搬宋朝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元朝当政者看来，什么契丹、女真的，都是汉人，而蒙古高原曾一直是辽金的属地。自成吉思汗以来，至少有数十万内地人移居于蒙古草原。1214年，成吉思汗伐金，“尽取山东、两河少壮数十万而去”。元统一全国后，不断有全国各地的工匠、农民等大批移居蒙古高原。同时，大批蒙古人、色目人定居各地，与当地人通婚杂居。朱元璋手下有不少蒙古将士，而撤至蒙古高原的，也有大批汉人官兵。至于清朝，后金起兵时，东北本身便是民族混杂之处。什么满八旗、汉八旗，较真起来，努尔哈赤的祖宗，是否纯正的满人，也得另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燕代的自由世界。

与古希腊并无血缘关系的日耳曼人后裔尊崇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因为欧美人将他们看作西方世界文化之源。同样，我们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是我们将炎黄确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一个民族的内核是文化，是共同的信仰。移居中原的氐人、鲜卑人、契丹人、西夏人、金人等等，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修身齐家，以儒家思想治国平天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华大家庭。

不管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从骨子里，我们依然是儒家思想的支持者、实践者。对于家人，大年三十，我们会不远万里顶风冒雪赶回家，与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家子同桌吃团年饭；对于同学朋友和乡邻，我们会讲义气甚至两肋插刀，将他们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正是让西方人惊讶的“回家过年”等一系列中国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才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

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流浪世界千年，始终自成一族，是因为对自己宗教信仰的虔诚；同样，因为儒家学说的有效传承，无数中国人漂洋过海聚族而居于异国他乡，数百年后的子孙们仍坚称自己是华人。正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凝聚起来，形成了一个打不乱、拆不散的整体。

前些年，“台独分子”推行“去中国化”，首先就是力求将中国传统文化这根血脉割断，在教科书中大量删除传统文化的内容。洋人反儒学，“台独分子”反儒学，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今天的某些专家亦如此，就不可思议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肯定儒学，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什么。以博大的胸襟，积极学习世界各种文化，珍爱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祖宗的传统，才是正宗的儒学。



结语：对外开放的条件

第8章

对外开放，就是在平等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互通有无，广泛合作，实现双赢。反过来说，当你拥有让外人感兴趣的东西，才可以跟别人坐下来谈合作。

显然，对外开放，必须是有本钱的。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或者一支装备大刀长矛的军队，是没有资格谈军事开放的。一个无钱、无自然资源、无智慧的国家，即便你把国门卸下来扔进太平洋，也没人对你的开放感兴趣。

举两个例子：一个中国的，一个外国的。

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没有国门了。先是中国海关的首脑由洋人担任；《辛丑条约》之后，守卫首都北京的大沽口炮台被拆掉了，山海关至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上驻扎了洋人的军队。此时的中国，彻底地开放了。

洋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鸦片。民国时期，只有鸦片馆这一洋文明深入到了中国的每一角落。代表现代文明最高成就的上海，就是一个大的修理厂，帮助别人修修汽车、轮船。代表近代工业的机器制造，始终与中国无缘，上海连拖拉机也造不了。

中国主要出口了四样东西：一是领土，国土面积减少了数百万平方公里；二是自然资源，煤炭、矿石等东西，只要洋人搬得动，能搬多少搬多少；三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今天，我们要了解自己祖宗的言行，很多时候还必须访问洋人的博物馆；四是人口，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都规定清朝不得禁止华工出口，据不完全统计，1845年到1875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至少有60万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也承认这是“一种与奴隶贸易毫无区别的贸易”。

再说外国的例子。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我们怎么“普及”外语教育，即使再过20年，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也难以达到部分亚非国家20年前的水平。印度、

巴基斯坦、赞比亚、斯威士兰、冈比亚、利比里亚等国，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乍得、中非、尼日尔等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至今，我国还有数不清的知识分子，还在为有关部门设置的外语“门槛”而烦恼不已。相比之下，这些国家与“世界”融合到了极点。

开放了，就一定能发展吗？答案是：未必！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华山论剑。华山论剑之初衷，是为武功交流搭建一个开放性平台，遴选天下第一是手段，切磋武功才是目的。华山论剑，固然是人人可以参加，不会武功的，也可以当观众看热闹。天下武林，因为华山论剑的存在，显得极其开放。但是，武林和商界一样，热衷华山论剑的，郭靖一般纯洁无瑕者毕竟是少数，欧阳锋、慕容复之流大有人在，要么是为了捞个第一第二的头衔，要么为了更加隐晦的目标。要想在此盛宴中有所收获，首先必须先打遍天下，获取“百强”甚至“十强”俱乐部的门票。否则，即便自个儿爬上华山之巅，也找不到与高手过招的机会，最终也就落个“到此一游”罢了。因此，华山论剑不过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们的私人宴会，其他人至多也就是陪练角色。

练武之人都希望拜东邪、西毒为师，东邪、西毒们也从不拒绝收徒。看起来，武林也很具有开放的基础。不过，真心拜师的不可胜数，实意收徒的却不多。在收徒上，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不适用。即便被东邪收为弟子，想要得到真传，比登天还难，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东邪的几个弟子，因为背着师傅学了绝学，竟被打残后逐出师门。所以，在武功第一的师父与普通徒弟之间，平等意义上的开放是不存在的。

当今世界，拥有华山论剑门票的，当然是欧美。想要高科技，必须到欧美；想要大笔的资金，必须到欧美；想上最好的大学，必须到欧美；想找最好的工作，还是必须到欧美。即便某些国家的叛乱分子，想要讨个“公道”，或者弄点先进武器回去搞颠覆活动，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欧美。欧美让外人感兴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想不开放都不行。

欧美是一个贵族俱乐部。西欧、美国、日本等贵族国家，虽然块头大小不同，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一战、二战打下来，他们明白了：高手过招，不死即伤，还是合作的好。经过一些年的磨合，初步完成了市场分工——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了一种高手之间的有序竞争，更多的则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

由于人类资源有限，控制贵族的规模成为贵族们的共识。早在中世纪，贵族们就

达成了禁止新会员加入以维护贵族整体利益的默契。对于想挤入贵族圈的资产阶级，对于任何挑战贵族、有损贵族利益者，贵族们心照不宣地同时举起刀枪给予屠杀。一场法国革命，招来全欧洲贵族数十年的持续攻击。鸦片战争以来，即便在英法两国相互敌对的时期，每次教训中国，他们都是肩并肩手挽手。今天，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贵族们无不精诚合作，你扔炸弹我开枪。

贵族打杀农奴，自古以来就是合理合法的。农奴即便富可敌国，也是低贱的。美国立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手握令贵族胆寒的武器了，才能甩掉农奴的帽子。美国打击曾经的盟友伊拉克，再一次证明，富裕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国家，终属第三世界，贵族们随时可实施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军事打击。**弱国开放与否，完全取决于强国想不想让你开放。**

中国近些年有很大进步，但是，既没有最尖端的产品，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连地底下值钱的东西也不多。即便储量稍大的东西，满足我们十几亿人自身需求都有困难。中国最多的，就是十几亿人口，而整体文化素质还不够高。我们手握数以千亿计的美元，美国却拒绝卖给我们数千种商品。我们输出以十吨百吨计的血汗产品或不可再生的资源，不过是为了一纸“技术”，能不能换成，尚取决于别人高兴不高兴。我们拿出半卖半送的土地、只需管饱饭的民工、半收半送的税务政策、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不过是为了人家带几张图纸到中国来，让他从此坐收红利。但是，人家未必高兴来，即便来了，必定缺少那张最关键的图纸。

说说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一件事。那是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家家都希望有一辆凤凰或者永久牌自行车，而获得的途径只有权力或者奖励。邻居大哥因工作出色，获得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购买指标。一家人乐滋滋地到商场后，营业员始终用一句话支应：下半年再说。后来，找到商场的一名科长，送去了两个水果罐头，才将自行车骑回家。

物资短缺的时代，消费者是渴求“对外开放”的，而营业员以奇货可居而“闭关锁国”。市场经济也好，经济全球化也罢，尖端技术永远是短缺的，供给不足的。掌握尖端技术销售权的营业员，照样是满脑子奇货可居的想法。而购买涉及国家利益的尖端技术时，绝不是靠送两个罐头就能够摆平的。

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绩有目共睹。我想说的是，要想实现真正的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必须通过自力更生，不断创造出让贵族眼热的新东西。否则，对外开放将始终是低层次的——我们主动敞开大门以求别人开放，是不会有真正的平等互利可言的。

不经历拜师学艺、闯荡江湖，而想在华山论剑中捞个名次，何其难也。单靠师父教的几个绝招，不肯下功夫钻研领会、有所创造，连走出“门户”都会困难，遑论进军华山。武林顶尖高手，其武功精奥之处无不是靠苦苦修炼而自成一家。

正如脑笨口拙的郭靖靠勤学苦练与细心琢磨终成一代宗师一样，我们的十几亿人口，必定是一个潜力巨大的钻石矿、升值空间巨大的绩优股。在坚持韬光养晦、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以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潜心抓好人力资源的开发，好好地挖掘这个宝藏。只有当将人口优势转变为智慧优势、对外贸易以自主创新的成果为主时，我们才会实现真正的对外开放。

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锁国，恰恰相反，立足于自力更生，才是实现有效的对外开放的前提。我坚信《国际歌》中的一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